天山南北的记忆

武纯展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8-14264-4
9 787228 142644 >
定价:42.00 元

天山南北的记忆

武纯展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山南北的记忆/武纯展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7-228-14264-4

Ⅰ.①天… Ⅱ.①武… Ⅲ.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271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42.00元

前　言

《天山南北的记忆》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新闻采访实录，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散文集。

本书作者武纯展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第一代新闻记者。1952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时年，他只有17岁。从此，照相机陪伴着他在新疆度过了半个世纪。他的摄影技艺、新闻采访水平与时代俱进，与共和国同成长，与新疆共发展。

长期以来，武纯展通过新闻图片、摄影作品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边疆地区风貌，建设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绿洲城市的振兴作了一系列报道。他曾先后绕行塔里木盆地，南登帕米尔高原，北行伊犁河谷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报道。他的一些作品被《人民日报》、《中国旅游》等杂志刊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刊、专版和画册，其中"坎儿井"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与生活"的柯尼依西卡俱乐部奖；"塔里木秋色"、"待渡"曾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刊载并得到同行的较高评价。

这个集子的每篇文章，每一幅图片都是作者对天山南北的发展、对新疆的历史进程，以及相关人物命运的变化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

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美好事物发自内心的赞美。其真情实感跃动于纸上，特别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平实而又坚定的社会责任感，让人感受到一种勃勃向上的精神；同时也让读者看到那个年代人们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工作风范，以及热爱新疆、热爱岗位、真诚待人、不计个人名利的质朴品格。

做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时时被那些美好的时事及人物所感动，不断滋润着他的心田，激励着他奋发，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因此，他觉得仅仅用相机还不足以表现出他所见闻的精神风貌，所以又拿起笔，更充分地传递着那叱咤风云的时代精神。正如作者在出这本书之前所表白的那样："在40多年的新闻采访生涯中，我走过天山南北的许多地方，饱览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经历过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接触到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脚踏实地、默默奉献在最基层、最偏远的普通人。那些动人的事迹，时时拨动着我的心弦。无论是风沙、大漠的旅途遭际，还是雨夜毡房的杯酒笑谈，都给我的生命不断注入希望和活力。这些不能忘怀的人和事，常常萦绕在心头，即便是退休赋闲已步入人生古稀之年，我依然对往昔的记忆回味无穷，感到温馨，欣慰和振奋，以至于不得不把这些美好的回忆记述下来，奉献给读者。让我们永远记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平凡的奠基者。"

这个集子是他对采访生活的回眸，也是他对旧雨新知的感怀，更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有力见证。

作者虽然是出生在伊犁的西北汉子，可他的写作风格却细致入微。他笔下的《穆青重返新疆》，能把读者带进现场，让你亲眼见到穆青发现和发掘新闻题材的那种激情，感受到新闻长者如何贪婪地追逐着真善美。读着这篇文章，似乎我也同穆青一起进出一户户维吾尔族农户，亲眼见穆青跟农民促膝攀谈、算收入、拉家常，他跟老乡像走亲戚一样，谈笑风声、亲切随和。

武纯展自述和王恩茂在一起的日子，展现给读者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爱民胜过爱自己的特质，重现了王恩茂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融入百姓中，与维吾尔老乡同呼吸、共命运的手足情。从这篇文章中让人们感受到王恩茂是一位亲和力极强的领导者。

作者文风十分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夸夸其谈的个人评论，通篇都是用事实说话，声情并茂。他用图片记录的"葡萄姑娘"和用文字描述的"葡萄奶奶"画出了王惠珠一生在吐鲁番传授、推广葡萄种植科学技术的事迹。成为千千万万服务在边疆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的一个缩影。

书中记叙最多的还是天山南北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就守护克孜尔千佛洞的维吾尔族老人尼牙孜，忠于职守、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文化瑰宝的故事；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阿尔泰山的牧民；喀纳斯湖图瓦人的生活；边防哨卡的士兵；深山老林中的护林员；胡杨林中相爱相助的故事……武纯展同志尤其关注新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及其各层人物的命运变化，这些都被他一一记录在书中。

总之，这是一本很有趣味、很有故事的书，能使你看到往日新疆的书；有历史跨度的书；了解记者生活的书；使你得到人文知识的书。

打开这本书吧，会使你深长思之。

编　者

2011年3月

目　录

忆 同 行

考古随笔

印 痕



历史的功劳簿上



记者节有感

每当记者节来临的时候，作为一名退休多年的新闻记者，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追忆当年的采访生涯，以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我是一名摄影记者，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已有40余年。在天山南北连年奔波的旅途之中，我亲历过许许多多的重要事件，也采访过许许多多的平凡人物。有些事件和人物给我以启迪，给我以激励，给我的新闻摄影工作注入活力，令我深长思之，记忆犹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华社的一位同事到吐鲁番采访时，曾经拍摄过这样一幅图片——一位汉族姑娘为开墩不久的葡萄藤剪枝打杈，旁边的维吾尔族老人眯着双眼，全神注视着姑娘的双手。文字说明透露的信息是：毕业于内地院校的这位姑娘来到“葡萄之乡”吐鲁番，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高产种植技术，进行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这幅新闻照片及其文字说明，引起我对摄影作品表现力或冲击力的思考。此后我多次前往吐鲁番的葡萄园中，把摄影镜头瞄向那些辛勤劳作的农业技术员们，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终于拍摄出一组“从葡萄姑娘到葡萄奶奶”的专题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阿勒泰草原的深山牧场采访时，遇到一位刚从县城回来的哈萨克族牧民，在毡房外面向牧民们讲述自己在县城的所见所闻，言谈之中透露出许多改

革开放的新消息，听讲的哈萨克族牧民们，既惊奇，又兴奋，身姿不同，神情各异。我立即举起相机，把这一场景纳入镜头，向外界展示出阿勒泰草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遥远的牧区社会正发生着深刻变革。1979年新华社组织丝绸之路采访报道，我和几位同事在丝绸之路沿线作了一次艰难的旅行，积累了许多报道素材。此后十多年中，我对一位名叫尼牙孜的维吾尔族老人始终难以忘怀，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守护克孜尔千佛洞长达40多年，坚韧不拔的精神感人至深。因此，我多次前往克孜尔千佛洞，追踪采访尼牙孜老人以及他的同道——长期驻守克孜尔研究丝路文化的人们，相继发出"龟兹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和后来的吐鲁番"交河故城考古新发现"等专题摄影报道，从几个侧面反映丝绸之路的古今变迁。我深深地感悟到，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当他记录现实生活、反映历史进程的时候，善于发现受众关注的东西并且不断拓展报道深度，从而准确、及时、鲜明、生动地给予反映，也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我把多年新闻采访中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沧桑巨变五十年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5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它所带来的历史巨变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维吾尔族有句谚语："没有经过寒冬的百灵鸟，不知道春天的可贵……"新疆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幸福的这一段历程，使各族人民深深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人民带来明媚的春光，才使新疆走向发展振兴的大道。

谁会想到在旧中国不能生产一颗铁钉的新疆，今天从钢铁、煤炭、机械、电力、石油、纺织到食品，已经建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著名艺术家阿布都·古力（维吾尔族）正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新中国成立初，和田沙漠绿洲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准备带着哈密瓜和葡萄干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救星毛主席。当初，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用手中的钢笔和相机记录了这感人的故事。老人怎会想到，现在天山南北公路网络四通八达，航空线路不仅连接着北京，而且连接着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城市，乃至中亚的一些国家，加之亚欧大陆桥的开通，红其拉甫口岸对第三国开放等。铁路的开通，光缆通信网的形成，这些不可想象的便捷，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现实，也把遥远的新疆同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不仅如此，旧社会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无雨满街土、有雨一街泥、破旧落后的乌鲁木齐，今天高楼林立，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作为自治区的首府，已经以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屹立在祖国的西北边疆，正向中亚乃至世界著名城市迈进。而这些变化，无一不被我们新闻记者定格成难忘的历史瞬间。

新疆的历史巨变，莫过于人的命运的变化。被人们称为新疆"金唢呐"的阿布都·古力老人，从12岁学会吹唢呐开始，便在新疆南部的绿洲村镇过着乞讨般的卖艺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吸收为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从那之后，欢快嘹亮的唢呐声不仅响彻天山南北，而且还在大江南北让人们领略他的艺术造诣和幸福情怀。这位艺术家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他的大儿子克里木演唱的著名歌曲



新疆医科大学何秉贤教授（汉族，右一）和肉孜·阿吉教授（维吾尔族，右起第三人）正在诊断病情。早年，他们是师生，今天是新疆医学界的著名人士。



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新疆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教授吾守尔·司拉木在为汉族学生授课。

《塔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的母亲叫中国》长久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阿布都·古力由一个乡间艺人而成为新中国的艺术家,这仅仅是许多维吾尔族人命运变迁的一个事例。新疆医科大学心血管专家肉孜·阿吉是喀什古城一个贫民家庭的儿子,1956年他来到当时的新疆医学院,在汉族老师也是著名心血管专家何秉贤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并一直跟随老师从医教学,同老师一起带出十几名博士研究生。每年肉孜·阿吉的生日,全病区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等各族医护人员,都会为他举行隆重的生日庆典。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新疆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教授吾守尔·司拉木也是在新中国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人的命运的变化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昔日的放羊娃成为专家学者;荒漠绿洲的孩子步入高等学府;偏僻乡村的姑娘登上国际音乐艺术殿堂。这些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之转机,都同新中国的诞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密切相关。

今天,新疆各族人民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石油勘探开发的井场上,在攀登科技新高峰的征程中,在建设棉花基地的田野里,在草原、在工厂……他们携手并肩,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拼搏奋进!

记者应是美的使者

——记穆青重访新疆

1990年9月15日,我们新华社新疆分社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新华社社长穆青来到乌鲁木齐,看望新疆分社的全体职工。庆典活动结束之后,他对吐鲁番、石河子和伊犁等地进行考察访问,新疆分社指定我全程陪同。

穆青第一次进疆是在1964年,这次算是故地重游了。短短的十几天,我从穆青的采访和摄影活动中,感受到这位著名记者对新疆大地的热爱之情,对新闻事业勤于耕耘和执著追求的精神。

"我们记者应是美的使者"

这是穆青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在新疆采访的日子里,他努力发现美,用心追逐美,处处显露出著名记者的才华。

从乌鲁木齐去吐鲁番的路上,穆青话语不多,目光始终盯着车窗外面的一景一物。车到达坂城,穆青走上一个小土坡,眺望一片随风势而弯曲的老榆树和天山博格达雪峰。这里是新疆著名的风口,一年四季风声呼啸。穆青站立风中,望着眼前的景色,久久不愿离

去。达坂城往东，是一片丰美的草地，溪水萦回，羊群漫游，远处的列车飞驰而过。看到这幅动静结合的壮观图景，穆青抑制不住荡漾的激情又招呼停车，要把这幅美景纳入镜头。

吐鲁番葡萄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了，但葡萄沟里错落有致的建筑物——制作葡萄干的阴房却吸引着穆青。他走到山头的制高点去拍摄全景，然后又走进阴房，在葡萄串的空档之间走来走去，寻求最佳拍摄点。

拍完葡萄干的阴房，我们又一道参观交河故城和坎儿井，访问果农。傍晚时分，穆青已经很劳累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40公里以外的地方，拍摄火焰山落日。因为他预感到，黄昏时的火焰山也许会更红、更美。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驱车来到火焰山下时，夕阳已为它涂抹了特殊的影调，比我往日所见美多了。穆青不顾脚下的砾石、土冈和沙尘，去追逐殷红的光影和山峦中图案般的纹路。待到群山湮没在薄暮之中，他才回过头来，赞叹戈壁日落之前特有的深邃博大之意境！

在去伊犁途中经过天山峡谷时，穆青已经完全沉浸在美妙意境之中了。

进入天山峡谷，景色更是美不胜收，群山烘托着银光闪烁的雪峰，公路像一条飘带铺展于崇山峻岭之中，峰回路转，变幻无穷。面对这一宏伟工程和山中景物，穆青注入一片深情。他手持照相机从山底拍到山顶，汽车一进入哈西勒根冰峰的防雪走廊和穿山隧道，耸立的雪峰、蜿蜒的公路使穆青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海拔近4000米的天山之巅。他不顾寒风刺骨，不顾高山缺氧，爬高坡，登巨石，去选择表现这一工程和天山气势的最佳角度，直到拍得满意为止。翻过山巅，到了一个名叫乔尔玛的谷地，天山深处的另一番景色使他更加激动。绿中透黄的金秋草原，白浪翻滚的山间河流，笔直的松树，蓊郁的林野，构成了天山腹地的又一画廊。时值深秋，牧人们赶着肥壮的牲畜正向新的牧场迁移。穆青立刻把镜头对准这些转场的牧

民。从这里开始，汽车走走停停，他几乎没有放过任何美好的景物。本来预定在距乔尔玛较远的尼勒克种蜂场用午饭，此刻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午后3点多钟才选择了一处能够看到溪边毡房和畜群的高坡，啃了一点干粮。他边吃边看，从羊群、牛群、马群的移动中寻找着最好的拍摄时机，他一而再地赞叹："太美了，太漂亮了！看来我们今天走不出这条沟了。"我们早已过了预定到达尼勒克种蜂场的时间，他也多次下决心说"不拍了，不拍了"。可一看到新的景物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有一次，看到前方有一个牵着几峰骆驼转场的哈萨克族牧民，我们问穆青还拍不拍，他说："不拍了，就是牵着老虎也不拍了！"可是到了跟前他还是忍不住，走下车去抢拍了几个镜头。事后他说，在阿拉伯看到的骆驼都是干瘦干瘦的，而新疆的这些骆驼，身躯肥壮，驼峰高耸，看起来特别精神。这一天，我们到达尼勒克种蜂场是傍晚8点钟，而到达伊宁已是午夜12点半钟了，掐指一算，行程整整14个小时。

在穆青的眼里，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风光，都有美的真谛。采访过程中，穆青常把听到与看到的人和事同1964年他第一次到新疆时见到的相比，从对比中发现更新更美的东西。后来我意识到：一个记者不正是通过对美的感受而引发的激情，去发现和发掘新闻题材的吗？

他到农家像是走亲戚

从吐鲁番盆地到伊犁河谷，穆青都十分注重采访农民，总是要到他们的家里看看，和他们聊聊。在吐鲁番，当地报社的负责人陪着穆青进入一个农家，穆青显得非常高兴。农家庭院里，葡萄藤织成浓重的绿荫，垂累的葡萄和墙边的花卉使整个院落幽静而充实。男主人不在，女主人和孩子把穆青一行迎进凉爽的客室。吐鲁番盆地天气炎热，进入客室都十分凉爽、舒适。看得出，这家客室是新建的，红

砖墙面镶嵌着蓝色窗棂，屋内四面顶部的墙围都是用水银玻璃和彩色玻璃拼起的几何形图案，熠熠生辉。地上铺着一块和田地毯。客人们席地而坐，观赏和闲谈。女主人一面打发孩子去叫他的父亲回来，一面忙着烧茶。不一会儿，茶水烧好。女主人在院内葡萄架下的毡毯上又特意铺上几块褥垫，置一个大圆桌摆起一大盘油馓子和白面馕，刚刚从棚架上摘下的马奶子葡萄青翠欲滴。穆青在圆桌前刚刚坐定，男主人急急忙忙地回来了，他立即起身相迎，握手交谈。男主人名叫阿布都·热依木，时年46岁，妻子名叫加木拉汗，他们是葡萄乡博于勒买里村的葡萄种植专业户，承包60墩葡萄，预计1990年可收2.5吨葡萄干，收入可达1.5万元。穆青和他们谈经济收入，谈家庭成员，谈葡萄沟风景，言谈笑语，就像走亲戚拉家常般的亲切而随和，他对农村太熟悉了。

在伊宁，仅停留一天，穆青却用半天时间访问了伊宁县愉群翁乡的两户农民。第一户名叫伊拉洪，是54岁的维吾尔族农民，是这个乡第一个富起来的人，近几年新建了自己的庭院。院内一半的空间种植着各种花卉和苹果树，而另一半则掩映在葡萄架下，一排有廊檐的住房排列在院子西北角上。主人热情开朗，一见到穆青便拉着他的手让进围着沙发、挂满壁毯的客室，穆青一进屋便说"好漂亮!"主人谦和地向他们叙述发家的过程。当说到每年已经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时，穆青便问："你是不是这里最富的?"伊拉洪说"现在不是，因为劳力少，过去承包的是粮食地，近几年才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收入只是中上等而已，不过现在的收入和生活同过去是没法比了，好得很。"穆青鼓励他说："只要把粮食种好，把加工厂办好，你会更加富裕的。"临走时，穆青送给伊拉洪一包方糖、一盒茶叶，表示一个远方朋友的情谊。在愉群翁访问的另一户农民是养鹿专业户，他名叫胡赛，和穆青一样，也是回族。他的院子很大，房屋多而新。穆青同这位回族老人坐在炕沿上拉起家常。谈到收入，老人怕露富，当着大家的面不愿讲，穆青便贴近这位老者："实事求是地讲讲你的收入。"胡

赛只是说:"发了!"穆青问:"年收入有没有5万?"他答:"完全有。"站在旁边的一位乡干部说:"10万也不止"。对于这个数字,老人没有否认。但始终没有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他领着穆青到院子里转转,看到他的鹿圈里圈着健壮的11头公鹿和给他儿子新盖起来的另一个大宅院。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的一个家庭农场里,穆青同这个农场的主人刘小国的一席谈话也是十分情深意切的。刘小国是河北人,1966年转业到这里,1985年办起联产承包的家庭农场,1990年改为统一种植专业承包。全年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主人谈起河北老家,穆青感到格外亲近,他对刘小国说:"过去打仗,我经常在那里跑来跑去,对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话题转到1990年收成时,穆青问刘小国:"小麦怎么样?"他说:"不错。"

"能打多少?"

"700多斤。"

"老家怎样?"

"老家过去一亩三四百斤就不错了。现在可不一样了,一般500斤左右,好的达到800斤。"

"这里一年种几茬?"

"一般是一茬,最多两茬。"

穆青对刘小国讲:"河南扶沟县一位农民一年七种七收。前些日子他给我来了封信说,1990年光粮食就可收3000斤。我去看过,这位农民就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他是一茬小麦,三茬玉米,一茬绿豆,两茬蔬菜,我去的时候还有两茬菠菜没收。这个农民就是靠科学种田,他是个初中生,给我的信上说,每天不到夜里12点他是睡不着觉的。那里地少人多,只好想办法挖掘土地的潜力。"

穆青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他所到过的省区都有他的农民朋友。他的文章里照片中,凝结着对农民的深厚情谊。

“什么事都得琢磨”

6月21日，穆青从伊宁返回乌鲁木齐。途中穿越天山果子沟，经过奎屯新城，石河子垦区和昌吉市。这是1964年穆青第一次来新疆时走过的路线。他的脑子里，还保留着对果子沟和赛里木湖的美好记忆。一上路，他就说要把这次的感受和看到的变化记录下来。

果子沟已是层林尽染，秋色斑斓。峭壁上的松林直插蓝天，墨绿色的林野中，山杨、白桦、野果树已经透出火红或金黄的色彩。这里也像我们去伊宁时走过的乔尔玛、唐布拉山谷一样，牧民正在转场，不同的是，果子沟的山谷比那里要窄狭和险峻，转场的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不是在谷底的溪边，就是在山坡上，构成了一幅幅变幻多彩的画面。这一切，还有那接二连三出现的瀑布，当然都没有逃过穆青的眼睛。他在观察，他在构思。对我这个在新疆工作多年、多次往来果子沟的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总认为这里的瀑布不算什么，没有多少拍摄和表现的价值。可穆青不这么想，他远远就盯上了那一束垂挂山头的白练，刚到瀑布前面，他便让停车，登上一个高高的山包，左瞄右瞄，选择精彩的一段按下快门。他看我还不太理解地愣在那里，便把相机移近我，让我看一下他所截取的画面。在取景框里，瀑布下面的杂物和终点没有了，只见那股来自天际的瀑布在林间山头飞珠溅玉，构成一幅奇妙的景致。我由衷发出“原来是这样”的感叹。穆青则说，什么事都得琢磨。

凡事多琢磨就会有新发现，当我们到达赛里木湖时，我更加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赛里木湖是我们行程中最重要的停留点。穆青本来以为还是像1964年那样绿草如茵，湖边布满牛羊。可是到了山顶一看，深秋的草原枯黄了，牧人的毡房都已转移，所见的只是养路段的一些牛马散落在湖边。他寻找了好一阵也没有找到理想的镜头。湖边野餐时，穆青望着波光万顷的湖面发愣，继续前行时，

眼睛还是那么盯着。他在思索什么?当汽车沿着湖边拐到赛里木湖的另一端的时候,他忽然让车停了下来,闪着欣喜的目光直向湖边一丛芦草走去。这时我也看到微风中摆动的芦草,晶晶耀眼的光波一直把视线引向朦胧的远山。这种动和静的变化,近景的优美和远山的气势,真的很吸引人,他拍了,我也拍了。后来,穆青在一次民族报道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通过赛里木湖的这个角度和这种拍法,我打破了一个格式,就是拍摄赛里木湖必须有马有牛,有野花,有蓝天,有白云雪山才漂亮吗? 如果你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怎么办?这就看怎么找角度的问题。我们写文字报道也是如此,千篇一律大家都在那个上面做文章,文章做不好。新疆的图片报道也有公式化,一讲到新疆的草原,上面有高山雪峰,下面有松树,前面有草场,后面有羊群;就像我们那种公式化的新闻和一般化的新闻一样。如果你能打破这个格式,就一定会写出和拍出非同寻常的好稿子。"

车过赛里木湖,一路经精河县种牛场,穆青看到路边堆积的棉山和农民交售新棉的热闹场面,他下车走到售棉的农民中,棉堆旁,了解当年棉花的收成,寻找照相的角度。经过精河县城时,公路两旁有一公里多长的路段,断断续续摆着许多哈密瓜的瓜堆。瓜色诱人,光线也好,却没有顾客,摊主呆坐着,其中一个摊主竟在瓜摊旁的床上睡着了。穆青对准他拍下一张照片。事后他说,这里面有新闻。透过这个细节,不是正好说明今年新疆哈密瓜特别多,多得没人买?这是新闻! 说实在话,这种角度我过去从没想过,见到了也是不以为然。回到乌鲁木齐,在同记者们谈到此事时,穆青画龙点睛地说出了实质。他说,记者遇事应该多动点脑子,千万不要满足"大路货"的东西。要寻找,要观察,抓住它的特点,选择好角度。一个生动的细节,往往也可以成为很有意义的新闻。

穆青为办好世界性通讯社提出的文字图片两翼齐飞的观点,今天看来,这个主张的意义已不限于新华社了。这次在新疆同新闻界

朋友们的接触中，他不仅从宏观上表达了对当前新闻改革的一些看法，鼓励记者热爱边疆，热爱少数民族，抓住特点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把新疆的美和变化传播给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他还希望文字记者学会摄影，从美学的观点看事物，选角度，深入观察，从一些有特色的细节中发现有意义的东西。他是文字记者学摄影的倡导者，也是实践家。

"新疆是个新闻宝库，在这里大有可为。"这是他临行前给新华社新疆分社的同志们的题词。

他鼓舞着我们不仅执笔，也会举起照相机，在这个宝库里勤奋地工作。

——1990.10.15于乌鲁木齐（刊于《中国记者》1991年第四期）

同王恩茂在一起的日子

王恩茂与我们在一起种冬麦的事情已经过去47年了，但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位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领导风范令我久久难忘。

1960年秋天，党中央发出以粮为纲的号召，要求全国各地抓好粮食生产。为了贯彻中央这一号召，王恩茂来到距离乌鲁木齐约70公里的呼图壁县，同农民群众一起种冬麦。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我，连



王恩茂书记在呼图壁县播种冬麦。



王恩茂书记同当地农民在地头用餐（右一为王恩茂）。

同新疆日报一位文字记者担当此次采访任务。随着王恩茂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两位秘书和警卫员小赵。我们于中秋节前夕到达呼图壁县，住在五工台乡的一户农民家中。王恩茂连同秘书和小赵一起住在农家的土炕上。第二天，王恩茂来到乌—伊(乌鲁木齐至伊宁)公路南侧新开垦的一处戈壁荒地，开始耕耘播种，荒地尽头有一座古代的烽火台。当时村里的农民正在翻犁新垦的土地，为了不误农时，抢墒播种，大家在荒地近旁挖了地窝子住宿。这种一半露出地面、一半埋在地下的窝棚，中间有一条过道，两旁是铺着麦草和毛毡的通铺。地窝子外面，几位妇女在搭有锅灶的临时草棚里烧水做饭。

王恩茂身着一套旧中山服，脚穿布鞋，一到地头便扶起犁把吆喝着耕牛干起活来。在浇水不久，墒情很好的土地上，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像波浪般翻起的黑褐色泥土，动作娴熟得就像一个庄稼汉。早在八路军三五九旅，他就曾与王震开发过陕北南泥湾，身体力行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1960年，作为权重位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高尚风范，确实令人敬佩。

在呼图壁县劳动的十多天里，王恩茂除了早晚在所住的农家吃

粗茶淡饭，每天中午都是吃在地头，午休在窝棚。有时下工，在地头用餐的人很多，他还帮助揉面、擀面、切面条。待到饭熟之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端着盛满面条的大碗，同几位农民围着一盆素菜，蹲在那里边吃边聊。最初农民听说同他们一起播种冬麦的是王恩茂书记，言谈举止都有点拘谨。在一起吃午饭时，也是王恩茂问一句，他们答一句，不敢多说。经过短暂的接触之后，王恩茂和蔼可亲的笑貌、随和朴实的言语，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劳动中，他们望着这位百事缠身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高领导人，双脚踩着泥土，扶犁播种一天一天地干下去，便流露出一种崇敬的心情。他们背地里说，这么大的官和我们一起种庄稼，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吃饭时王恩茂不仅同他们谈怎样搞好农村“五好”建设，还同他们拉家常，不断加深他和农民之间的感情。头一天用过午饭，县委书记请王恩茂回到村里休息，王恩茂说住的地方太远了，来回一趟得很长时间，就在地窝子躺一会行了。说着弓腰走进窝棚，坐在地铺上。大家看到王恩茂要在他们的地窝子休息，怕打扰他就待在外面。看到这一情况，王恩茂便让工作人员把他们请进来。村民进入窝棚之后，王恩茂说：“我怎能把你们主人撵到外边，你们起早贪黑也很劳累，更应该进来休息。”说着就躺在给他腾出的铺位上，并告诉警卫员小赵：“我就睡半个小时。”说过之后就发出轻轻的鼾声。说也怪，半小时刚过他便醒了。我还悄悄地问起警卫员小赵，怎会这样准时自己醒来？小赵说王书记向来如此。对于这位翻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中磨炼的意志力，我们由衷感叹：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素质！

两三天之后，便是中秋节。那天晚上王恩茂让警卫员小赵把我们叫到他住的屋子里说：“今天咱们就在这里过中秋节了，恐怕别有一番意义和感觉吧！”说罢，请我们每人吃了一块月饼。是夜皓月当空，望着皎洁的月光，置身于清爽宜人的秋夜之中，我对身旁的吕乾训秘书说：“王书记孩子那么多，应该回家过中秋节才对呀。”吕乾训



1960年，王恩茂在呼图壁县种冬麦。临别之时，当地农民向王书记深表谢意。

说，王书记早给家里打了招呼，中秋节不在家里过，而且他的夫人骆岚也在呼图壁县的另一个村子同农民种冬麦呢！记得中秋节的第二天王恩茂白天干完活，听说村民还要打夜工加快播种进度，当天晚上他也来到荒地同农民一起抢墒播种。月夜之中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后来在秘书的一再恳求下才回到村里休息，第二天他不顾劳累又出现在垦荒播种的地头。

播种冬麦的一个星期里，王恩茂只因处理一件重要公务回过一次乌鲁木齐。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边劳动、边通过电话同办公厅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商谈工作，指挥全疆的生产建设和播种冬麦工作。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的政委，王恩茂在新疆的老部下很多，呼图壁县就有几位。记得一次芳草湖总场的一位老部下听说王恩茂来到呼图壁种冬麦，就来探望。他向老首长汇报了芳草湖总场的工作情况之后，邀请王恩茂种完冬麦之后到他们的农场去看看，王恩茂答应了他的请求，如期到远离县城的芳草湖看望了农垦职工。

在以往的接触中，我只是在群众大会和送往迎来的活动中为王恩茂拍过照片，每次见面他也只是含着微笑向我点点头。种冬麦是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一次采访。见面时，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来新疆几年了？当我一一告知之后，他便记住了。后来只要见面总要问一句："小武同志，你好！"时隔多年，他依然记着我，知道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他先后调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后来又任吉林省委书记，1981年调回新疆。一次他要了解乌鲁木齐市的绿化情况，还要到人民公园看看这座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供各族群众休息娱乐的场所搞得怎样？可巧的是那天我正在公园，看到王恩茂，我就迎上前去，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冲我微笑着用维吾尔语问道："武纯展绕尔达西（同志）司孜雅克西么(你好吗)？"我激动地说："很好！王书记您可好？"他依然操着维吾尔语说："雅克西，开日薄勒地(很好，但老啦)!"20多年了，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动

乱又先后调至南京军区和吉林省的这位领导人，仍然记着我这个普通记者的名字，怎能不让人感动呢。后来听人说，王恩茂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他接触过的人并问过名字，不管时间多久他都牢记在心。

王恩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贯穿于他的领导工作之中。那次种冬麦当然是一次较为集中的体现。在呼图壁种完冬麦并得知全疆已经全面适时完成冬麦播种任务之后，王恩茂离开所住的农家，那天村里许多人都到院子里看望王恩茂并给他送行，他们拿着红纸上写的感谢信表示对这位领导人的敬意。王恩茂在临别赠言中感谢房东和全村人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对他们一行人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要大家再接再厉把生产搞得更好，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开村子的当天晚上，王恩茂住在县城，听取全县生产建设的情况汇报之后，提出要看看水利设施，以及秋收情况，还要到天山深处的雀儿沟访问哈萨克族牧民。一连三四天，他除了看望仍在另一个村子劳动的夫人骆岚，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水利建设工地和农村牧区，其间还专程去了一趟沙湾县。考察中，他那瘦长的身形、可亲的面容和矫健的步履，感动了许多人。每到一处，他那沉稳朴实、富有哲理的言语，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所说的事理会让听者心服口服。记得在去莫索湾垦区的途中，他路过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邀请王恩茂到队部坐坐，实际上是打算向王恩茂报告他们农场同地方争水争地的矛盾。听了他们的陈述，王恩茂说："大家都是为了新疆的生产建设，要互谅互让，遇到矛盾要调换一个位置思考，如果双方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他们的困难，许多想不通的事就会化解，有些事也要沟通情况，商量着办，过于急躁就会使矛盾激化，形成对立。你们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这样不好。心情不舒畅，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你们说呢？"听了王恩茂的话，连队领导过激的情绪便松缓下来，觉得王恩茂说得对，今后一定本着谅解的态度处理好矛盾，把农场的开发建设搞好。接着，王恩茂一行沿着乡间的土路边走边看，径直来到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边缘的莫索湾垦区。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得知王恩茂要到新建的莫索湾农场去，便风尘仆仆赶了过来，要陪同前往，但王恩茂同他简单交流了一些情况之后，就让张仲瀚回去了，他轻车简从直插莫索湾。

莫索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石河子垦区之后，在准噶尔盆地边缘建起的一处新垦区。1958年军垦战士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把天山雪水引入莫索湾，开垦出60多万亩耕地，建起6个农场。王恩茂到来的时候，原先的亘古荒原已是渠道纵横，田连阡陌。莫索湾一场、二场和共青团农场紧挨着连绵起伏的大沙山，其他新建农场也崛起于准噶尔盆地的荒漠之中。1960年是莫索湾垦区的第二个丰收年。王恩茂望着开始泛绿的冬麦田和生机盎然的林带苗木十分高兴。而就在莫索湾的荒漠之中，曾为收复新疆建立卓著功勋的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当年也曾建起一座屯垦农场，由于农田渠系未能完善加之没有植树造林，只经营了几年时间，便在风沙侵袭中废弃了，清朝屯垦将士的营区也便成为历史遗迹。王恩茂专程查看了那块地方。到达之后，他看着残垣断壁和流沙湮没的田埂，便对莫索湾垦区管理处的负责人肖凤瑞说，我们这些新建的农场，要想永远成为沙漠前沿的绿洲，就得加固、完善水利设施，在经营管理中不仅要种粮棉，更要管好渠系，种好树木，使莫索湾垦区像石河子那样成为林带纵横、绿树葱茏的花园式农场，不然就会走清朝屯垦失败的老路。考察了莫索湾之后，王恩茂来到石河子。看着这座戈壁荒原上崛起的农垦新城，他感到十分欣慰，对石河子管理处和农八师的负责人说，城区的规划绿化已经初具规模，要让它绿了更绿，这是军垦战士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今后还要依托周边农场，形成农林特产牧业兴旺的经济区域，同时发展棉纺、毛纺、农机制造和食品加工等产业，使之成为天山北部乃至全疆的花园城市和经济名城。

从种冬麦的地方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的将近一个月时

间里，王恩茂所到之处，没有十里相迎十里相送的场面，有的是夜晚听汇报，白天去考察，不顾劳累的工作和调查。

那次我同王恩茂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现存播种冬麦以及他在玛纳斯河一带考察的留影，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黄沙绿浪咏黄诚

1980年的早春时节雨雪较多，接连多日天气阴沉，让人感到格外压抑。这年3月28日黄诚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原本烦乱的心情更加沉重，悲痛不已。我与黄诚非亲非故，只是在新闻采访中有过几次接触和交往，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想到他平时那充沛的精力、洪亮的话语、朗朗的笑声，我总觉得他不会死、不该死，可他真的不在人世了。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追忆黄诚，如烟的往事一件一件浮上心头。

记得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黄诚是在和田县肖尔瓦克的庄稼地里。当时他正在检查春耕生产，同几位干部一起查看去年秋天平整的土地，询问农民今年将在这些地里种什么作物？施多少底肥？计划多少产量？他看得仔细，问得认真。那时，黄诚接任和田地委书记时间不长，但已走访了和田地区的许多村庄。他问我："你看这里春耕生产搞得怎样？"我说很好，今年下种的土地都很平整，好像按规划搞的。他笑着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将来会越搞越好。从言谈之中，我感觉到黄诚是一位爽快的人。

几年以后，我又到和田采访。那时全国到处缺粮，可是和田不缺。和田农村的建设规划正在全面实施，一条条卵石砌成的渠道翻



1960年，被周恩来总理赞誉过的和田新玉文工团在塔里木盆地中的肖尔瓦克乡举行的新式婚礼上演出。



和田新玉文工团的小演员在肖尔瓦克乡举行的新式婚礼上为大家演唱。

滚着浪花，沙漠边缘已经建成好几座水库，新栽的树木抵御着流沙南侵，昔日的戈壁荒滩展现一片片林带纵横、田连阡陌的新绿洲。看到这些景象，我的第一感觉是和田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当时甘肃省武威地区的文工团正在和田巡回演出，感谢和田人民给武威人民调运粮食，缓解了武威地区的粮荒。这一次我与黄诚接触时间较长，有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次是黄诚邀请我去参加维吾尔族青年农民的婚礼。新疆各地风俗不同，一些少数民族的结婚典礼也不相同。我想看看和田维吾尔族传统婚礼是怎样举行的，可是到了生产队的大院里，我们愕然了。这哪里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婚礼，分明是新式的集体婚礼。只见六对佩戴红花的新郎新娘并肩坐在地毯上，新郎们手里拿着结婚证书，新娘们没有蒙盖头，观礼的人们围着一层又一层，小孩子们到处乱跑。为了使这场新式的集体婚礼更加隆重，黄诚还请和田地区的新玉文工团前来表演，动听的音乐和欢快的舞蹈，给这场集体婚礼增添了新意。

有一次我问黄诚："和田平整土地，规划农田，会不会把果园也

给铲了，影响瓜果生产？"黄诚笑着说："这个我们早有考虑，还是用事实说话吧，明天带你去看两个地方。"我们从建有新居民点的管理区所在地，来到一片约有50亩的大果园，园内果树排列整齐，苹果树、桃树、梨树虽然还没有到盛果期，但已结了不少果子。据陪同的干部讲，这样的果园每个生产队都有。看着同农民谈话的黄诚的身影，我感到和田地区的一切变化，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同群众愿望紧密结合的必然产物。离开肖尔瓦克，我们又到和田县古丽巴格。这是一个盛产核桃的地方，广阔的农田整齐划一，田间那些有着数十年树龄的核桃树张着巨大伞盖，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年复一年地结出果实。这里既有生产队的集体果园，也有农民房前屋后的自家果树。在人民公社时期，能够允许私人果树大量存在，说明地方领导人是务实的。

我离开和田之前的一天晚上，黄诚拿着几张3寸大小的照片要我帮助翻拍放大。这是1949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和田时，沿着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行军照片，一幅是解放军在万古荒原徒步前进；一幅是解放军露宿胡杨林中；还有一幅是部队到达和田市街头，维吾尔族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的场面。这几幅照片记录着人民军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艰辛历程和昂



参加新式婚礼的宾客。

扬斗志，是很珍贵的。当时黄诚没说他是那支部队的指挥员，但在照片上的战士中间，我看到黄诚的身影，也看出他珍藏这几幅照片的深意，答应一定把照片放大放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春天，我与文字记者梁鸣达前往和田采访，一进市区就看到“炮轰”黄诚、“火烧”黄诚的大字报，但他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他主持召开干部大会，说：“不管怎样，我们的各项建设要进行，和田人民要吃饭，一定要把粮食种好！”他请我们一起去洛浦县的玉龙喀什河上游，查看新建的引水干渠能不能保证春耕用水。在“造反派”的围攻之中，他依然想着如何抓好农业生产，如何搞好和田地区的各项建设。不久，他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关押了，受到种种折磨。想起我在和田地区的所见所闻，以及黄诚在风沙前线和村舍田间的工作情景，我对黄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感迷惑。他被打倒后，和田地区的林带也被破坏了，一些果树也被砍伐了，粮食产量下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人们开始吃返销粮。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只是为黄诚的处境感到担忧。

1978年黄诚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任职。自从和田一别，我们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的身体怎样？精神如何？有些什么变化？都是我所挂念的。因此，1979年春天我去伊犁采访，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望黄诚，他的两鬓虽已花白，但精神尚好，说话声音洪亮，带着几分诙谐。看到这些，我的担忧消除了，为他的劫后余生而庆幸。当时他正要去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检查春耕生产，我因其他采访未能同去，但能想见他又要踩着消融的残雪行走在村舍田间。

1980年初我再到伊宁，没有见到黄诚。听伊犁州委的干部讲，黄诚一直在乡下了解农村经济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同各县负责人商讨如何搞好伊犁经济建设。他走访了伊犁河谷的许多乡村，到那些集体生产搞得好、农民收入增幅大的村子里调查研究。当我到昭苏县

采访年收入5000多元的维吾尔族农民司迪克阿訇的时候，他兴奋地说："前两天黄书记来到我家，听说我的收入这么多，特别高兴，鼓励我们更好地发展生产，富了还要更富。"1979年伊犁地区农业增产幅度比较大，农牧民收入增加很快，其他各项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些情况说明，黄诚领导伊犁河谷各族人民迈上了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找他谈谈，可是总没机会见面，只是在即将离开伊宁的一天早上，才在疾驶而过的汽车里看到他的侧影，不知他又要到哪里去？

黄诚幼年家境贫苦，曾讨过饭，长大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转战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也为新疆的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不能不令我深切缅怀。

追寻草原上的焦裕禄

1965年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发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地在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相继发现一批焦裕禄式的干部，长期工作在祖国西北边陲阿尔泰山麓的叶志强就是其中一位。1966年2月，新华社新疆分社成立报道小组，前往阿勒泰地区，采访报道叶志强的事迹。那一年阿勒泰地区经历了罕见的暴风雪和寒潮侵袭，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阿尔泰山麓和福海县南准噶尔盆地的茫茫雪原。

记得2月16日我们到达阿勒泰机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厚厚的积雪，汽车行驶在推雪机推开的雪巷之中，两侧的雪墙足有两米高，从机场到市区，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纷纷扬扬的大雪，笼罩着山城的四野，给人们的心里蒙上厚重的阴影。此时，阿勒泰地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各级干部学习焦裕禄抗灾自救。福海县副县长叶志强也是这次会议倡导学习的人物。叶志强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当时他在离阿勒泰市500多公里的准噶尔盆地冬季牧场帮助牧民抗击风雪灾害。于是，我们赶赴转移牧场第一线，参与体验叶志强率领的抗灾活动，从中了解他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

福海县城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靠近新疆著名淡水湖泊乌伦古湖。该县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出产著名的大尾羊。全县30多万头牲畜中，有11万头要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过冬。从冬到夏，由沙漠到阿尔泰山的夏季牧场，仅转移牧场的往返路程就达1400公里。哈萨克族牧民就这样年复一年经历着漫长而艰难的逐水草而生的转场生活。为了帮助牧民转场途中和在沙漠、高山放牧中遇到的困难，叶志强倡导成立跟随牧民转移的牧业办公室，自己成为牧业办公室的前线指挥官，同牧民一起从盆地走向高山，从严冬的沙漠走到山中的夏季牧场，四季转场生活四五年来从未间断。我们到达福海县之后，得知叶志强带领的牧业办公室，正随着大批牲畜而迁徙，已经从沙漠深处转到盆地北缘一个叫做盐池的早春牧场上。因此，我们便开始了追寻叶志强的经历。

初春三月，阿尔泰山依然是银装素裹，寒风料峭，就是准噶尔盆地也还被残雪覆盖着，气温仍然在零下十几度。我们顶着寒风从县城出发，骑马走了两天才到乌伦古河畔的哈拉玛盖，接着又从那里出发到准噶尔盆地深处寻找牧业办公室。从乌伦古河畔的哈拉玛盖到盐池牧场，我们整整走了一天，途中遇到几户转场的牧民，也目睹了被饥饿狼群撕咬过的羊只，直到夜幕降临四野苍茫，我们还没看



叶志强在查看马群。



叶志强巡视转场时途中用餐。

到牧业办公室的影子。深沉的夜空，寂静的大地，给我们增添了几分恐慌，大家只有继续扬鞭催马，去寻觅牧业办公室的火光。牧业办公室随着转场的畜群而移动搬迁，没有固定的驻地，就连陪伴我们的哈萨克族干部也不知所向。午夜立即来临。我们这些没有骑马夜行经验的人，焦急和紧张的心情难以言表，常常出现一种似乎听到人声狗吠的幻觉，但转瞬即逝。零点左右，当我们看到牧业办公室燃起的篝火，开始还以为又是幻觉，直到听见人们的呼唤，才意识到这是真的。

我们终于见到叶志强了，他头戴皮帽，脚蹬马靴，一身灯芯绒面的皮衣皮裤，俨然一个哈萨克族牧民。他30多岁，个头不高，脸庞黑里透红，眼睛闪动着精明、热情的神采。他言谈中流露着青春的活力。在牧业办公室采访的几天之中，我们除了请他介绍几年来指挥畜牧业生产，跟随牧人的转场生活，更多的是亲眼看到他帮助牧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以及他用哈萨克语和牧民们交谈的情景，深感这是一位体贴群众、受人爱戴的汉族干部。

就在牧业办公室又要随着畜群转移到另一处牧场的时候，我跟随叶志强到最困难的转场前沿。此时，未从准噶尔盆地转移出来的牧民和畜群，仍然处于风雪包围之中，叶志强对此一直放心不下。我

们出发时，天空又开始降雪，走着走着便进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里是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青河县上百万头牲畜的越冬之地。我们沿途不时可见沙丘之间的洼地有牧人搭过毡房的痕迹和用篱笆围起的畜圈。进入3月份，大部分牧民和牲畜已向北转移到乌伦古河两岸，只有马群和少部分羊只因牧民劳力不足，或因跟随畜群转移的孕妇中途临产而落在后面，滞留于准噶尔盆地。在半天多的行程中，我们几乎没有碰到牧民和羊群，只是到了下午才看见在沙丘上啃食干草的马群，还看到牧马人的“霍斯”(用几根木杆撑起的简易毡房)。毡房里有几位放马的青年在烤火取暖，看到我们进来，便挪出一块地方，一边让我们烤火，一边介绍转场情况。不一会儿，女主人给我们烧好了奶茶，几碗奶茶下肚，驱散了全身的寒气。叶志强提出要去看马群，风雪之中大家乘马向马群驰去，我也顾不得鞍马的劳累和两腿的酸痛跟了上去。他们边走边谈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如何给放牧造成困难，以及转场途中他们经历的一次又一次风雪寒流侵扰的情景。到了马群，马匹的膘情都很好。飞扬的雪粒使叶志强和牧民都成了雪人。叶志强坚持要把马群看完，此情此景已使我忘记寒冷，掏出相机把这些难得的镜头拍了下来。那一天叶志强对所看到的十几群马都比较满意。

此后几天，叶志强查看了巴旦铁布克、切开、克孜勒韦、达郎哈等几处牧场。在去达郎哈牧场的途中，浓雾弥漫，面对眼前一条又一条羊肠小道，不知该走那一条才好，只能选择一处认定的方向，走着走着竟然发现一处芦苇茂密的洼地，苇草丛中有野猪卧过的痕迹和野猪拱出的大坑。叶志强兴奋地说：“这就是我们六年来一直寻找的水源地，今天终于找到了。”他翻身下马，用手挖开坑内的积雪，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看他激动不已的样子，我一次又一次按下相机快门。当天傍晚，我们才在沙山上看到一些牧人。他们见到叶志强，立即迎了上来，其中一位名叫开买提的牧人，非要请叶志强到他家的毡房不可，并说他有一件喜事要告诉叶副县长。叶志强问是什么

事，他便说："我家一峰母驼早产了，但小骆驼长得很好。"那峰小骆驼卧在一块毡垫上，瞪着眼睛，显得机灵壮实。主人特意给它缝制了一个保暖的护夹，一边用红绒线绣着"1966"字样，另一边绣着哈萨克文。当我问起是什么意思时，叶志强边念"吐拉克拜克"边说这是一个名字。走进毡房，女主人已给我们铺好花毯，茶壶也已架在熊熊的篝火上。她的身旁偎依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脸庞红润，眼神天真。毡房虽小但十分温暖。叶志强递给小姑娘几粒糖果，她就不再怯生生的了。毡房外面仍然落着雪花，我惦记着那峰小骆驼，便走出毡房去看，不料小姑娘已在那里逗着它玩儿，并且嘻嘻地笑着。小姑娘似乎向我说着什么？我虽然听不全懂，但知道她在告诉我小骆驼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她是多么地喜爱小骆驼。

晚上，按照哈萨克人的传统习俗，真诚的主人款待我们这些远方来客。熏肉已经煮在锅里，炉火熊熊，热气蒸腾，香味弥漫。同行的牧业办公室干事哈斯别克逗着小姑娘唱歌，她还真大方，稚嫩的歌声犹如清澈的泉水，把大家的疲劳洗刷了。她唱着父母教给她的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唱着他们所在的克孜勒韦牧场。唱了一阵子，她便偎依在大人的身旁，母亲抚摸着她的头，父亲拉着她的手，倾注着深情的爱抚，此时此景令人动情。我问这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她母亲说叫吐拉克拜克，已经五岁了。啊！"吐拉克拜克"，这不就是小骆驼护夹上刺绣的名字吗？我当即感悟到哈萨克人爱畜如子的情怀。第二天我拍下小姑娘与小骆驼的合影照片之后，带着留恋的心情离开牧人们和吐拉克拜克。那个非同寻常的夜晚，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启发我对摄影报道如何贴近生活的思考。后来叶志强告诉我，牧民们在严酷环境中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经常激励着他忘我地工作。

那次风雪之行，我体察到一个汉族干部深入群众不怕困难的精神风貌。一路走来，叶志强除了操心牧民的粮油肉盐之外，还为贫困和患病的牧人送去温暖。也就在那次巡行的最后一天夜晚，在一顶

用几根木杆支撑的小毡房里，叶志强召集就近几位青年牧人，了解他们转场的情况，询问有什么困难。小伙子们说，有牧业办公室跟随，大家的心里踏实多了，一有困难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记得我们所住的这顶小毡房，只有两个放羊的小伙子，却帮助有困难的牧民放牧着1000多只待产母羊。当时家里的女主人和孩子们因为风雪太大，已经赶着几头大牲畜和待产的骆驼先行一步到了乌伦古河。小伙子面对这么多客人，倾其所有把准备带在路上吃的干粮拿出来，招待我们这些风雪来客，我见叶志强吃得很少。那天夜里，十几个人就合衣睡在四处透风的小毡房里，我被冻得一夜未能睡着。而对叶志强来说，这种境遇是常有的。三天之中他查看了十几个马群的2000多匹马、十多群羊，探访了十几户牧人。我觉得跟随他的那次风雪之行，也使我深深感到要搞好摄影报道不仅要身临其境，而且应该同被报道的对象心心相印。

第三天是我们返回驻地的日子。路上遇到的牧民告诉我们，牧业办公室已经搬迁到乌伦古河附近。因为这一天路途较长，我们扬鞭催马向着准噶尔盆地北部急行。起伏而坎坷的路上残雪消融，稀疏的牧草在寒风中抖动。我问叶志强，像这样的牧草牲畜能吃饱吗？他说整个春秋过渡牧场生长的主要有两种牧草，就是哈萨克人所说的“卡日韭蒜”和“阿克韭蒜”，别看这种牧草比较稀疏，但它的营养价值很高，犹如夏季牧场长得细瘦的酥油草和“坎布尔恰西”（老太太的头发）牧草一样，牲畜吃了容易长膘。说到此处，我觉得这位汉族干部已近乎于一位草原专家了。在这一天的行程中，令人难忘的是到达盐池东侧一片洼地所见到的梭梭林，它古老而苍劲，六七米高的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穿行其中，干枯的树枝给人以奇异而可怕的感觉。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才出了林地，这是我在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内从未见过的景象，后来我从准噶尔盆地到塔里木盆地再也没有见到过，可惜的是当时因为赶路和天气阴沉没有顾上拍照，为此我常常自责这种职业上的疏忽，成为我忘不了的一件憾事。20世

纪70年代再问起那片林地，听说已被人们砍伐殆尽。

午夜时分，在又一场暴风雪到来之前，我们到达乌伦古河畔的哈拉玛盖，住在公社的办公室里，据说牧业办公室也已搬到附近。一个多小时后，暴风雪便已来临。狂风卷着雪粒呼啸而过，扫过屋顶向着黑沉沉的原野与河谷奔去；飞舞的雪粒扫动着窗棂，并在屋檐下积起厚厚的雪堆。这一夜叶志强辗转反侧，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闪动的微光不时照着他沉思而焦虑的面容。他担心牧民和畜群又遭受风雪袭击。看到他的不安，我也不由得想，牧人的毡房能否经得住这样的狂风？他们经过整个严冬，刚刚转移到春牧场的畜群又会怎样？

第二天叶志强组织救灾，我们便一同回到县城。由于暴风雪连续不断，道路又被积雪阻塞，我们只好取道霍什托日盖返回乌鲁木齐。

回到新疆分社短暂休整并向领导汇报之后，4月1日我同汪有富、毕寻再次前往阿勒泰草原。这次目的地是阿尔泰山前的沙尔布拉克，了解叶志强同牧业办公室的人员在接羔育幼的那片山前牧场上是否能安全度过春寒。医疗点、供销社、配种站、兽医防疫站、粮食及饲料供应点等畜牧业设施发挥了什么作用；牧民们到达那里之后接羔育幼的情况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只有当沙尔布拉克的牲畜转入夏牧场时，才能给安全度过冬春的生产活动画上一个句号。

4月的阿尔泰山麓才刚刚进入冰雪消融的初春。路途中飞溅的泥泞、从深陷泥潭中挖车的艰难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乘车只能到阿尔泰山前的红墩乡，然后再骑马去沙尔布拉克。从阿勒泰县的红墩到沙尔布拉克福海县牧业办公室所在地，只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却整整走了两天。当时到沙尔布拉克必须渡过克兰河，河面的冰盖还没有化解，但被开始消融的雪水所淹没，无法探测河水的深浅，当我骑着马还没有走到河心时，马蹄踏裂了浮冰，就在将要沉入河底的危急时刻，马儿一个回跳，才没有陷入冰下。汪有富在一位牧人的指点下率先踏上另一处河段，我们才渡过了克兰河。

过了克兰河，经过很长一段路途，便进入福海县境内，这时牲畜已安然转入沙尔布拉克春牧场，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接羔育幼。不巧的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叶志强已经看过所有的畜群，并要牧业办公室的干部到畜群中去帮助牧民搞好接羔。当晚，我们看到来自牧业队和县社的干部围在油灯下分工，准备到各自固定的畜群去工作。

4月14日我们到达福海县牧业办公室。牧业办公室设在阿尔泰山前的沙尔布拉克牧场的中心，恰似一座新建的草原集镇。新盖的房舍大部分都刷得粉白，牧业办公室的近旁有供销社门市部、医疗站、粮食供应点、畜牧兽医站和草原工作站等。在牧业办公室我们看到有乘马的牧人不断来反映放牧情况，寻求畜牧兽医的帮助和到供销门市部采购生活用品。那里已经成为福海县春秋牧场的生产指挥中心。叶志强仍然在草原上逐群逐户查看畜群，了解并帮助解决牧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们一方面等待叶志强的到来，一方面帮助附近牧民给刚刚出生的羔羊寻找哺乳的母羊。傍晚时分，我们看到叶志强骑着那匹白马，疲惫而面带倦容回到牧业办公室。这几天他马不停蹄地去了许多地方，一见面就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们，在近十年没有遇到的风雪寒潮中，牲畜基本上算是保住了，但由于冰雪消融得慢，影响了牧草生长。因此经过漫长转场途程的畜群，瘦弱牲畜比较多，保畜保羔成了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还告诉我们3月底的那次暴风雪，他到县上组织救灾，不几天就到了额尔齐斯河，一方面组织调运牧民口粮和牲畜草料，一方面趁河面解冻之前将大部分畜群安全转到沙尔布拉克牧场。眼下就是要搞好生产母羊的放牧补饲和接羔育幼。为此汪有富、毕寻两位记者便决定到牧民的毡房参加劳动，了解他们抗灾保畜的典型事例。他们一走就是五六天。那几天里，我随叶志强去巡视整个牧场的情况，每天傍晚回到牧业办公室，又随几位青年到畜群帮助为新生的羔羊喂奶。一天下午冷风劲吹，叶志强到了一位老牧人的毡房问寒问暖之后，立即到羊群中

给母羊喂料补饲，到傍晚他一连去了3家牧人的畜群，并且在泥潭中救出两只羊和一匹马，救助时他本人和乘马两次滑倒在泥流中。在叶志强的影响下，牧业办公室的几位青年为了抢救冰雪泥流中的牲畜，也曾多次下到刺骨的泥水里，把奄奄一息的牲畜抢救出来。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到达牧业办公室不几天，看到哈萨克族牧人不断给牧业办公室送奶茶、肉和油饼。他们都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来慰问叶志强和牧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位妇女，她不但送来放有丁香、胡椒的奶茶，还送来手抓羊肉。按照哈萨克人的传统习俗，只有草原来了新的住户，头一天老住户都要送茶送馕。而这位妇女为什么一而再地给叶志强和牧业办公室的人送茶送肉？一打问，原来是1965年春天她生孩子引起大出血，在病情危重之时，正在牧场工作的叶志强闻讯，立即派出4名干部乘马分两路去找医生，使她得到及时救治。她对我们说："叶副县长救活了我，我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好干部。"一位老牧人也说，过去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灾害，别说牲畜保不住，就是人也会冻饿而死，今天是党的好干部、是随同我们一起度过灾年的牧业办公室帮助我们战胜一次又一次风雪寒潮。

福海牧区一幕幕抗灾保畜的场景，叶志强同牧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品格，常常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仅靠上面和别人的转述是很难了解到和体验到的。正是叶志强同牧业办公室的这种工作精神，使他们抗击了多年不遇的风雪灾情。据牧业办公室调查统计，当年全县牲畜死亡率仅为9%，而繁育成活率达到90%以上。可是几年前的一次风雪灾害，全县牲畜死亡率达到40%。

4月25日我们离开福海县牧业办公室，沿着阿尔泰山前起伏的草原乘马驰向阿勒泰市。十多天前还是积雪遍地、雪水横流的牧场，已经呈现一派新绿，在绿茵覆盖的草地上，夹带着活蹦乱跳的羔羊的畜群，已经开始向深山牧场转移，人们终于战胜了一冬一春的风雪灾害，迎来一个新的丰盛的年景。

当年5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采写和拍摄叶志强的稿件最终没有发出,而我们与叶志强共同度过的近两个月时光却是难得的。

从“葡萄姑娘”到“葡萄奶奶”

——记王惠珠

1954年春，我的同事在吐鲁番葡萄沟拍摄了一张新闻照片，主题反映汉族技术员指导农民为葡萄剪枝的情景。画面上的汉族姑娘梳着长辫，旁边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眯着双眼，认真观看姑娘双手操作。吐鲁番盆地素有“葡萄之乡”的美称，当地农民种植葡萄应该说是看家的本领，而年轻的汉族姑娘向维吾尔族老农指点如何修剪葡萄藤蔓，不是班门弄斧吗？其实，这张新闻照片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我十分欣赏那位同事捕捉新闻的才能以及摄影技巧，也敬佩那位扎根吐鲁番盆地为少数民族传授科学技术的汉族姑娘，她就是王



1954年，王惠珠在地头指导葡萄老农为开墩不久的无核白葡萄剪枝打杈。

惠珠。

此后，我每次去吐鲁番采访，都关注王惠珠的动向，而且发现像王惠珠一样由国内各地来到吐鲁番从事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还有好几位，可巧的是其中两位年轻姑娘的名字也都带有“珠”字。知道她们的人，称她们是吐鲁番盆地的“三颗明珠”。在多年的采访中，我曾接触过她们，并在田间地头把镜头瞄向她们。后来“两颗明珠”被调到上级部门从事科研和领导工作，而王惠珠与她的丈夫廖可璜仍然留在吐鲁番，继续从事葡萄引种栽培试验和瓜果保鲜研究的课题。1990年王惠珠56岁，已从“葡萄姑娘”变成“葡萄奶奶”。关于她的专题摄影报道，也就在我的脑际逐渐形成。

王惠珠出生于湖南宜阳，1954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当年就同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一道奔赴边疆，把毕生精力和才智都献给吐鲁番的葡萄事业。王惠珠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1954年新华社记者拍摄的那张指导老农修剪枝蔓的照片和1956年其他记者给她拍摄的庆丰收的照片，都记录着王惠珠当年的风华。王惠珠初到吐鲁番时，当地葡萄种植是粗放的，推广一些新的种植技术并不容易。那时一些老农看到前来指导自己种植葡萄的竟是一个黄毛丫头，便带着不信任的眼光对她说：“我们祖祖辈辈种植葡萄，从来没听说要什么技术！用老办法我们照样能收上葡萄，能吃上葡萄干。”这些话，给第一次从县城徒步十多公里沙砾戈壁来到葡萄沟的这位汉族姑娘吃了闭门羹。但是她很倔犟，并没有生气离开，直到傍晚，她才被领到乡政府办公室。出于怜悯之心，一位名叫海力其汗的维吾尔族妇女把王惠珠领到家中吃饭，并且拉着王惠珠的手，一方面装着生气的样子，一方面摆着手用维吾尔语说：“不要生气，不要着急，以后会好的。”王惠珠不懂维吾尔语，但能看懂海力其汗说话时的手势，便会心地笑了。从此以后，王惠珠同海力其汗成了知心朋友，并且开始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她先是指着日常用具，每指一件海力其汗就告诉她维吾尔语怎么说，进而学习起居、用餐、行走问路、姓名问候等生

活用语，直到葡萄开墩、剪枝、栽培、收获等等，她逐渐地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方便了新技术的推广。这样，吐鲁番农民在王惠珠的指导下，学会给葡萄整枝打权，给原来铺地而长的葡萄藤搭起支架，通风透光，合理施肥，葡萄增产效果明显，果农们得到实惠，这才对王惠珠刮目相看，并给王惠珠送上“葡萄明珠”或“葡萄姑娘”的雅号。


1954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农业技术员王惠珠（右起第三人）来到吐鲁番盆地，使当地的葡萄产量不断提高。

久而久之，王惠珠成为吐鲁番盆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些果农对她更是佩服，可以说对她推广的新技术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吐鲁番盆地葡萄种植面积只有7000亩，平均亩产200多公斤。到1990年，全地区葡萄种植面积已达78000亩，平均亩产1050公斤，有的地方亩产高达4000公斤。这样的发展变化，凝聚着王惠珠的心血和汗水，年轻一代称她为“葡萄奶奶”。此时，王惠珠到乡间推广试验葡萄栽培新技术的同时，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瓜果保鲜技术的研究课题上，因而在城里待的时间要多一些，但许多维吾尔族农民并没有忘记王惠珠，进城时总要带上一筐葡萄或是葡萄干以及自家新烤的馕，去看望王惠珠。在吐鲁番的街头，人们常常会看到王惠珠用流利的维吾尔语同老农们交谈。

王惠珠与丈夫廖可璜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的同学。1954年毕业后一同来到新疆吐鲁番。1990年他们的女儿廖新宇毕业于新疆农学院园艺系，也被分配到农业战线工作。他们为了祖国边疆的建设事

业，同少数民族兄弟一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王惠珠的女儿廖新宇是这样评价父母的："我母亲痴迷于葡萄瓜果栽培、保鲜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在我爸爸的心目中，葡萄第一，我是第二。"确实如此，1990年廖可璜已经61岁，几年以前患直肠癌在家养病，但一直没有忘记葡萄。在鄯善县的新疆瓜果葡萄试验中心，他是副主任。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几个试验课题，从国外国内引种了530个葡萄品种进行栽培试验。为此，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常常到离家100多公里以外的实验中心去观察记录，和同事们一起研究探索。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一起在区域化试验中形成的新品系达到100多个。此外，他们的甜瓜、西瓜新品种选育推广成果也很好。为了经常能看到试验成果，他和王惠珠一起在自家庭院中栽种了几个试验品种。瓜果成熟季节，他们家的院子里总是弥漫着特异的清香，葡萄藤几乎覆盖着整个庭院，抬头看去，垂累的葡萄有鹅黄，有青紫，有嫣红，小粒的有绿豆般大小，大粒的几乎赶上乒乓球。而经过嫁接改良的几个当地品种，色彩更加好看，味道更加甜美。除了能看到的以外，还有



王惠珠、廖可璜和他们的女儿廖新宇在自家庭院里。



王惠珠同雅尔乡的果农喜摘丰收的葡萄。

几个正在培育改良的新品种都用纸袋罩着。在品味观赏之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培育的一种颗粒大、味道甜的798028品种葡萄，已在全国一些地方进行试种，吐鲁番雅尔乡已经进行大面积种植，为此我们约定第二天实地查看。正在休假的廖新宇听说我们要去雅尔乡，便说也要同去。能够同他们全家一起到乡间去看已经获得丰收的新品种葡萄，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们如约前往。从市区西行十多公里，便到雅尔乡一位名叫尼牙孜的葡萄种植户的园中。沿着两排葡萄架的路径摆放着装满葡萄的箱笼，深藏在葡萄架下的人正在忙碌地采摘，不时还传出姑娘婉转而清脆的歌声，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王惠珠一家的到来，主人显得十分高兴，把大家引到装满葡萄的箱笼前，说这些都是798028品种的葡萄。这种葡萄不仅穗长，而且颗粒饱满。主人说现在只采摘了一半，自去年(1989)进入盛果期以来，产量比过去增产三成以上，没有采摘的还多着呢！说着王惠珠夫妇已到葡萄架下，只见颗粒饱满，长长的果穗挂满了藤蔓。王惠珠捧起一串硕大的葡萄赞赏不已。经过多年试验的成果所呈现的良好长势，怎能不使他们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为了推广新品种，他们不知来过多少次雅尔乡，只要能看到用汗水浇灌的丰硕成果，就是再来多少遍也是高兴的。笑谈之中，廖新宇已经同园中的小主人一起摘起葡萄来。而此时此刻，王惠珠夫妇则挑剔起自己所培育的新品种的不足之处。他们更加仔细地观看着一串串果穗，看颗粒，尝味道，后来得出结论：798028葡萄新品种经过大面积种植之后，颗粒和香甜都是成功的，只是挂色稍欠火候。为此廖可璜便陷入沉思。女儿本想赞美几句父母的试验成果。临走时连叫了好几声爸爸，他都似乎没有听到。“爸爸，你心里只有葡萄！”是的，正是在这位瘦弱老人及王惠珠的艰难探索中，一个个新品系葡萄的弱点和不足在消失，新品种在思索和试验中趋于完美。

克孜尔的守护神——尼牙孜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篇文章曾经写道：天山南麓的丝绸之路焉耆、库车、阿克苏至喀什一线，保留着许多佛寺及石窟遗迹，那是公元2世纪以后历时千年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期由当地佛教信徒、过往僧侣和商贾修建起来的。这些古建筑印证着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但是历经千余年风沙侵蚀和人为破坏，以及外国探险家掠



1960年6月的克孜尔千佛洞外景。

夺性的窃取，这些古代遗迹已经遭到程度不同的损毁，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些不可复制的记录历史的物证就会进一步毁坏甚至消失。读过这些文字后，我为这些历史文化遗迹的命运而担忧，总想寻找机会去探访这些令人向往的文化遗迹，想知道它们是否得到了保护，更想就此内容做一些摄影报道。

1960年初夏，我在进行一组有关新疆历史和新貌的采访报道时，有幸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并结识了尼牙孜老人。

记得去克孜尔那天，我们的汽车离开拜城县城经过当时的克孜尔公社后，便驶上一片茫茫戈壁。戈壁滩尽头的山峦若隐若现，我们难以相信，这片平坦而单调的区域里会有千佛洞。正在疑惑时，一道深深的崖坎出现在脚下，千佛洞的洞口一层高过一层，排列在我们俯视的崖壁上。这是一片荒漠戈壁之中的谷地，在看到佛洞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长满沙生植物和古树老林的小小绿洲。到此之前看到的远山被这片谷地隔开了，那座远山被当地居民称作“却勒塔格”，远山脚下蜿蜒的河流就是莫扎尔特河。

我们脚下的崖坎高高耸立在谷地前，佛洞和绿野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车到此地已无路可行，眼前只有一条浮土飞扬的崎岖小路通向谷地，这条小路只能步行通过，我们一行只得弃车徒步，随着这条小路左转右旋，有时就蹚着没过脚踝的浮土往前走。在最陡的路段，我们几乎是用手撑着地面半蹲半坐地滑行，半小时后才到达谷底。

高悬着佛洞的崖壁，在我们眼前延伸到很远，在最密集的洞窟之间，由几架长长的木梯和栈道由低到高、由左至右连接在一起。在洞窟的下面，透过满滩的红柳丛看去，有一座刷白了墙面的土屋掩映在几棵老树的绿荫里，那便是克孜尔千佛洞最初的管理所。

到得近前，一位留着山羊胡子，大约50岁的维吾尔人出门迎接我们。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说除了管理人员和上面来的考古人员，这里是不对一般来访者开放的，你们是记者，就带你们看几个洞窟

吧。他说，一些洞窟很高没法上去，通过搭梯子的地方要特别小心。他回到屋里拿来几串钥匙，带着我们朝洞口走去。

我用维吾尔语和他边走边谈，交谈中得知他叫尼牙孜，50年代就来到这里，管理着山前山后的200多个洞窟。他是当地人，除了文管所和上级部门有时来人进行考察研究活动、巡查管理和了解保护情况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这里守着，有时也回到克孜尔乡间的家中看看，驮点粮食蔬菜，很快也就回来了。

我们不知不觉便到了山下的土坡前，尼牙孜指着土坡说，这都是千余年来水土流失堆起来的，一些洞窟便埋在里面了，只有等到日后挖掘才能重见天日。土坡上方有几个洞窟没有门窗，我们问那几个怎么都是空洞，尼牙孜说历史上曾有几个外国人来过，他们用胶布粘贴和切割剥离的方法盗走一些壁画；一些牧羊人住在洞窟里生火，烟熏火燎使一些壁画失去颜色，有些壁画剥落了。过去这里没人管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他来，才管住了那些偷盗壁画、随意攀登和在洞窟居住的人，并且安装了门窗，加强了日常修缮保护，一些壁画多的洞窟才算得到保护。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守护克孜尔千佛洞的维吾尔族老人尼牙孜。

走到一架高高的木梯前，他嘱咐我们拉开距离，一个一个地攀登，免得人太集中压断梯子。他腿脚轻捷地先登上几层，我们便跟了上去。晃晃悠悠的木梯高高架设在一层高过一层的洞口前，攀登显得格外惊险。攀到一个洞口时，尼牙孜从

挂有许多钥匙的绳串上找出一把打开洞门。记得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一个绘有许多菱形格子壁画的洞窟，分布在丝绸古道上的一些石窟壁画中，这种风格的壁画数克孜尔最多，每个格子中都绘有一幅佛本生故事或讲经说法图。



为了保护祖国丝路瑰宝，尼牙孜老人常常需要攀登这种木梯，巡视绘有壁画的洞窟。

我们一行都是头一次接触壁画，也没读过佛经，看不懂壁画的内容，只想对丝路壁画这种闻名于世的古代艺术瑰宝作一次直观的报道，没想到在参观中尼牙孜成了称职的导游。在整个观看过程中，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夹杂着维吾尔语逐幅为我们讲起壁画中的故事。他先是指着一幅绘有一群猴子互相牵拉着踏着一只猴子的身体过深沟的壁画，说这是一位猴王，为了帮助小猴子们过河，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一座桥，让小猴子们安全渡河，猴王因为做了这样的好事而成为天使。听着他的讲解，我们观看的兴趣大增，想不到尼牙孜对佛本生故事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我用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提问，想了解每一幅壁画的内容，他便逐一向我们介绍，我在此时充当了他和同行汉族记者的口头翻译。用这种方法，他先后为我们讲解了“舍身饲虎”“燃臂救人”“王子出海”等本生故事，各种造像，包括佛、菩萨、供养人以及世俗人和他们生产生活图景的壁画。尼牙孜通过语言和表情手势绘声绘色地讲述，生动传神。尤其在伎乐壁画前，他指着画中手执箜篌、

筚篥、弹筝，吹着排箫弹着琵琶的乐人和随乐起舞的供养人说，这都是在神面前表演技艺想要成仙成佛的人，这些壁画也反映出古龟兹人爱好音乐舞蹈的习性。据他讲，就在千佛洞的山后有一处滴着泉水的山崖，人们称为“千滴泉”，泉流潺潺，滴水成音，古龟兹的艺人们就在这里采集动听的响声，编成乐曲和舞蹈传世。所以在千年以前这里的音乐舞蹈特别盛行，还传到内地被吸收到宫廷乐曲中，当时这里的音乐舞蹈家们也到过长安和洛阳。



在1960年，尼牙孜老人给我们讲解的第一幅壁画——猴王本生故事。

在洞窟中，听着尼牙孜通俗易懂的讲解，我们不禁面对着菱形壁画凝神静思，默默追溯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也禁不住为尼牙孜热爱祖国文化历史的感人举动而赞叹。

我第二次到克孜尔千佛洞已是十年之后的1970年了。虽然走的还是那条老路，但千佛洞周围的环境已有很大改观，山下的树林和绿洲大了许多，管理所房屋背后新栽了一片果园。



克孜尔千佛洞新2号洞窟顶部的飞天壁画。

接待我们的依然是尼牙孜老人，这次他带我们参观洞窟时，特意把我们领进一个没有壁画的洞窟中，在讲述外国探险者偷盗剥离壁画的同时，还让我们看了我国画家韩乐然的一幅题记。这篇题记除了为



从事丝路古道千佛洞研究的学者们在克孜尔石窟寺里。

祖国文化瑰宝的被窃而警示人们要保护好克孜尔千佛洞之外，还写明韩乐然发现并编为新1号、新2号洞窟的所在。尼牙孜对这篇题记和警示特别珍惜，他同几名汉族考古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把整幅字迹用白漆描摹得特别引人注目。他还特意把我们带入韩乐然所发现并已被他们妥为保护的新洞之中，在中心柱的后室窟顶，我们看到巨大的飞天和窟壁释迦牟尼涅槃的壁画。为了弥补上次的不足，他还特意把我们带入绘有伎乐、杂耍以及有龟兹人耕耘劳作的壁画前，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克孜尔千佛洞所反映的古龟兹文化艺术的历史和民间习俗，乃至同祖国内地的关系。望着尼牙孜饱经风霜的黑褐色脸庞，我们被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感动了，似乎同那些佛本生故事所描绘的典故一样，他也成为用生命保护祖国文化瑰宝的天使。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窟内窟外，都十分整洁，听到我们对他的管理和讲解工作发自内心的赞扬，他露出会心的微笑。果树还没有到结果期，临走时他说大沙枣很甜，给你们带着路上吃，说着便把我们每个人的口袋塞得满满的。

1979年，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报道，我第三次来到克孜尔。再次见到尼牙孜老人。岁月在他的脸上又增添了几道深深的刻痕，灰白色的头发飘拂在仍然神采飞扬的圆圆脸盘上，虽然年事已高，但他

精神还好。上级派来几位青年到克孜尔千佛洞，尼牙孜同他们盖起了新房，扩大了绿地。尼牙孜早年栽种的果树已进入盛果期，他也把自己的家搬到莫扎尔特河畔，养了几只羊，开了几亩地。此时，老人除了管护果园种树种草，依然常常巡视沟前沟后，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千佛洞。当他看到我们时，热情地像老朋友一样握手问好。他说："现在我爬不了洞子了，由年轻人带你们去吧，近几年我们给一些较低的洞子修了台阶，不用再爬危险的木梯了。今天我带你们去看看后沟，也就是古龟兹人采集音乐的滴水山和谷底的溪流。"



90年代初，来自德、法、韩、印度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僧侣、学者们为生活在1300年前的龟兹故国著名的佛学翻译家鸠摩罗什铜像揭幕，并开展学术研究。

穿过管理所浓密的树林到灌木丛生的沟口，便看到一条溪水从眼前的峡谷中流出。越往上走，随着落差增高流速加快，水声越来越大，起初是汩汩流淌，继而哗哗震响，有细微的低咽，也有欢快的流动，有时如琴弦高奏，有时又如绵绵细语，水声变幻无穷。走了约3公里上坡路，一道半环形突立而湿润的岩壁出现在面前。到得近处，从岩缝中渗出的水珠似帘幕般滴落在一泓清潭之中，在幽深的谷底里，人们感受到透骨的凉爽。尼牙孜老人说，这可是克孜尔的一大胜景，别看现在空寂无人，在古时佛教盛行之时，从现今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沿莫扎尔特河直到克孜尔，每年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那些来自库车、拜城和更远地方的佛教信徒，在沿途寺庙和石窟进香朝拜，来到克孜尔后，滴水山泉是他们的必到之地，有人就在此处采集

滴水之声，创作出当地著名的龟兹乐曲。就在岩壁东侧的台地上那棵大树附近，还有一座寺庙，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那次克孜尔之行，听了老人以及几位青年管理人员的介绍，我对克孜尔的石窟艺术及其历史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为此，我们感谢尼牙孜老人一次又一次的热情接待，对他和几位青年人为保护克孜尔这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敬佩。

经过几年的体验和了解，我准备进行一次有关龟兹文化研究和保护的专题报道，因此在1994年我第四次来到克孜尔。此行距离1979年的那次踏访，又过去十多个年头了。

我一到克孜尔就询问尼牙孜老人的情况，人们告诉我，不久前老人去世了。此时，一条宽阔的砂石路面已从崖上的戈壁滩头铺到崖下洞窟近旁，克孜尔已经成为龟兹文化的研究基地，一些学者长期在这里临摹壁画，研究考察。靠近石窟的山下，郁郁葱葱的林野之间也建起新的房舍。十多年来，经过小岛康誉等日本友人的捐助和文化部门的投资建设，被风蚀和流沙侵害的许多洞窟的墙面都抹上水泥，门窗也进行了整修，而原来的木梯已不见踪影，过去只能拾梯而上的洞子已全部修了水泥台阶和护廊、围栏、栈道。克孜尔不仅成为研究考察丝路古道的重要遗址，也成为新疆文化旅游的一处胜地。就在我们到达时，那里正在筹备召开龟兹佛教文化的研讨会，并为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铜像举行揭幕仪式。来自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台湾地区和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僧人聚会克孜尔，一时间盛况空前。守护克孜尔千佛洞数十年的尼牙孜老人虽然未能目睹这种盛况，但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欣慰。当鸠摩罗什铜像的帷幕徐徐揭开的那一刻，我想，尼牙孜老人也是一位维护祖国灿烂文化的有功之臣，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迷途胡杨林

——采访日记一则

1990年10月24日，晴，有微风，天空和四野弥漫着薄薄的浮尘。

这是难忘的一天。

自10月中旬到塔里木河畔的草湖原始胡杨林采访以来，我一直惦念着1985年在桑塔木林场到阿扎特勒克牧业村途中见到并拍摄了照片的那几棵古老胡杨树。那经历了千百年沧桑几人围抱不住的巨大树身，虽然布满深深的裂纹，但依然伸展着新的枝条，树顶长满了嫩绿的叶片。它是在恶劣环境中抗击自然灾难的一个化身，一个代表，因此我一直想再次找到它，进一步探寻这种沙漠树木的生存特点。



塔里木盆地古老而衰枯的胡杨树。

下午5时，我没有打扰胡杨林管护站的任何人，便踏上去桑塔木的路途，经过阿扎特勒克牧业村时，热心的维吾尔族护林员库尔班·司马义看我只身一人，便给我指点路径。这是一条很久没人走过的蜿蜒的毛驴车道，那忽隐忽现的辙迹，一会儿钻入林中，一会儿又出现在碱窝。连日的霜冻也使原先金黄色的胡杨林变得萧条，寂寞和荒凉主宰着那里的一切。

沿路所见林木之中，几乎全是老胡杨树，但却没有我所寻找的那几棵壮观、粗糙的老胡杨树。渐渐地，我迷失了归路。眼看着太阳没入树林的背后，我的心里便发起急来，在无路可寻的情况下，只好沿着刚刚走过毛驴车的一道辙迹走下去。看到一块被人啃过且沾满泥土的甜瓜头，我便捡了起来。万一回不到住地，又找不到人家，它便是一点含有水分的救命食物。拿着甜瓜头走了几步，又觉得有点可笑，还没有怎么样就紧张起来，也太有点脆弱了。想着想着，我又随手把甜瓜头丢弃了。

太阳已经没入地平线，落日的余晖已被深沉的暮色吞没。小道两旁的干枯胡杨树的枝丫就像张着巨手的魔鬼，而最令我发憷的，还是那无所适从的路。

一片林地过去了，前面是一片洪水冲刷过的滩地，远处依然朦胧摇曳着沙包和树木的怪影。这时极目搜寻阿扎特勒克牧业村附近的有测绘标识的三角架和那几棵白杨树的树冠，都已消失在夜幕中。只有右侧的远方似乎有几棵高大树木，那是不是我要寻找的村落呢？在不可忖度中，我舍弃了正在走的路径，向着那几棵大树走去。可是到了附近，没有犬吠，没有人迹，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而那几棵大树却是这片林野中的灰杨。此时，我的心开始慌乱了，离开原来的路径已经一公里多了，再折回去能否找到也很难说。怎么办？心慌意乱之中，我看到不远处好像有一条路，便毅然决然地沿着它走下去，去寻找自己今夜的归宿。

密林中一切都变得黑沉沉了，只有头顶的天幕还是微亮的，是

我所能借助的一点光亮，一点慰藉。而整个林间则是令人恐怖的死寂。又走了一程，在天光将尽的最后一刻，我拍下一片林地的树影，就在此时，眼前的昏暗之中出现一片林木环抱的洼地，而且它的中央似乎有一道篱笆，几间房屋。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不由得喊叫起来，回答却是死一样的沉寂。屋里没人，可是曾经有人住过，一种安全感给我增添了几分欣喜。急步走到近前，房门锁着，好在房屋南面的树林边有一口水井，我用吊桶打上半桶水，也不管洁净与否，便暴饮起来，因发急而干渴的喉咙和满嘴的苦涩立即润湿了。



塔里木河北岸轮台的原始胡杨林。

10月下旬的塔里木盆地千里胡杨林中，早晚温差很大，中午太阳是暖洋洋的，有时还显得燥热，而晚上则是寒气袭人。为了不至于被冻坏，我四处搜寻，先是在篱笆旁捡起一个有毡片的破马鞍，接着钻进一间像是储藏室的黑屋子，伸手一摸，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把我吓得几乎晕倒，回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团羊毛。后来我又摸到一片麻袋。有了这两样御寒之物，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远处传来马达的声音，我警觉起来。在不断增强的声响中，我侧耳倾听，极力辨别它来自何方。我振奋了，循着它的声响疾步跑上高坡，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可是无论怎么叫喊都没有回应，马达声也远远地遁去，我沮丧地回到土屋的檐下。后来才意识到这林木围抱的地方，隔音性很强，声音是不容易传出去的。后来马达响过几次，

我知道有人在寻找，可是我看不到路径，辨不清方向，又怎么迎上前去找他们呢？我开始失望了。恰恰此时，我终于听到越来越近的马达声。这时我才辨明了它的确切方位，便一路小跑迎了上去，透过密林看到一点点光影。那是一种生命的召唤，是人们相爱相助的光明。温暖、喜悦、激动交织着的情感，一齐涌上我的心头。当车灯扫向我的时候，我向他们发出欢呼，而车上的人们也发出动人心弦的呼喊。


落日中见到的干枯胡杨怪影。

车上的人告诉我，下午6点多钟发现我没回来，他们就分头去找。自治区林科院的副研究员李护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林科所副所长敏杰，还有刚刚回到护林站的护林员都出动了。找到我时已午夜11点多钟，我偏离了住地以北约9公里。在回程的路上，车子停了两次呼喊那些寻找我的朋友。最后一次停车时，我还听到他们在沉沉荒野中发出的深长呼唤声。我担心他们会在焦急之中怨恨我，而实际上当得知我被找到时，他们都是那么高兴。为了找到我，大家都饿着肚子。一场虚惊之后，有人便开玩笑说，亏了我没有成为第二个彭加木。为了找我，他们出动了两部车，试验站和林管站除一人要给大家做饭外，全部出动，总共20余人分三路撒向方圆十多公里的林野。

后来，我拍到了比那几棵老胡杨树更加珍贵的护林人员和科研人员为保护原始胡杨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拍下了胡杨、红柳以及各种沙生植物蓬勃生长的大漠景色。

在胡杨林里结识的朋友们

我因喜欢沙漠中和盐碱地生长的沙生植物，特别是胡杨、红柳而结识了几位在塔里木盆地风沙前线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沙生植物的朋友。其中有林业专家、科技人员、地县林业部门的负责人、护林员以及荒漠中的牧人。他们长年累月经受着干旱的煎熬和风沙的洗礼，任凭生活条件多么严酷，都不曾退缩而且忘我工作。他们的性格当中具有沙生植物的朴实和顽强，所以我爱他们更甚于那里的一切。同他们的接触虽已事隔多年，今天我仍要把他们描述出来，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思念和崇敬之情。

早在1985年秋，我第一次到轮台县草湖胡杨林试验站采访时，就听站里的几位青年介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科院的副研究员李护群是他们这个站的创始人。每年3月末4月初从胡杨发芽直到隆冬季节，他都要到试验站好多次。特别是春季，胡杨刚刚吐出嫩叶而被虫子吃光之后，又在萌发第二茬树叶时，这种生长在沙漠盐碱地带的古老树种，以它特有的生命力焕发生机的时候，也是李护群进行观察和研究时间最长最忙的日子。

1990年，当我在林科院见到李护群并约好乘他们的沙漠车一起到草湖参与夏季观测试验时，才算同他一起工作生活了比较长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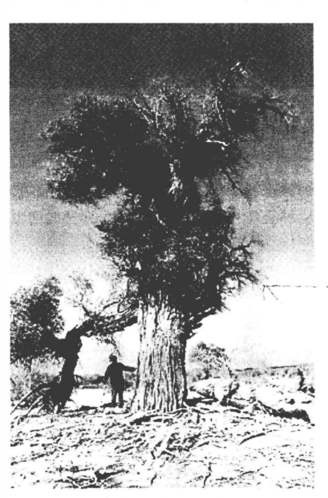
胡杨林的早晨。

日。那已是我第三次进入草湖了。见面时他已50多岁,身体瘦弱,一看便知是长年在试验地工作的,属于那种历尽沙漠风尘、饱尝荒野孤独、全身心投入林业试验的专家型人物。后来当我问起他的经历,果不其然他仅在阿克苏试验林场就待了20年,而其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天山南北同沙漠和盐碱地带的荒漠林打交道。

李护群对新疆沙生植物和森林资源的专注和倾心,是我在草湖感触最深的。草湖是塔里木河下游一段胡杨林生态环境中最典型的一段,那里林木茂密,而且是老中幼林替代生长,各种沙生植物交相辉映的区域。它的北部是戈壁荒漠,南面濒临塔克拉玛干茫茫沙海,而塔里木河畔的这片千里胡杨林则构成了抵御风沙盐碱的生命力极强的沙生植物带和绿色生态屏障,研究它、保护它便成了林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李护群几乎把一生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沙生植物和荒漠生态的研究上。正因为这样,他也就成了塔里木盆地沙生植物种类的"活字典"和"胡杨通"。我的沙生植物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报道胡杨，总要了解它的生长环境，每每谈到这些，李护群总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新疆胡杨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存活最好的古老树种。能够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研究胡杨和其他沙生植物的生存规律、生长特点，从而维护、繁育它们，改变塔里木盆地日趋萎缩的荒漠生态环境，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每次想到这些，我都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在和他的接触中，我每时每刻都想通过他得到许多情况，特别是胡杨的生长奥秘，有一次我确实听得入了迷。

进入轮台县胡杨林区之前，我几次想请李护群介绍胡杨知识，但他不停地找林业科研人员了解试验课题的进展情况，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也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他。到了晚上，他显得有些疲惫，我更不好意思启齿，可他却说："白天瞎忙活，也未能好好谈谈，现在随便扯扯吧！"我说："你也很累了，我们还要在一起待几天，到了试验地再说吧。"他则以了解我们采访活动的行话说："明天咱们就要进入草湖，同胡杨直接打交道，我还是先把你需要的背景材料给你说说。"接着，他从胡杨的分布到生长繁衍特点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



新疆林科院胡杨研究专家李护群在轮台县轮南草湖原始胡杨林中观察胡杨的生长和衰败过程。

新疆的胡杨林主要分布在全长2100多公里、我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面积约420多万亩。在我国，胡杨分布西起新疆，东到宁夏，是绵延几千公里的荒漠地带生长的唯一乔木。世界上杨树种类很多，只有胡杨能在荒漠地带生生不息，巍然挺立。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胡杨为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其他树木所不具备的生长特性。六七米高的胡杨树，下半部的枝条长着柳形叶，上半部则是锯齿状的掌形叶，这种变异反映了胡杨从幼苗到成年的顽强生长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胡杨在幼苗期为了保住水分减少蒸发以便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所以叶片狭小，而当它根系扎入地下之后，随着树干的增高便长出大叶片，以促进光合作用加速成长。胡杨的另一生长特性是它不怕热，不怕冷，抗盐碱，抗洪涝，抗干旱，在绝对高温41摄氏度和低温零下39摄氏度的气温中都不会受到伤害，在年降水量少于280毫米而蒸发量大于1500毫米的情况下也能安然存活。胡杨抵御盐碱的能力很强，一棵胡杨就像一座化学工厂，自身能够分解排出所吸收水分里的盐碱，这在一二百年的老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树身的疤痕和树洞凝结着黄白色的结晶体，就是它排出的盐碱。胡杨的繁殖能力也是十分旺盛的。每年初夏，当胡杨的种子成熟时，外壳便自动开裂，带着绒毛的种子纷纷飘向四方，有的随着洪水漂流，不论凭着哪种方式飘飞，一旦有了落脚之地，在60个小时左右就能发芽扎根。它们虽然不能全部成活，但在那些经过洪水冲刷保有一定水分而后来干裂的土地上，胡杨种子发出的嫩芽，密密麻麻覆盖着河床的两岸。出于生存繁衍的本能，胡杨把种子成熟期同塔里木河洪水期吻合起来。除了种子，胡杨还可以靠自己的根系传宗接代。在原始胡杨林中，你会看到二三百年的老树周围长出许多幼树，它们便是由老树根部发出来的胡杨子孙。李护群给我介绍胡杨之后，作了这样的概述：胡杨有三奇，奇异的叶形、奇特的生理功能、奇妙的繁育方式。

次日，我们进入草湖。草湖位于塔里木河中段的轮台县境内，是

新疆南部千里胡杨林最为茂密且生长年代久远的区域之一。密林之中,生长了千百年的老胡杨比比皆是,十分壮观。自20世纪70年代末塔里木河流量的减弱,加之人为的盗伐,许多地段尤其是远离河岸靠近沙漠戈壁的一些地段,林貌出现衰退的景象。为此林业科研部门会同轮台县,加强对胡杨林和其他沙生植物的管理保护,于1984年建立胡杨林保护研究试验站,对胡杨的生长特点、繁育规律、保护措施进行多项课题的研究试验,李护群就是试验站里第一位课题负责人。我们在草湖的几天采访活动中,李护群从沙漠边缘到塔里木河畔的密林,从试验地到天然落种区,带着我看了不少地方。记得第一个项目是看天然落种自生自灭的原始胡杨林。进得密林,虫子虽将早春发出的嫩叶吃光,但光杆上又发出新的芽叶。李护群领着我观看并拍摄这一景象,是为了证实塔里木河畔的天然胡杨林能够恢复。接着他把我带到一处空旷而胡杨稀疏、苍老的林区,以证实塔里木河水量减弱威胁胡杨生存的严重状况。此后我还看到,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应用和由此带来的一处处胡杨复苏的景观。李护群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胡杨林更新复壮课题的研究试验以来,已经开出1号、2号和3号引水灌渠,渠系之中出现了充满生机的胡杨和沙生植物群。我感受到,在这片干旱、酷热、风沙、盐碱交替肆虐的荒漠上,林业科研人员的辛劳没有白费。他们利用胡杨生长的特性、繁殖规律,围绕着一项项试验课题,从多次失败中取得了成功,为荒凉的大地挽回了绿色。他们通过伐桩、落种、嫁接、断根等试验课题所营造的生态景观是非常喜人的。在伐桩的几十米半径内,密集丛生的胡杨柔嫩枝条荡漾着绿色波澜,而天然落种的蓬蓬勃勃的小小树冠又绿得那么养眼。后来我又跟着李护群查看了展现试验成果的几处地方,拍了不少照片。在一处万亩胡杨林更新地,胡杨幼苗正茁壮成长,林下还长出多种草类,一些地段的优良牧草给原是寸草不生的地面铺上绒绒的绿毯,开着红色或黄色的小花。在另一片试验地里,利用胡杨基因嫁接的白杨直插蓝天,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封滩

育林之地出现了幼林到成年林的5个阶梯式的绿色屏障，而且林地中长出当地人称为“胡杨蘑菇”的可食菌类，那一颗颗顶出腐土、形似木耳的紫色花冠分外好看，食用这种蘑菇别有风味，营养价值很高。李护群及试验站的青年科研人员已把“胡杨蘑菇”列入新的试验课题加以研究培育，掌握这种菌类的生长规律之后，便可人工种植并推广。就在他们研究更新复壮的林地里，已经增产木材6万多立方米，采集薪柴4403公斤，新增幼林19853株，增加干草3675万公斤，保护农田26万亩，恢复草场42万亩，并且引来了多年不见的马鹿。不辞辛劳的林业科研人员和林区管护人员，正用他们的汗水浇灌出一个绿色世界，在塔里木河畔谱写新的诗篇。正像胡杨林试验站廊檐上所书“瀚海扬碧波”的门栏那样，李护群和他的伙伴们的愿望正在实现。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绿色的梦想，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绿色的现实。

李护群的足迹几乎遍布塔里木盆地胡杨林的主要分布区。当我快要结束那次采访离开轮台县之前，李护群告诉我一个新的消息，自1985年开始研究试验以来所取得的6项科研成果，已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轮台县、尉犁县、库尔勒市的92万亩荒漠地上进行推广，经过验收完全合格。

胡杨林中的“海燕”

新疆林业科学院在轮台县建立了胡杨林科学试验基地。从1984年以来，经过科技工作者和林业工人的长期努力，一些试验成果已经得到普遍推广，仅更新复壮这项成果就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尉犁县和轮台县一带的92万亩土地上取得显著成效。库尔勒的情况我只是听说过，也曾在尉犁县的孔雀河下游看到过一片次生胡杨林，那片林莽郁郁葱葱，甚为壮观。当然，这一成果不知凝聚着多少林业科研人员和当地村民的心血与汗水。在轮台县境内的

草湖林区，我结识了一位专门从事胡杨林管护和推广更新复壮研究成果的特殊人物——陈海燕。

从名字上便可猜出，他是从祖国南海之滨飞落到瀚海戈壁的一只“海燕”。事实确是如此，为了支援边疆建设，1956年他从广东省来到新疆轮台县，到1990年已有34个年头了。他今年54岁，除了说话还带着很重的广东乡音外，看上去已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了。黝黑的面孔常常显出一副冷峻而严肃的表情，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如果混杂在维吾尔族人群中，你还真看不出他是来自南方的汉族人。陈海燕是轮台县胡杨林管护站的站长，同他的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等各族伙伴一起，管护着县城以南、塔里木河以北、东西长123公里、南北宽18公里的36.4万亩胡杨林地。

早在1985年10月，我第一次到草湖林区采访，当时那里只有一座名叫阿扎特勒克的荒村，距轮台县城70公里，就是这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竟然走了20多个小时。经过一番艰难跋涉，当我看到一排粉白而整齐的房舍时，感到十分新奇，屋檐上“瀚海扬碧波”五个大字更是醒目。听当时在站内执勤的青年人说，这些房舍是由陈站长一手操持兴建起来的。时值深秋，站里的科技人员都已回到乌鲁木齐忙着写试验



轮台县林业局技术人员陈海燕正在研究保护胡杨林。

课题报告去了，陈站长正在县城办事，所以我们未能见面。

1990年我第四次到草湖之前，在轮台县招待所见到陈海燕。初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总觉得他板着面孔待人。也许是缘于广东人的耿直，一见到新疆林科院副研究员李护群和我这个没见过面的客人，他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光发牢骚。后来才知道当时石油部门正在塔里木盆地勘探开发石油资源，有一口新的探井井位定在草湖，要修的一条探区临时公路正好穿过胡杨林地。出于对胡杨林爱护的情感，穿林修路这件事让他想不通。那几天陈海燕正在气头上，所以一见李护群的面，他就顾不上什么礼数，当场发起火来。当然经过李护群耐心劝说，他最终想通了。然而对于这次冷遇，我一下子还难以释怀。事后，通过越来越多的接触，我才真正了解到陈海燕正直的为人和独特的品格。特别是得知他从1982年起就患了中心性视网膜炎，但仍然坚守在风沙弥漫的胡杨林中实施更新复壮课题时，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草湖胡杨林的更新复壮是从1984年开始的，那时刚患了视网膜炎的陈海燕，就同全站的人修渠挖沟引洪漫灌一些开始衰退的林区。到20世纪90年代，共开凿了6条引洪渠道，总长度为42.7公里，挖掘土方35万立方米。有了这些渠道，每年有7万多亩受到干旱威胁的胡杨林在塔里木河洪水到来之时汲取急需的水分。有了水，更新复壮的胡杨林地也扩展到8000亩。这些努力使正在衰退的胡杨林恢复了生机，许多地方呈现林茂草丰的景象。在那些经过引洪灌溉的人称“老头林”的地方，百亩地的木材生长量增加了0.2立方米，绝迹多年的马鹿又回到林间了。

塔里木盆地的荒漠胡杨，一般都分布在塔里木河两岸的盐碱地上，所以它们被称为“荒漠勇士”。在那风沙肆虐、盐碱泛白的大漠之中，胡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当你进入原始密林，看到那扭曲的树身、干裂的肢体时，你会从那粗陋的外表感受到它们所经历的磨难。那混沌洪荒中绝少水分、绝少生命的踪迹，脆弱的生命难以存活，胡

杨却依然顽强地挺立在严冬酷暑里，年复一年延续着绿色的生命。陈海燕和他的伙伴们正像胡杨一样，扎根在这片瘠薄的大地上。

自1984年以来，陈海燕带着越来越重的眼疾，一年里总有4个月待在原始胡杨林中指导施工，组织护林。1990年，他的右眼视力只有0.04，左眼视力也只有0.6，在右眼接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依然在那里琢磨建设新工程的点子。英切克北面沙丘连绵，南边林海苍茫，管护站在这样的地方建起房屋，开出50多亩地，一方面解决护林工人的吃菜问题，一方面准备种果树。

1989年初春，塔里木盆地风季来临，昏黄的天空弥漫着沙尘，有时沙暴袭来天昏地暗。为了试种果树，在塔里木盆地全年最恶劣的天气里，陈海燕同副站长毛拉肉孜、技术员艾尔肯一起，到英切克踏勘地形，调查那里能否引洪蓄水。到了那片荒凉的地方之后，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一次出去走了很远，遇到一场大风，呼啸着的狂风卷起沙尘满天飞舞，打得脸上生疼。因为陈海燕视力模糊，毛拉肉孜等人就让他闭着眼睛，搀扶着他走回营地。经过陈海燕和林管站工人们的共同努力，英切克的一片洼地终于引来了洪水，后来竟然建成全疆闻名的集湖泊、沙山、胡杨和其他沙生植物于一体的森林公园。

在护林更新工作中，陈海燕同少数民族的副站长、技术人员以及在林间放牧的牧人结下深厚的情谊。管护站青年技术员艾尔肯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之后，同陈海燕一起为胡杨断根、伐桩、清林、育苗、作规划、搞建设，他们配合十分默契。1990年四五月间，林管站准备在一片衰退林里进行伐桩更新，春天的风沙加重了陈海燕的眼病，他需要去内地医院治疗。艾尔肯对陈海燕说："你放心地去，那片林子我们一定按设计要求施工。"陈海燕走后，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们把帐篷搭在林间，面对初夏的炎热和疯狂的蚊虫叮咬，他们毫不退缩，照常施工。就这样，艾尔肯同施工队长及刚从新疆林业学校毕业的库尔班托乎提等人一起，每天从日出干到日落，终于提前半个多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1988年，牧羊人依明·托尕的地窝子

失火塌陷，压伤了孩子，正在更新林地的陈海燕得知后，用拖拉机把孩子连夜送到县城治疗。从此依明·托尕不仅成为他的知心朋友，而且主动当了管护站的义务护林员。陈海燕既是轮台县胡杨林管护站的站长，也是党支部书记，像毛拉肉孜、艾尔肯这些把一切献给胡杨林的人，都经过党支部的培养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0年10月，我再次来到草湖林区时，陈海燕领着我们去一位老牧人家里做客。我们沿着一条起伏的沙山行走，登上一处最高的沙梁，看到他们引洪灌溉过的一片林野和那片为了试种果树而引蓄的洪水，闪烁着金辉的胡杨林海无边无际，林野中湖光闪闪，碧波粼粼，给那片戈壁荒野平添了无限生机。我几乎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中，举起相机连连拍摄。

接触多了，我发现陈海燕并不是过分严肃和冷漠的人，他是那种内热外凉、通常称作"暖水瓶"性格的人，越是在困境中，他对人的关心和热情就像冬天的炭火一般温暖。我在离开草湖的前两天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当时，我为了再次寻找两棵1985年曾经见过的大胡杨树而迷路，陈海燕带着护林员几乎跑遍前几天我走过的地方去寻找，在沉沉夜幕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当我们再次重逢时，当听到他那因呼唤我而嘶哑的嗓音时，我禁不住心头一热，差点儿流出眼泪。

情系林海的刘建国

刘建国是我在草湖林区结识的一位风趣幽默的人物，可以说是胡杨林中的红脸大汉。

他是轮台县林业局的副局长，平时总爱待在塔里木河畔的草湖林区，对那里的原始胡杨和其他沙生植物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正因为这一点，胡杨林观测研究试验站建立时，他就被新疆林科院的副研究员李护群看中了，成为共同经营试验站的伙伴。

他很健谈，个头1.75米，脸庞黑红，眼神里透着精明，嘴唇有点突出而厚重，一看就像是能言善辩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诙谐总能使自己身边形成一个热闹的场面。他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人物的长相特征、性格特点和他所经历过的某件事，平淡的事情经他一说也能引人捧腹。跟他在一起你会听到许多趣闻，获得一些启示，所以在草湖胡杨林中工作，有他便会有笑声，一切寂寞、忧愁、困难和疲劳都会被扫荡殆尽。

比如说吧，我们到草湖林区之后工作劳累，第二天早晨往往不想起床，他却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一次大家要去远处的观测地搞试验，他最先起床，用着唱京剧的腔调催促大家："太阳已三竿之高，为何还不起身？"还拖着尾腔说了一句体谅的话："也罢，那就饶恕你们多睡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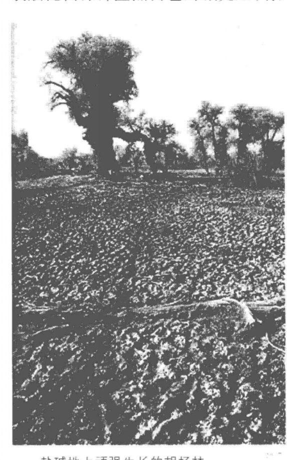
刘建国只要见到新疆林科院的李护群，便有说不完的话。深秋季节正是塔里木河畔色彩最为丰富的时候，我同他们去草湖正好住在隔壁。入夜，他们的说笑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有时凌晨两点多钟，还能听见他们聊得热乎。第二天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刘建国回答说，除了胡杨、红柳、沙生植物、试验课题，其他都是秘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他们意志消沉、心态萧索。他们对事业、对生活、对人生充满激情。

刘建国1968年毕业于新疆农学院，被划入当时所谓的"臭老九"行列，分配到农场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起进行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分配到轮台县当林业技术员。自那时起，刘建国无论是在林管站还是在林业局，总是一次又一次来到草湖林区。从住马棚到住砖房，他和他的同事们经历了漫长而艰难困苦的时光。他说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苦日子还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

提起过去，刘建国说总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悲哀。那是一种令人迷茫的岁月，除了空洞的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事业上的作为和抱负。

而这些年虽然也吃了不少苦，但我们的森林事业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保护好原始胡杨林，为了经营好科学试验地，他们不管春夏秋冬，战胜了许多困难，作出了许多奉献。1984年以前进入草湖，大部分时间要靠拖拉机，在那蛮荒的林野上翻沙梁过碱地，飞扬的碱尘窒息得人喘不过气来，有时深陷在沙包或泥潭中，就要彻夜挖掘和用柴草铺垫才能把抛锚的机车拖出。遇到这种情况，从轮台县城到草湖70公里的路程就得走两天。1978年冬天，刘建国到草湖查看胡杨林的管护情况和试验站房屋的建设进度，返回时乘坐的拖拉机一路颠簸，半道上车斗同拖车脱了钩。隆冬季节，司机戴着大皮帽，马达声音又大，脱钩之后被丢下的人们，无论怎么呼喊，司机也听不见，只管开着机头往前跑去。走了一段之后，司机回头一看，才发现车斗没了，返回去找，到了跟前只见刘建国他们冻得受不了，正燃起一堆篝火取暖。挂车斗时，机头又熄火，重新发动只有一瓶引火汽油，是全部倒入启动器还是先用一半，他们为此大伤脑筋——如果一次用上却发动不了，那就再没汽油了；如果分作两次，又怕天气冷油量少发动不起来。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一瓶汽油分作两次，结果都失败了，大家只好徒步向县城走去。他们穿着厚重的大头鞋、皮大衣，从黄昏走到凌晨 3 点才到了一个村子。还有一次，刘建国到天山深处查看护林情况和调查天山云杉森林资源。深秋季节，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乡村正是秋色浓重秋实丰盈，而天山山区已经降雪了。他们到了深山，牧人们都已赶着牲畜往山下转移，没有住处只好把鞍垫铺到突出的山崖下，几天后调查工作快要结束时，遇上一场暴风雪，积雪厚达70多厘米，把山里的一切都覆盖了，所乘的毛驴也冻得不停地发抖。刘建国和同行的伙伴砍了一些树枝，把饲料全部让毛驴吃了，待毛驴增加了热量恢复了体力，他们才踏上归程。就是这样一年到头从平原到天山的林野，又从高山到塔里木河畔的荒漠，他们对森林管护和养育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从而使胡杨林免遭砍伐，充满生机。

我第四次到草湖林区采访时，有一天刘建国对我说："走！领你去看一个地方。"我们穿过密林，来到一处洼地，看到一片盐碱地，在表层泛白深部呈黑褐色的碱壳上，有几棵树龄不大的胡杨已经倒伏并开始腐烂，周围只剩下几墩红柳。盐碱地另一侧的胡杨林里，红柳新枝蓬勃生长，红柳的花穗和胡杨的黄叶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妙的画卷。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我茫然了，便问刘建国："同一地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生态表现？"他说："这是一片近年来临界水位发生变化的荒漠地，由于水位上升成为重盐碱地之后，除了大胡杨，原来的胡杨幼苗都已死去，但是红柳却能生长。经过长期的观察试验，我们发现了治理重盐碱地使其恢复绿色生态的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通过撒种的方法先使可以抗御重盐碱的红柳扎根生长，形成一定的密度后，使天然落种的胡杨生长起来，形成次生林，从而改变这片盐碱地的面貌，这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观察、思索、试验中，林业科研人员通过植物断根、天然落种、人工育苗、嫁接、引洪灌溉、挖排碱沟等手段，逐渐摸清了许多沙生植物的生长规律，一些与胡杨、红柳共生的骆驼刺、沙拐枣、老鼠瓜、梭梭、罗布麻，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草，都出现在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因为是秋季，许多植物



盐碱地上顽强生长的胡杨林。

还正在撒种。沙生植物有一种共同的特点，为了传宗接代，抵御干旱、盐碱，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发芽生根的可能，它们的种子总是驾着绒毛般的翅膀，随着漠风飘向四方，寻找能够繁衍的土壤，这种繁育方式也是荒漠植物能够顽强生存的一种本能。就在我们的脚下，裹着沙拐枣籽种的红色、白色、黄色的小小绒球，不时在沙地碱滩上滚动，寻找自己落脚生长的机遇。而罗布麻正在从开裂的种荚里不断飘出银白色的绒毛，夹带着它们的种子，也在轻轻地飞向远方。当我在刘建国倾注深情的土地上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脸上露出的欣喜表情。塔里木盆地盐碱荒漠出现的植被和正在播撒的种子，展示着生态复苏的美好远景。更让我感受到刘建国同他的伙伴们为了当好森林卫士、维护生态平衡忘我工作的精神风貌。他们就像那红柳、胡杨和其他沙生植物一样，风寒酷暑无所惧，常年辛苦操劳在塔河。

荒漠林中的活地图

这几年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心绪催动着我到塔里木河畔的草湖去，而每次去过之后，总期待着再一次成行。所以从1985年到1990年我到那里去了4次。可以说在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我去到那里都拍了不少照片。究竟是什么东西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伏案沉思，是胡杨林和沙生植物那种抵御风沙盐碱的生命力给我心灵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我一次又一次所结识的大漠人。

每每想到草湖胡杨林中结交的许多朋友们，他们的音容笑貌、脾气性格便都浮现在眼前。就拿最先结识的胡杨林试验站的工人王香宝来说吧，这位来自甘肃省河西走廊从小在草湖长大的人，无论哪次见到，他身上都带着塔里木的风尘，神情中流露出一种刚直而干练的性格。他个头不高，瘦瘦的脸庞在一层浮尘中透着黑红，两眼深藏着刚毅和智慧。他身材虽然比较矮小，但动作灵活。在他身上有

着胡杨般的韧性。在那冬季严寒、春天风沙频频、夏日酷暑难熬的荒漠中，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他常常在孤独和寂寞中忘我工作着。平时他话语不多，如果问起是怎样工作的，回答总是三言两语，说得很平淡，但你如果跟他出去工作，在那常常使人迷路的密林中，他会准确无误地带你到所要去的地方。1990年10月，当我迷失在胡杨林中，人们还一下子找不到我的时候，是王香宝想到我有可能在牧羊人称为“维羊塔克”（维吾尔语意思为“坑里的骆驼刺”）的地方，为此他也十分担心。因为居住在那里的一户牧人有几只猛犬，一次3个小伙子拿着棍棒都没躲过猛犬袭击而被咬伤了。

就在我迷失的前几天，王香宝巡林走到那里时，都是先爬到一棵树上喊叫主人拴好猛犬才敢下来，所以他们怕我被猛犬咬坏，所幸的是王香宝到那里找到我时，那户牧民两天前已经搬迁到新的放牧地。由于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人们又称他是草湖的“活地图”。

1990年6月，新疆林科院的几位专家要趁塔里木河洪水到来之前，到离试验站70多公里的名叫通古斯勒克（维吾尔语意“野猪窝”）的1500亩圈护地去，进行生态变化的全面观测，我参加了那次活动。

那是在1985年新疆林科院为了掌握塔里木河千里胡杨林和其他沙生植物的生态变异而建立的观测试验地。当时也是由王香宝给几位科研人员带路一起圈定和围护起来的。事隔5年，过去的一些路段已被洪水冲毁。我们在没有人迹和道路的情况下起程，天光未明依然由王香宝带路，穿密林走河滩，在王香宝的指点中行进。一路上拱沙窝，过碱滩，行程十分艰难，但70多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准确到达了。晨光中也是蚊虫最猖狂的时候，大家忍着叮咬抓紧工作，分布在1500亩原始密林中的5个水泥界桩虽被荒草掩盖，但在测量中仍被王香宝找到了。工作现场到处都是野猪翻起的土坑，草丛中有很多野猪卧过的痕迹。我想象得到，只身孤影的人肯定不敢到这里来，而王香宝则年复一年地出入这样的境地，保护和巡视着塔里木河岸的那片鲜为人知的林野。

在草湖林区，每个护林员管护面积3万亩，巡视一遍需要10多天时间，每次出巡都要带上干粮，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有时在牧人的帐篷，有时就在野地里，遇不到人家就喝几口坑里的积水，啃几口干粮。夏日的蚊蝇、冬日的严寒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特别是密林草丛中的野猪，常常成群结队在林间觅食，有时就会同人们相遇。一次王香宝到离住地10多公里的地方去巡林，走到一处林深草茂的地段，忽然遇到20多只野猪在那里拱草根、啃树皮，遭遇太突然，双方都惊呆了。只见几只带着猪仔的野猪亮着獠牙，瞪着王香宝，而他也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是后退，还是继续走路？后退就有被野猪追赶的可能，最后他硬着头皮，假装毫不介意地从旁边走了过去。事后他说，一想起那些野猪、那叫声、那獠牙，他就心有余悸。就这样他依然没有放弃巡林，每年都要在住地周围的林野巡视上百遍，除了护林他还担负着保护塔里木河鱼类资源的重任。由于生态得到保护，野猪的胆子越来越大，常常出现在试验站附近。王香宝一出远门，就剩下他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妻子还要进行清晨到傍晚的几次气象观测记录，寂寞和恐惧不时困扰着她和孩子，但她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本来，王香宝是试验站里从事课题劳动、林木管护和观测记录的一名工人，可是他仍然担负着一万亩胡杨林的巡护工作。从住房到试验地3公里的盐碱地上，不仅有他长年累月踩出的一条路径，就是方圆十几公里的密林中，也常常留下他的足迹。

热心肠的依明·托尕

塔里木河两岸的千里胡杨林里，居住着许多维吾尔族牧民，其中的依明·托尕令我终生难忘。

多年来，我从孔雀河下游到轮台县的草湖，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叶尔羌河、和田河流域到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阿拉干，接触过不少牧人。我曾随着驮夫，伴着叮当的驼铃，在沙漠南

缘寻找古城遗址。我见过手托鹰隼的猎人，也在小小的荒漠集市的湖边吃过别具风味的烤鱼，而轮台县原始胡杨林中的牧人依明·托尕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那片林野中无人不晓的义务护林员，也是一位喜欢帮助别人的热心人，在一年之内我曾到他家去过两次。

在草湖林区，许多地名都是缘于当地牧人的名字，比如木沙羊圈、毛拉肉孜羊圈、托乎提羊圈等等。也有以地理特征、植物名称而得名的，如维羊塔克（坑里的骆驼刺）、江尕勒（戈壁地）、枯木库都克（沙井）、通古斯勒克（野猪窝）等。但是，在草湖林区，无论向谁提起依明·托尕的羊圈，对方就会流露出一种特别的亲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听人说过，他是绿色生态的卫士，是荒漠旅人的挚友，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到了他的家中，按维吾尔成语讲，便是一个"没有白面馕也有热心肠的热情好客的人家"。我这个来自城市的人，起初对这种评语体会不深，当我在草湖工作过一段时日之后才深深感到，一个在胡杨林中迷失路途的旅人或者护林员，如果能够遇到依明·托尕这样的人家，将会感到十分幸运。

1984年新疆林科院在草湖建立胡杨和沙生植物生态试验基地之初，是依明·托尕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科研人员无微不至的关照，就是所圈护的几片试验地也是由他领着踏勘并确定下来的。依明·托尕祖辈就在这一带放牧，草湖林区是他们生存的依托和幸福的保障，因此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无限的深情，而长期的游牧生活又使他养成淳朴热情的高尚品德。草湖林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得到过依明·托尕的救助。

我第一次到依明·托尕的家里是在1990年6月，那个季节也是一年里最难熬的时节，蚊蝇、炎热、干旱轮番袭来，把人们折磨得疲惫不堪。我们所到的地方是依明·托尕春末夏初放牧的一个营地。在上一年，由塔里木河洪水汇集而成的一些池塘干涸了，由于地势低洼，别处的积水都已渗漏蒸发殆尽，唯有这片营地还汪着一泓有点混浊

但可以饮用的淡水，因此那里便成为附近护林人员和过往行人甚至石油勘探地质人员的驻足之地。我们前往胡杨试验地工作时，必然要到依明·托尕家里午休、饮水。依明·托尕的半地窝子式的草屋掩映在一片胡杨林中，离房屋北面约50米的地方，是一道深深的引洪渠道，他就是靠着渠道中蓄水最久的一个深沟把家安下来的，每年枯水季节必定要在此地住上一段时间。

我们到时，依明·托尕已经出去放牧巡林。几位乘着毛驴穿红着绿的远方亲戚来到他家做客，还有几位附近的护林员正在他家歇息。我是第一次到这里，别人看来都是常客，要吃要喝无拘无束。当时女主人正忙着烧茶，大女儿在草屋附近和面烤馕。我们喝过热茶，吃过热馕，即将离开的时候，依明·托尕正好回来，见到很久没有相遇的老朋友林业专家李护群，他分外高兴，非要我们留下来吃晚饭不可。面对这位朴实厚道的牧人，李护群只好答应搞完试验地的观测后一定再来，他这才放了我们。傍晚，我们再次来到他家的时候，屋外已经煮了一大锅手抓羊肉。李护群和轮台县林业局副局长刘建国同主人谈起护林情况。依明·托尕说，近年来因为塔里木河水减少了，北部边缘的一些林子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他建议今后进行更新复壮的施工时，最好能在那一带开挖一条引洪渠道。他感谢林管站在他放牧的地方打的那口井，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夏季人畜饮水的大难题，附近的牧民也纷纷仿效。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促进定点放牧，他说这对护林防火是有好处的。改革开放中，这几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许多新鲜事物已经出现在这片过去人迹罕至的地方，不远的阿扎特勒克办起了寄宿学校，还开起了商店，石油勘探队的到来使他们知道了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情，看到了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机器。这些都使牧民们开了眼界，懂得了不少知识。可是，随之而来的护林担子也越发沉重了，特别是入冬以前，盗伐林木的情况很多，为此依明·托尕常常夜间出去巡护。他希望护林队在那个季节要特别加紧巡逻。为了增加巡林次数和扩大巡林范围，他还特地花费

500元买了一头健壮的黑驴。他指着屋旁的那头黑驴说，这两天我就是骑着它转了一大圈，要不是母亲病重，我还不准备回来。多年来依明·托尕就是以这片大地主人的姿态，维护塔里木河的生态环境，管护着他家放牧地周围的林子。

依明·托尕面色黑红，个头不高，健壮敦实。听着他们侃侃而谈，我产生了许多联想。过去，无论在塔里木河的千里胡杨林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由于交通不便，生活在荒漠地区的牧民一直过着封闭和半封闭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婚丧嫁娶，最多只是一些玩鹰斗狗、打猎捕鱼的事儿，大部分时光都耗在循环往复、枯燥乏味的放牧之中了。1979年，我采访丝绸之路，途经和田地区安迪尔河附近，接触过牙通古斯的几位牧人。那里没有树木，只能盖草屋，四周是白花花的盐碱荒草地，远处是绵延起伏的沙山，很少有人到那里去，一旦有位远方客人光临，热情的牧民会倾其所有给予款待。款待之余，他们便会打问外面的世界，跟你说个没完。有时因为语言不通没什么可说的，也要陪伴你坐在那里。当时一位为我们当向导牵骆驼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沙漠，甚至没见过卷烟，就连离牧场仅100多公里的绿洲出产的苹果、石榴是怎么长成又如何挂上红色也弄不清楚。而今天，这些地方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依明·托尕憨直的笑谈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把这些曾经与世隔绝的荒漠牧人的思路和眼界乃至活动天地引向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吃手抓羊肉的时候，主人用新买的收录机放起动听的音乐，还拿出啤酒为大家助兴。

第二次去依明·托尕家是同年10月。深秋时节的草湖林区，胡杨闪烁着金辉，林间和盐碱滩地上的红柳像一团团火焰在漠风中燃烧。依明·托尕的家这时已经搬到离塔里木河较近的一个大水塘子旁边，那是一处用胡杨树干围抱起来的篱笆院落，土坯筑起的房屋比初夏的那座半地窝子式的草屋要大得多，房屋的近旁打了一眼机井，附近的洼地里种了8亩甜瓜，瓜田旁边一片胡杨和灰杨的叶片金光灿灿。这是依明·托尕冬季放牧的营地，我们到时，他的母亲因为

病重在轮台县城住院治疗，依明·托尕前去陪护，只有他的大孩子带着弟妹放羊护林，操持家务。

这次到草湖试验基地，站里的王香宝抱出几个甜瓜给我们这些风尘仆仆的人解渴。一打问，这些甜瓜是依明·托尕种的，这是他为慰劳老朋友王香宝和站里辛勤护林和实验基地的技术人员们准备的。在我的记忆中，塔里木胡杨林里干旱缺水，许多地方别的作物不能种植，而在一些水位较高的洼地里种出的甜瓜却是香甜无比，所以每到夏末初秋甜瓜成熟，那里的甜瓜是最能饱人口福的了，特别是深秋季节，一些牧人把收获的甜瓜晾在屋顶和木架上准备冬季享用，这时你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牧人便会嗅到瓜香，看到那椭圆形金黄的大甜瓜排列在屋顶和棚架上，那真是别有一番风情。吃过甜瓜之后，我又返回依明·托尕家去，拍摄他们晾瓜、藏瓜，以及“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大漠风情。可是去了以后，我失望了，一问才知道，那年塔里木河洪水特别大，瓜田被淹过一次，因为水分太大，瓜不太甜，许多都烂在地里，剩下的一些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慰劳了护林员和过往的行人。我没拍到有特色的照片，便同小主人聊起他们家管护林木及经营羊只的情况。依明·托尕家有700多只山羊，虽然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胡杨林中的牧人，但生活得真正富裕还是这几年的事，仅1989年他们家出售活羊和山羊绒收入就达9000多元，1990年仅山羊绒一项就收入7000多元了。

我问为什么收入这么高？十五六岁的小主人摸着后脑搜肠刮肚地想了一会儿说：“听爸爸说主要是党的政策好，再加上浇过水的林子草长得好，羊只繁殖快长得肥。爸爸常讲胡杨林管护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注意护林防火的事。”我没见依明·托尕，却听到小主人一席动人的言谈。说话之间，轮台县胡杨林管护站站长陈海燕顺便询问林子里的情况。小主人说，这几天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前些日子有人盗伐，被爸爸制止了，还给盗伐的人讲解了《森林法》的一些规定。有一个过路的人晚上点火取暖，小

主人知道后，去那里查看了，并让他管好火种。今年春天断根，爸爸利用洪水还浇了一遍已经长出许多幼树的更新林地，树苗长得很好。小主人说，他有一件事情对不住父亲，就是春天买的那头用于巡林的大黑驴，前天因为自己顾不过来，黑驴独自出去喝水，陷在泥潭中被溺死了。听了这些，我们十分惋惜，也为依明·托尕的精神所感动。我便安慰这个孩子："没关系。大人不在家，你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忙不过来，你爸爸会原谅的。"

在深山之中结识的老人

——阿尔泰山纪行之一

1961年和1968年，我曾两次到阿尔泰山采访并且结识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哈萨克族，名叫木勒特克拜依；另一位是图瓦人，名叫巴图尔。在那山峦叠翠、湖光潋滟的草原谷地，他们把自己融入青山绿水之中，陶冶着爱美的心灵和刚毅的性格，捍卫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这种情怀自然而然地传承给他们的子孙后代。

我最先认识的是木勒特克拜依。那是1961年8月，我们采访了福海县吉力湖上的渔民之后，听说布尔津县有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于其塔什，还听说作为牧区前线生产指挥机关的布尔津县牧业办公室，已经跟随转场的牧民和牲畜到达此地，帮助牧民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有许多新闻素材，于是我们从额尔齐斯河畔的布尔津县城到于其塔什牧场，交通十分不便，经过多方打问寻找，才找到一辆给牧场送粮的汽车，好心的司机答应把我们带到大山之前的琼库乡。起先我们沿着将要汇入额尔齐斯河的布尔津河东岸，在生长着野山杨和白桦林的河滩便道上行驶，当到达一处靠近山前河流出口的渡口时，由于山中降雨引发洪水暴涨，水急浪高，无法摆渡，只好等到来日河水平缓才能过去。我们饿着肚子，在岸边露天过了蚊虫叮咬的夜晚，第二天激湍咆哮的河流平静了许多，水位回落，

可以摆渡，我们又踏上旅途，不巧的是将要到达琼库乡的时候，布尔津河上游暴雨汇成的新的洪水又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好滞留于南岸一个俄罗斯族聚居的村庄。第二天，山里的雨量减弱，激流平缓之后，我们才过河来到琼库乡机关所在地。当时乡党委书记得知我们经过两天的周折才到乡里，而且还要去汽车无法通行、道路更加艰难的于其塔什牧场采访报道牧业办公室的工作和牧民的生产生活，他很受感动，答应立即设法给我们找几匹乘马，在供应困难的情况下，还让供销社给我们准备了一块茯砖茶、几包方块糖以便到深山牧民家中食用。我们等了两天，等来了两匹乘马和一位向导，三人骑马起程。

从琼库乡到于其塔什又走了两天。第一天住在阿尔泰山前一个名叫海溜滩的村庄，村里住户稀少，除了给牧场转运粮食、盐巴的转运站和皮毛收购站，还有一些定居的哈萨克族牧人。第二天的路程全是山路，崎岖的路径有时盘上山顶，有时又落入谷底，越往前走山林越密，而谷地中草丛没膝，山花烂漫，展现着阿尔泰山的丰盈秀美。下午，牧业办公室的小木屋里走出了一位汉族干部，他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生硬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猜想他可能把我们当做破坏草场挖药材的"盲流"，因此对我们很不客气。我们递过布尔津县开的介绍信，他才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内，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刘波，是布尔津县委办公室的秘书。刘波是一位幽默诙谐的人。我们认识之后，他故意开玩笑问我们，你们到深山牧区采访带没带耳朵？会不会说话？我也开玩笑说："你可以当我们的翻译嘛。"大家哈哈大笑。

于其塔什牧场位于阿尔泰山深处，草场比较平缓，除了肥美的牧草，许多山冈布满密密的松林。哈萨克人这样歌颂于其塔什牧场：叠叠群山似少女的乳房，密密森林似少女的裙衫。后面这句歌词成为我们新闻稿件的标题。于其塔什确实很美，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随着山冈的起伏而伸向远方，黄昏时分，夕阳给群山镀上金辉，更加

令人陶醉。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看畜群，访牧民，钻林野，登山巅，几乎每天都马不停蹄地驰骋在草原，不顾劳累，深入采访。牧业办公室的人们也喜欢与我们交谈，主动给我们提供线索介绍情况。

一天，布尔津县委副书记哈斯勒汗对我们说，过两天他去县城开会，临走之前要带我们去喀纳斯湖看看，那是阿尔泰山最美的景区，我们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带着牧业办公室食堂厨娘制作的烤饼和羊油上路了。山区的天气阴晴不定，起初晴空万里，白云蓝天，走了没有多久，前方几块铅灰色的云层就开始汇聚，接着从幕布般阴云中传来滚动的雷声，还不时夹杂着闪电。随着一股呼呼作响的风声，霎时雷电便在头顶炸响。阿尔泰山的雷声是我采访生活中遇到的最可怕的声响，暴雨还没有来临，最先感受到的是突然在头顶炸响的雷声和令乘马竖蹄的闪电，那一瞬间我几乎被受到惊吓的乘马掀翻在地，接着狂暴的雨水倾盆而下，不一会儿，我们行走的小路就变成溪流，十分泥滑。哈斯勒汗领着我们不得不改在密林的草丛中行走，倒伏的朽木，加上常常刺痛着面颊的树枝，行走起来十分困难。这一段路途要经过加勒登育林场才能上喀纳斯湖的牧道。

到了加勒登育，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赶紧向一座小木屋走去，还没进屋，一位年约50岁的哈萨克族牧人就笑呵呵地迎了出来。他个头不高，戴着锦缎缝制的高顶皮帽，红润的面孔，精明的双眼闪动着笑意，虽然飘动着稀疏的山羊胡须，但依然显露着强健的体魄，一看便知是久经草原风雨的哈萨克人。哈斯勒汗说，他叫木勒特克拜依，是附近林场的护林员，也是全县打狼保畜的模范。我们的到来，木勒特克拜依显得十分高兴，他马上生起炉火，一边让我们烘烤淋湿的衣服，一边让妻子给我们烧茶烤饼。我们吃喝之间，哈斯勒汗介绍说，木勒特克拜依和喀纳斯湖畔的一位图瓦人，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人物。木勒特克拜依管护森林草场已经五六年了，这期间林场从未发生过火灾、盗伐和破坏草场的事。于其塔什是我们布尔津县主要的夏季牧场，放牧着十几万头牲畜，过去狼害很严重，哈熊（棕熊）

有时也袭击牧人和羊群。木勒特克拜依在巡视草场的过程中打死了许多恶狼，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你们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报道。木勒特克拜依是一位言谈幽默而且很重感情的人。我们喝过奶茶，雷雨已基本过去了，虽然还下着小雨，但我们决定还是继续赶路。木勒特克拜依看我们要走，便说："刚才的雷雨只是老天爷先打个招呼，加勒登育这一带山高林密，雨云不会走得那么快，雷雨过后有时没完没了的阴雨常常给路人带来烦恼。刚才我出去看到雨云依然翻滚，到处流窜，说不定还有一场大雨呢！你们看我的木屋这么大，木板搭的床铺又宽又长，别说你们三位，就是十位八位客人都可以住下。我们哈萨克人有句谚语——风雨之中、漆黑之夜把客人放走是不道德的，它会像风一样传遍草原。住下吧！如果怕粮食不够吃，我们还有奶干、肉干，还可以吃打来的狼肉。"我们问狼肉能吃吗？他说这里的狼吃的都是我们的羊，所以狼肉同样好吃，说得大家都笑了。由于哈斯勒汗两天后还要赶到县城开会，我们谢绝了木勒特克拜依的挽留，并答应一定再来。

上路之后，起先还是蒙蒙细雨，行不多久雨又大起来了。穿过一片密林，面前出现高高的山冈，坡路很陡，我们只有顺着泥滑的山路去登上那座山冈。哈斯勒汗在马背上长大，加之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一般都骑着好马，他双腿一夹，吆喝一声"驾"！乘马便踏着滑溜的泥水飞步爬上山坡，而我们骑的马就有些差劲，不管怎样催促，用鞭打用腿夹，每次爬到半山腰都会滑溜下来，反复多次也无法到达山顶。哈斯勒汗无可奈何地说："上不去咱们就在这里的林间空地过夜。"后来我们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只好到路旁的一片林间空地搬来几棵倒伏的树干，掰下树枝点燃一堆篝火，把树干拼在一起准备裹着雨衣躺在上面，围着篝火在雨中过夜。经过半天多的行程，我们都已感到疲乏，饥肠辘辘，便拿出干粮就着羊油吃了起来。此时，几位赶着牛群驮载盐巴的牧人也因雨大路滑上不了山，就同我们凑到一起露宿。他们的驮牛中有几头乳牛，赶牛人挤下鲜奶，用自己携带的炊

具烧起奶茶。我们啃着干粮正在羡慕之时，一位牧人邀请我们去喝奶茶，我们也把干粮、羊油带去一起享用。哈萨克人热情好客，在转移牧场途中遇到风雪暴雨时，他们不得不风餐露宿，因此救助路人共渡难关也就成为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们喝过奶茶，一股暖流贯注全身。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骤然低了下来，雨依然下着，雨丝淋着我们，落在篝火上，噼噼啪啪，蒸腾着水雾。大家望着熊熊的火焰起初还没有睡意，我便用半通不通的哈萨克语夹杂着维吾尔语问他们从哪里来，驮着这么多盐巴准备送到哪里去。他们说要送到喀纳斯湖一带的夏牧场里，给牲畜吃。我问："牲畜还要吃盐吗？"他们说虽然夏季草好，但要使牲畜长膘，长得结实才能度过缺草少料的冬天，所以要加喂咸盐给它们开胃。他们也是从海溜滩过来的，已经走了两天，要是不下雨，再走两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问："你们每天都在外面吗？为啥不带帐篷？"他们说，带帐篷太费事，为了多给牧场驮点盐巴，我们就没带帐篷。言谈中，他们已经困乏，不久就听到他们的鼾声。雨还在下着，篝火也奄奄一息，我把雨衣裹了裹，但依然没有睡意。除了冰凉的雨滴不时打着面颊，一切都是黑沉沉的。想到这几天度过的蓝天丽日的草原生活，一下子又把自己裹挟在阴雨连绵的夜幕之中，记者生活真是不可预测。我又想到中午在木勒特克拜依木屋中所度过的短暂时刻，他那典型的哈萨克人体魄、充满笑意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心想回程中一定再去拜访他，随之我坠入梦境之中。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雨已停歇。望着天幕，繁星点点，不久天光已明，星辰隐去。由于阴雨连绵，我们四周的沟谷蒸腾、回旋着晨雾，初升太阳的光华已经穿透迷雾，让我们看到橙红色的云霓，这预示着一个晴好的天光将呈现在我们眼前。晨光中我们收拾行装起程，昨天上不去的山冈，路面已被晨风吹干，我们轻易地登上山坡。此时，流动在峡谷中的晨雾也已消散，一道白浪涌动的激流出现在脚下的谷底，那便是喀纳斯河。路旁挂着晶莹露珠的草丛和两山浓

郁的密林荡漾着勃勃生机。我们翻过几道山梁，下到谷底，涉过淙淙的溪流，穿越亭亭玉立的白桦林，变幻不停的景色诱发我们心中一波又一波的激情。啊！从于其塔什牧场到山谷中的喀纳斯河边，阿尔泰山所展露的风姿令人迷醉，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拍照。山坡陡峭，山洪冲下的巨石常常阻挡我们的去路，行走起来十分缓慢，到达喀纳斯河一处回流的河滩，我们便停了下来。哈斯勒汗说，昨天如果不下暴雨不在林间过夜，我们就可如期到达喀纳斯湖，现在不行了，我明天要动身去县城开会，只好等回来再带你们去喀纳斯湖。我们只好遗憾从命。在布满云杉、落叶松、西伯利亚白松、白桦林、野山杨的两山对峙的谷底，喀纳斯河形成一处镜面般的回流。俯瞰河面，山林倒映，河心小岛上松林挺立，灌木丛生，神秘诱人。意外的是，我们在清澈的水流中看见"大红鱼"，这种学名为哲罗鲑的冷水鱼，是出自喀纳斯的名贵鱼种。那次行程虽然未能到达终点，但所经历的雨夜，所看到的沿途景色，也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我们拍摄的一组新闻图片，被新华社采用了。

回程之中，我们留在木勒特克拜依的家中，在主人的热情挽留下一住就是7天。他们全家4口人，大女儿在附近林场读书，小女儿不满7岁。木屋坐落在山林中的一片开阔地上，草高林茂。木勒特克拜依管护的林地和草场，从加勒登育直到喀纳斯湖南岸方圆几十公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巡林，以免林木被人盗伐和扑灭人为的火种，阻止偷挖药材破坏草场，劝阻违规放牧。20世纪60年代，棕熊和狼群常常出没，因而他每次外出巡林都要背一杆长枪，还带上利斧尖刀作为防身之用，有时也带着铁夹置放于狼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去的第二天，他便整装待发要去巡林了，看到他背枪携斧的英姿，我准备给他拍摄一张出发前的特写照片，刚刚举起相机，他说："慢着！"便到屋旁的草棚里抱出一只小狐狸放于马背之上，笑着说："这是我前些日子救护的失去母狐狸的小宝贝，养大之后再放到山林中去，今天先给我们留个纪念。"他还指着紧随其后的一只牧羊犬说：

“这是我出去巡护森林牧场同甘共苦的伙伴，也不能忘了。”要我一并摄入镜头。后来《人民日报》星期画刊刊登了这幅照片。在我们的接触之中，木勒特克拜依那种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情怀，随时都有体现。我曾随他一起出去过两次，每次他总有些担心，怕我们被突然出现的野兽伤着，一路上他高度警惕。记得头一天，他怕我们没进过深山老林，一直从小道和容易走的山林坡面上巡视，看到我们的骑术还可以，第二天就走的完全是没有路径的密林和可以登高望远的山巅，陡立的坡面、山涧溪流中的巨石使我们乘马行走十分艰难，但却能看到更加壮观的风景。巡护中我们深深感到，这位生长在阿尔泰山的牧人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深情，他熟悉每片林子的情况，一看花茎就知道哪种牧草的名称以及牲畜是否喜好或者药用价值。他曾动情地说：“除了冬天积雪很深无法行走，从春末到深秋我每天都饱览这里的风光。”是的，春天落叶松开始萌发新的针叶，给大山抹上浓重的绿色；云杉经过冬日的风寒也从墨绿中闪现出新绿；银灰色的山杨首先飘出雪片般的花絮，日渐茂密的叶片在微风中发出快乐的声响迎接夏日来临；白桦素洁的树干上新长成的柔嫩枝条吐出叶片，经过一冬的严寒之后又将以柔中带刚的气质迎候夏日的暴风骤雨。从那时开始，整个山林草地都充满生命的力量，呈现



哈萨克族护林老人——木勒特克拜依。

出夏日的风貌。秋天，阿尔泰山丰富的色彩也是迷人的，最先是山杨以一团团火红和橙色的树冠在云杉的绿林中现出自己的身影，白桦则在林中闪动着金黄，秋色斑斓，层林尽染，放射出一派秋日的光华。在那些林间草地上，山菌、野葡萄、挂满浆果的各种灌木、秋红的草丛都为这片大地奉献着自己的果实，涂抹着特有的色彩。



1957年6月阿尔泰山蒙古族牧民把逮到的一只小棕熊送到地区政府。

木勒特克拜依热爱山林还体现在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守护人。他管护的范围内有一片林场的苗圃，山林的空地上栽着一片更新林地的幼林，人工栽植的林木从幼苗成林，都是在他和林业技术人员的看护管理中茁壮成长的。因此，每到苗圃和那片幼林，他总要绕着护栏查看是否被牲畜践踏，也常常蹲在苗圃和幼林中，看着嫩绿的幼苗日渐长满松针，那长势令他露出开心的微笑。在那人工栽培、日渐长成的更新林地，他总要嘀咕几句："你们快快长高，有朝一日以自己高大的身躯填补这山间的空白。"而在草场上，他望着不同季节的花儿一茬又一茬地绽放，草丛也由低矮达到齐腰深之时，便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年又可以给越冬的牲畜储备更多的干草了。"这些言谈举止，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敬佩和爱慕。

一天，他出去巡林，我们同他的孩子们到附近山坡上采草莓，看着满山的野花，孩子们都十分高兴。对他们来说，这种景色天天都在

眼前展现,但大自然的美景是看不够的,它总是不断地给人们心中注入美好和愉悦。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毫不例外也有着同样的心境。8月是草莓成熟的时节,藏在齿形绿叶中的红红果实遍地都是,不一会儿就采了许多,正当高兴之际,只听从附近密林中传出"噢!噢!"的叫声。夏末初秋正是棕熊忙着采食的时候,它们要储存更多的脂肪准备在冬眠中消耗。棕熊的听力和嗅觉十分灵敏,它是不是听到我们的说笑,嗅到人的气息要来攻击我们,想到此处我们便紧张起来。我不敢声张,示意两个女孩赶快往家里跑。这时,只见木勒特克拜依笑着从密林中走出,原来是他在同我们开玩笑。走到近前,他说:"害怕了吧?我常会遇到棕熊和饿狼,晚上再讲给你们听。"

当天晚上,我们吃过女主人用熏肉干煮的面条,就和木勒特克拜依和他的女儿们围坐在煤油灯旁闲谈。我说:"白天你不是说要给我们讲遇到野兽的故事吗?"于是,他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着:"从我们住的加勒登育到喀纳斯一带,甚至更远一点的禾木、哈熊沟,野兽很多。小动物有松鼠、兔子、旱獭、水貂,大型动物有雪豹、山猫、狐狸、马鹿、狼、棕熊、石羊、大头羊。这些年在巡林和管护草场的过程中大部分我都见过,而打交道最多的要算是棕熊和狼,而且他们对我威胁最大,棕熊虽然以食肉为主,但因为一个冬天都要待在洞子里,整个夏秋身体需要储存许多脂肪才行,所以什么都吃。棕熊一般是偷袭各种家畜,夏季还偷吃蜂蜜,入秋也吃草根、树叶、草莓、野果。狼进入羊群,不是吃一只咬一只,而是一咬一大片,它们只是咬住羊只的脖颈吸食血液,而后又去咬另一只,一次下来会咬死几十只羊,看了真是气人,所以我最恨的就是恶狼了。"我问:"你在巡护山林的时候遇到过危险吗?"他说:"遇到的危险不止一次。上级要求打狼保畜,我一般是根据狼的粪便和足印,判断狼的行动路线,然后布置铁夹子,再放点肉食作诱饵,狼嗅到肉味来吃的时候,就被夹住了。只要发现狼被夹住,一般都是用枪射杀,但有一次夹住的是一只

很大的狼，可能是狼群中领头的吧，它挣扎着把铁夹子从固定木桩中拖出，恰好我巡视到那里，刚刚下马还没端起枪，它就拖着铁夹子扑了上来，我赶快从腰间抽出斧头，对着它的脑门就是一下，没想到用力过猛，让它脑袋开了花。作为一个猎人，遇到这种情况不能慌张，只有冷静才能制伏野兽的袭击。对于棕熊，凭我多年的经验，一般来讲只要不是突然遇着，它就不会主动咬你。棕熊的耳朵和鼻子都很灵敏，如果不是十分饥饿，就是嗅到你的气息、听到你的声音也不会到你跟前，而会远远地躲开，它捕到猎物饱餐的时候更不会理你。再就是棕熊的前腿比后腿短，登山可以跑得很快，下山就慢一点。你们如果碰到棕熊，千万不要往山上跑，要往山下跑，跑不动滚下山坡也行。最重要的是和棕熊相遇之后，不要有任何害怕的表现，只要沉着冷静，总有对付的办法。有一次，我在密林中看到一只大熊正在倒下的松树后面找野葡萄吃，乘马发觉之后竖起耳朵打着响鼻的声音惊动了棕熊，它立即站起身望着我，而我调转马头，就像没有看到它一样，缓缓地走了。这一带最大的棕熊有三五百公斤重，听说



阿尔泰山麓的哈萨克族猎人。

可以背走一峰骆驼，我没见过，但背走一头牛的事我却亲眼所见。那是两年前在于其塔什牧场的一片林子旁边，一只棕熊突然闯入放牧的牛群，咬住一头牛拖着便走。当时我骑马正走到那里，看到惊散的牛群，我才发现棕熊拖着牛正向密林钻去。我喊叫着策马追了上去，叫声也惊动了附近的牧民，大家群起而攻，那只棕熊才丢下牛跑了。我今天吓唬你们的声音就是模仿棕熊的叫声，今后你们听到这样的叫声可别以为是假的。”

说过故事的第二天，木勒特克拜依又出去巡视林地和草场，当天晚上没有回来。想到昨晚的故事，我们担心他遇到野兽袭击，但他的家人则习以为常，说今天他去的地方可能远一些。我们还是放心不下，直到第二天下午也不见他的踪影，便到一处高山上四下里张望，黄昏时分才在山坡下的林间小路上看到木勒特克拜依的身影。我们立即赶到跟前，还没等我们开口，他便说：“等急了吧！看我带来了什么？”原来是几只野兔和山鸡，他神神秘秘地说：“兔子是我和猎犬给你们抓的，山鸡是喀纳斯的图瓦老朋友赠给的，他是那一带看护林子和草场的老人，昨天晚上我就住在他家，那里可比我这里好，如果你们喝了他烧的奶酒，肯定会高兴得跳舞。他听说你们两位贵客在我家里，也邀请你们到他那里看看，去不了的话，就先尝尝他带给你们的野味。”我们两天来的忧虑一下子烟消云散。木勒特克拜依给我们带回的不仅是野味佳肴，更多的是宽慰和欢乐。

深山牧区粮食供应很是不便，每月需要到琼库乡或者更远的窝依莫克用牲畜驮运，而且是定量供应。算下来，我们在木勒特克拜依家已经住了一个礼拜，虽然付给主人相应的粮票，但也不想再给他们一家增添负担了。我们流露出离开的意思，却遭到他们全家的反对。木勒特克拜依说：“怕什么！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面粉没了还有肉干，还有鲜奶和奶疙瘩。”对于哈萨克人这种倾其所有接待客人的赤诚之心，我从天山牧场到阿勒泰草原早就领略到了。面对主人的盛情挽留，又身处令人陶醉的美景之中，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

气,我们对木勒特克拜依一家还真有些依依不舍。但是,不管时日多长总有离开的一天,何况我们已经采集拍摄到许多新闻素材及照片,也需要赶快回去发稿。经过再三解释,木勒特克拜依总算理解了我们,临走时全家给我们准备了肉干和奶酪,我们一再谢绝,主人则说如果把他当做朋友就收下,不然你们就空着手走!转眼一看,孩子们早把我们的挎包塞得满满的。淳朴热情的木勒特克拜依一家,他们由衷地热爱大自然,自觉维护生态的情怀使我永生难忘。

从边防哨卡到喀纳斯湖

——阿尔泰山纪行之二

1968年七八月间，我与闵福全采访阿尔泰山白哈巴边防站，顺路去了喀纳斯湖，而且结识了图瓦老人巴图尔。到白哈巴，当时边防公路还没修通，从铁热克提经过30多公里徒步跋涉到边防站走了半天多。我们受到白哈巴边防站全体官兵的欢迎。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山区，边防战士能够看到身着便装的新闻记者，都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所以对我们格外亲热。

白哈巴边防站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边防战士那神秘而艰苦的巡逻生活，长年累月守护祖国疆界的奉献精神，都值得我们采访报道，而作为摄影记者的我，更想拍摄出独一无二的新闻照片。我们到达白哈巴边防站后，同边防战士广泛交谈，深入挖掘新闻素材，不几天便和他们混得很熟，看到许多令人感动的情景，从中体验到边防战士艰苦为荣、守疆为乐的精神风貌，也听到许多巡逻中发生的故事。尤其是边境线上的值勤点，远离边防站，战士们驻点巡逻特别艰苦。我们希望对驻点巡逻能有一次切身的经历，以便拍到更深刻更生动的新闻照片。幸运的是，边防站正要派人去科克牙一带，我们便征得站长和指导员的同意，与边防站的周医生和两名战士乘马前往。

我们离开边防站，经过图瓦人的村落，沿着白哈巴河行进。在两天的行程中，阿尔泰的高山密林、深涧激流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第二天傍晚，我们才到达有几间木屋的边防值勤点。当天是8月1日，附近的几户牧民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带着羊肉、酥油、奶酪、油饼特意到值勤点慰劳边防战士。牧民们看到周医生更是喜出望外，几乎附近所有的牧民都要请他到毡房坐一坐，几天里除了沿着白哈巴河的源头巡逻之外，晚上总有牧民把周医生和我们请到毡房加以款待，有时周医生也被请到很远的放牧点，为妇幼老人看病。军民之间的深情厚意，常常使我激动地按下相机的快门。

边防值勤点位于山巅之上，在一览无余的景色中，每天清晨向东南方向望去，一处山坳里总是漂浮着一团云雾。我问周医生那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每天总是雾气蒙蒙。他说，那是喀纳斯湖蒸腾的水雾凝聚的云团，那里风光很美，牧人们称它是阿尔泰山中的一颗“蓝宝石”，回去的时候我带你们走另一条道去喀纳斯湖。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兴奋不已，从1960年于其塔什采访之后盼望了好几年的喀纳斯湖之行终于要实现了。

在边防值勤点待了3天之后，我们带着欣喜的心情同周医生踏上前往喀纳斯湖的行程。山区的气候是多变的，走不多久，起先在远山漂浮着的云团随着一股山风很快滚动游弋到我们的头顶，接着便下起了小雨。周医生是当地的“活地图”，看到雨有越下越大的势头，便对我们说，咱们只好到附近看草场的一位老人巴图尔家去避雨。我们离开正在走的崎岖山路，拐入一条草丛半掩的小道，在一处布满山林的林间空地看到一座木屋。到得近前，最先迎接我们的是一只黄色的牧羊犬，随着它的吠声，木屋闪出一位姑娘，接着一位图瓦老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见周医生，便把我们迎进屋内。在寂静的群山之中能找到人家，这是不寻常的境遇。周医生和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相聚在一起，便热烈地攀谈起来。我不懂图瓦语，但从他们夹杂着的哈萨克语中，听到他们之间的许多问候，继而就说起别的事



阿尔泰山白哈巴边防站指导员同图瓦儿童在一起。

情。交谈之中，老人的孙女就在身旁，她的脸庞有着山区女子的典型的红润，体态显现着山区女性的耐劳和健美。木屋里炉中的火焰为我们驱散了寒意，喝过奶茶浑身暖和了许多。周医生在白哈巴边防站工作已有五六个年头了，在他们的交谈中，我透过他同老人的情态感受到他们之间友谊的深厚。据我们所知，老周虽是边防站的医生，却也是方圆百余里牧场上的白衣天使，救治过许多牧人。就在他们的亲密交谈中，旁边的姑娘看着我们插不上话，便指着对面的松林，示意让我们去那里。望着屋外的雨幕，我虽然有点怯意，一想到人家一个小姑娘邀请我们去松林看风景，我们怎能冷落她呢，也就跟着走出屋外。淅淅沥沥的雨丝迷蒙着山野，潮湿的草地挂满了雨珠，林间滴着雨水，走不多远两脚和裤管都被打湿。而小姑娘根本不理会这一切，对她来说山雨就像晴天一样惬意。上得屋外的一处小山坡，姑娘指着眼前的松塔让我们看。啊！松果挂满了针叶之间。我们刚到阿尔泰山，就听说整个山区唯有白哈巴一带的新疆针松、西

伯利亚云杉才结松子。此时，我才明白小姑娘是叫我们出来一起摘松果以解雨天之中的寂寞和烦闷。她敏捷地踩着松树枝杈，把采摘的松果丢下树来，有的松果打在我们头上，她就露出一丝窃笑。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几乎忘记自己正在雨幕之中。不多时我们已经采集到许多松果，姑娘跳下树来，装了满满的一木盆。回到屋内她把闪着余火的炭灰扒出炉灶，把松果埋在里面，一股带着松树清香的热气从炭灰中散发出来，弥漫着整个木屋。不多时姑娘扒开火炭灰，拿出一颗松果，递给我们做着剥果仁的示范，一面尝了几颗果仁，便把所有松果扒出来让我们吃。烧熟的松果像玉米棒子一样嫩甜，并且带着松林的清香，以前我们从未品尝过这么香嫩的松仁。就在边吃松果边听图瓦老人同周医生的闲谈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又到了外面。正在寻思中，她又采来一盘草莓和山葡萄摆放在我们面前。山野的草莓虽然没有人工栽培的个儿大，但吃起来甜中带酸，透着野生的美味；山葡萄晶莹剔透，几十粒挤在一起形似红宝石，令我们馋涎欲滴。这些无言的馈赠，透着少女一颗多么纯清而真挚的心灵，也正是这种赤诚造就出草原生活的纯美。在阿尔泰山的霏霏雨幕中，我们感觉到山野女子的无言的热情。雨下到傍晚还没有停歇，我们只好借宿于图瓦老人的家中。晚上姑娘给我们做了放有肉干和山葱的面条。挤奶、劈柴、煮饭的劳作中她总是唱着歌谣，忽高忽低的歌声有时把我们带入高山之巅，有时又如山中鸟雀的鸣唱。她那红润的面容、健美的身姿，不管晴空丽日、林涛雨露，都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那种执著的倩影，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用过晚餐，巴图老人拿出一只盛着奶酒的木桶，对周医生说："没有别的招待你们，这是我烧制的奶酒，表示一下图瓦人的心意。"说到奶酒，我想起几年前在加勒登育，木勒特克拜依曾经说过喀纳斯湖西北有位看草场的老朋友，他烧制的奶酒特别醇美，喝过之后会使人高兴的跳起舞来。我接过老人递来的第一碗奶酒，先是品尝了一口，酒精的醇香带着奶香，刚一入口虽然有点清淡，喝下之后一

股热流先是顺着食管继而在胃中产生了灼热。面对主人的豪爽，我一连喝了三碗，兴奋之中便表现出微微的醉意。趁着酒兴，我用自己懂得的一点儿哈萨克语问起老人："认识不认识加勒登育的木勒特克拜依？"他说："怎么不认识？每年夏天他总要到我这里来一两次，有时还在这里过夜呢。"我说："七八年前我们在他家住的时候，还吃过你请他带给我们的山鸡。"他说："既然这样，就请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再喝一碗。"喝过之后，老人喊着孙女："格尔丽，把我的楚尔拿来，你也唱一支歌，给周医生、给记者敬一碗酒。"说完他便接过送到手上的一支长管木笛，先是吹奏起热爱草原、山林，继而引申出民族历史的歌谣。悠悠笛声伴着孙女格尔丽时而低吟、时而辽远、时而轻柔、时而高亢的歌声。她每唱一支歌，就要敬我们一碗酒，这是图瓦人待客的习俗。在不胜酒力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婉言谢绝，转换话题请老人谈谈管护山林草场的情况。说起这些，老人的话语像打开的闸门滔滔不绝。他说："我不是吹牛，从喀纳斯湖的源头四季积雪不化、有着冰河的奎屯峰（海拔4000多米）、友谊峰（4300多米）到森林茂密的高山和牧草茂盛的草场，直到沿着喀纳斯河到湖泊两岸长满白桦、山杨的河谷川地，没有我不熟悉的地方，就是经常出现在这一带的哈熊（棕熊）都认识我巴图尔。我是在这里出生的，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山，白哈巴、喀纳斯、禾木河方圆几百里的图瓦村庄，都是养育我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天堂。冬天我看到的是一片纯白的世界、静静的山林；初春嫩绿的草芽刚刚给山坡抹上鲜绿，紧接着星星点点的花卉点缀着山野河谷；到了6月，满山遍野金黄色的花儿一齐开放，所到之处金辉铺地，而叶片肥大的野芍药的粉红花朵绽放在林间山冈上，它们望着雪山，雪山遥望着它们，就这样迎来繁花似锦的盛夏。我是带着政府的使命、族人的委托守护着它们，不使林木被人盗伐，不被人为的火种引燃，草场不被牲畜践踏，草原不被破坏，为冬季能够储存保留更多的牧草，这就是我的心愿和职责。"多么朴实而和谐的责任心啊！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在听了图瓦老人肺腑之言的振奋中，我想，他们爷孙俩虽然没有离奇的经历、惊险的境遇和豪迈的壮举，但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他们把自己融入巨大的山野，默默无闻地守卫着祖国的疆土，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无论是风中雨中，还是春夏秋冬，松涛绿野、山花烂漫的大自然，以秋实的丰盈、松果的幽香、山葡萄的醉人、野草莓的甜美向他们展示着无穷的美景及丰厚的馈赠，而他们则以最真诚的胸怀护卫这里的一切，使其生机永存。

第二天起来，浓雾消散，天已放晴，晨光中雨露闪烁着光华。我们告别了木屋的爷孙，又开始了穿密林、登山脊的行程。不久，映照着碧野群山的喀纳斯湖便呈现在面前，清晨的阳光折射着山野的静谧之美，湖光展现着绝佳的景色。有道是：才别木屋温馨夜，今又置身美景中。

从海拔4000多米的奎屯峰、友谊峰流下的道道溪流，先是汇成一潭名叫阿克库勒的湖泊，而后又穿过密密的松林注入喀纳斯湖，这种湖河相间的景色由北向南一直把我们的视线引入遥远的两山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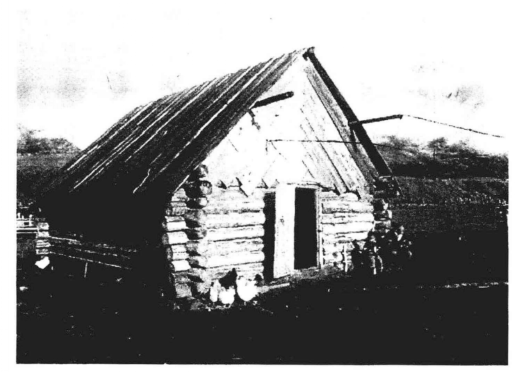
喀纳斯湖的夏日。

峙的河曲之中。眼下苍茫的林野和湖中的树岛，把湖面烘托得明媚而欢快，蓝天和浮云又使湖色处在一时湛蓝、一时深绿、一时乳白的变幻之中。在高高的山巅行进，我真不愿意催促胯下的马儿，好让我在眼前流动的画面中慢慢地浏览这美好风光。看着这30多公里长的湖面和它周围的山峦，我陶醉于不断变化的景色之中。

这条山脊小道，周医生已经走过多次，而且对这一带的景物不仅有着感性认识，在理性上也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他说喀纳斯湖是由冰川强烈剥蚀，高山河流扩展形成的阿克库勒湖和喀纳斯湖。它位于高寒山区，冬季长，夏季短，春秋两季几乎连在一起，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纬度较高，它成为阿尔泰山最高部位的自然保护区。因此，它是我国寒带草原区域中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已知的植物有83科298属798种，其中珍稀植物有新疆五针松、新疆冷杉、灌木柳，以及西伯利亚花楸、接骨木、鹿根、小叶桦、阿尔泰大黄、鸡腿参、阿尔泰赤芍、金莲花等，森林覆盖率19.4%，林区的森林覆盖率达82%。从景观上看，喀纳斯完好地保留着由冰川、雪山、森林、灌木、草场、湖泊、河流组成的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它们的存在为野生动物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栖息繁衍的理想之地。生活在喀纳斯已知的野生动物和鱼类有100多种，其中两栖爬行类4种、鸟类117种、鱼类7种。一类保护动物有貂熊、雪豹、北山羊和黑鹳；二类保护动物有雪兔、棕熊、水獭、猞猁、兔、马鹿、黑琴鹤、花尾榛鸡、苍鹰、黑啄木鸟、雪鹄、水朱雀、黄巫等。真菌的品种就更多了。在蒙古语中，喀纳斯是美丽富庶、神秘莫测的意思。据说元代成吉思汗的军师耶律楚材曾到过此处，还吟咏过喀纳斯湖春意盎然的美景。诗云："谁知西域逢佳景，始信东君不世情，园沼为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池平。"正在品味着周医生吟咏的这一诗句，那平静的湖面上出现三条分叉的浪花，一前一后伸向湖心。我立即问周医生："看，那是什么？是不是几条大鱼？"他说："可能是吧，喀纳斯湖有两种大鱼——江鳕和当地称为大红鱼的哲罗鲑，它们的体型都很大，不常出现在



喀纳斯湖畔的姑娘在晾晒奶干。



图瓦人的木屋。

水面，偶然看到此种情景的牧人，把它称为水怪加以传说和渲染，因此有人说，出没于湖中的这种水怪有几次还把到湖边饮水的牛马拖入水中吞食。今天咱们能看到算是一个奇遇了。”这种情景持续了约有一刻钟的功夫，游动着的不明物体便潜入深水中。我们从登上喀纳斯湖西侧的山脊乘马行驶了半天多，才下到谷底的喀纳斯，见到山村的图瓦人正在用扇镰打草，割草人相隔一定的距离，一左一右挥动着手中长长的镰刀，富有节奏的动作像舞蹈般协调优美。他们是为牲畜越冬做准备。从喀纳斯到白哈巴以至更远的禾木河、琼库一带，还有几处图瓦人聚居的村落。图瓦人是蒙古族的一个支系，亦称“德瓦”，是我国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图瓦人每年都有祭山、祭天、祭树、祭鱼、祭火、祭敖包、拜佛颂经等宗教活动，这也反映了他们崇尚大自然的一种精神，他们喜欢居住在山区林地，故又有“林中百姓”的称谓。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很少同外界联系，一些老人更没有出过大山。所以70年代之后，听说第一辆越野小汽车到达禾木山村时，有位老人看着车灯，以为那是瞪着大眼睛行走如飞的怪物，跑得那么快却不吃不喝，停在那里怪可怜的，特意抱了一捆牧草去喂它。当喀纳斯修起水电站，刚刚送电，有位老人到了晚上还用火柴去点亮灯泡。在他们的心目中，喀纳斯就是一切，是上天赋予他们的福地。在同巴图尔老人的接触中，这位融入大山的老人对喀纳斯的自然生态充满了深情和爱慕。

注：禾木喀纳斯也称禾木村，是喀纳斯乡政府所在地。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包括喀纳斯湖与禾木河一带。冲乎尔，当地哈萨克人一般称为琼库喀纳斯河，源头为中俄中蒙交界的奎屯峰（4082米）和友谊峰（4374米）。

瀚海明珠乌伦古湖(1961—1992)

1957年6月初,我第一次到阿勒泰地区采访,就听说额尔齐斯河以及发源于阿尔泰山的大小河流,尤其是乌伦古河流域的乌伦古湖和吉力湖两个水域鱼类非常丰富。说这话的人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位于乌伦古湖畔的福海县,每年春季农民浇水灌田之后,白花花的小白鱼、五道黑鱼铺满农田,就连乌鸦都只啄食鱼眼,剩下的全部变成肥料。因此,乌伦古湖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过了几天,我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布尔津县采访,每天傍晚都能看到许多人在岸边垂钓,他们几乎不费多大功夫便可满载而归。我同民族画报的一个记者也试着去钓鱼,不一会儿就钓来几十条小白鱼和五道黑鱼。可惜的是,我们在布尔津县城没有一个熟人,无法烹饪尝鲜,只好把长长的一串鱼儿放归河里。我们在垂钓的时候,透过河边的潜流看到不少为捕食小鱼而往来穿梭的大鱼,数量之多是我从未见过的。自那时起,我就想采访报道祖国西北边陲阿勒泰草原上乌伦古湖丰富的鱼类资源。3年之后,我在乌伦古湖和吉力湖实现了这一愿望;30年后的1992年隆冬季节,还在那里看到冰上捕鱼的景象。

记得1961年夏天,我同记者李义芳到阿勒泰地区采访,此行的第一站便是福海渔场。到达之时,位于乌伦古湖和吉力湖之间的渔

场正值捕鱼旺季。由于交通不便，除了冬季冻鱼可以运到乌鲁木齐，夏季捕捞的鲜鱼无法运到外地，只能就地进行腌制或晾晒鱼干，因此尽管是捕鱼旺季，每日捕捞的数量也不太多。那些日子，送鱼的船只穿过连接两个湖泊的芦苇荡，每天上午将捕捞的鲜鱼送到场部附近的河边。

此时，我国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的征兆，也波及到遥远的阿勒泰地区。到福海县的最初几天，我们都在渔场食堂就餐，用餐的人不多，早餐是窝头和咸菜，午餐和晚餐全是腌制的咸鱼和少许玉米面饼。食堂里面鱼腥味道很重，几乎让人倒胃口。我们的住房正对着连接大湖和小湖的河流，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垂钓。这种现象也触动了我们，想法弄到鱼钩和鱼线，自制钓竿，利用别人抛弃的鱼饵，就在河边钓起鱼来。那时河边浮游的鱼类，大部分是学名称作河鲈的五道黑。我们像在额尔齐斯河钓鱼一样，不一会儿就钓了十多条，搞来一点儿盐巴，用自带的搪瓷缸就近舀上湖水煮熟，原汁原味的鱼汤就送到嘴边。真没想到，我们仅仅用了一点儿盐巴，就鲜美无比。后来，一位渔民看到我们每天吃着又咸又硬的鱼干，便说："你们不是来采访我们捕鱼的嘛！在这里除了送鱼的船和那些腌制、晾晒鱼干的女人，还能拍到什么？不如跟我们到湖里去，住在那里一起捕鱼，不但能拍到很多照片，还能吃到自己煮的鲜鱼汤，比食堂里的干咸鱼不知好到哪儿去了。你们愿意的话，明日就同送鱼的船一起到我们的窝棚去住。"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第二天就跟随那位渔民乘船荡桨，向乌伦古湖以东的吉力湖行进。渔船激起水浪，湖面微风习习，水道两侧的绿色芦苇随风摇曳，逐渐开阔的湖光水色令我们心旷神怡。初到湖心的新奇和兴奋，犹如渔船两侧不时跃出水面的鱼儿激起的浪花，激荡着我们内心的波澜。

船行约一个时辰，就到了吉力湖边打鱼人住的窝棚。两位老者把我们迎进住地，后来才知道其中的老张是捕鱼队队长，他特意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窝子里。盛夏季节正是蚊蝇猖獗之

时，老张和几位年轻人给我们撑起蚊帐，并帮我们垫起苇草和毛毡，铺开自带的行李，地铺就算搞成了。入夜之后，我们躺在地铺上，听着湖面传来的隐隐涛声，对捕鱼人的体贴和关照感激不已。

我们在吉力湖的第一顿午餐就是炖鲜鱼。由于口粮供应紧张，这顿午餐以鲜鱼为主，一锅鲜嫩可口的肥鱼，真是我们平生少见的美味。在我们的连连赞叹声中，一位老人说："这仅仅是个开始，今后几天还有更好的鱼种和新奇的做法，让你们品尝。"我们趁机问起他们在乌伦古湖的捕鱼情况。老张说："你们既然到了这里，傍晚就同我们一起去撒网，明晨就可看到收获。这些过程你们跟着看比我们说的要好听，要真实。至于鱼的种类，阿勒泰地区从山里到山外鱼种很多，起码不下30种。著名的鱼种有学名称为哲罗鲑的大红鱼、小红鱼，有称作鲟黄鱼的西伯利亚鲟，还有长颌白鳍的大白鱼，名叫花棒鱼的北极泂鱼，还有白斑狗鱼、小白鱼、五道黑，即便是鲤鱼、草鱼、鲫鱼等一般的鱼种，肉质也比其他地方的细嫩鲜美，今天你们吃的只是一般的鲤鱼。乌伦古湖周围的大小湖泊，绝大部分是因乌伦古河形成的，是一个特殊的水系。除了学名叫河鲈的五道黑、学名叫贝加尔亚罗鱼的小白鱼等其他河流共有的鱼种，乌伦古湖所产的北方条鳅、黑鱼、船丁鱼、红黑鲫等，都是这里的独有鱼种，而且产量高、品质好。"他们如数家珍地介绍乌伦古湖的鱼种，我们听了恨不得立即同他们到湖中去，领略湖面风光，体验捕鱼生活。

当天下午，我们在湖边观看渔民修船、补网、整理渔具，等待傍晚到湖中去布网，体验渔民生活。乌伦古湖流域分布着许多湖塘，最大的是乌伦古湖，水面宽阔，烟波浩渺；其次是吉力湖，水面虽比乌伦古湖小，但也显得辽阔而深长，从我们的住地向东望去，波光粼粼的湖面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崖岸之下，崖岸北侧就是布满山杨、白桦的乌伦古河谷。靠近湖岸的地方长着茂密的芦苇，岸上则是广袤的春秋牧场，一直绵延到北边的额尔齐斯河谷，南端的准噶尔盆地。这是一片充满着生机的湖区，盛夏季节各种候鸟飞来，有的在芦苇丛

中筑巢孵雏，有的漂游湖面，有的则不停地飞翔，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水面，或者扎入水中猎食鱼儿。伫立于岸边浅水处的脖颈长长的大白鹭，常常一只脚站在水中，等待鱼儿游到身旁，瞅准机会突然伸头，准确无误地捉到小鱼，所以渔民称它为"老等"。有时各种水鸟发出不同的鸣叫声，恰似回荡在湖中的交响乐曲。成群的黄鸭和班头鸭，一边漂游一连嬉戏，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声，表示着相互的亲昵；一种发出滚珠般清脆声响的水鸟，恰似遨游在云端的鹰隼那银铃般的歌喉；而白琵鹭扁平的长嘴深入水中发出的声声闷响，又有着交响乐中大提琴所奏音响的厚重。这一切都是我们初到湖区享受的天籁之音，它是那么新鲜而奇妙。

随着日影的西斜，一种傍晚的静谧开始笼罩湖面，渔民们将网具放入可以乘坐三四人的小船之中，共分成三组开始向湖心荡去。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傍晚，午间还是蓝中透绿的湖面，开始变得金光闪耀，随着渔船的摆动掀起一波又一波长长的涟漪，恰似玉液琼浆在四处荡漾。傍晚的鱼儿也不甘湖面的寂静，不时地跃出水面，溅



1961年拍摄的乌伦古湖的打鱼帆船。

起欢快的浪花。日落时分，湖上的蚊子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我们裸露的臂膀、脖颈、脸面上贪婪地吸吮着血液，但这些袭击已被我们撂在脑后，大家全神贯注于霞光瑰丽的湖面。到达湖心的一片水域，捕鱼队长老张示意可以布网了。因为没有机动船只，加之生产规模不大，他们没有使用拖网，用的全是挂网，三只渔船拉开一定的距离缓缓行进，将网片投入水中，一串长长的浮漂也随之出现在水面上，只用了半个多时辰便大功告成。回程之中，即将陨落的日影随着微波款款地摇曳。临近岸边的芦苇荡时，蛙声伴着鸟鸣合奏新的乐章送去落日，迎候夜幕的降临。回到岸上，留守的渔民已经燃起驱蚊、照明的篝火，我们将在篝火旁共进晚餐。为了我们的到来，捕鱼队长老张安排得很周全。他说："二位记者同我们一起住窝棚，布网打鱼，受蚊虫的叮咬，吃简单的饭菜，这都是很难得的。今天我们也没别的，就地取材多做了几样菜，略表心意。上午我说过乌伦古湖从大湖到小湖鱼种很多，数量也多得老了去了，只是没有办法将鲜鱼运出去，现在我们的捕捞只是小打小闹，你们还来采访报道，为我们拍照。这样也好，通过你们的报道反映一下阿勒泰地区丰富的鱼类资源，宣传祖国的美丽富饶，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希望能在一起多待几天。"听了老张的一席话，我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便说："这里的湖光水色，各位的捕鱼生活，特别是大家的热情和乐观，已经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当然要多待几天，更深入地了解你们的事迹，学习你们的精神，把阿勒泰地区的地理风光和丰饶物产，把你们为开发建设阿勒泰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反映给广大读者。"说话之间，丰富的鱼宴已经摆在面前，除了午餐时吃过的炖鱼，还有红烧鱼、炒鱼片、鲜鱼丸、熏鱼干、鲫鱼汤等，都是用湖中的鲤鱼、草鱼、黑鱼、棒棒鱼、五道黑、鲫鱼等鱼种烹饪的，虽然没加任何调料，但味道特别鲜美，是在其他地方无法尝到的美味。晚餐后，大家围着篝火又闲聊一阵，便各自回到窝棚。

我们进入蚊帐，白天被蚊虫叮过的肿块奇痒难忍，一下子还无

法入睡，湖上的经历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夜幕之中，水鸟的鸣叫和青蛙的喧嚣逐渐平息下来，只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儿仍在呻吟，白琵鹭或是鹈鹕还不时发出声声闷响……它们把我们引入梦乡。

次日天光微明，我们就听到老张“捞鱼去了”的喊声。走出窝棚洗漱之后，东方已经泛白，大家依然乘着三只小船在两旁芦苇隔开的水道中向湖中驶去。此时一切都是静谧的，一层薄薄的晨雾弥漫水面，整个湖区似乎沉浸在最后的梦境之中。唯一惊扰我们的，便是一阵强似一阵的蚊群攻击，令人难以招架。出了芦苇荡，晨雾悄然散去，灿烂的阳光照亮湖面，眼前到处闪耀着波光日影。到了下网水域，浮漂依然在昨日放置的水面上摆动着。船上的渔夫从各自的网头开始起网，起出的网片挂着许多不同的鱼种，不一会儿就放满船舱。经过一番紧张的收网捞鱼，大家收获颇丰，顿时兴奋起来，在各自的船上吆喝着，有的还捧着大大的活鱼让我们拍照。回程之中，有人唱起自编的歌谣，大意是：“吉力湖水辽无边，鸟儿掠水面，鱼儿水中潜，芦苇荡里蛙声欢；如此好风光，渔人真依恋；趁着风扬起帆，鲜活的鱼儿船舱满；吉力湖滨似宝盆，收获的歌声入云端。”

欢歌笑语伴随着我们回到岸边。捕鱼队长老张领着大家先把捕捞的鲜鱼按种类分开，一部分装入渔船立即送往场部加工腌制，一部分大鱼就地劈作两扇撒盐晾晒在木架上。这一天收获的大部分是黑鱼、鲫鱼、五道黑，还有学名为北极洄鱼的花棒鱼，这些都是吉力湖中特有的经济价值高的鱼种，当然也捕获了一些鲤鱼和草鱼。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随同捕鱼队傍晚布网、清晨收网，有时老张驾着小船，扬起风帆，把我们送到对岸的牧人家中做客，或者乘船漂游到湖泊以东的岸上寻找黄羊的踪迹。这片北倚阿尔泰山、南临准噶尔盆地的辽阔区域，由于湖水充沛，牧草丰美，历来是黄羊和野驴等野生动物的乐园。当它们发现有人追踪时，奔跑的群体甚为壮观，尤其是黄羊奔跑时闪现着白色臀部的光点，偶尔停歇下来回头张望的停顿和再次跳跃起来的灵巧貌似一台集体舞。这一切都使乌伦古湖周

围大小湖泊充满生机和显得富庶。那些日子，我们除了领略乌伦古湖的秀美和博大，几乎每天都饱餐鲜鱼，当时虽然很少能够吃到粮食和其他肉类，但有鲜鱼果腹，也算是我们的造化。有时老张也给我们变个花样，在湖边挖些野葱，到场部找点大蒜，做红烧鲤鱼、红烧白斑狗鱼，煮鲫鱼汤，非常好吃，至今难忘。记得我们采访完毕临走的前一天，老张从刚刚返回的船舱里选出几条新鲜大黑鱼，先是剥皮切片，接着切成条状，用他珍藏的白醋和胡椒粉，再加上葱末蒜末，特意做了一大盆凉拌生鱼，端到我们面前。看起来这盆生鱼鲜嫩清爽，但我们从未吃过，有点怯意。老张笑着说："生鱼你们恐怕没有吃过吧？今天我之所以做这道菜，一方面给你们送行，另一方面你们吃过之后，一想到凉拌生鱼就会回忆起这几天的生活，特别是用吉力湖特有的黑鱼做成的这道菜，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吃到的，就以此作为我们相处过的一个心里留念吧！"确实如此，后来我在伊犁河畔、塔里木盆地的大西海子水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五家渠水库采访时，吃过用鲜鱼做的几十道菜的鱼宴，但再也没有品尝到乌伦古湖那样鲜美、脆嫩的凉拌黑鱼。

因为有那么一段难忘的经历，后来我一直关注着乌伦古湖、吉力湖鱼类资源的开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那里增加冬季捕鱼的数量，但没有注意封湖休渔，加之日益严重的无序捕捞，80年代初鱼类资源开始萎缩。本来冬季捕鱼的最初时期一网可以捕到几十吨，到后来最多也只有几百公斤。湖中原有的红鱼和黑鲫，尤其是黑鱼等独有鱼种已濒临绝迹。改革开放后加强了渔政管理，向湖中放养新的鱼种，加之近几年封湖休渔，鱼类产量才有了大幅度增加。为此，1992年冬我采访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建的阿勒泰地区2817牧民定居工程时，还专程到乌伦古湖采访冬季捕鱼，目的地依然是乌伦古湖旁边的吉力湖。

时值隆冬1月，吉力湖已经结起厚厚的冰盖。福海渔场打鱼队的人们，每天清晨乘着雪橇、汽车奔向湖心，透明的冰盖被茫茫白雪覆



渔民在冰冻的湖面上布网。

盖着。头一天我们赶到捕鱼现场,渔夫们正在湖区北端作业,鱼网已被下到多处凿开的冰洞之中,除了准备拖网起鱼的人们相隔一定的距离等着起网,有的则敲击着周围的冰盖等待鱼群入网,大约一个小时便开始出网,拖网的人们踩着冰雪,从一个冰洞中将鱼网往外拉,直到被拖出长长的一段之后,鱼儿就出现在洞口,越到网尾鱼越多,最后洞口鱼群密集,手持大笊篱的青年人,不断从冰洞中将鱼捞到冰面。阿勒泰地区的隆冬气温一般在摄氏零下20多度,清晨和夜间常常在摄氏零下30多度,刚刚捞出的活鱼,不一会儿就被冻僵了。那一天捕鱼点选在较浅的水面,捕上来的都是小鱼,没有拍到大鱼出网的镜头,我并不甘心,第二天又起了大早,天刚一亮就赶到湖中,这一捕鱼点选在湖心部位。我们身穿厚重的皮袄,戴着有护耳的大皮帽,几位青年男女也把脸面捂得很是严实,他们肩扛着大冰锥,按照技术人员的指点,相隔一段距离开凿一个下网的冰洞。人们劳作时蒸腾的汗气结成白霜,挂满了他们的帽檐和两鬓。这一天鱼网似乎下得很长,收网时众人拖出的鱼网达到近一里的长度时,被网

住的鱼才密集出现在洞口。站在洞口边的几位青壮年捞了许久，在冰面上堆积了很大一片。这次捕到的大都是五六斤重的大鱼，主要鱼种为东方真鳊和白斑狗鱼，也有部分鲤鱼、草鱼和鲫鱼。60年代占主导品种的黑鱼、红鲫几乎不见踪影。我问起在场的技术员，他说："黑鱼早在80年代以前由于过量和无序的捕捞，数量已经很少，加之这种对水中含氧量变化适应力强的鱼种大部分都潜入湖底泥沙中，所以很少见到。而占主导的东方真鳊和其他几个鱼种都是80年代之后从黑海及咸海水域和内地引进的珍贵鱼种，而原有的几种鱼虽然已经减少和接近绝迹，但经过近年来的封湖休渔才得以缓慢恢复。所以原有的生态平衡只要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也只能在科学的捕捞和管护中才能复苏。"乌伦古湖加强了渔政管理，加之引进放养新的鱼种，1990年鲜鱼产量已达1250多吨。当说起30年前在湖边看到过大群黄羊、野驴的话题时，技术员说："你们看到的那种景象也因为偷猎而数量已大不如前，只是近年来加强了保护生态的宣传，严惩了乱捕滥杀的偷猎行为，才出现了新的生机。"回到福海渔场，大家又向我们介绍了渔场及周边地区深化改革、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到湖边新建的冷库、保鲜车队和新的作业线。又听说除了利用自然湖



乌伦古湖、吉力湖的冬季捕鱼获丰收。

泊水域发展渔业，渔场还开辟了3500亩养殖水面。我们为近8000平方公里水面渔业发展及周边地区生态复苏、经济振兴的繁荣势头而欢欣鼓舞。而1961年的捕鱼队长老张和其他几位朋友已经退休。临别之时，忙活了一个早晨的渔民邀请我们到湖边饭店用餐，这顿丰盛而鲜美的鱼宴，使我重温了30年前同捕鱼队长老张和其他几位渔民朋友共同度过的那些时日，再次感受到乌伦古湖渔民的真诚和热情。

孔雀河畔访梨园

金秋季节，孔雀河两岸梨园中的香梨成熟了。果园中累累的果实青里透黄，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这时节，不论你走到哪片果园都会看到果农们忙碌的身影，采摘，装箱，入窖，处处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梨树的收成要分大年和小年，按照老人们推算今年(1981年)应该是个小年，可是落实了生产责任制之后，小年的收获赶上了大年，甚至超过以往大丰收的年景。人们喜笑颜开，欢声笑语回荡在每一个果园中。为此，我们专程访问了库尔勒市栏杆乡文拉克村3位老人承包的果园。

文拉克是塔里木盆地库尔勒绿洲一个古老而著名的香梨产地。出了库尔勒市区，道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林带一直伴随着我们进入文拉克村。在浓重的秋色中，田野里人们正在收获玉米和油葵，新播种的冬麦地里已是一片绿色。果园大部分都建在村头，密密丛丛的树冠也遮挡不住丰收的果实，秋阳照射下，枝头的苹果、秋桃、红枣透过园林的围墙闪烁着红艳艳的光彩。我们是在一处果园的门口看到加麻热依木老人的。他是作业组长，73岁了，瘦长的脸上飘着灰色的胡须，面庞虽已苍老，但浓眉底下却有一双机敏的眼睛，一看便知是一位刚毅而健康的老人。

他动作敏捷，言语幽默，说起话来意趣深长，令人回味。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的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便把我们领到一个梨树园中。只见纵横成行的树干之间，新摘的香梨一堆一堆的，整整齐齐码放在树荫下。在这里，他又风趣地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两位老人："别看我们都是些老头子，土改的时候我们就是村干部了，只是这几年我们觉得应该把担子交给青年人去挑，所以才决定在这果园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寒暄中，老人从梨堆里捡了几只香梨递到我们手中。他介绍说，库尔勒的香梨有两种，一种是从外地引进在原有品种上嫁接的，这种经过改良的香梨个头大、水分多、产量高，有很多优点；另一种就是本地的老品种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递过几只个头略小的香梨。他说这种梨子是老树上产的，个头虽然不大，但皮薄、肉细、清脆，香甜可口。听了介绍，我们便先尝小梨，一股清香的甜汁噙满口腔，真爽，而且没有粗渣。品尝之中我们同老人席地而坐，霞光透过梨树的浓荫射下一道道金辉，清悠悠的梨香回绕在我们周围。

老人说，今年是个丰收年，他们几位承包了50多亩果园，其中有22亩梨树，今年可收30多吨香梨，比1980年的产量增加将近一半，除了出售给乌鲁木齐、库尔勒等地之外，还有10多吨将要储存在刚刚建起的果窖里，等待入冬之后和来年春天卖个好价钱。说到这里，老人诙谐地笑了。他告诉我们："今年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二个丰收年。责任制刚开始实行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办法好。当时几个老人一商量，也要像当年土改时打头阵那样，首先在果园里实行包产到人，这样做我们不光是为了钱，我们认为要富国富民，自己应该一马当先。过去在一个大锅里搅，搅了几十年也没有富多少。我们坚决开好这个头，去年一年包产梨园，光获奖部分就给我分了300多元。这样做，集体和个人都增加了收入，大家干劲就更大了。那年冬季给大田里运肥，大家的干劲比哪一年都大。今年入春后，我们也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果园里忙个不停。辛苦不负有心人呐！我们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

老人笑着说："嘴说不如眼看，我们边走边谈吧！这样你们既可以看看我们的果园有多大，又可以看看我们的葡萄和苹果。"

说话之间，我们已穿过梨树林，来到一排很长的葡萄架下。翠绿的藤蔓一直铺盖到架顶，搭起一座绿色长廊，架底藤蔓的浓荫下，垂挂着串串葡萄，犹如翡翠色的珍珠，有的绿中透着奶黄，有的半紫半青，有的整串黑紫，葡萄粒上虽然挂着一层白霜，但那隐含的光彩和微微的清香仍是十分诱人。穿过葡萄架便是一片果树林，秋红的苹果硕大而艳丽，像孩童的小脸，隐藏在枝叶之中。老人告诉我们，在这个果园里，每年 3 月底报春花开放，各种果树也就相继开花了，一直开到 5 月。6 月杏子最先黄熟，接着成熟的是桃子，8 月底 9 月初桃子和苹果还没有摘完，香梨和葡萄就上市了。春季这里处处花香满园，到了夏秋果实就一批接着一批成熟了，让人忙不过来。他说："我们维吾尔族喜欢栽树，更喜欢果木，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夏秋季节真是个醉人的季节。前几天梨子熟透了，怕刮来一场风把果子吹落摔碎，村里许多人都来帮忙采摘，如果那时你们来，就会看到人们的那股子热情，也会听到姑娘们在林间的歌唱。摘下的梨子成堆成堆的，谁看了不高兴！"说话之间，我们已经绕了一个大圈子，又来到果园入口处。当我们将要告别的时候，老人说："还是看看我们的梨窖吧，这可是个新东西。"

我们接着又参观了刚刚建起的梨窖。这是一个长约10米、宽约5米的新建筑，它坐落在果园入口处的左侧，新砌的砖墙一半深入地下，一半露出地面，人字形屋脊，新抹的泥顶十分平整。屋檐和气窗刷着蓝色油漆，在果园里显得特别醒目。老人告诉我们："本来去年村里就筹建过一座这样的果窖，我怕资金不够，还把自己超产获奖的300元给了村里。可是入春后，供销部门专门给我们拨款修建了这座果窖。"他把我们引入窖内。透过门窗的微光，我看到已经入窖的香梨垒成5层，码放得整整齐齐，几乎占去2/3的地面，微带温湿的窖中散发出一股香甜。据老人说，香梨入窖有两个好处，一是库尔勒香

梨刚摘下时还只是青里透黄，微微带着香味，放在窖里经过“发汗”颜色就好看了，就会变得金黄金黄，一侧还会透着红色。到那时不但好吃而且香味更重，那才是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呢！再一个好处是现在市场上各种水果都很多，把收获的一部分储藏起来，到了隆冬季节投放市场，让人们在冰天雪地里也能吃到库尔勒香梨。说到这里，我们忍不住插话说：“那样一来，冬季里人们不仅围着火炉吃西瓜，还可以围着火炉吃香梨呢！”老人回应说：“不，如果保存得好，就是来年梨树开花的4月份也能吃到香梨。不信，我欢迎你们明年春天来看看。”

回程之中，库鲁克塔格群山上的蓝天白云，孔雀河两岸郁郁葱葱的林野和遍地成熟的庄稼，文拉克村果园的丰收景象和老人们的幸福笑容，久久回荡在我的心头。

（写于1981年）

戈壁绿洲桃儿沟

在吐鲁番市区以北的戈壁滩头，在火焰山西部布满砾石的灰褐色的山坳里，有一片绿色的林野。它那翡翠般的色彩，在7月的火洲似珠似玉十分醒目，那就是桃儿沟。

桃儿沟是吐鲁番盆地的世外桃源，也有小葡萄沟的美称。一般来说，到吐鲁番的客人大都是离开市区，沿着葡萄之乡沙河子的一条绿色走廊，到桃儿沟以东的葡萄沟去观光旅游，品尝各种美味的葡萄。到桃儿沟的人不是太多，只有那些好奇的游人在满目灰黄的戈壁尽头看到一片翠绿，才会带着好奇心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探访。

1986年盛夏，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去桃儿沟的。

7月中旬，吐鲁番盆地的气温每天都在40摄氏度以上，太阳像一个白炽的火球蒸烤着这片大地，干燥的气流送来阵阵热风，扫得人脸面发烫。

穿过约5公里的戈壁滩，两排白杨、一渠清流便把我们迎入村中。土坯砌成的墙垣，几乎每个农家的屋顶都有一幢镂空的晾制葡萄干的红褐色小屋，像一座多孔的楼阁显得十分别致。时值葡萄收获的季节，村中的居民大都去葡萄园中劳作，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在树荫下和屋外的渠边，手扶摇篮，三五一起地拉家常。孩子们则在一

股不深的溪流中游泳玩耍。

穿过村落，沿着一条土路向东北方向，便折入去葡萄园的路径。这是一片伸向高山之下的丘陵地带，布满砾石的山包像被太阳烤焦了似的油光黑亮。也就在这丘陵的豁口中，一片扇形的田园铺展而下，它就是桃儿沟的大葡萄园，因为正值收获季节，藤蔓之中彩裙点点，姑娘的歌声清脆而悠扬。

我们还没有踏入葡萄园的绿荫，几位姑娘和孩童已经来到我们身旁，带着新奇好客的神态问长问短，领着我们进入葡萄园中。刚到葡萄架下，一位正在忙碌的维吾尔族中年妇女看到有客人来，便捧着新摘的葡萄送给我们消暑解渴。经过炎热戈壁的行程，能品尝到那样甘甜的葡萄，一股甜美注满心头。

主人叫古丽汗·依布拉音，承包了20多墩葡萄，因为树龄都比较年轻，加上全家人的精心管理，近两年来，每年都增产一至二成。他们除了卖鲜果以外大部分都晾成葡萄干。她说："现在只是今年的第二次摘收，准备销往乌鲁木齐。大批葡萄将在8月份收获，所以大头



桃儿沟里品葡萄。

还在后头呢！”说着便领我们在一株搭着低矮支架的葡萄墩旁站住，掀起藤蔓让我们看，呵！葡萄几乎一串挨着一串地挂满了枝头。



在丰收的日子里。

接着，我们便在一位青年妇女和几位姑娘、孩童的引导下顺着坡路继续前行。

我们的路径就是一条长长的葡萄架，它像颐和园的长廊那样蜿蜒在整个园中，一直把我们引入绿色园林的尽头。不同的是，这条长廊完全是由葡萄藤蔓和绿叶搭成。走在架下，头顶和两侧几乎挂满了晶莹剔透的葡萄串，抬手可得。在葡萄架浓荫清凉中，看着两边满坡满沟的葡萄园，就像置身于一个小小的葡萄王国。一路上好客的主人、热心的孩子们像变魔术似的，钻入两侧自家的葡萄藤中，一会儿给我们拿来一串红葡萄，一会儿又是无核白葡萄、马奶子葡萄、索索葡萄、喀什噶尔葡萄等等，还没有走到尽头，各种成色不同形状的葡萄就装满了一草帽，把它装点得简直就像一个盛满玛瑙珠玑的花篮。

边说边笑，我们来到葡萄园的尽头。一道坎儿井清流在这里汇成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池畔细柳拂面，清风送爽，十分惬意。再往上走就是一层高过一层的光秃的山包和一条划破这片灰黄山丘的绿色峡谷，谷中流淌着另一股清流直到山坡下的村庄。

我们没有再往上走，便在浓荫环抱的池畔停了下来。因为这里是一块高地，回头望去，吐鲁番盆地的片片葡萄园像一座座绿色的

岛屿，漂浮在戈壁瀚海的热浪之中。因水源的关系，桃儿沟的绿野被戈壁沙滩分隔成为几片，加起来也不过二三百亩，除了白杨和桑榆围抱的村舍，凡有绿色的地方几乎都是葡萄园。

看到这些，我想象的翅膀张开了。桃儿沟的人们究竟何年何月在这里发现了清泉又开垦出田地，已经无法查考，但从附近峡谷崖壁上几孔古老的寺庙洞窟来看，可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由此联想到新疆是祖国种植葡萄最早的地方，从西汉时期就有葡萄传入内地。桃儿沟也可能是吐鲁番葡萄的一个发源地吧！

正在想象中，领我们来的那位维吾尔族姑娘吐拉古丽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桃儿沟的历史和这几年的变化。她说，据父辈讲，他们家爷爷的爷爷就住在这里，一直以种植葡萄为生。过去这里交通不便，生产的葡萄不能卖鲜果，绝大部分晾成葡萄干，进入冬季后用毛驴驮着翻越村北的天山峡谷，到乌鲁木齐换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有时也卖给专门贩运葡萄干的人，价格很低，常常吃亏上当。那时桃儿沟葡萄种植面积也小，加上"水霸"和地方乡绅的盘剥，人们的生活都很贫苦。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和坡下面的几大片葡萄园。而生活真正好起来还是这几年土地承包了，种植管理都很精心，前几年科研部门还在这里建立了葡萄栽培试验站，加上国家对葡萄价格的调整、新的果酒罐头厂的建立，无论是卖鲜葡萄还是晾制葡萄干，收入都很好，所以日子越过越甜，甚至比手中的这串红葡萄还甜呢！

她的一席话也感染了其他的孩子们。姑娘们在说笑中扬起手里的葡萄串边唱边跳起来。我们吃着甜美的葡萄，听着美妙动人的歌声，心里被这欢快的情景所迷醉。记得有一首情歌唱道："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在这样一个丰收的季节里，身处戈壁绿洲，又看到这些被幸福和欢乐所包围的孩子们，醉了的人又何止阿娜尔罕一个！

在回程的路上，孩子们争着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去做客，看到

那溪流环绕、绿树掩映的新村舍，真想走进那些庭院，倾听主人的心声，可又怕惊动正在田间收获的人们，只好一一婉言谢绝。

随着时光的流逝，桃儿沟之行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那段经历给我们留下一幕十分甜美的回忆。

葱岭古道话今昔

深秋季节，当我来到新疆南部喀什绿洲的时候，透过无垠的绿野向西眺望，看到一脉相连的雪峰绵长而又雄伟，冰峰玉柱直插蓝天，有时云遮雾绕显得很神秘。那儿正是著名的世界屋脊——帕米



海拔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冰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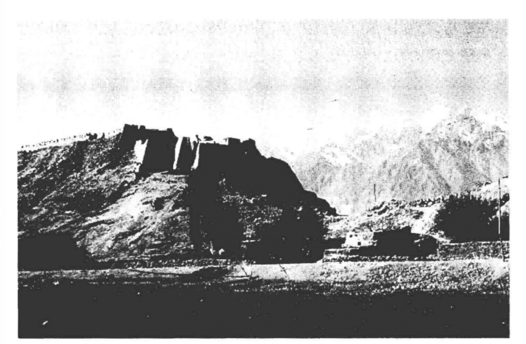
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是我国西部重要山脉，也是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虽然高山连绵，但从公元前起就已是我国通向波斯、印度乃至西亚、欧洲的要道了。奇特的地理景观、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以及神奇的传说、古老的人类文化遗迹，为世人展示出一幅绚丽的画卷。

帕米尔高原是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三大山系交汇形成的高原，我国历史上称为“葱岭”。这里有海拔7000米以上的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峰，以及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

从表面上看，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似乎形成了巨大的地理屏障，隔断了这里的居民同外界的联系。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这里就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古往今来，在这里各个时代的文臣武将、商贾游客、传教士、探险家都留下过足迹。1913年，当英国人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西部考古探险时，他亲身体验了翻越崇山峻岭的艰辛之后，禁不住惊叹2000多年来前人跨越这里冰山达坂的坚韧毅力。他提到了玄奘、马可·波罗，而最使他叹服的是，公元747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居然率领一万人马进行了一次奇迹式的远征，完成了翻越这座“可怕的天然屏障”的壮举。就是在今天，尽管已有公路通达，但人们攀登帕米尔高原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有过一次攀登帕米尔高原的体会。那是1963年春天，我乘坐一辆卡车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访。从春光明媚的喀什市出发，约行100公里进入山谷后便遇到暴风雪，狂风卷着纷纷扬扬的雪片铺天盖地，峡谷模糊了，山峦成了一幢幢巨大的怪影。越往上走，路途越加艰险。因为是消冻无常的春天，雪花落地随即消融，而遇到地温低的路面却又结成一层冰盖。当时沿途没有开通客运班车，我只能搭乘邮政班车前往。车体轻，邮件少，车轮常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司机和我们仅有的两名乘客尽管揪着心



塔什库尔干古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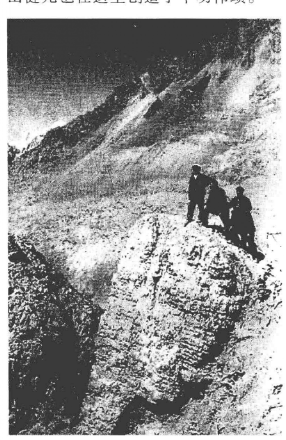
却没有退缩，遇到冰多难走的路段，为了免于滑落深渊，我们便往车厢里装石块增加车体重量，而在平整无冰的路段和陡坡上，又把石块扔掉减轻重量。一路上就这样装装卸卸，一直行驶到海拔3500多米的公格尔峰脚下，车子陷入雪窝，我们在养路工人的帮助下才把车子拖了出来。这一天从凌晨到午夜，艰难行驶了20多个小时，我们才到达一个食宿站。我在挤满了养路工人和长途汽车司机的通铺上寻出一个空隙倒头便睡。

从海拔1000多米的喀什攀升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路途虽然几经雾气弥漫、高山反应很重的路段，但因为全神贯注同风雪搏斗，我几乎忽略了身体的不适。后来从史书中我才知道，古人早就给这条路上的几处险要地段起了“大头痛”“小头痛”的别名。《汉书·西域传》就有一段有关翻越葱岭的描写：

“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道狭者，尺六七，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渊，行者徒步相持，绳索相引……”

当然，行驶在今天的公路上，感觉之畅快，较之古时的羊肠路已有天壤之别。第二天一觉醒来天已放晴，在熹微的晨光中，我们已置身于神话般的冰雪世界，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以及慕士塔格峰宛如冰塔般的奇峰就耸立在身旁，内心无比激动。经过艰难的盘旋能够立足于帕米尔高原之巅，确实是人生的一种荣耀。

就在气势磅礴的慕士塔格及附近的几座高峰之中，有粼粼的湖泊和丰美的牧场，这里是高原主要居民之一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夏秋放牧的好地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登山运动员和爱好者来到这里，攀登被人们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海拔7546米）和公格尔九别（海拔7595米）的顶峰。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男女登山健儿也在这里创造了丰功伟绩。



位于达布达尔乡附近的塔吉克人称之为“克孜库尔干”的“公主堡”。

雄伟壮丽的帕米尔高原拥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和古老的遗迹。从慕士塔格山下沿中国—巴基斯坦公路再向上行走，便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所在地。这里是塔吉克族人民的聚居区，也是新疆南部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塔什库尔干”译成汉语意思是“石头城堡”。现在的城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起的新城，而真正的石头城堡则在新城附近的一处高地上。那是一座巍峨险要、龙盘虎踞、形似要塞的古老城堡，城内房屋虽已倒塌，但城区轮廓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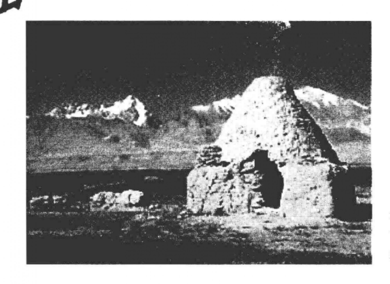
晰，墙垣完好，在高山的映照下依然显得雄伟壮观。据熟于掌故的塔吉克族老人讲，现在基本完整的城墙是公元13世纪元朝时在原有基础上建成的，清代进行过维修，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

帕米尔高原在史前时期已有人类居住，1977年在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面的香宝宝古墓发掘出来的人骨、石器、陶器和铜饰可以证明，3000年以前这里就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据我国古籍《穆天子传》记载，3000年前周穆王西巡曾登上春山（一说春山即葱岭），在这里住了5天。而周穆王的葱岭之行主旨应是探望亲戚，因为当地的“赤乌氏”祖先季绰是周的祖先开国时分封的“春山之虱”(虱：一侧)。这里所说的“赤乌氏”，按《中外史地考》“赤乌”是色勒库尔的转音。色勒库尔是地名，泛指塔什库尔干一带，所以塔吉克人又叫色勒库尔人。《穆天子传》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这一段描写也不无根据。

中原人对于塔什库尔干的真正了解和记述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前汉时，西域天山以南统称三十六国，其中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5000人的小国蒲犁，位置就在现今的塔什库尔干。《后汉书·西域传》无蒲犁之名，而有德若。魏时蒲犁、德若并列，根据《中外史地考证》作者岑仲勉解释，“德若”就是“塔吉克”三字的音转。到公元二三世纪，这里又出现一个朅盘陀国。唐初，玄奘取经回来路过葱岭时，曾在朅盘陀小住，受到国王款待。后来唐朝设立葱岭守捉，把这一中西交通的关隘要道直接置于安西都护府控制之下。到了宋朝，这里属于我国一个地方政权。在元代是蒙古族所建的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又为当地和卓取代，直到清朝置蒲犁直隶厅，民国以后改为蒲犁县。

在历史的长河中，帕米尔高原留下的不仅是石头城一处古迹。从塔什库尔干沿丝绸古道再向上行走直到明铁盖，古老的驿站、千尸洞和公主堡的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它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公主堡就有一段传奇故事，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传扬。

公主堡，当地名称是“克孜库尔干”，它坐落在达布达尔乡，在现



帕米尔高原由达布达尔通往明铁盖、瓦罕走廊途中的古代驿站。

今中巴公路通向明铁盖古代隘口的交叉路口的一处依山傍水的悬崖之上。今天留存在崖顶的除了一段夯土的城墙和长有一棵柏树的房屋遗址之外，已别无他物。就是这样一处位置险要的遗址，却印记延伸着《大唐西域记》的一段记述。这本书在《朅盘陀国》一节中记述了玄奘到达葱岭朅盘陀国受到国王的盛情款待，并且给他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即很早以前，西域波力斯（即波斯）国王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美丽的少女，自说是来自东方太阳升起的国都。国王醒来，从此寝食不忘梦中人，便派了两名大臣去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求亲。两位大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拜见皇帝，献上求亲书信。中国皇帝被远方国王的真心诚意所感动，就许嫁了公主，但在两位使臣护卫公主到达帕米尔高原时，不巧前方发生了战争，道路被阻。为了安全起见，两位大臣和侍从就在险峻异常的高山上筑起城堡屋舍，将公主安置在那里。过了几个月战争平息，待两位大臣继续护卫公主西行时，发现公主已有身孕。经过多方询问才听一位宫女说："每当中午，就有一位美丈夫从太阳上下来，与公主相会。"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只好留居此地。后来公主生了一个男孩，非常聪慧英俊，大家就推举男孩为王，即朅盘陀国第一代国王。公主协助国王操持国事，同邻国友好相处。因此国王自称他与汉人有血缘关系，而称其祖

先是“汉日天种”。这一记述不仅见于《大唐西域记》，就是在塔吉克族的民间也广为流传。

为此，我还专程攀至公主堡的山崖，在巍峨峥嵘陡峭险峻的崖壁上探访公主堡遗址。在这险要的山巅，公主堡扼守两条要道的交



塔吉克族姑娘在欢歌起舞。



塔吉克族牧民之家。



热情好客的塔吉克人。



1960 年春，跟随塔什库尔干模范乡邮员艾再孜汗（共产党员、塔吉克族）在瓦恰的春耕现场给塔吉克族农牧民读报。

汇之处，一条向西的山路可越过明铁盖达坂而到阿富汗和费尔干纳，再到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东岸，一条向南的山路可越过红其拉甫达坂通往克什米尔和印度。从残留的墙垣和突出的马面看，这里更像是一座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城堡关隘。

离公主堡不远，进入明铁盖岔路口约10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曾在山村背后的一个山洞里发现过几具年代很久的干尸，据目击者描述为深目高鼻，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孩子，即使是在高寒山区，人物的毛发、衣物业已风化，足见年代已经久远。那么在丝绸之路上他们为何躲入山洞又死在那里，是为了逃避战乱，还是躲避强盗？这两种可能都存在。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从印度回来时，走到朅盘陀国东北五日之程处遇见成群强盗，和他同行的"商侣"逃往山上，玄奘从印度带来驮东西的大象被强盗一追落水淹死（按：大象会泅水，估计是帕米尔高原上河流湍急所致）。强盗没有伤害玄奘。强盗走后，商人们才渐渐聚拢来，与玄奘继续东行。

美好动人的传说、古老的遗址已成为历史陈迹，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已经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以来的30多年中，人口由原来的几千人增加到近两万人，畜牧业和高原农业经济都有很大增长，一些偏僻山村过去与世隔绝，今天不仅邮路畅通，还通了汽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商业工交也都从无到有，为自治县的繁荣和未来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巴基斯坦公路通车后，红其拉甫口岸对第三国开放，为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旅游事业、各种交往开辟了新的通道，现代化的丝绸之路已经构筑在崇山峻岭之间。塔什库尔干正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到来，客人们会在塔吉克人鹰笛、手鼓的奏鸣声中领略他们能歌善舞的风情，在柯尔克孜、塔吉克人的赛马、刁羊中感受高原民族的豪爽和勇敢，而通过攀登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冰峰雪岭去检验自己征服大自然的能力。

边城的鲜花与友情

在伊犁的故老耆宿中，晏恩博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祖籍在天津市杨柳青镇，其先辈追随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新疆伊宁市。

晏恩博曾是伊宁市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同一位俄罗斯人合作，从苏联引进技术创办实业，在伊宁市办起电灯公司、面粉加工厂和肠衣加工厂等，其技术之先进和规模之庞大，比当时迪化（乌鲁木齐）的此类企业实有过之。对此，伊宁市的居民颇有一种自豪感，而晏恩博也就成为伊宁市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当地居民对他造福伊宁的种种商业活动称赞不已，加之他平日有种植果木和花卉的爱好，品种颇多的花卉成为他与各族居民密切交往的媒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伊宁市五道巷，晏恩博是一位很受尊敬的汉族邻居。

我们拜访晏恩博老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与维吾尔族老人艾木鲁拉之间的情谊传为美谈，成为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当时晏恩博虽已年过七旬，但身体硬朗，精神健旺。他的居所建有露天长廊，是一套具有维吾尔族建筑风格的住宅，共有三间居室。他家院落很大，宅院中除了果木便是鲜花，在一处长长的花架下，盆栽的花木

姹紫嫣红，香气四溢；而在花架之外，靠近居室的花池中，则种着晚香玉、美人蕉、君子兰、兰花、山茶花、木香、金银花、大理花和当地称为“八十朵玫瑰”的蔷薇……整个院落除了曲径甬道，遍布绿色植物，不是绿荫覆盖，就是花卉点点，充满温馨。特别是一对养了多年的白鹤，漫步林木花间，洁白的身影同庭院的花卉融为一体，真是边城伊宁难得一见的景象。



晏恩博与花友交流育花经验。

在看花谈花的过程中，我们得知晏恩博在伊宁市南郊早就结识了一位名叫艾木鲁拉的维吾尔族朋友。两位老人几乎是你种什么花，我就种什么花，无论谁有了新的品种，都会推荐引种给对方。晏恩博的长子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工作，有时带回一些新的花种，因而晏恩博种植的品种就比艾木鲁拉的要多一些，只要有了一种新的花卉，晏恩博都要给艾木鲁拉移栽一棵。他们还常常在一起交流花卉栽培技术，研究如何嫁接改良。晚香玉的花色一般都是白色，经过两位老人的精心嫁接改良，已经培育出粉红、淡紫等颜色，而一些热带花草如龙舌兰、棕榈、水仙等，也曾出现在艾木鲁拉的园中。花卉已经成为两位老人交流友情的使者，时间长了，如果十天半月见不到面，他俩心里总像缺了点什么。

1962年盛夏的一天，我们跟随晏恩博老人到他的花友艾木鲁拉家去了一趟。我们乘坐当地人称为“六根棍”的轻便马车穿行在伊宁

市的街巷之中。在这座以满城白杨树而闻名的城市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种着果木和花卉的庭院。街道两边，高高的白杨直插蓝天，挂满苹果、李子、桃子的果树枝伸出宅院墙头，透过门庭就能看到花卉满园，色彩斑斓，花香果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艾木鲁拉老人住在伊宁市南郊的卡赞奇一带。他听到驾车马匹的项铃声停了，便知有客人来到门前，快步出门将我们迎入院中。进了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鲜艳的玫瑰花丛，扑鼻而来的花香沁人心脾。我们沿着两旁开着各色小花的花径走到遮蔽在葡萄架绿荫中的居室，艾木鲁拉老人执意要把我们让进室内。晏恩博对他说，客人是来看花的，坐在室外的土炕上就行了。艾木鲁拉一听说我们是来看花的，便喜上眉梢，立即从屋内搬出褥垫铺在土炕的花毡之上，又摆起方桌，让儿子从葡萄架上剪下几串葡萄，还从靠近围墙的果树上摘下最好吃的夏季苹果，金黄透明的夏梨木、嫣红的阿波尔特、翡翠般的葡萄配以烤馕，摆了满满一桌。大家坐定之后，晏恩博说："好久没来了，你是不是还像你种的花那样鲜活？"艾木鲁拉笑着回答："那还用说！花是我的灵魂，种好它们便会有一种神灵让人精神焕发，越活越年轻。"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个头不高，旺盛的活力时时展露在他的音容笑貌之中。我们问起老人种了多少个品种，花都长得怎么样，他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他种的七八种玫瑰花正在绽放，大理花更是各色各样，晚香玉一早一晚香气袭人，让人陶醉。

老人说："咱们别说花了，先吃点葡萄，尝尝我近年引种的苹果，馕也是新烤的，泡在我们伊犁河谷这种大碗的奶茶中别有风味，吃饱喝好后，我领你们去看，比在这里说的更好。"

吃饱喝足后，艾木鲁拉老人便带我们穿行在他家的花丛之中。除了靠近墙垣的果树之外，花木几乎占去宅院的大部分空间，我们虽然没有女性那样痴迷于鲜花的灵性，但身临其境也还真是有点如痴如醉。艾木鲁拉老人种植的大丽花，花朵很大，而且有红、黄、紫等

多种花色，还分为单片、双瓣，真是多姿多彩。美人蕉肥大的叶片簇拥着红红的花冠，像火焰般热烈，似朝阳般嫣红。尤其是那些喜欢温湿的南方花卉，枝繁叶茂，幽香袭人，让人驻足不前。在观赏过程中，艾木鲁拉和晏恩博两位老人还不时说着自己的花经。晏恩博说："我最近从儿子那里弄来一棵昙花，入秋后给你压一棵，你那种黄色的大理花和大叶子洋芋花味道很香，到时候可别小气，给我弄点儿种子，也让我种几棵。"艾木鲁拉风趣地说："那还用说！咱们既是老朋友，又是伊宁市的老花仙，我有什么好品种，也忘不了你老先生。"观看评说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两位老人的情谊之深。

伊宁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各族人民团结友爱源远流长，即使在三区革命初期，尽管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恶意挑唆，却也未能把各族居民的深厚情谊割断，几经磨难反而使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加牢固、难解难分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又一次到故乡伊宁采访，并再次拜访了晏恩博老人，他身体健康一如往昔，依然痴情于花木。当我问起他的老朋友艾木鲁拉时，老人的脸色便黯淡下来，说艾木鲁拉去世了。他告诉我们，虽然这位老友已经作古，但他的孩子却常来看望，有一次还特意赶着马车把晏恩博拉去看花。看到晚辈继承了父亲的爱好和满园的花卉，而且比他父亲种得还好时，晏恩博非常高兴。那次年轻人还用马车把晏恩博拉到他家的乡间果园转了一圈，临别时对晏恩博说："您老人家和我父亲的情谊，我是不会忘记的，会常去看望您，还要把您接来多加指点。"后来，我们了解到晏恩博老人的花友不止艾木鲁拉一个，他在伊宁市西郊和北郊还有几位花友。我们特意拜访了晏恩博的花友——住在市区西郊的一位名叫买合买提江的维吾尔族老人，穿街走巷进得这位老人的家门，依然是花果满园，天蓝色的墙面和雕花廊檐的门庭居室，几乎同园中的绿荫花卉融为一体，十分协调。鲜花仰着笑脸迎接我们的到来，而热情好客的主人更是喜笑颜开，不仅用瓜果葡萄招待我们，还敞开自己的心扉向我们



共同赏花。

谈起全家人爱花的秉性，也向我们介绍了鲜花怎样使他和晏恩博等几位老人结下的深厚情谊。临别时老人特意从花丛中剪下一束鲜花，让自己的孙女送到我们手中，让我们把花香和友情带到自己的住地。看到此景此情，晏恩博老人也十分动情地告诉我，前次他来买合买提江家的时候，临走前老友特意送给他一枝天竺葵，走了一路香了一路，拿回家时，孩子们都跑过来闻那奇异的花香，盛赞维吾尔族老人的情谊。

时隔不久，一天傍晚晏恩博老人请他的晚辈杨俊甲给我打来电话，说晏家庭院的昙花今夜就要开放，邀请我前去观赏。我到晏家时，天已麻黑，院中的葡萄架下灯光通明，除了几位爱花的老友，左邻右舍都来观赏，显得十分热闹。这一天晏恩博老人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葡萄架下摆上椅子，还特意换上200瓦的大灯泡，静候客人的到来。大家看着那盆挂着十多个花蕾的昙花，言谈笑语其乐融融，待到入夜花蕾绽放之时，大家凝神注目，只见花瓣缓缓开放，

花蕊渐露，一股幽香飘然而出，素白的花朵使在座的人们都沉迷于花香之中，此时大家专注于赏花，整个庭院显得十分安静。一个多小时后，昙花开到最盛处，展露出素洁高雅的最佳姿容，维吾尔族乡邻和花友发出“亚克西！”（好）、“那哈伊提其来丽克！”（非常美）的惊叹，汉族亲友说着“真好，真好看！”赞美之声不绝于耳。伊宁市引种昙花始于晏恩博老人，而那次赏花已是第五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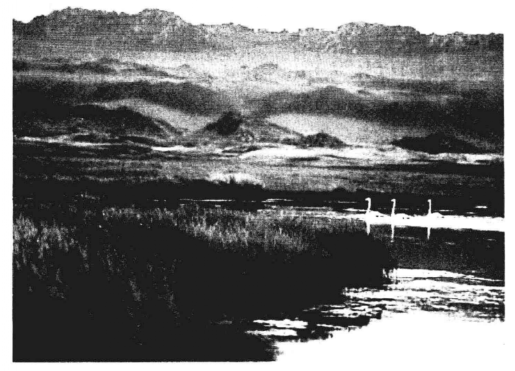
种果养花，已成伊宁市各族居民的生活习性，以花为使，边城的各族居民结下深深的情谊。正是受到这样的感染，每到伊宁市，我总要到那大街深巷之中，仰视那高耸的白杨，欣赏居民庭院的景色，感受那花香果香所展示出的风情。每每此时，我也常常受到好客主人的邀请，进得他们的院中，倾听他们畅谈民族团结的心声。

天鹅湖上的寻觅

幅员辽阔的新疆有许多神奇的地方，位于天山中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鹅湖就是其中一个。像银色飘带似的开都河蜿蜒流过这片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山草原，两岸茂密的草丛和镜子般的湖面上，每年初春都有一批批水鸟飞来，跋涉行程最远的要算是天鹅了。它们是在印度半岛度过冬季以后来到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这里是它们的故乡，它们的天堂。天鹅们要在这里产卵、孵化、脱羽换装，一直到9月中旬第一场风雪来临之前才又飞到南方过冬。

如果你在夏日里来到巴音布鲁克草原，常常会看到一对一对大天鹅分别带着四五只或者七八只小天鹅，时而浮游在静静的湖面上，时而钻进丰美的水草中。它们那洁白的身姿轻盈而端庄，长长的脖颈轻吻水面，显得悠闲而典雅；有时它们摇动着巨大的翅膀拍击水面，击起朵朵浪花；高雅恬静的天鹅身上，积蓄着勇敢和力量。

居住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族牧民喜爱天鹅，他们把雄鹰比作蓝天的勇士，把天鹅则比作圣洁的神鸟。多少年来，他们陪伴着天鹅，天鹅展示的高尚情操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它们洁白的身影和交响乐般的鸣叫给这片草原增添了乐趣。所以过去牧人就是离天鹅很近很近，天鹅也不会受惊飞跑，长期以来人鸟之间和谐友好相处，共



天山深处的天鹅湖。

同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生存繁衍。当远方的客人来到牧人们的帐篷,青年们就会捧起一碗醇香的奶酒,唱起劝酒歌——

洁白的天鹅落在我们家乡的湖泊,
远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帐篷做客,
我们举起一碗奶酒歌唱巴音布鲁克,
也用天鹅一样纯洁的心灵献上我们的歌。
天鹅冬去春来眷恋着开都河,
因为它有积雪的高峰明镜般的湖泊;
牧人四季离不了开都河,

因为它有辽阔的草原和美丽的天鹅。

美酒是醉人的，请喝下吧，因为它伴着草原伴着生活。

科学家十分珍视天鹅的存在，因为在它身上尚有许多奥秘需要探索。天鹅属于群聚性候鸟，在漫长的迁徙途中总是几十只或上百只结合在一起。它们又是最忠诚的伴侣，只要找到配偶，便会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鹅就是这样，每年春天四五月份，一群群天鹅从南方飞到这里后，便分散在自己往年活动的区域，按照家庭组合一双双隐没在湖泊湿地的深草中，开始交尾、筑巢、产卵、孵化。天鹅筑巢都是雌雄一起进行的，一般用各种枯草、绒毛做材料，把巢筑在人们和各种兽类不能到达的沼泽地深处最隐蔽的地方。特别是孵雏期，雌天鹅静静地卧在巢里，而雄天鹅则守候在近旁，放哨照料，直到小天鹅出世。刚刚孵出的小天鹅并不是白色的，它们全身长满了银灰色的绒毛，出窝不几天，大天鹅就开始带着小天鹅在水面上浮游。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大天鹅一边脱羽换装，一边带着小天鹅采食、游泳，训练它们潜水、隐蔽、飞翔等各种本领。大天鹅脱羽期间是飞不高飞不远的，小天鹅也需要它们无时无刻的照料，所以七八月间到天鹅湖的人，常常会看到大天鹅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浮游在水草深处的湖面上。大天鹅典雅地缓缓浮动着，不断摆动着长长的脖颈警惕地环顾四周，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侵害，而天真的小天鹅则一会儿钻入水下，一会儿学着大天鹅的样子，用自己的嫩嘴梳理洗刷羽毛。在整个夏季里，它们虽然以这种方式分散在水草地中，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群体，每到夜幕降临或朝霞升起时，湖面上总是掀起一阵阵天鹅鸣叫的声浪，它们互相应和，互通声讯，也好像互道晚安或早安。

9月，大天鹅的羽毛换齐了，小天鹅已经几次飞临到高原的蓝天和白云间，它们慢慢长大了，翅膀硬了。这时候风寒已开始把远山染白，阵阵冷风预示着冬天即将到来。



寻找天鹅。

天鹅开始准备迁徙了。也许是天鹅长者发出了号令，也许是一种本能的驱使，它们开始集中、会合，要靠群体的力量飞越戈壁瀚海，翻越喜马拉雅山，飞行几千公里到印度半岛去。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片片像羊群似的天鹅开始出现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它们欢叫着，舞蹈着，和自己的伙伴问安道好。在鸣叫的声浪中，它们既相互庆贺重逢，又呼唤着还没有到来的伴侣。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在这欢乐的天鹅群中也有失去伴侣的不幸者，它孤寂地等待着，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在等待，已经编好了长途跋涉队形的天鹅群体也在等待，它们不想丢下自己的伙伴，直到草原上落雪的最后时刻，为了整体的生存，天鹅群飞走了。失去伴侣的天鹅留在荒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它要以自己的赤诚在与风雪搏斗中等待和寻找自己的伴侣，但往往经受不了冬季的寒冷，最终被埋在积雪中。

天鹅的组合、习性需要去探索研究，那些非常罕见的黑天鹅又是怎样出现的？有着什么样的个性特征？研究天鹅的秘密，在扩充人

类知识宝库方面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可是前些年天鹅失去了保护，1979年一支天山动植物考察队来到巴音布鲁克草原考察天鹅的时候听到牧民反映，在这片约130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文化大革命”前曾栖息过近2万只天鹅，到1979年只剩下5000多只了。由于没有专人保护，一些无知的人捡走天鹅蛋，给天鹅的繁衍带来灭顶之灾，也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直到1980年，巴音布鲁克草原才被列为新疆重点自然保护区，天鹅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宁的生存环境。即使如此，1982年我专程到巴音布鲁克草原拍摄介绍天鹅湖的专题报道，天鹅数量仍然少得可怜。少许的天鹅因为害怕人类射杀，也离人类活动的地方很远很远。因此我们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开都河上游最偏僻的沼泽地找到它们的踪影，拍摄到有较多天鹅的照片。对我们来说，那是不寻常的一天，因为在此之前，有时听到几声天鹅的鸣叫，我们曾去寻找拍照，但湖水很深，芦苇丛生，即使看到几只天鹅伸长脖颈，游来荡去，也难以接近它们，更找不到适宜拍摄的角度，总是失败而归。就在我失去信心的时候，金光牧场的几位蒙古族牧民伸出援助之手。他们说：“我们带你去开都河上游的大山后面，如果在那里看不到较多的天鹅，就没有办法了。”第二天，我跟随这几位蒙古族牧民来到开都河的一处渡口，那是一艘只有四五平方米的木箱式渡船，在铁索牵引下每次只能摆渡四五个人。牧人只好卸下乘马的鞍具，让乘马泅渡过河，我们则挤在小小的渡船中到达彼岸。从渡口开始，我们骑马翻过几座山冈，才在雪山脚下的沼泽地上看到天鹅群。经过将近一天的奔波，我们到达此地时已近黄昏，在夕阳的余晖中拍摄到浮游于芦苇塘中的天鹅之家，并在另一处湖泊中拍摄到天鹅的群体，回到金光牧场的驻地已是午夜时分。虽然这一天非常辛苦，但能够拍摄到天鹅群，我还是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但是，人们是不是都认识到保护自然生态、保护动植物是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必要条件呢？学会与世间各种生物和谐相处，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三进阿克牙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新疆分社按照总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好民族地区报道的要求，先后在伊犁、喀什、和田、克拉玛依设立记者站，作为新华社工作的前沿触角。我曾在伊犁记者站度过一段时间，有几次令人难忘的采访，昭苏县阿克牙孜冬牧场的采访报道便是其中之一。

回想起来，作为一名新华社摄影记者，对现实生活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感人事迹，不遗余力地去追踪采访报道，应该说是自己的一种责任。多年以来，我总是把这种追求作为当好记者的动力，因而能够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这样，阿克牙孜冬牧场就成为我一再追踪采访报道的目标。

记得1963年冬天，我在同当地干部的交谈中，了解到昭苏县有一位长期在哈萨克族牧区工作的党委书记高励阳，坚持学习哈萨克族语言，并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在阿克牙孜深山牧场建起学校和商品流动供销点，并在冬季草场面积不足的情况下，带领牧民在高山之巅开辟新的草场。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同当时驻伊犁记者站的宋政厚、张宏文决定，春节之前赶到阿克牙孜冬牧场，采访报道那里的新鲜事物。



昭苏县阿克牙孜冬牧场里的骆驼商店。

阿克牙孜位于天山深处的托木尔峰脚下，那时从伊宁市到昭苏县乘汽车需要走一天，从昭苏县城到区政府骑马就要走一整天，再从区政府到阿克牙孜峡谷则要走一天半。时值隆冬季节，旅途寒风凛冽，刮得脸颊生疼，大风卷起的雪浪在眼前流动，山峦雪雾迷蒙，似乎总是走不到尽头，特别是到了傍晚和入夜时分，听到一声犬吠、看到一点灯光都让人感到欣慰，因为这预示着即将达到目的地，我们可以在牧人的土屋或毡房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也许会围着火炉并在奶茶和熏马肠的香味中倾听牧人弹唱……这一切不仅可以消除旅途的疲劳，而且可以萌发许多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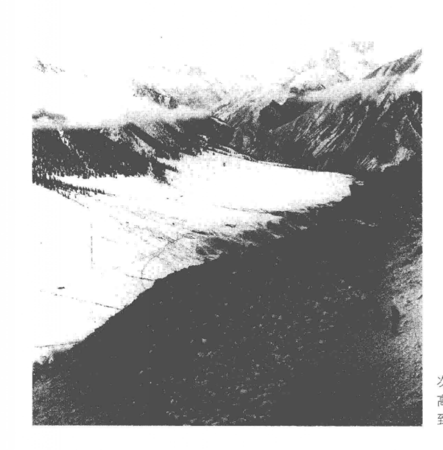
我们进入阿克牙孜冬牧场的第一夜，住在一位名叫木卡西的哈萨克族牧羊人家里。喝过奶茶，我们便围坐在火炉旁听他讲述放羊的经历。他放牧的羊群就在一处新开辟的高山牧场上，而要到达那

里必须拄着削得尖尖的木棍并在脚板绑起铁爪。他指着眼前的火炉烟筒说，要去那片高山牧场就得攀登像烟筒一样陡峭的山崖，还要涉过雪深没膝封冻滑溜的沟壑。听到这些，我们对这位牧人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在一股激情的催动下，我们决心同这位牧羊人一起爬上那座山顶，体验他的高山放牧生活。

第二天清晨，木卡西给我们每人削了一根尖头木棍，并从附近牧人家里借来几只铁爪，因为铁爪数量不够，我们每人的脚板仅能绑上一只，就这样跟随他向陡立的山峰爬去。木卡西走在最前面，像山羊一样敏捷而熟练地攀登，而我们越往高处爬，越感到吃力，不时地停下来喘息，几乎累倒。

此前我也曾到伊犁地区天山深处的果子沟拍摄新建的盘山公路，因为当时天气不好，加之来往车辆稀少，显示不出新建公路的繁忙景象，我便在果子沟的林场住了七天等待拍摄时机，每天清晨从山下攀上山顶，选好角度，守株待兔，想把穿越天山果子沟的新公路拍好，后来终于拍摄到理想的画面。我满以为经过那几天的锻炼和适应，攀登阿克牙孜的高山牧场不会很困难，没想到竟会累得几乎爬不起来。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咬紧牙关爬到山顶，只是耗费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那片新开辟的牧场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向阳山坡，积雪中的牧草长得比山下高。木卡西为了照顾好他的羊群，有时下不了山，夜间只好在一处避风的崖缝里露宿，一待就是三五天，放牧时饿了渴了，就用铁壶烧点茯砖茶，吃点干粮填填肚子。面对这一情景，我更加敬佩这位牧羊人，便拍下他高山放牧的照片，后来宋政厚和张宏文在新闻通讯中生动描述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报道了木卡西高山放牧的事迹。

从山顶下来，我们沿着阿克牙孜河走进山谷深处又采访了几户牧民，走访了供销社流动服务的情况，听了牧场小学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并采访了校长和教职员工，还同孩子们一起在放学的路上策马驰骋，拍摄了不少照片。但是，我对这些照片不太满意，就在阿克牙



1967年第二次登阿克牙孜高山牧场所拍到的放牧景象。

孜牧场留下来，决心要把冬牧场的采访报道搞得深入一些，把图片拍得更好一些。在几天时间里，我单人匹马访问了一些牧民，跟着供销社的“骆驼商店”到最远的山沟采访流动售货情况，也拍下孩子们冒着风雪骑马上学的照片。这些照片发往北京新华社后受到好评，其中《骆驼商店》《山区学童》被中国摄影杂志刊用并入选全国摄影展览。虽然如此，我总是对阿克牙孜牧场念念不忘，觉得那次采访未能把牧人在严酷环境下不怕苦、不怕累、精心放牧的品格表现出来，因此盘算着再去一趟阿克牙孜牧场。

1968年12月我又去阿克牙孜牧场采访，并再次绑上防滑铁爪，拄着尖头木棍，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登上海拔约4000米的山顶，拍摄了牧民高山放牧的照片。我从阿克牙孜牧场办公地策马走了一天，来到牧场中心部位的生产队长家里寻找采访对象，最后选中在山上最高处放牧的名叫夏日希拜的青年牧民，正好生产队准备派人上山给

夏日希拜送干粮和薪柴，于是第二天我们脚上又绑起防滑铁爪，拄着尖头木棍向高山攀登。为了减轻我的体力消耗，那位背着干粮和薪柴的向导舍弃往日直上直下的路径，带我走着“S”形的路线，就这样我还是喘息不止，一路上躺在草地歇息五六次才到一处山崖陡立的巅峰，向上望去，陡岩峭壁，冰雪覆盖；回望来路，深沟大壑，下临无地。

我们在一个山脊上见到放牧的夏日希拜。这位哈萨克族青年身着皮衣皮裤，一条宽大的皮带束着腰身，脸颊黑里透红，神情刚毅淳朴。得知生产队里的同伴带记者来采访，他憨厚地笑了，并把我带到他的住处。他住在一个岩洞之中，里面除了一片毛毡和一件皮袄，再就是用几块石头搭起的炉灶和一只煮茶用的搪瓷缸。因为好长时间没有下山了，他的干粮所剩无几，哈萨克人不可缺少的茯茶早已断顿，他只得用山里的一种大叶植物代替。我端起茶缸尝了一口他用雪水煮的这种“茶”，苦涩之中略有一点儿草香。他要用向导刚刚带上山的茯茶、肉干和烤馕招待我们，我考虑到他今后的生活所需便



在天山深处高山牧场冬季里放牧的哈萨克族青年牧人。



1995 年国家在阿克牙孜牧场封冻的河谷架起了桥梁修建了牧道。

谢绝了，只喝了几碗茯茶便给他拍照。我拍摄了夏日希拜和白白的羊群，记录了他在群山之上放牧的磅礴气势，也拍摄了他的住处和为了防止狼害而用石块垒起的羊圈，但这些照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未能发出，直到今天还留存在我的手中。每当看到这些照片，采访夏日希拜高山放牧那段经历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1996年冬天，我再次来到昭苏草原，虽然时隔28年，但我依然惦记着阿克牙孜牧场，惦记着那些高山放牧的人们。改革开放了，那里的牧场发生了什么新鲜事物？哈萨克族牧人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这诱导我再次进入阿克牙孜峡谷的冬季牧场。

真是今非昔比，一条供牧人和畜群转场的公路，已经通到我们过去骑马才能到达的阿克牙孜牧场中心，水流湍急的阿克牙孜河上已经架起几座桥梁。在1963年我随供销社骆驼队去过的牧场深处，几名哈萨克族青年已经办起餐馆和商店，店里日用百货的种类比过去丰富得多，山外生产的新鲜蔬菜也已运进隆冬的深山牧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阿克牙孜牧场建成的人工灌溉草场，给牲畜过

冬储备了大量牧草，牧人用牛将巨大的草捆运回家中，以防牲畜遭受雪灾和春寒。这次重返阿克牙孜牧场，唯一的缺憾是未能见到前两次采访过的高山牧人木卡西和夏日希拜。看到山下的这些变化，我用相机都记录下来，作了报道。

走进阿克牙孜牧场，给我的记者生涯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可喜的是，多年来新华社一贯倡导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采访作风，今天依然影响着年轻记者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草原散记

——蛇的故事

在多年的采访生活中，对于蛇的恐惧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尤其是每到草原，那种惧怕更胜于平常。这种心理除了从阅读书报杂志和民间传说中产生，亲身经历则是在巩乃斯草原度过的那些日子。

1954年春天，在冰雪消融大地苏醒的一天，我同另外两名记者乘一辆二轱辘大轮车行走在泥泞满道气候温湿的伊犁河谷，准备从那里翻越墩麻扎山野到位于尼勒克县的巩乃斯春牧场去采访哈萨克族牧民的生产生活。我们先到达了尼勒克县镇。

巩乃斯是新疆著名的春季牧场，位于伊犁河谷以东自巩乃斯种羊场到新源县的那拉提草原，全长绵延有三四百公里。在天山牧场中除了巴音郭楞尤鲁都斯草原，巩乃斯便是最辽阔最平坦的牧场了。行前听尼勒克县主管畜牧业的干部讲，仅这个县就有20多万头大小牲畜在那里接羔育幼，度过春天后再转移到河谷两侧的高山牧场。因此，在4月的巩乃斯，是一年中牧民较为集中、生产十分繁忙的季节。他说，去冬以来雪情比较好，开春之后又经过几场春雨，牧草长得特别茂盛，加之连续几年的丰收，那里呈现着人畜两旺的景象，很值得一去。他特意提醒我们，那里毒蛇很多，在访问中无论是行走

在草原还是住在牧民的毡房都要十分小心。他听说前两天刚刚到任的巩乃斯种羊场党委书记杨文轩的儿子在一天夜里临睡前听到床头发出嘶嘶的声响,待杨文轩循声走到床前一看,一条蛇正盘在床头的被褥上,吐着信子的蛇头摆来摆去。亏了他们发现得早不然咬上可不得了。巩乃斯草原的蛇大部分都是叫"草上飞"的七寸蛇,蛇身虽然短但毒性很大。由于对人畜的危害严重,县里还组织牧民专门开展了一场打蛇活动,我们听了虽然有点瘆人,打蛇保畜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报道的选题。临走之前我也带着不安的心绪问起那位管畜牧业的同志,有没有什么办法防范蛇咬。他告诉我们在草地上行走要把裤管扎严,最好拿一根马鞭和木条见到就打,如果住在牧人的毡房,睡觉之前在自己的枕边和铺下撒上烟沫,蛇最怕烟油,嗅到烟味也会躲得远远的。再就是到了给羊喂料喂盐的食槽跟前要特别注意,那里老鼠比较多,蛇往往藏在槽下袭击吞食前来偷食饲料的



1954 年春,新疆尼勒克县巩乃斯草原上的由哈萨克族牧人组成的打狼灭蛇队。

老鼠。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忠告。

从尼勒克县的喀拉托别翻过几道山脊经过几条沟壑，便看到了辽阔的巩乃斯草原。泛着银辉的巩乃斯河迂回蜿蜒在草原的腹地，点点毡房和散布于草原的畜群构成了一幅美丽而丰饶的草原景色，一直伸延到南边远远的雪山之下。在乡干部的安排下，我们来到一处有五六顶毡房的"阿乌勒"。"阿乌勒"一般都由亲友和同部落的族人组成，在游牧生活中，无论是春夏秋冬游牧到哪里，他们都在一起相互照应，年长或德高的族人便是单元的头人，即便到了水草丰美的牧场上，他们的驻地也都相距不远。

接待我们的牧人名叫艾山拜依，是个中等牧户，在"阿乌勒"是位有威望的人。主人十分热情地帮助牵马拴马，并执意要我们全住在这个5口之家的毡房。这个"阿乌勒"有5户人家，放牧着700多只羊，10多头牛，7、8匹马，有5峰用作搬家的骆驼。生产中大家分工管理牛马羊，挤奶、剪毛、储备冬草都在一起劳作。转场时青年人赶牲畜，老人和妇女孩子们便收拾毡房，赶着载着家具毡房的骆驼和大畜走在前面，到了住地给边走边放牧的男人们支好叫做"禾司"的简易毡房，并埋锅做饭；无论是生产生活都是相互照应，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主人给我们介绍这些习俗、哈萨克人部落和社会构成的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生活安定，大家非常热爱新的生活，干劲也特别大，生产发展蒸蒸日上。这是我的第一次春季牧场之行，初次接触哈萨克族牧人，他们的质朴热情和待人接物的爽朗无私给我们的心中不断注入着友谊。

到了傍晚，随着放牧人的归来，草原沸腾了。羊羔和母羊相互呼唤，母牛的"哞哞"声汇流成一股热烈的声浪。此时，孩子们便把母羊一只只用绳套套在一起，而后，在用石块和树条围起的育羔围栏中把羊羔赶出圈栏去辨认自己的母亲，找到母亲的羊羔则狠命地吸吮着乳汁。对于个别寻不到母羊的小羊羔，牧人们便给予帮助，家庭主妇此时已在乳牛的腹下挤奶，挤过一些之后便把拴在一旁的牛犊放

归到母牛身旁，黄昏的牧场处处呈现着既热烈而又恬静的景象。此间，我们同孩子们一起抓羊羔寻母羊跟着瞎忙活了一阵。之后，便到男主人给他自己和我们所乘马匹喂料的木槽傍，望着经过一天劳累的乘马咀嚼着草料的那种专注时，受到马匹和我们惊动的几条蛇眨眼间从我们脚下飞窜过去，惊得牧羊狗迅速躲了开去，把我们也吓了一跳，没想到第一天就领略了毒蛇爬行的迅捷和灵活。入夜喝过奶茶，吃过女主人手擀的面条，女主人趁我走出毡房方便的空间已经给我们在靠门的左角铺上了厚厚的被褥。临睡之前想到县上同志的指点，我便把随身带的“莫合烟”(一种当地出产的颗粒状烟末)撒在了每个人枕边，才敢安然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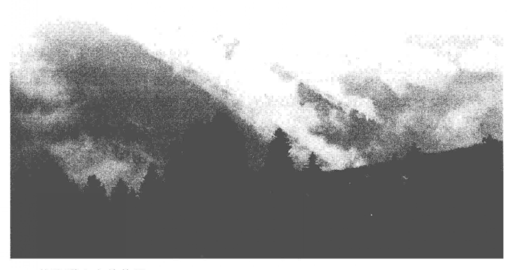


天山之中的原始林野。

当时，巩乃斯草原除了毒蛇伤害人畜之外，狼害也很严重，因此乡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打狼灭蛇队。我们跟随的是由十几位牧民组成的打狼队，那天主要到附近山丘布狼夹、掏狼窝，沿途见到毒蛇就地消灭。哈萨克人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骑术都十分娴熟，无论什么样的烈马、不管如何跳跃奔驰，他们都驾驭自如，如同与马匹成为一体般牢牢地紧贴马背之上。而我们则不同，马一跑起来就战战兢兢，根本无法把控狂奔的马匹。在第一天的奔跑中，我的同行阿布列孜的乘骑马失前蹄，把他从马的头部掀下去了。同行的牧人见状很快下马扶起了老阿，幸好摔在了草地上，没出大事。就在此时我们

又发现乘马踩着了一个蛇洞，洞中正有几条毒蛇在蠕动，大家连挖带打一下消灭了10多条。望着老阿和我们傻愣愣地站在那里，有位牧人笑着说："真是上帝保佑阿记者，从马背上摔下不但没有摔坏，还使我们发现了蛇洞，为草原除了害。你们今天可是为我们打狼队开了个好头。说笑之间，另一位牧民已将跑远的乘马牵了回来。在后来的行程中，又发现了几个蛇洞和几条盘卷在草丛中和交尾的毒蛇，大家也都没有放过挖毁了蛇窟，用马鞭打死了它们。到达山丘后在布放狼夹的同时，发现了一个洞穴中有几只狼仔，大家便抓了回去交给了乡上的畜牧兽医站。那一天我们是在一种新鲜、惊恐、神秘而又夹杂着兴奋的心情中度过的。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巡行在草原上，踏看接羔育幼的情景，访问经过严冬和初春风寒的牧民如何迎来了畜牧业的丰收；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新生羔羊的欢跃、膘情好转的大畜。一次，采访一户牧民之后正走向住地的途中，我发现离乘马不远有一条蛇正缓缓地爬行在草丛之中，我们立即停了下来，两人都在犹豫，下马去打手中没有



苍翠群山中的牧场。

马鞭，空手去抓用脚去踩，万一被蛇咬着那可受不了，我更是忐忑不安，后来还是同行老杨有了主意，他看到我拿着拍照用的三脚架，便说："小武，把三脚架给我！"他拿上之后便下马轻脚慢步走到了毒蛇近前狠狠叉住了蛇身，我看到冲向老杨摆动的蛇头所发出的嘶嘶声，喷射毒液的凶狠，简直毛骨悚然了。老杨看准时机一脚踩向蛇头。我们的精神正在放松之时，在老杨的身后不远处我又看到一条蛇，他扭过身去用同样的办法消灭了它。

对于毒蛇的恐惧，我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在一本期刊上读到的，记得那篇文字主要说的是一位研究生物的科学家。一天中午他在实验室中看到关在笼中的一条毒蛇似乎正在睡眠之中，他想弄清楚蛇在这种情况下反应是否灵敏。本来进行这种试探需用一支探棒便可万无一失，而他觉得那条蛇睡得很沉，一时大意，把手指伸进蛇笼试探。刚刚把手指伸入，警觉的蛇突然咬中了他的手指。毒液随着血液很快从臂膀扩散，他赶忙拨打急救电话，但不巧的是那天电话机出了毛病，随着蛇毒的进一步扩散，他已挪动不了身体，在无法得到救助的情况下，他便用笔记述了从被蛇咬伤到失去知觉前的整个过程。我敬佩这位科学家为人类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从此我见了毒蛇就更加惧怕，即使是盘卷在路边、爬行在草丛中的大蛇小蛇，我都不敢招惹，总是绕道而行。

采访中，我们又得知附近巩乃斯种羊场培育的新疆细毛羊所产的第三代羔羊获得丰收，专家们正在鉴定其品质；另外也需要给我们的毡房主人买些茶糖，表示一点心意，我便乘马驰行20多公里去履行这一任务。一路上也见到了几条蛇，尤其是盘卷在马路当中的蛇，心里发憷总是绕道而行。到了种羊场，有一次要去场部北面的羔圈去拍照鉴定和给羔羊打耳号的科学管理活动，因为路途较近我便徒步而行。行走之中看到一条蛇盘卷在道路中间，绕行吧又怕惊醒之后遭到突然袭击，只好等它自行爬走再通过，可是等了很久它依然纹丝不动，后来只好捡了几块石头站得远远的投掷过去，才算把

蛇赶走。

巩乃斯草原是我一生中见到毒蛇最多的地方。每次去天山草原和其他的牧场采访，我总要随身带着烟沫或者蛇药。我特别看重50年代市场上畅销的季德胜蛇药，因为我曾听过有关季德胜的一段传奇故事。


胡杨林中准备冬眠的小蛇。

那是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一天，农家之子季德胜在村边破庙中看到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他回到家便把此事告诉了父亲。自此，父亲就让小季每天给那位老者送水送饭，用山里的草药给他治病，不久，老人病体全愈。临行之前，当他得知季德胜家境贫寒时就告诉小季的父亲，他是一位游历于深山老林中捕蛇采药的人。他说：眼下我也无法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如果放心的话，你把小季交给我准保有口饭吃。小季便这样被托付给了这位知恩图报诚实厚道老人，他跟随老人在山野中捕蛇采药。捕蛇过程中小季常被蛇咬伤，起初蛇咬过疼痛难耐，反应很重，老人就用自己配制的药丸给他连吃带抹，去除蛇毒。经过多次蛇咬服药和在伤口上涂抹，到后来，蛇咬后的反应越来越轻，以至到被蛇咬后不再需要服药了。就这样，他们在深山中捕蛇，到市镇中耍蛇卖药，成为出售特效蛇药的游医。后来师傅去世，他继承了医术，依然捕蛇采药，做蛇药丸在集市上出售，最终成了人们口头传颂的神医。抗日战争中，日本侵华并入侵东南亚地区，那里毒蛇多，日军曾研究过季德胜蛇药，但未能弄明白其化学成分，便四处寻找季德胜，想利用他制作蛇药。季德胜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隐姓埋名，到抗战胜利才又出现在南方的街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献出了药方，经过去粗取精，医生们将用

敷料较多的季德胜大药丸改制成了片剂。季德胜自身的抗毒体能和蛇药的奇特功力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50年代卫生部门在著名的蛇岛捕捉了几条蝮蛇，季德胜当众表演捉蛇技巧和自身抗毒功能时，伸手之际被蛇咬了一口；以往被各种毒蛇咬过都没有反应的季德胜这一次却产生了异样感觉，季德胜不仅感到疼痛难忍而且感到蛇毒扩散得十分迅速，他立即告知在场的负责人，这种蛇的毒性非同一般，他认为已无药可救，并留下遗言如果有什么不测请政府照顾他的家人。那位负责人劝他赶快用自带的蛇药。他估计可能不行，再说也没带来。那位负责人立即派人火速取来蛇药，季连服带抹后觉得轻松了许多，经历了这次风险之后，季德胜本人及其蛇药成了人们口头传颂的传奇故事。而他的蛇药便成为我在深山草原采访生活中的随身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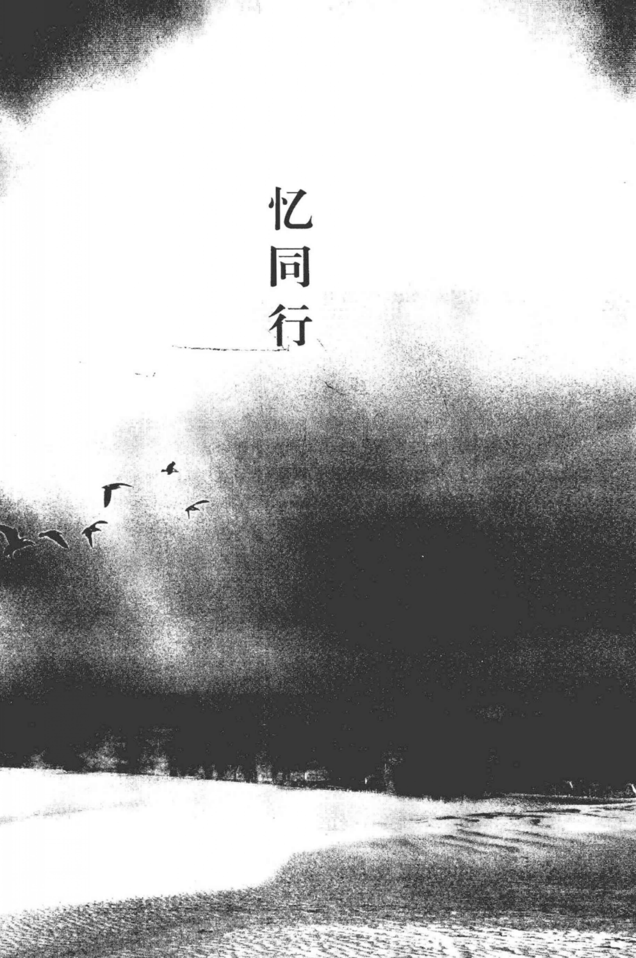
1978年为编采新疆第一本“天山画册”，我们去了位于天山山谷中的拉孜牧场。6月间，高耸入云的雪峰山峦下，牧场上牧人还不多，只是一些牧马的哈萨克人最先来到了那里。布满森林的冈峦，茵绿的草原，烂漫的鲜花把高山牧场装点得既雄伟又秀丽。看到这样的美景，我已迷醉其中，几乎忘记了草丛中已经开始活跃的毒蛇昆虫和藏在原始林野中的野猪、熊豹。记得那是一个气候多变的日子，到达时山区阳光普照明媚璀璨，没过一会儿，一场又一场的雷雨便接踵而来。在云霓、光霞和雨露的交替变幻中，我拍下了郁郁苍苍的林野、雨幕蒙胧的山巅和雨后日照的彩虹，拍下了突立于崖岩的松塔、雪山下奔腾的马群。那一天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人动情，虽然一场场雷雨给人带来了一阵阵寒意，我依然流连忘返，不闻归途。直到最后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在山后消隐，我才意识到该寻过夜的毡房了。哈萨克人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当我敲开一位牧马人的家门时，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哈萨克人习惯于热情收留求助的路人，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深山牧场，牧民也十分欢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会把牧场之外的消息和趣事带到毡房，给草原牧人们带来令人新奇

的乐趣。

在初夏的高山牧场，一到傍晚依然寒气逼人，特别是当天又下了几场雨。入睡之时女主人特意给我铺了很厚的褥垫，我想在这样的天气不必在枕边和褥下撒烟沫了，奔波一天深感疲乏，我倒头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早晨醒来，当我揭开棉被时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一条小蛇正盘卷在身旁。我先是一惊，后来看到它将头紧紧地贴着卷曲的蛇身，对我毫无敌意，我逐渐地反应过来，是夜间的寒冷驱使它来到了我的身边，并借着我的体温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看着它那银灰色的鳞片、白色的腹部、修长的蛇身，一种对于幼小生物的爱怜油然而生，我轻轻地离开了暖被窝，随着晨光初露，这条蛇也缓缓地从毡房的缝隙中游出，消失在金光粲然的草原上。

从此，我对蛇的恐惧和憎恶心理消失了，作为一种生命和自然生态链中的物种，它们的存在虽然对人类和其他生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危害但也不能否认它们的有益的作用，因为有了它们草原上的鼠害得到了有效抑制。人类和大自然依然不能缺少蛇，而且应该善待它们。





忆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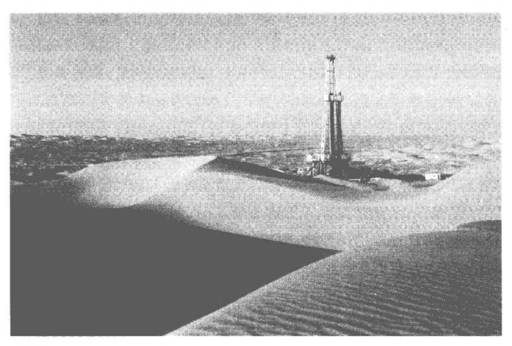


瀚海深处响春雷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过春节

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重新上马以后，到风沙弥漫的塔里木盆地去，到寸草不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去，报道石油健儿征战“死亡之海”英雄壮举，成为我的一种梦想，一种渴望。

1988年初，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勘探公司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



塔克拉玛干沙海中的石油探井。



塔克拉玛干野骆驼自然保护区。

地竖起第一座井架。同年12月的一天，一架双水獭飞机载着我和石油勘探人员，降落在满西一井附近由钢板铺就的沙漠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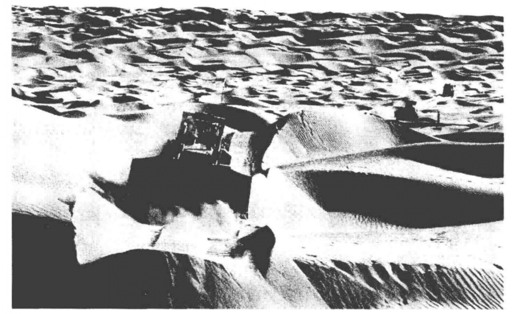
耸立于沙海之上的石油井架，坐落于井场旁边的列车营房，昼夜轰鸣的钻机，忙忙碌碌的身影……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富有激情，令我不愿放过任何生动的镜头。在那些日子里，我奔井场，攀井架，坐着沙漠车追踪野骆驼，站在高高的沙山上迎候沙漠车队的到来。我想象着沙漠腹地的光明前景，曾经借助夜晚井架上熠熠生辉的灯光，透过有节律的沙漠波纹，使用闪光灯不同的色板，描绘出我心底的期盼和沙漠的生机。我也曾请钻井工人畅谈酷暑、严寒、极度干渴的感受，在狂风怒号沙尘飞扬之时，与高空作业的工人一同登上井架，在迷眼的风沙中，随着井架的摆动拍摄他们拉动长长的钻杆，体会他们不畏艰险的精神。为了拍摄拉运钻井器材的沙漠运输车队驰骋沙海的镜头，我在结束满西一井采访报道后，舍弃了乘坐飞机返回石油基地的机会，专程跟随沙漠运输车队，在绵延起伏的沙山和原始胡杨林中颠簸两天，到达塔里木河畔沙雅县的一个运

输支撑点。满西一井之行和后来塔中一井的踏勘，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采访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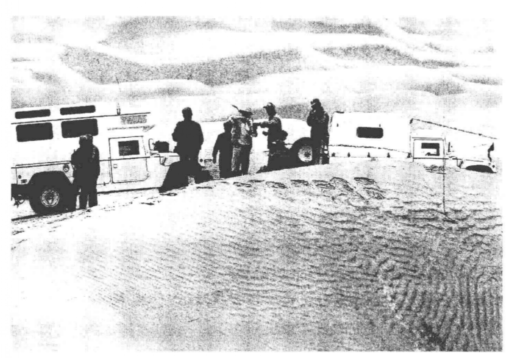
最令我难忘的是，时隔不到一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第二口石油探井——塔中一井即将施工。南疆勘探公司党委书记周原带领先遣组进行实地踏勘，我随他们一同前往。先遣组人员乘车从库尔勒出发，经过若羌绿洲和且末绿洲，两天之后到达民丰县安迪尔河下游的一处牧场，休整一天，再从牧场进入沙海。为了沿途的安全畅行，先遣组由日本产"五十铃"大马力沙漠车开路引领，在沙海中行进110公里，到达1831石油物探队的营地。那里是先遣组依托的另一个支撑点，它距卫星定位系统测定的塔中一号探井井位30多公里。起程那天，风起沙扬，为了尽快完成线路踏勘，大家只好冒着风沙，奋力前行。途中我们乘坐的莫尔沙漠车几次陷在沙窝中，经过一次次辛苦挖掘，才到达塔中一井的井位，在原有的水泥墩旁，用装满细沙的红色油桶组成了新的标志。

自此以后，我和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结下不解之缘。在对满西一井的钻探、塔中一井的井位踏勘以及塔中其他几口探井的钻探或出油作了报道之后，我几乎把目光投向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各个角落。石油勘探的先锋——沙漠地球物理勘探队，便是我追逐的目标之一。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当时的石油部物探局组织多支地震队挺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施工作业，地震测线从相距几十公里、十几公里准备加密到五公里左右。地震队员冒着沙海中的酷暑严寒、极度缺水和狂暴沙尘的袭击，凭着自己的脚板几乎踏遍整个沙海。为了深入报道地震队员的精神风貌，我先后去过1831地震队、2222地震队和来自大港油田的渤海沼泽地震队进行采访。他们踏破黄沙千里浪的豪情壮志使我深受感动，促使我不愿停歇地搞好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新闻报道。

1990年春节到来之前，我和文字记者申尊敬商量，决定一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同石油物探队的一线员工过春节，报道这些



塔克拉玛干沙漠石油勘探中先遣队正为新的探井在茫茫沙海中开路。



最先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确立首批探井井位的塔里木石油勘探指挥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沙海深处。

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石油健儿在沙漠腹地过节的情景。于是，我们便来到库尔勒的石油物探三处，选定前一年被评为部级先进地震队的1830队。这支地震队的营地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队员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作业区域的加密测线，正准备转战到克里雅河下游的沙漠深处，开辟新的施工区域。我和申尊敬先到沙雅县塔里木河南岸的转运点，从那里乘坐直升机去1830地震队。到达转运点的第二天早晨10时，我们乘坐的苏式直升机准时起飞。塔里木盆地刚刚下过一场初雪，直升机螺旋桨一启动，我就忙了起来。据说在塔里木盆地很少能够看到雪景，所以我抓紧一切机会把这雪后景色摄入镜头。

直升机飞行约一刻钟后，先是看到白雪覆盖的垄垄沙丘，接着就是冰封雪盖的蜿蜒曲折的塔里木河，笼罩在蒙蒙朝雾之中。塔里木河以南，柔和的沙丘一面覆盖着白雪，另一面则呈现着褐黄色，新月形沙脊的曲线，把银白和灰褐划分得一清二楚，像疏密有致的图案展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直升机飞行约40分钟后，沙海的积雪越来越少，黄褐色占据了大部分沙面，一座接着一座的高大沙山，像汪洋大海中翻滚的巨浪，绵延叠加，此起彼伏，十分壮观。

快到1830地震队营地的上空时，我们先是看到一缕飘在沙海中的青烟，继而看到沙丘之间排列整齐的银白色宿营车。直升机降落在钢板铺设的简易机场后，地震队派人用莫尔沙漠车把我们接到营地，值班的副队长张力平把我们安排在宿营车内，房间较小，一张书桌，两个铺位，特别简陋。嗡嗡作响的空调机，把屋里吹得很热。张副队长给我们冲咖啡、倒牛奶，十分热情。他30岁左右，留着小胡须，浑身充满青春活力。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说："欢迎二位记者到沙漠中和我们地震队员过春节。现在这个区域的地震测线快搞完了，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一部分人马已经转移到克里雅河下游的新工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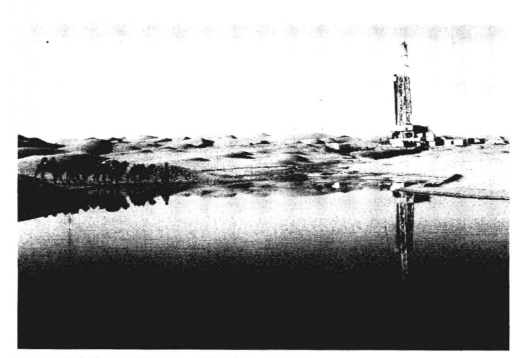
第二天，即1990年1月24日，副队长张力平驾驶一辆莫尔沙漠车，要把我们送到营地东北方向的地震作业现场。作业点距营地约

40公里，沙漠车翻过一道道沙山后，便在绵延起伏的沙丘中上下颠簸，白色的车体简直像是小帆船，一会儿冲上黄色的浪尖，一会儿又跌入谷底，时起时伏，忽上忽下，使人头晕目眩。

到达地震施工点后，只见队员们挖坑的挖坑，放线的放线，扛炸药的扛炸药，显得十分忙碌。那天放的是小炮，即在相距50米的地方各挖一个炮坑，填入炸药，电源操纵两个炮坑同时起爆，爆炸瞬间产生的人工地震波，由精密仪器接收并记录下来。小炮施工，任务更重，放线工们不能坐车，全要步行，真不愧是“铁脚板”。隆隆炮声把地层深处的信息传递上来，经过大型电子计算机处理后，绘制成地质剖面图，供石油地质专家们研究判断。从1983年到1989年，这支82人组成的地震队，共完成地震测线6500多公里，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南到北完成沙漠地震测线600多条。我们采访的当天中午，地震队员们在沙梁上燃起一堆篝火，将冻得硬邦邦的馒头烤热，草草用过“午餐”，接着再干，直到傍晚才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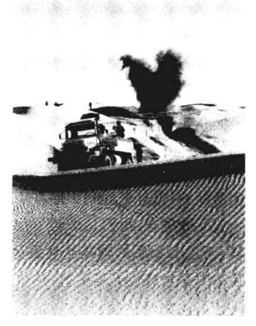
子夜时分，营地院子里人声喧哗，听说是置办年货的地震队副队长冯志文从400多公里以外的阿拉尔绿洲满载而归。岁末的最后一道地震测线已经完成，大家开始迎接新年了。地震队决定派人前往新的工区，把在那里施工的队员们都接回来，全队人员团圆过节。这样，我就跟着他们一道走进沙漠深处的新工区。

驾驶莫尔沙漠车的是两位年轻人，他们自1988年进入沙漠后，跑的多了就成了“沙漠通”，在没有路径和标志的沙海中行驶，即使遇到沙尘暴，也能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转危为安。有一次，司机马红伟运送材料时迷路，沙漠车也出了故障，抛锚于沙海之中，他仅靠5个馒头，在沙尘暴中坚守6天，最终修好车子，走出迷途。听了他们的叙述，我的心中惴惴不安，但看到他们坚毅而富有智慧的神情，一切担心便一扫而光。起程之后，沙漠车一直都在起伏的沙山上颠簸，有几次翻越大沙山时，像是乘飞机时遇到强大的气流，把我的内脏搅乱了，真想呕吐。行驶约三个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新营地就在克



树立在塔克拉玛干塔中 4 号区域的石油探井。

里雅河西岸的一片干枯胡杨林中，古老的河床早已被流沙填埋，除了个别的胡杨还在挣扎存活，大部分已经枯死，四野之内，荒寒可怖，倒地的朽木、干枯的枝丫、扭曲的树身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魔鬼，盐碱、风沙、枯叶、荒草，到处是一派破败荒凉景象。克里雅河，这条沙漠河流在水量充沛的时候，几乎由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岸的草木该是多么繁茂啊！今天变得如此凄惨，怎能不使人惋惜！当看到冰冷沙丘上靠着篝火度过20多天的地震队



长年活跃在沙海深处的 1830 石油物理探测队 1990 年春节期间也忙不停歇地进行地质剖面的放炮震测。

员时，我的心情好多了。他们使这片被人们遗弃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他们给“死亡之海”带来希望之光。当天，沙漠新工区的地震队员全部返回营地，回程依然用了3个多小时。

转眼之间，已到除夕。地震队员们跳远、举重、登沙山等比赛活动，一项项开展起来。举重比赛，用的是一根重约150公斤的钻杆，许多队员上场，相继败下阵来，年轻工人陈振春体格健壮，号称大力士，举起这根钻杆时也是非常吃力，满脸通红。后来换了一根较轻的钢管，能够举起来的人就多了，有些人还能连续举起三四次。被称为“铁脚板”的于志安老师傅，1989年为了在沙漠中开辟一条新路，他放弃了回老家探亲的机会，带领两名推土机手在沙山中奋战，饿了啃干馍喝凉水，连续干到第五天，遇到刮黑风下大雨，他们也不停工，光着脚板不知走过多少大沙包，终于用半个月时间开出一条新路。今天除夕之际，于志安师傅老当益壮，将沉重的钢管连续举起五次，获得老年组的冠军。体育比赛结束后，大家张灯结彩，筹办晚餐后的文娱活动，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

晚上8时，这支深居沙海的80多人的地震队，分作8组举行气氛热烈而别具风味的节日宴会，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午夜，一堆熊熊篝火照亮了沙丘，第一轮震耳欲聋的鞭炮响过之后便是猜谜语，直到零时每人点燃除旧迎新的鞭炮，将迎接新年的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就在此时，记者申尊敬将一篇《塔克拉玛干沙海中石油工人的除夕之夜》文稿传到新华总社，很快就播出了，第二天就被《新疆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

正月初一，我们又采访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业的美国石油专家，而最有意思的则是从地震队营地东行80多公里，到和田河故道采访维吾尔族牧人买买提·热依木。在一年多的地震施工作业中，副队长冯志文与这位维吾尔族老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那是1989年冬季，冯志文从塔里木河畔阿拉尔返回营地的途中，在荒无人迹的和田河故道上，遇到正在求救的买买提·热依木，当时他的老伴处于高



1830 地震勘测队除夕之夜。

烧昏迷状态。看到这一情景，冯志文驱车返回营地，把地震队的医生拉来进行救治，才使老妇转危为安。此后，在这片除了沙海便是原始胡杨林的荒寒之地，买买提·热依木老人的屋子，就成了地震队员们的避风港和转运站，每当沙暴骤起、天昏地暗、地震队的车辆无法行驶时，便在这里躲避风暴，有时拉运器材的车辆负载过重翻不过大沙山时，老人的家也就成了储存物资的转运站。春节里，1830地震队没有忘记买买提·热依木老人，冯志文带人前去看望慰问。得知这一情况，一大早便乘着莫尔沙漠车赶向营地西侧的和田河故道。和田河曾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条绿色走廊，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这可以从河道中段麻扎塔格古人所建城堡得到印证。和田河原本是一条发源于昆仑山、水量充沛的塔里木河主要支流，而在近代随着水量的减少，已经成为季节性河流，只有在七八月份山洪暴发时，水流才能进入沙漠。因此，原本分布于和田河两岸原始胡杨林也开始衰败。车行8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都是在左旋右转、

起伏不尽的沙山中行进，只是快到河床时才看到胡杨和红柳。那里除了密林荒草和沙包，几乎看不到人迹。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根本无法找到人家。而冯志文则轻车熟路，在林中穿行了一会儿，便来到一片不被人们注意的空旷之地，把我们拉到一处有篱笆围拢的门前。后来我们问他怎么会在没有路径、没有标志的地方找到牧人的家。他说要在这里找到人家不能光看地上，而要看林间的树冠，看到在树顶绑有小旗的长竿，或挂有羊头角的地方，附近就会有牧人的家。

买买提·热依木老人和孩子听到熟悉的马达声，站在门前迎候。见面之后，大家互致问候，孩子们高兴得欢呼雀跃。冯志文对买买提·热依木老人说："这几天是汉族人的春节，按照汉族人的习惯，我们过节不能忘了老朋友，队里派我来看望你老人家，顺便带点礼物以表心意。"说着从车上搬下水果、罐头、砖茶、糖果。买买提·热依木老人说："阿瓦提牧场的领导早给我们打过招呼，要尽力帮助石油勘探队员。我还要感谢你们平日里对牧人的帮助，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救治，我的老伴不知道会怎样呢！这是我们全家都不能忘记的。"买买提·热依木老人要宰羊招待，我们婉言谢绝。他说："羊肉可以不吃，总可以尝尝这里的野兔肉吧！"我们只好留下，吃过晚饭返回营地。

在回程的路上，冯志文说地震队员们结交的朋友不只是买买提·热依木，这几年从克里雅河下游的村庄，到其他沙漠河流尽头的小片绿洲，地震队员们结交了好几位像买买提·热依木这样的朋友，有这些维吾尔族朋友帮助，地震施工作业开展得还算顺利。通过这一天的观察，我们也感受到塔里木石油工人和南疆普通百姓的深厚友谊。

2月1日我们离开1830地震队，回想在沙漠深处度过的节日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地震队员们远离家乡，即便是春节也不能同亲人团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

挥部有一句口号——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要奉献、拼搏、团结、开拓。我也曾记得石油职工有这样一首歌谣:“春风吹醒了塔克拉玛干,勘探队的红旗迎风招展。我们是进军塔里木的尖兵,勇敢走向勘探沙漠石油的战场。汹涌的大沙海中,印满了我们的足迹。为揭开沙漠的秘密,我们将奉献青春的力量。酷暑严寒把我们锻炼成钢,幸福的花儿将为英雄开放。”这正是他们战酷暑、斗风沙、为国找油的心声。

白杨深处的记者之家

这是一座白杨掩映、独门独户的宽阔庭院，青砖门楼，铁皮屋顶，门楣刻有1929年建筑标记，十几间房舍临街排开，屋檐围着木雕花边。院内栽有丁香树、苹果树、樱桃树、葡萄藤等果木，园林几乎占去整个院落2/3的空间。果园通道的尽头，是原来主人停放车辆的棚架和存放草料的马厩。庭院四周，长着几排高大笔直的白杨树。这座庭院位于伊宁市斯大林街三巷，与街巷之中大多数庭院样式相同，体现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就是这样一座庭院，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当地政府帮助购置而成为新华社伊犁记者站。自那时起，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地占用过几年外，直到70年代后期都有驻站记者，最多的时候驻有5位记者及其家属，大家为伊犁记者站的建设和新华社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我曾几度在伊犁记者站常驻采访，现在虽已事隔多年，但许多往事依然珍藏在记忆之中。

学习和工作共勉

1964年冬天，我第五次去伊犁记者站，当时已有几位记者连同他们的家属返回乌鲁木齐，站内留着老记者金元明与夫人以及3个

孩子，另外两位记者分别在天山深处的特克斯县和昭苏县冬季牧场的牧民家中学习哈萨克语并且调查研究，每隔一段时间回到站内休整。那时，伊犁记者站已经成为我们深入采访、交流思想、编写稿件、聚会学习的园地。如果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重大采访报道任务，则记者站也就成为新华社新疆分社负责人组织指挥前线采访的活动中心。

那次我是同宋政厚、张宏文两位文字记者一起前往伊犁驻站的，刚一进门就受到金元明夫妇的热情关照，烧水做饭忙得不亦乐乎。为了把铺着防寒防潮地板的几间宽大正房打扫干净让给我们，金元明一家住在院子角落的矮小房中，让我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当时虽然远离新华社新疆分社所在地乌鲁木齐，但大家工作生活依然紧张，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先把共同学习、研讨和写稿的大房间打扫干净，而后各据一方开始读书，用过早餐（奶茶、烤馕和咸菜）就分头外出采访。晚间有的写稿，有的读书，或者交流当天的采访情况，当然有时也打打扑克、看看电影。宋政厚和张宏文二位勤奋好学，购书成瘾，经常光顾伊宁市的新华书店自不必说，即使他们外出采访，无论走到哪个县城，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准是新华书店，采访归来总能带回几本新买的书籍。我被他们这种喜欢读书的习性所感染，并在他们的鼓动下从伊宁市新华书店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他俩还专门刻制了“政厚藏书”“暂得于己”的印章，印在自己购买的所有书上。他们学识渊博，写的稿子富有文采，加之年轻人的浪漫心态，采访过程中也发生过令人捧腹又引起家属担忧的笑话。我们到伊犁记者站不久，决定在春节之前出击一次，到天山深处的昭苏县去采访冬季放牧生活，途中要过一条名叫阿克牙孜的河流。宋政厚和张宏文读过苏联著名记者爱伦堡的著作，对爱伦堡所写的苏德战争报道中“苏军饮马第聂伯河”的新闻导语记忆很深，因此到达采访目的地之后，在向新疆分社及家人报告平安的电文中写着我们三人“饮马阿克牙孜河”。当时昭苏牧区邮电所的译电员大都是哈萨克

族，这份电报几经翻译到达乌鲁木齐时，电文“饮马阿克牙孜河”却成了“骑马掉入阿克牙孜河”，引起新疆分社和我们家属的惊慌。那个年代天山牧区的电话还不畅通，相互联络很不方便，万般无奈之际，新疆分社几位领导人对着电文再三琢磨，看到发电人的名字正是我们，这才意识到掉进河里的人怎能自个发来电报呢？即便得救也不会发来这样的电报，可能是翻译电文时出了差错。新疆分社与昭苏县委联系，回答是没有听说发生过记者掉入河里的事情，疑虑和担忧才完全消除。后来我们回到伊犁记者站同家里联系时，受到家人的埋怨和领导的批评，说我们发出那样的电文也不看是在什么地方，真是弄巧成拙，把人们吓了一跳。

不久，记者们在牧人家里蹲点调研结束，相继回到伊犁记者站，然后再返回乌鲁木齐进行休整。最先回到伊犁记者站的记者，是在特克斯县深山牧场蹲点调研的张进兴，因为他爱看古书，喜欢古文，待人有些老气，大家就称他“老夫子”。过去我未同张进兴接触过，这次他回到伊犁记者站，我们都很高兴。张进兴的脸面被深山牧场的阳光晒得黑红，嘴唇干裂，双手布满老茧，说明他在牧场蹲点调研是深入的，学习哈萨克族语言是刻苦的，我对他深表敬佩，把最暖和的房间腾出来让他住，想方设法给他弄些好吃的。我想从张进兴那里打听一些牧场生活中有趣的事情，空闲时一再问他在牧场是怎么度过的，可他总是不愿意谈，只是埋头读书、整理资料。见我总是问这问那，他万般无奈，才私下里对我讲，他所去的深山牧场距特克斯县城很远，骑马要走两三天。那里的牧人淳朴热情，起初把他当做上面派来的干部，喝茶吃饭总要把他让在上座，晚上睡觉也被安置在毡房中间位置，而且铺盖厚实，弄得他很不自在。这样过了几天，彼此比较熟悉了，他便反客为主，抢着干活，向牧人学习哈萨克族日常用语，闲暇时逗孩子玩，教他们歌唱，消除了最初的陌生隔阂。到后来，张进兴不仅给主人家担水劈柴、捡牛粪当燃料，而且跟着牧人一起放牧。牧人们看到这个新华社记者不怕吃苦、顶风冒雪同大家一起

放牧牛羊，亲身体验牧人的生产生活，便常常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了不起的新华提力齐(记者)。"冬季牧场狼害严重，牧人常常要在羊群中守夜，有一天张进兴提出要代主人值守，起初他们不肯，说："你能跟我们放牧就不简单了，现在又要守夜，出了事可不好。"张进兴一再坚持，牧人也就勉强同意了。那是一份很苦的差事，入夜之后要带着毡片，裹上老羊皮大衣，坐在羊圈旁边的一处岩洞中不眨眼地守护，不时还要吼叫几声把前来偷袭羊只的狼吓跑。听到这些，我更加感到张进兴精神可贵，也对他一到伊犁记者站就埋头整理笔记、不理睬人的行为表示理解。

一天午夜就寝之后，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见是柴怀吉，他从昭苏县的牧人家中回来了。由于客运班车中途抛锚，他整整又走了20个小时，风尘仆仆，疲惫不堪，但黑红的脸庞依然显现着刚毅神采。他头戴大皮帽，身穿老羊皮，手执马鞭，脚蹬马靴，还把带去的马鞍背回来了，看上去很像一个来自天山深处的牧人。当时，柴怀吉和其他几位记者分别在伊犁河谷维吾尔族村庄或天山草原、阿勒泰草原牧人家中进行为期一年的蹲点调查研究，并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投身于少数民族群众之中，与普通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了许多基层情况，研究了农村牧区不少问题。尤其是通过学习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与采访对象的感情交流更为融洽。柴怀吉在昭苏县夏塔乡的哈萨克族牧人吐郎拜依家中住过将近一年，同吐郎拜依全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0年初，我和柴怀吉采访天山以北历史上存在的茶畜之路，还专程到靠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昭苏县夏塔乡拜访吐郎拜依。柴怀吉给吐郎拜依送来茶叶和布料，还给他的孩子们送来糖果。当晚我们住在这位牧人的家中，柴怀吉用哈萨克语同吐郎拜依亲切交谈，并在煤油灯下帮助吐郎拜依的两个小孩复习功课。看到这些，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要当好记者就应该深入基层，与普通群众广交朋友。

记者站的春节

春节临近，伊犁记者站的多数人都已回到乌鲁木齐。我和宋政厚、张宏文及金元明一家留守伊犁，算是春节里的值班记者。当时春节食品供应十分紧张，金元明夫妇多方求人搞来一些肉食，我们在阿克牙孜牧场采访时结识的牧人送来一些熏肉马肠，大家还从伊宁县的乡村酒坊买来一些白酒，算是年货了。

除夕之夜，我们在金元明家吃过饺子，回到平时学习、写稿的那间房子里，拿出剩下的熏肉马肠和一行军壶的烈性白酒，准备一醉方休。宋政厚、张宏文两人喝了几杯，提出以猜字、对句代替猜拳行令，猜不着、对不好的要罚酒。张宏文引述清末《南亭四话》中一句"金樽酒满"，让我对出下句，我没有细想便胡乱说"你我对酌"，他们笑道："错了，错了！应该是'碧水人来'，喝一杯吧！"接着宋政厚出句"人生几何"让我们对，我立即抢答"对酒当歌"，他输了，就喝了一杯。我出句"望梅止渴"，张宏文抢答"画饼充饥"，我只好喝了一杯。赢家出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宋政厚对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齐，我没有抢上，再喝一杯；赢家又以清代名士之作"红黄蓝白黑"，我和张宏文都对不出下句"侍酒客琴棋"，只好同喝了一杯。后来他们提出要组字，宋政厚先说了一句三鱼为鲜，结果你一句三水为淼，他一句三牛为犇，三金为鑫，三木为森，三石为磊，三人为众……最后我以"你我他三人为友"作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酒兴渐浓之时，大家开始唱歌。先是我情不自禁地唱起30年代风靡全国的歌曲"微风吹动我头发，叫我怎能不想她"，他们便以"人逢佳节倍思亲，你我共饮相思酒"，"情深深意绵绵，梦里寻你千百遍，何日家中还"。我边唱边喝，已经有些醉意，而他们两位喝的酒少，一会儿吟咏唐诗，一会儿吟咏宋词，一会儿吟咏元曲。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李白的《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兰，微霜凄凄簟色

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晏殊的《浣溪沙》：“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元曲似乎是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吟咏之后，他们见我醉眼蒙眬，就引诱我说说自己的爱情史。第二天他们问我昨天说了些什么？我说不是喝酒吟诗对句子嘛！他们则诡秘地说：“你还说了爱情的秘密。”我说不可能，但也没敢细问，而他们则哈哈大笑。我心想坏了，昨晚肯定说了不该说的事情。这段酒后真言，后来成了他们常常逗弄我的笑料。我对在外过节早就习以为常，而在伊犁记者站度过的那个春节，则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情趣。

民族团结的故事

也是1964年春节，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赶着马车来到伊犁记者站。他是按照汉族习俗来给金元明夫妇及孩子小明和小亮拜年的，带着南瓜、油馕和糖果。老人进得伊犁记者站的门庭，金家两个孩子便叫着“阿达！阿达！”（爷爷）扑进他的怀中。见我对此情景感到茫然，金夫人李玉珍便给我道出原委。

那是1962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长驻伊犁记者站的金元明夫妇带着孩子到集市上买东西，当他们走到街区的一条暗渠时，年仅5岁的小亮只顾看热闹，没注意脚下有一个打水的洞口，不慎掉下去了，吓得金元明夫妇不知所措，大喊“救人！”就在金元明将要跳入洞口的时候，只见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已经跳入洞口，很快从激流中把小亮救出来。伊宁的4月乍暖还寒，看着老人湿漉漉的，金元明夫妇再三邀请老人去家里换衣服，老人说还有事就离开了。金家夫妇要他留下地址姓名，老人说：“我是胡蒂亚圩孜的农民，救助别人是我应

该做的。"当时围观的人们听到老人的话语，不断地发出赞美之声。这样，维吾尔族老人在激流中救助汉族儿童的佳话，也就在边城伊宁的各族居民中传开。后来金元明经过多方打问，才知道这位老人是伊宁县红星公社胡蒂亚圩孜大队的农民吾麻尔江·司马益，便带着礼物专程看望老人，而后又把他接到家中做客，从此他们就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



吾麻尔江·司马益老人同小亮在一起。

听了金夫人的叙述，我们也一再向吾麻尔江老人表示感谢。那天金元明夫妇特意做了羊肉抓饭招待客人，感激之情发自内心。看到孩子们对这位维吾尔族老人的亲昵之态，我拿起相机拍摄了发生在新华社伊犁记者站的这一感人场景，后来民族画报以《深情厚意传佳话》为题刊登了这一报道。

新华精神的传承

1984年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原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时任新疆分社采编室主任的石正章带领三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开展这次庆典报道。伊犁记者站成为我们采访报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带来巨大变化和祖国西陲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组织指挥中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伊犁记者站的常驻记者平时有两名，遇到重大报道时记者人数就会增加，记者站的建设也受到新华社新疆分

社的重视。经过大家的共同整治,记者站院内新栽了果树,又种了葡萄,每到夏秋季节,院内浓荫铺地,树上果实累累,苹果和葡萄成熟收获时,驻站记者常常采摘一些运到乌鲁木齐,让新疆分社的同事们分享。驻站记者唯一的缺憾是生活必须自理,也就是说自己动手做饭,有时采访一忙,或者刚从乡间回来,就只好到街上找饭馆用餐。那次我和石正章一行4人,加上原有的一名驻站记者,人员比较多,天天在外用餐既耗时间也不经济,大家决定一起动手自办伙食。我当主厨,司机訾刚担任采购员。早餐一般比较简单,喝奶茶,吃烤馕,就咸菜;中餐和晚餐要求做得相对丰盛,由我定好食谱,訾刚照单采购,记者们采访归来,便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新华社新疆分社的员工,在长期相处中形成了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的优良传统,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领导、记者、司机还是其他岗位的职员,都有一种平等相待、团结友爱的自觉意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采访报道由石正章挂帅,当地政府要给石正章一些特殊照顾,多次请他到宾馆去吃住,但是石正章一再回绝,说同记者们在一起可以随时研究报道工作。那些日子大家晚上研究报道,白天分头采访,写了不少稿子。石正章还带着我们到特克斯县的高山牧场卡拉峻,司机訾刚在险峻的山区小道上历尽艰险,把我们送到一户牧人的毡房。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成功报道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天山草原哈萨克族牧民带来的巨大变化。

那些日子,石正章成为我们大家的表率。这位60年代初在新华社安徽分社通过深入调研最早写出并肯定“三自一包”的新闻报道而受到极“左”思潮批判的记者,调到新疆分社之后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锐和扎实的采访作风,而且始终保持着谦和朴素的高尚品质,带领记者写出许多颇有影响的新闻稿件。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新闻报道中,他同记者们一起采访,常常为写好一篇稿子熬到深夜,外出采访时,他从不以领导人自居,从不计较吃住的好坏,只要能达到采访目的就行。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采访时,

由于县里条件较差，加之客人很多，接待人员把我们安排在离县委招待所较远的一处临时腾出的客房中，和我们同住的还有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有的记者在县委书记面前表示不满，说："我们是来报道你们的，怎能把我们安排在这样的地方？"弄得县委书记不好意思。石正章对县委书记说："庆祝活动来了这么多客人，你们也有难处。我们做记者的上山下乡是常事，只要能够采访到好的素材，掌握有用的材料，吃点苦怕什么！你们这里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招待好其他客人对你们的工作、对扩大察布查尔的影响都有好处。我们唯一的想法是搞好这次报道，其他的都是小事。"一席话让县委书记很受感动，说："你们真不愧是新华社记者。"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采访报道中，还有一件事情令我难忘。为了反映伊犁州首府伊宁市的变化，我需要拍摄一张城区建设全貌的照片，而市区中心的广播电视塔则是最为理想的拍摄点，便决定选择一个晴好天气登上塔顶去拍照，电视台也同意我登上塔顶。这件事被司机菅刚知道了，他要同我一道前去，我想塔下有个照应也好，就同意了。到了塔下，他却要帮我背着摄影器材一起上，我说："不用了，自己完全可以。"他说："不行！你也快50岁的人了，我还年轻，一方面保护你，给你壮胆；另一方面也可以帮你一把。"电视塔高约120米，攀登过程中菅刚紧紧跟随着我，以防我踩不准梯阶发生意外，他还不停地提醒我要加倍小心。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他说不要再往上爬了，可我总想登上塔顶，而且只有到达塔顶才能选取适当的角度，拍到理想的照片，菅刚只好陪我爬到塔顶。过去我为了拍好照片，上过高大烟囱，上过石油井架，同去的司机都帮我背着摄影器材一起攀登，菅刚更是不止一次。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我多次前往伊犁驻站采访，心中珍藏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令我终生难忘。俗话说"人生如影，世事如梦"。而在伊犁记者站的工作与生活，则是我记者生涯中永驻心田的一段经历。

令我敬慕的一位前辈

回顾往昔的新闻采访岁月，我不能忘记韩文辉的教诲与提携。他是我在新华社新疆分社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前辈，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就经常一同外出采访，一次次的采访经历，犹如一堂堂生动的课程，引领着我一步步成长起来。

南疆之行

我最早的一次采访是同韩文辉前往南疆。当时南疆绿洲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批共产党人迅速成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为广大群众树立了榜样。采访报道这样的先进典型人物，便是我们那次南疆之行的目的。

在60年代初期，南疆的公路交通是很糟糕的。我们乘坐的客运班车，是由卡车改装成的轿子车，比起过去经常乘坐的敞篷卡车，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制作工艺粗糙，加之长期在坎坷不平的路面上颠簸运行，客运班车已很破旧。那次出行正值2月中旬，天山以北依然冰雪覆盖，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虽然春风乍起，但除了中午暖和一点，早晚也是异常寒冷。我们乘坐的客运班车，两侧车窗

有的保留着玻璃，没有玻璃的车窗则用木板封住，这样虽然挡住了风寒，却也影响空气流通，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坐在车厢偏后的部位，那天路过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县，行驶在翻越天山的上坡路上，路面坎坷，尘土飞扬，被旅客们称为"搓板路"。起初我们感到头晕，想请司机停下来，容我们呼吸点新鲜空气，以解眩晕之感。虽经几次呼吁，司机为了赶路都未理会，我们只好忍着。深夜到达库米什食宿站时，车厢前部的乘客都已下车，我们挣扎着刚一起身便又晕倒，有的人刚刚下得车门就一头栽倒在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醒后则呕吐不止。韩文辉也很难受，但他强忍着把我们一行几位记者从停车场扶到旅店的大通铺上。待我们缓过劲来之后，他招呼大家喝了点热水，吃了点热饭。我们都是坐惯了这种长途汽车采访的人，为什么这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很纳闷。第二天上车之后，我们才发现脚下的踏板上有一个裂缝，透过它可以看到汽车尾部的排气管正对着我们坐的地方，这才明白是汽车行驶中排出的有毒气体一直熏着我们，几乎致我们于死地。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车程需要六七天，我们总不能让毒气就这么一路熏着。怎么办？在我们的要求下，司机取下车窗上的隔板，摇下玻璃，此后我们虽然经受着冷风的吹刮、呛人的尘土，却再没有出现眩晕。

那时韩文辉的肠胃一直不好，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经受一路颠簸，加之饮食冷热不均，到达喀什时他已疲惫不堪。虽然如此，他依然同大家一起采访调研，确定各自分工之后，就再也撑不住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几天之后，他刚好一些，就要我同他一起到英吉沙县采访那里的几位共产党员。大家劝他再休息几天，他说南疆交通不便，通讯联系又不畅通，春耕大忙季节将至，只有抓紧时间采访，尽快把稿子发到北京新华总社，才能收到预期的报道效果。

英吉沙县接待记者热情周到，县委大院特别腾出一间屋子，挂上"记者之家"的标牌。凡来英吉沙县采访的记者，可径直到"记者之家"，休息片刻之后会有县委宣传部及办公室人员接待。韩文辉认为

这样边休息边采访,对身体健康影响不会太大。县委给我们推荐了几位带领群众改变农村面貌、处处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共产党员,其中乌恰公社牙瓦克村的党支部书记玉素因·艾山因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改变陈规陋习、扶助老弱病残而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农民说:"村里的干部弹什么弦子,我们就跳什么舞。"可见玉素因·艾山的威望之高。

这句话引起韩文辉的注意。他对我说:"究竟怎么样,我们得到村里去住几天,深入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你拍照片也需要到现场去观察。"我说:"这里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又能得到县委的关照,有利于你的康复。你身体不好,还是住在县城吧。至于牙瓦克村的情况,让我们去了解感受,回来原原本本地向你报告。"韩文辉执意要去,我们只好一起来到村里,住在农民家中。当时春播即将全面铺开,一条卵石砌成的引水干渠刚刚修通,全村农民正忙着在平坦的田间修建支渠和斗渠等配套工程,玉素因·艾山同村民一起劳动。我们听到他关心群众、克服困难的许多有趣故事,觉得玉素因·艾山的事迹确实感人。我们在牙瓦克村的田间地头连日采访,忙得不亦乐乎。



20 世纪 80 年代韩文辉重访克拉玛依时在著名的黑油山上。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村落处地偏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

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农牧民虽然结束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半年杂粮半年桑榆的生活，但到60年代，南疆农村经济依然是落后的，农民们一年四季能够吃到包谷馕就算不错了。玉素因·艾山想弄点小麦面粉给我们改善伙食，韩文辉坚决不让，说“农民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尽管如此，玉素因·艾山还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得好一点，所以每天我们总能吃到玉米面饼和又厚又宽的玉米面条。当时我年轻，身体结实，吃这些倒没什么，而韩文辉本来就有胃病，加之病体初愈，这样的饮食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和种种不适，但他一直坚持采访。

正当全国都在春耕大忙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时节，我们及时发出题为《维吾尔族的好儿子》的通讯，被《人民日报》刊登在第一版重要位置。如果说，过去几年我只是在新疆分社业务研讨、布置报道和日常生活中得到过韩文辉的指导，那么这次南疆之行则使我对韩文辉的采访实践有了切身体会，为我此后开拓新闻报道思路、养成良好采访作风是一次很重要的启示。

老记者的品格

韩文辉是最早采访克拉玛依油田的记者，1956年初新华社播出他采写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之后，他又相继采写了一系列石油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勘探开发石油的新闻通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我步韩文辉的后尘，于当年六七月份到克拉玛依油田进行摄影报道。

在准噶尔盆地西北部成吉思汗山下的戈壁荒漠中，我沿着韩文辉的采访足迹，先到最早出油的克拉玛依1号探井，而后又到盆地南缘打出最深探井的钻井队，还乘坐石油职工拉水的汽车到了小拐地方。在克拉玛依到乌尔禾“魔鬼城”上千平方公里的石油探区，许多石油勘探人员向我讲述韩文辉冒着戈壁荒漠的炎热，忍着干渴，从

一个井队到另一个井队深入采访的事迹。听到这些，我更加不敢懈怠，也像韩文辉一样，整天奔走于井场之间，从而成功地用摄影手段报道了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的最新成果，人民日报为此出了画刊。韩文辉报道了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也在克拉玛依留下他那令人敬佩的人生轨迹，以至多年之后，克拉玛依油田的老领导老工人依然记着韩文辉当年采访的情景。在克拉玛依油田矿史陈列馆，韩文辉最早采写并播发的油田新闻稿件，至今被陈列在展厅之中。

我在新华社一直从事摄影报道，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新闻摄影报道如何做到图文并茂，却没有认真思考过。有一次闲谈中，韩文辉笑着问我："听说摄影记者都是只会照相不会写作的'咔嚓'记者，有人还说摄影记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是不是这样？"我回答说是有些重摄影轻文字。韩文辉说："那就要注意文字锻炼，除了写好图片说明，也要写点文稿。"这次交谈之后，我便开始注重文稿写作的锻炼。

1962年东北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克拉玛依油田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奔赴松辽盆地，支援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得知这一信息后，当时担任新疆分社采编室主任的韩文辉指定我去克拉玛依采访报道，临行之前对我说："这次就不派文字记者了，你要做到图文并茂，除了拍好照片还要写文字稿，把工程技术人员出发的消息写好。"我顺利完成了这一报道任务，也体会到摄影记者除了搞好图片报道，承担一些文字报道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一年的冬天，我正在伊犁河谷采访，韩文辉打来电话，让我到巩乃斯草原的新源县那拉提公社采访并写一篇调查报告，说那拉提公社实行牧民定居，牧民们不仅种粮种草，还通过养蜂、采药、狩猎增加收入，公社还购置了卡车。当时我写动态新闻消息还可以，写调查报告真是不知如何下手。我意识到这是韩文辉又在督导，是要求我向新的高度冲刺。隆冬季节，我从伊宁市来到新源县城，又骑马走了两天到达那拉提，尽力采访收集

第一手材料，认真搞好调查研究，终于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使我的新闻业务得到全面发展。

采访路上的足迹

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来，我经历过的一些重大采访报道活动，大多是在韩文辉直接引领之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动，韩文辉敏感地察觉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要求记者密切关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拓宽思路，放开视野，搞好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并且身体力行。

1981年初秋，韩文辉带领我们几位记者前往南疆，采访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塔里木盆地带来的变化。翻过天山的第一站是库尔勒绿洲，这是新疆著名的香梨产区，市郊有一个国营的沙依东园艺场，改革开放后实行果园承包制度，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引进先进栽培技术，使香梨产量增加不少。一进梨园，我们看见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等各族员工正在采摘香梨，他们说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丰收年，出产的香梨已经远销广州和香港等地。

国营果园如此，那么乡间又如何？韩文辉决定到栏杆乡文拉克村由三位老人承包的果园去看一看。在乡村公路两旁的田野里，人们正在收获玉米、油葵和棉花，新播种的冬麦地里一片绿茵。我们一路观看丰收景象，直到文拉克村的果园。进得园中，但见纵横成行的梨树果实累累，树下码着一堆一堆刚刚收获的香梨。在散发着果香的树荫下，作业组长加麻·热依木带着几位老人向我们介绍经营果园的情况。他们几位承包了50亩果园，其中有22亩梨树，1981年香梨产量比上年增长近50%。他们生产的香梨除了销到乌鲁木齐等地，还有10多吨储藏在刚刚建起的果窖里，等入冬以后和来年春天卖个好价钱。维吾尔族老人的这番肺腑之言令人深思，这是韩文辉带领我们到塔里木绿洲采访时最先感受的改革信息。

在后来的行程中，韩文辉引领同行记者不断拓展南疆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报道。我们离开库尔勒向喀什行进，途经库车县。这里的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皮毛加工、工艺小刀、维吾尔族花帽等都是新疆著名的民族特色产品。改革开放给库车县的特色经济注入活力，手工业及工艺产品开始出现振兴局面，这些都被纳入我们新闻报道的视野。在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中，库车县农民的民主意识也得到增强，通过村民大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选举乡村干部。韩文辉带着大家来到齐曼乡和阿勒哈格乡参加村民大会，观看了阿勒哈格乡民主选举的全过程，选举会上村民们精神振奋，畅所欲言，当天晚上村里举办"麦西来甫"庆祝选举成功。南疆农村民主生活出现的新气象，丰富和深化了我们此行的新闻报道。

新疆和平解放初期，韩文辉就在喀什采访，与喀什有着不解之缘，一些著名的新闻报道如《守卫帕米尔的边防战士》《毛主席的一封来信和帕哈太克里三喜临门》等等，都是出自韩文辉及杜鹏程、赵文节之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喀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首先来到以前采访过的帕哈太克里公社，看到田野里的水稻已经抽穗灌浆，显示出丰收的征兆，从田野到村里，到处都是欢乐而忙碌的人们。韩文辉特意采访了解放初期出生的新中国第一代新人阿扎提古丽(维吾尔语意为"解放花")，这位青年妇女已经是帕哈太克里公社一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她神采飞扬地说："1949年的解放给我们维吾尔农村带来新生，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使我们展现一个新的天地，我们真正开始奔上富裕的道路了。"20世纪60年代曾在英吉沙县工作、后来调至疏附县的一位老干部，得知韩文辉又来到帕哈太克里采访的消息，就带着核桃、水果专程到采访现场看望韩文辉。作为一名长期在边疆奔波采访的记者，韩文辉通过新闻报道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变迁，也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在这次采访中，真正感受到像韩文辉、杜鹏程、赵文节等老一代新闻记者扎实细致的采访作风和热爱人民的高尚品格。

鲜活的素材来自基层

喀什地区采访报道的另一重点是阿其克。位于喀什市西南方向的岳普湖县是一片贫困的小绿洲，而阿其克(维吾尔语为“苦”的意思) 则是全县最苦的地方，风沙和盐碱使这里的人们处在极度贫穷之中，解放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人依然过着乞讨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阿其克发生了变化。得知这一信息，韩文辉决定同我们一起到那里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完成一次图文并茂的新闻报道，向中央反映边疆地区的变化。

10月的塔里木盆地秋色正浓。接近阿其克时，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虽然把它同其他绿洲隔开了，但农田里复播的玉米、开始采摘的棉花告诉人们，被盐碱和沙丘包围的阿其克绿洲遇上好年景。果不其然，车到村头就看到收购站里几座棉垛堆得很高，而交售新棉的农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在收购站的大门口排起长队。见此情景，韩文辉说：“我们对阿其克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们进入站内，看到交售新棉数着钱款的人们喜笑颜开。一位名叫艾海提·达吾提的农民，全家有11口人，劳动力不少，但在1979年以前却是个贫困户，每年都欠集体三四百元，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一年他家收入5200元，一举还清了所有债务。他说，过去全家人均不到400斤粮食，而1981年达到1249斤。从1980年起，他家添置了缝纫机和收音机等电器，还买了2头驴、4头牛、20只羊以及大小胶轮车各一辆，修建了一座存放粮食的仓库。

就在艾海提·达吾提述说时，我们的周围已经围拢了许多售棉的农民，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他们普遍反映过去出工一窝蜂，越干越没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阿其克这个苦地方带来巨变，这两

年分了口粮田和责任田，粮食多得没地方储存，牲畜多得没地方放牧，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越来越甜了。有的农民说得更形象："党中央的新政策来到阿其克只有两年工夫，我们的收入就超过以往的30年。别看现在我们吃的饭里有肉了，到巴扎(集市)上有钱花了，我们还要用更大的劲头，让阿其克发生更大的变化。"农民们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给我们的新闻报道增色不少。

我们在公社了解到的情况更加喜人，采访时当地全年的收成虽然没有最后定产，但夏粮和早播玉米、高粱、油料的收成都已超过丰收的1980年。介绍情况的公社党委书记吾寿尔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其克的变化确实很大，农民们为了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全部都用小麦交售公粮。"我们看到，阿其克棉花收购站里热闹非凡，农村集市贸易也比较繁荣，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绿洲。为了更加深入地感受这种变化，韩文辉与村民们一起赶"巴扎"。

一大早，许多穿戴一新的农民赶着羊只和牛马，有的用毛驴车拉着小麦、玉米、瓜果、蔬菜和自纺的棉纱，载着家人，汇集到阿其克乡附近的乡间集市。据乡干部讲，这是多年来很少看到的热闹景象。阿其克风沙盐碱灾害严重，土地贫瘠，过去农副产品交易活动很少，生活用品种类也少，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等日用品，都算是奢侈品。如今粮食丰收了，畜牧业发展了，又种了经济作物，农民有了钱，一度冷落的市场一年比一年繁荣，仅在1980年，当地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就购买耕牛和奶牛836头、马46匹、胶轮车450辆，此外还购买收音机198台、缝纫机144架、手表81块、毛织彩色地毯85条。当我们到供销社的一处摊位时，那里已有许多农民正在选购各色的布料、呢绒、绸缎。售货员告诉我们，1至9月份他们已经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集市最热闹的地方要算活畜市场了，许多农民在选购羊只和耕牛，为了挑选称心如意马匹，有的人骑着骏马跑来跑去，围观的人们评头论足，气氛十分热烈。一位名叫艾合买提·阿吾提的农民经

过试骑，买了两匹马。韩文辉问他为啥买两匹马？他说："两年前我连一头小毛驴都没有，现在党的政策放宽了，我们有了责任田，又有了口粮田和自留地，两年的丰收，让我们看到美好的前景，只要放开胆量勤劳生产，日子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用去年的存款，加上今年卖粮卖棉得来的钱添置一些耕畜和农具。"他既想把自家的地种好，还准备搞运输，把自养的羊只、自种的瓜果蔬菜运到岳普湖县城甚至喀什去卖。我们从农民们朴素的言谈中感受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正释放着巨大能量，而这种切身体验只有通过深入采访才能得到。韩文辉带领记者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塔里木盆地绿洲城乡带来变化的新闻报道，不仅有《从讨饭村走向富裕的阿其克》和《当代阿凡提》，还有《帕哈太克里又迎来了一个春天》和《票箱里选出来的县长》等等，我的图片报道《塔里木绿洲村落展新貌》也被报纸广泛刊登并获得好评。

放眼阿勒泰草原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作为新华社新疆分社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韩文辉要求记者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疆，面向全国，对天山南北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果进行全面深入而持久的报道。

1988年韩文辉离休之前，又带领我们几位记者到阿勒泰地区，在采访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开发的同时，还特意到哈拉通克草原，走访一位名叫焦尔巴勒斯的哈萨克族牧人。哈萨克族是逐水草而居、耻于经商的游牧民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焦尔巴勒斯改变本民族的旧有习俗，带头实行定居，并在定居点植树造林，建立苗圃，种粮种草，搞起运输，办起商店。我们来到他的苗圃，看到同他一起种树种草的牧人们正为树苗松土施肥，苗圃里既有杨树、柳树，还有苹果树，长势喜人。牧民对我们说，焦尔巴勒斯是一个有改革精

神、能带着大家共同富裕的人。大家也在赞扬他经商诚信无欺、曾将捡拾的价值8000余元货物交还失主的高尚品格。那次采访成为阿勒泰地区新闻报道中一篇富有特色的稿子,写出了改革开放给阿勒泰草原牧人的思想带来的深刻变化。

韩文辉是一位谦和的长者，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创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加入革命队伍,投身于新华社的新闻事业,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到达新疆后,他同当时新华社新疆分社负责人以及后来的闻捷、杜鹏程等人,共同创建新华社新疆分社。从那时起,他就迈开双腿走遍天山南北,为反映新疆各族人民的新生、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他不怕苦不怕累,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新闻事业。

忆王安

我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以后，遇到几位亦师亦友的好同事。他们对我采访作风的形成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产生过很大影响。王安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20世纪50年代初我步入新华社新疆分社大门到60年代初期，王安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日常生活与新闻采访活动中，他虽然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但他的思想作风、工作热情和求知欲望，对我起着表率作用，有些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一路风尘一路情

1955年春天，我第一次随王安去南疆采访，那时搭乘的是没有顶篷的卡车，乘客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塞在车厢中，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将近1500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走六七天。尽管如此，这时的交通条件比起新疆和平解放前已有天壤之别。通往南疆的公路刚刚修整过，铺着沙石，不大平坦，因此一路风尘，一路颠簸。沿途饭馆旅店极少，夜里入住的车马店全是大通铺，一个土炕往往睡着十几人。一路上我们晓行夜宿，吃苦不少。我是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记者，王安

则长年奔波于天山南北，旅途经验丰富，也很会关心人，路上吃住行等一应杂事都是他包办的。每当汽车停下休息时，他就让我下车活动僵硬麻木的四肢，一到车马店也总是先去排队登记住宿，寻找饭馆，使我很快能够喝到热茶、吃到热饭。每天只要汽车早点儿进店，他便抓紧时间到食宿站、客运公司、公路养护段了解情况，我却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用多想，认为只有喀什才是采访的目的地。不料我们一到喀什，王安就写出一篇稿子。我有点儿纳闷，心想还未正式采访，怎么就发稿了？我把稿子拿来一看，内容是反映南疆交通变化的。稿件叙述了在戈壁沙漠重重阻隔的南疆绿洲，过去人们行路不是骑毛驴，就是乘骆驼，很少见到汽车。新中国成立后，南疆才开通定期班车，沿途还建起旅客食宿站。稿件中有这样一些描述：离开鱼米之乡阿克苏，汽车沿着一条凿痕尚新的胜利渠行进，直到沙井子兵团新垦区农场，公路两旁展现一派令人振奋的生机。两年前沿途还是荒无人迹的戈壁路旁，今天却流淌着满满当当的一渠春水，渠道两岸的田野和树木泛起一片葱绿……王安还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由阿克苏到喀什两天戈壁旅程的过去和现在，说解放前骑马或骑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同王安去喀什采访所乘坐的客运班车。

驴要走七八天才能到达喀什，这400多公里是见不到水的路段，旅人常因干渴而丧命。因此，旅人往往将自己吃过的瓜皮小心地扣放在路旁，或者留下一些瓜放在路边，以便断水的旅人拾起来救急。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南疆旅人的习惯。而今天前往喀什的旅客，头一天就可入住政府在戈壁路旁修建的三岔口旅店，第二天便可到达喀什。这篇热情讴歌南疆新貌的稿子，使我体会到王安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对我后来的新闻采访报道启示良多。

走进牧民定居点

1959年夏季，我随王安去伊犁采访草原牧民开始定居的新闻。我们乘坐的敞篷班车挤满旅客，一路上尘土扑面，炎热难耐。正当旅客们昏昏欲睡的时候，车内几位维吾尔族旅伴唱起民歌，嘹亮的歌声给大家带来欢乐，因此旅途颇不寂寞。汽车停下小憩时，王安请唱歌的人复述歌词并记在本子上。汽车沿着天山北麓行进，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王安不时发出感叹，称赞天山的雄伟和壮观。他告诉我，咱们当记者的，不仅要欣赏这些景物，而且要用真心去感受，这也是一种采访的积累，对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都有帮助。王安还告诉我，乌鲁木齐至伊宁700多公里的行程，是新疆最富饶最好看的地



1955年同王安（右一）、分社翻译夏格尔（哈萨克族、右起第二人）赴伊犁地区采访途中。

带，沿途有准噶尔盆地的千里沃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区农场和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他说："过去新疆有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十八站的说法。穷八站是指东疆星星峡至乌鲁木齐一段，不穷不富十八站是指乌鲁木齐至喀什一段，而富八站就是我们所走的乌鲁木齐至伊宁这条路线。记者外出采访需要经常乘车旅行，坐车时当然看不成书，也写不成东西，但可以思考一些问题，时间一长就能积累许多学问。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有这层意思。"自那以后，我便在每次出外采访途中思考问题，并在心里描述自己接触的各种人物和景物，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到伊宁后稍作休整，我们就从伊犁河谷东行，来到天山深处的新源县，那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聚居区，从1957年开始一部分牧民走向定居，不再逐水草而游牧了。定居后的牧民不仅饲养牲畜，而且种庄稼、搞副业，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王安决定到几个牧业点亲眼看看牧民定居后的实际情况。新源县的巩乃斯草原毒蛇很多，有一种名叫"草上飞"的七寸蛇，盘卷在草丛中，常常咬死牛和马。肖尔布拉克农场曾经发现一个蛇窟，里面藏着几万条冬眠的毒蛇。附近的巩留县还组织农牧民开展打蛇运动。鉴于这种情况，当我们到达新源县一处牧民定居点时，我心里不禁有些忐忑不安，虽然穿着长筒马靴，还是怕被蛇咬，找了一根树枝，在草地上边走边打，以便把蛇吓跑。王安看到我打草惊蛇的举动，便开玩笑说："你的胆子也太小了，难道毒蛇还能把你的皮靴咬透？这样吧，我走前面，你走后面。"他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带路，我紧随其后。就在我们边走边看的时候，一条毒蛇突然蹿出，直追王安。我大喊一声："有蛇！"王安回头一看，那条毒蛇正摆着头、张着嘴向他扑来。我俩挥舞树枝一顿乱打，才把毒蛇赶跑了。那次采访，我们看了一些牧民定居点，采访了十几户牧民，报道了牧民定居后的生活变化，提出牧民定居是发展畜牧业的正确途径。稿件图文并茂，被《人民日报》等一些报纸刊登于突出位置。

胸怀坦荡长者风范

新华社新疆分社20世纪50年代的办公地点，在乌鲁木齐市文庙街附近。那时我与王安住在同一个小院里，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对门。他勤奋学习，勤奋写稿，经常熬夜。我受到感染，也想像王安那样认认真真地读一些书，但却不知从何着手，便请他给予指点。他要我先读一些历史书籍，比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等，再读一些中国和外国的文学名著，还要博览人文地理方面的书刊。当时新华社新疆分社读书风气很浓，而且有杜鹏程和闻捷等榜样在前，大家都好学上进，活得充实，同事之间的感情真挚而深厚。

后来新华社新疆分社搬到乌鲁木齐市民主西路的一座二层楼房里，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宿舍，我又同王安对门而居。他是新疆分社第一位自学英语的记者，每天清晨朗读英语雷打不动。60年代新疆分社生活艰苦，王安则豁达开朗，经常组织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苦中作乐，活跃气氛。每星期编前会之前，他也总要说几句幽默的俏皮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在报道思想上，他认为既要抓住中心，紧跟形势，又要立足新疆，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搞出有深度、有特色的新闻报道。无论是新闻消息、新闻通讯还是情况反映，都要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当时我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有摆布痕迹，文字说明也有夸大之词。王安告诫我："当记者首先要做一个老实人，写出的稿子、拍出的照片要真实可信，真实是记者的生命，是新华社的信誉所在。"有一篇反映牧民定居后草原出现新村镇的稿件，记者为了追求完美，把远处山巅的云杉"移植"到村边的山头，写道"透过墨绿的松塔便看到一片定居的新村"。对于这种不确切、不恰当的描写，王安认为新闻报道不仅要求事实准确，即使细微的描写也不能用文学的夸张手法。大家在业务会上讨论一番之后，也都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十分注重行文的严谨。

王安待人坦诚，对我更是处处关照。我结婚的时候，他写了贺喜的对联，还送了小台灯，说："灯盏虽小，却能照亮心田，给人以智慧。"

王安是解放军进疆部队的随军记者，1950年调入新华社新疆分社，60年代初调至新华社陕西分社，曾在天山南北度过十多个酷暑寒冬。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业绩，在新疆分社同事当中是有口皆碑的。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新华社记者，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在王安的追悼会上，许多昔日的同事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大家怀念他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王安对我的关怀和爱护，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良师益友茹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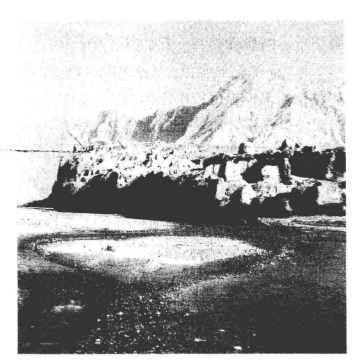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我刚刚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并在当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见习的时候，就知道西安的《西北画报》有一位摄影记者茹遂初，他拍摄的新闻照片画面简洁、生动真实、感染力强，在同行之中影响很大。70年代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他拍摄的《黄河源头行》《万里长江》等系列照片，更有一种想要结识这位摄影大师的愿望。

1979年，我终于在龟兹故地库车县见到茹遂初，他与我们同时进行丝绸之路采访报道，在拍摄一系列古代文化遗址时几乎形影不离。茹遂初直率而宽厚的为人，早把我头脑中"同行是冤家"的旧习扫除殆尽。为了搞好丝绸之路的报道，我与茹遂初相互启迪，真心诚意地求教于他。

从克孜尔千佛洞到苏巴什古城，从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到森姆赛木，古代遗址石窟壁画构成的艺术画廊令人迷醉。我们常常站在这些遗址前，想象它们千年以前的辉煌景象。茹遂初娴熟的摄影技巧和真诚无私的帮助，使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他是带着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采访丝绸之路的，我们虽然也有自己的证明，但往往受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阻挠。每当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茹

遂初为我们打开局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当地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的热情帮助。

在库车古城遗址、石窟壁画、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拍照中，我受到茹遂初的感染是多方面的。佛教壁画大多都在光线很暗的洞窟中，拍摄时使用闪光灯不能准确预测光线效果，茹遂初便把他和我带的反光板拼合起来，巧妙利用，先将洞外的光束反射到洞内，再将洞内的光束反射到壁画之上，便可立即看出光线效果，而且能够准确把握感光度。在库木吐拉千佛洞拍摄菩萨像时，洞中十分狭窄，站着无法拍全，我们便仰身躺在地上，成功拍到窟顶壁画的全貌。也在库木吐拉千佛洞，茹遂初像一位行家，把哪儿是僧房，哪儿是藏经洞分辨得很清楚，在一个洞窟套着另一个洞窟的崖壁上，一些细枝末节往往被我所忽略，而他都能通过自己的慧眼发现有拍摄价值的东西。在一个漆黑的洞窟中，由于墙壁已被牧羊人熏黑，原有的一行古龟兹人题记无法看到，即使看到也无法辨认，而且难以拍照，但茹遂初通过反光板折射一束亮光，字迹马上突显出来。我们来到建于公元3至5世纪的昭怙厘寺庙遗址和苏巴什古城时，灰色砾石和黄土墙垣把遗址衬托得比较显眼，但茹遂初没有立即拍照，经过深思熟


库车县(古龟兹)苏巴什公元 3-5 世纪所建寺庙群遗址。

虑之后，次日天还没亮便叫我们起床，一同驱车赶往苏巴什寺庙及古城遗址，在熹微的晨光中带着我们选好拍摄角度，当旭日刚把远山和遗址照亮的时候，我们架起相机把山峦之下熠熠生辉的遗址纳入镜头，照片画面十分完美。此后，利用早晚光线增强景物色彩的热烈，增强景物的空间感，从而做到画面简洁，便成为我经常效仿的摄影技巧。同茹遂初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为了把握好各种光线的特殊效果，常常起早贪黑，对着多种景物，寻求光色描绘的最佳境界。在森姆赛木千佛洞的山峦之中，茹遂初肩扛三角架，脸面晒得黑红，两鬓银发飘飘。他从青藏高原的黄河源头到西域大地的丝路古道，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我对他产生了由衷的爱慕和敬重之情。

作为一名执著于摄影艺术的人，茹遂初在丝绸之路的采访中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他在图片表现中不断追求新的境界，把事物表现得意趣横生，视野十分开阔。在克孜尔千佛洞的采访拍照中，他每天爬悬梯、观洞窟，很是劳累，即使到了傍晚，他也依然盯着千佛洞周围的一景一物。南疆的10月秋风阵阵，胡杨金黄。流经克孜尔千佛洞脚下的木扎尔特河畔，几棵稀疏胡杨树每到傍晚就放射出明亮的金辉。茹遂初在那枯寂、单调却又迸发生命活力的胡杨树上，似乎看到了什么，毅然扛起三角架向河边走去。后来，我在《人民画报》刊登的丝绸之路组稿中，并在1980年的挂历上，看到茹遂初拍摄的胡杨照片，画面突显荒山峡谷的金色胡杨以及木扎尔特河倒映的树影。这几幅拍摄作品再现了丝绸之路特有的风光，也透露出塔里木盆地的生机与活力。

1984年秋，我在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库尔勒绿洲又遇到茹遂初。那时，他刚刚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石油物探队采访回来，烈日和沙尘给他的脸庞镀上厚重的黑红色，卷曲的长发飞扬着神采。他笑着说："咱们又见面了，这是在塔里木的第二次相逢吧？"从他厚重的嗓音中，我感受到真诚和快慰。得知我也在采访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开发，当晚他便告诉我，第二天要到塔里木河畔正在作业的另

一支石油物探队去，邀我结伴而行。我们从库尔勒起程，先是沿着孔雀河，继而又沿着塔里木河下游的一段公路行走约130公里，看到塔里木河对岸地震勘探车卷起的尘埃和一排沙漠营房。我们乘坐原木凿成的维吾尔人称为“卡盆”的槽形小船渡过塔里木河。那一天我们采访了中美石油物探人员作业的情景和我国年轻一代地质工作者采用高新技术寻找石油资源的事迹。在人物摄影的表现上，茹遂初抓取人物一举一动和音容笑貌的典型瞬间，从而把人物拍摄得生动鲜活的技巧，使我受益匪浅。

在回程中，我们的汽车沿着连绵起伏的沙山行驶。时值10月金秋，塔里木盆地的荒漠植物大多已经枯黄凋零，借着风势把它们的种子撒向遥远的四野，唯有胡杨依然金黄，红柳依然火红，展现着它们与干旱、盐碱、风沙抗争的顽强精神，构成戈壁瀚海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茹遂初让司机慢速行驶，盯着窗外缓缓滑过的景物，当发现一



茹遂初和摄影同行在塔里木河搭乘渡船采访的情景。

处理想的拍摄地点时便让停车，随后带着我们爬上路旁的沙山。夕阳的斜晖，洒在绵长的沙丘波纹上。他在这诗情画意般的景色中，寻找理想的拍摄角度。那一棵棵生长在干旱风沙中的胡杨，竟能在高大的沙山上存活，如何把这种生存的奇迹纳入镜头，拍摄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他在思索、在寻觅。沙山顶上有一棵沐浴着夕阳余晖的胡杨，秋风摆动着它的身姿，金色的叶片鸣奏着秋日的欢歌，沙山就像大海中的巨浪，把胡杨高高地举向蓝天，又像顶在自己头上的华冠，这便成为茹遂初捕捉摄取的一首小诗，一幅色彩艳丽的风情画。在流沙漫漫的坡面上，几棵小小的胡杨顶出沙面，经受春日的风暴和夏日的酷暑，稚嫩的枝干这时闪动着金色的叶片，幼小的生命将以坚强的身躯迎接冬日的严寒，向秋风诉说着必能成才的夙愿。沙山上下，胡杨树间，到处都是茹遂初的脚印，直到暮色苍茫，他才拍得尽兴而归。作为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我从茹遂初的拍摄状态中汲取了养分。

自那以后，我每到北京总要看望茹遂初，翻阅那些注满茹遂初心血的画册和他收藏的许多摄影作品。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联欢会上。那时他的鬓发已经银白，留着长长的胡须，俨然一位学者，人虽老了但风采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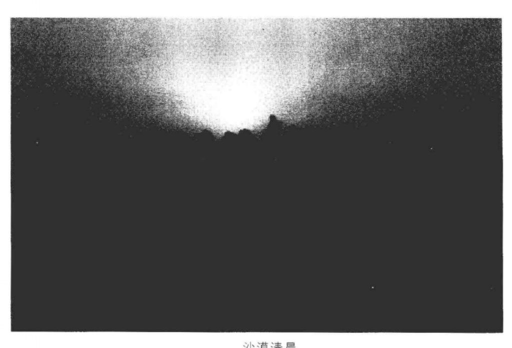
此后我们再没机会见面，但茹遂初来过几封信，说他正在编辑一本反映中国地理风貌的大型画册，并向我约稿。从来信中看，他年事虽高却一直没有闲着，除了编辑新的画册，还积极参加摄影界的活动。茹遂初很重感情，每年元旦前夕都会给我寄来贺岁的明信片，令我感怀颇深。

考古随笔



漫漫沙海寻古迹

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故道留有许多遗址，在盆地北缘，烽燧、驿站、古城、寺庙的遗迹历经千年，虽已破败损毁，但尚可寻找；而在盆地南端，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移，一些遗址已被流沙掩埋，有的已经远离绿洲，呈似有似无之状，既有确实存在的古代遗迹，也有



沙漠清晨

捕风捉影的虚幻传说，真假难辨，尚待考证。我既实地探访过一些古代遗址，也听到过一些子虚乌有的神话，还遇到过一些探奇寻宝的痴人。

最先听到的沙漠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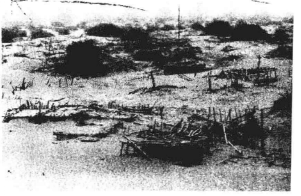
早在20世纪60年代，听说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因流沙移动而暴露出一座古城，成为人们传扬的一大发现。有人描述，这座古城墙垣完好，城区屋架历历在目，寺庙佛塔犹存，庙中佛像依旧，壁画鲜明，残存的屋角放着梵文佛经，乃至包括汉文等多种文字的木简木牍，还有林木果园的轮廓。这些信息引起我对探寻沙漠遗址的兴趣，为此我阅读了外国探险家20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南端至罗布泊一带考察和他们发掘文物、剥离、



巡行在塔克拉玛干南缘考古队，乘着第一峰骆驼的是新疆著名考古学家李遇春。



阿克斯匹尔(白山羊)古城遗址的城门经因一千余年的风沙至今完好。据说他建于唐代公元6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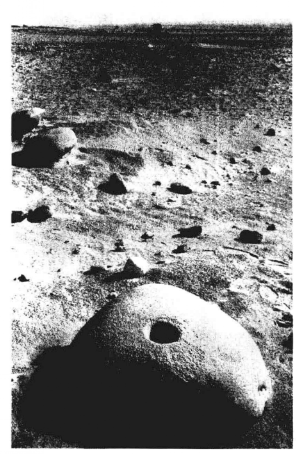


安迪尔河下游阿克斯匹尔(白山羊)古城。

壁画的著述。实地踏访这些遗址，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1979年，我在执行丝绸之路的采访报道任务中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一夙愿。

踏访遗址所引发的想象

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端的第一站，是和田地区玉龙喀什河西岸的买力克尕瓦提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是不是于阗故国的都城，早在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就发生过争论，因此它颇有名气。从地表上看，那是一处布满褐色砾石的戈壁滩，偶尔可见古建筑石筑礎、打碎的磨盘、打击石器，再就是已毁寺庙遗址的堆积、烧陶窑址的遗痕和像是墙垣的土墩。因为没有多少遗物，后来几乎被人们忘却。20世纪50年代兴修水利，设计一条干渠要从遗址中穿过，在挖掘中发现一只装





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陶制头像。

买力克尕瓦提古城遗址中的石柱礎及烧陶窑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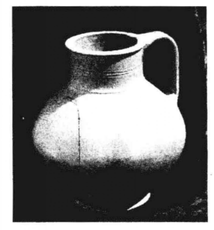
满西汉(公元1世纪前后)五铢钱的巨大陶缸,同时在其近旁发现一座佛寺遗址,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新闻。我们去时仍能看到,在出土陶缸的土堆上残存的古钱币和佛身塑像的碎片,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痕迹。和田地区文管所博物馆展厅保存的大量汉代钱币、陶缸、陶罐和佛像,印证了买力克尕瓦提古城的存在和兴盛。这座古城的神秘色彩从此便笼罩在我的心头,成为后来我不断追寻沙漠古城的基点,从而便有了第二座、第三座以至更多古城遗址的探险考察。

约特干是我探访的第二个遗址，它位于和田市西南的巴格其乡，那里曾经出土过多种古代金饰和陶制工艺品,20世纪外国探险家、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当地百姓对其进行过多次发掘,英国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也多有记述。他在那里曾发掘采集到金鸭、金饰件和造型奇特、惟妙惟肖的被称为"陶注"的陶制头像。我们到达这处古城遗址时,地表已无古人遗物可寻,四周是一道道土坎,低洼处是一片稻田,农田周边有几道泉水流出,据说一些精美的陶件和金器就隐藏在溪流之中。面对四周的陡壁和长势良好的稻田,我想象不出千年以前这里有寺庙,有城池,或者兼而有之,只是从一些考古文章展示的出土文物中,才能看出它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对我来说,它应该是丝绸之路上充满谜团的重要遗址吧!后来,当我环绕塔里木盆地一周结束丝绸之路南北两线的采访之后,才在新疆博物馆看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烧制精美的两具当地人造像的"陶注"——中间呈管状上下贯通的器物。这些1000多年前的文物,增强了我探寻沙漠古城的兴趣。

寻找丹丹乌力克古城

英国人斯坦因在其著述中所展示的丹丹乌力克佛塔、佛寺、佛像、壁画中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半裸仕女及婴儿供养人图像,以及

养蚕公主、老鼠显圣历史故事的木板画，使我对丝绸之路南道这些艺术珍品无限向往。我深情地追寻这些遗迹，来到丹丹乌力克。古城在和田地区策勒县的沙漠深处，但其具体地点因寺庙毁坏，文物被盗掘，多年来无法找到。可巧的是，策勒县委办公室主任是一位考古爱好者，曾借考察全县资源和生态环境之机，到过人们传说有古代寺庙及文物散布的沙漠深处老达玛沟一带，寻找丹丹乌力克遗址。他们所见的遗址已经残破不堪，无法确定，只是采集到许多文物。我们到时正值国庆30周年，策勒县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那次在沙漠里采集的文物进行展览，展厅摆放着单耳陶罐和双耳陶罐，有粗的，有细的，有绳纹，有彩绘，各式各样；还有奇巧的玉石灯台，它们造型各异，古朴而又精致。自然，西



策勒县出土的公元5—6世纪的单耳红陶罐。



1980年策勒县牧民在沙漠处采集到的佛像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勒县牧民在沙漠中捡拾到的铜佛。



文物考古专家学者在于田县沙漠中的一座佛寺遗址中考察。

汉五铢钱、唐朝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等钱币不必细说，那些写有梵文、吐火罗文、佉卢文、汉文的木牍、信函和绘有人物的木板画，烧制精巧的连体红陶人物造型都印证了它们的古老，隐含着出土之地的神秘。尤其是几尊佛头残段，似乎让我们看到斯坦因等盗窃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劣迹。其中有座形似二人合一的造像，令我惊叹塔里木盆地有着多么深厚的文化内涵啊，并隐藏着无数的中华民族历史瑰宝。策勒是沙漠古城遗址传说最多的县份，也是维吾尔族农牧民在沙漠中捡拾文物的地方，这与策勒县境内埋藏着众多古代遗址不无关系。在策勒县采访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位牧民到沙漠深处寻找丢失的骆驼，偶然发现在起伏的沙山中有一座露出地表的寺庙。在茫茫沙海之中出现房屋和庙宇，过去他也曾听说过，也知道有人看到摆放在佛寺神龛上的金银器物和宝石之类，但都无法拿到，有的人还为此丧失性命。不料这样的古城竟让他也遇到了，面对紧闭的庙门，他胆怯地走到跟前。当他推开门扉之时，一下子就惊呆了，布满尘埃的佛龛，涂有色彩的佛像阴森可怕，立即打消寻找宝物的念

头，赶快离开此地。回到村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给乡民，消息很快传到策勒县城，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时隔4年，1983年12月我随同新疆博物馆进行文化遗址及文物普查工作，考古队长柳晋文对我讲，在策勒县和于田县交界的沙漠深处发现一座佛寺遗址，佛头露出沙滩地面。后来新疆博物馆沙比提馆长和柳晋文知道我惦记着那处名叫卡孜纳克佛寺的发掘情况，便派车把我送到那里。此时沙丘已被清除，方形的巨大寺庙只剩下近一米高的残壁，佛殿分为前后两室，前殿佛像的莲花基座尚存，墙面所绘图像只剩下佛脚，为单线描绘，线条简洁而流畅，清理时发现壁画残片和破损的佛头。据说1936年一位牧人在其附近发现金铂，消息传出，引起外国人和当地居民的洗劫，后来便被流沙湮没，现在的残迹便是那时所为。我站在高高的沙山之上，望着卡孜纳克寺庙遗址浮想联翩，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两千多年来湮没了多少绿洲、古城、佛寺、村落，人们无从知晓，但那些流传至今的亦真亦假的传说，反映出塔里木盆地戈壁沙海确实埋藏着许多古代文明。

圆形城堡的中秋之夜

离开策勒，我在于田县度过国庆节，踏访了几处被巨大沙包半掩的古代遗址，看了当地出土的几尊佛像，便匆匆赶到民丰县。我随同新疆博物馆李遇春等人，到安迪尔河下游的沙漠中去，那里有一座被称为阿克斯皮尔的古城遗址。恰巧，我的同学田维新是安迪尔牧场党委书记，他帮我们从牙通古斯的荒漠牧场租来8峰骆驼。为了方便拍照，我乘骑了驼队中的第二峰骆驼。安迪尔牧场到沙漠古城约有25公里，到达时已近傍晚。阿克斯皮尔古城是一座完全被沙漠包围的圆形城堡。近年来经过几次沙暴才又全部显露出来。这座城堡只有一个门洞，堆积的流沙几乎遮挡着半闭半开的城门，很长一段墙垣已被流沙覆盖，还有燃烧的痕迹，城内街道清晰可辨，房屋墙

面虽被风沙剥蚀，但屋架却依然完好，附近几座巨大的沙丘表明它曾被沙漠风暴吞噬过。我为在沙海深处能够看到历经千年还比较完好的古城而兴奋，当晚大家便在城边的沙滩上住了下来，没有帐篷，背铺黄沙，仰望星空，在思古之幽情中沉沉入睡。

第二天醒来时，大家脸上敷满沙尘，用干毛巾擦一下算是洗漱，就着所带饮水啃了几口干粮之后，在李遇春的指点下开始清理一所沙埋的居室，先从门道开挖，流水般的细沙使清理工作十分困难，每挖一锹总是被流沙填满。大家经过多半天的努力，才清理出一间屋面，对着屋门是约4米长、3米宽的土炕，炕边有灶台，除了陶片别无他物。因为没有雇请工人，无法进一步探查，大家只好仔细察看城堡的建筑布局，最大房屋位于城北，坐北朝南，耸立的木架形似一间厅堂，可能是当时的官宅。城中除了个别居所和一所形似寺庙的屋架土塔，其他建筑大都埋于沙下，无法区分考证。除了建筑骨架，也有一些干枯的树木分布其间，采集的文物有一顶尖顶毡帽和一只铜耳环，再就是大量陶片。



沙海中的城堡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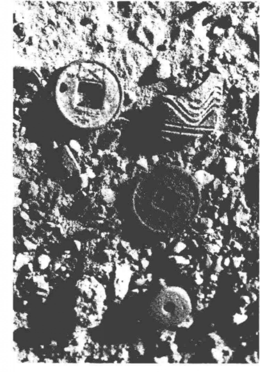
10月正是塔里木盆地的深秋时节，阿克斯皮尔圆形城堡周围沙山耸立，一些顽强生长的胡杨、红柳分布于沙海之中，金黄的秋叶，紫红的花穗，把荒漠点缀得颇有生机。沙漠白天气温仍然很高，入夜以后却寒气袭人，新疆博物馆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阿合买提·热西提燃起一堆篝火。我望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和落日余晖中的驼影，拍下一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图景。到达阿克斯皮尔的第二天是中秋节，当天下午田维新同几位牧羊人给我们用毛驴驮来甜瓜，送来一些油馕权当月饼。当明月高悬天际，熊熊篝火映红每个人的脸庞，在沙海深处的古城之中，大家吃着油馕，就着甜瓜，望着明月，其乐融融。这样的情景勾起李遇春老先生对考古生涯的回忆，他给我们讲述丝绸之路开通的故事，以及阿克斯皮尔古城的来历。

李遇春说，公元前140多年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以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便日渐频繁起来，商贾、使者、官吏、传教士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香料、珠宝、纸张、铸铁及瓜果种子西去东来十分繁忙，特别是运往波斯、罗马的丝绸越往西去价钱越高，到了罗马几乎是一两黄金一两丝绸，于是，沿途便出现强盗，丝绸和财宝被抢，商人被杀，很不安全。有人便告到汉武帝那里，开始汉武帝没有理会，把精力放在抵御匈奴的侵扰。当时打仗主要靠步兵和战车，为了战胜匈奴就要买马，有的商人告诉汉武帝，大宛(中亚费尔干纳)有好马，汉武帝就让工匠做了一匹金马让使者带往大宛，作为见面礼商讨买马之事。不料进入西域的使者被强盗杀死，金马被劫，这样汉武帝就派兵征伐以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自那以后，西汉政府便设置了西域使者，派兵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引进汗血马、天马等优良马种，防止匈奴的南侵。第一位西域使者是郑吉，接着将西域使者改为西域都护，设立了都护府，并将长城自玉门关以西，以烽燧墩台、关所驿站的形制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至今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依然有着它们的遗址，高耸的烽火台形似路标，相隔一定的距离突立于沙漠戈壁或绿洲边缘。月光下，篝火旁，李遇春把我们带入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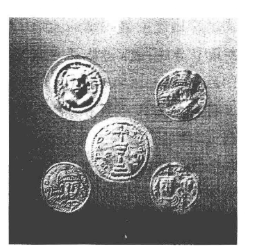
的往昔岁月。我望着月光下的古城遗址凝神静思,想象着城堡的来历,李遇春又把我们带入唐朝经营丝绸之路的盛况。他说,到了隋唐时期,外国使者来往日多,龟兹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内地,唐朝先后在龟兹(库车)、北庭(吉木萨尔)设置都护府,加强对关所驿站的管理。这座阿克斯皮尔古城,我在20世纪60年代探访过,据考证为唐朝所建屯田驻军的播仙镇、坎城镇、兰城镇之一,似为保护丝绸之路南道的关所。盛唐时期,西域建制加强,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听着李遇春的讲述,回想两天来对这座古城的认识,真是觉得不虚此行。

后来,多次进入沙漠考察过古城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阿合买提·热西提所讲的故事,更加使我对李遇春和新疆各族考古工作者的深感敬佩。那是1959年深秋,他同李遇春到尼雅遗址发生的故事。尼雅遗址1901年最先被英国人斯坦因发掘,它曾是汉唐时期的地方官府所在。当时出土并被其掠夺的大量汉文、佉卢文、梵文的羊皮书信函、木牍以及大量木雕、彩色毡毯等文物,轰动了考古界和史学界。对于这样一处遗址,作为中国考古工作者的李遇春和阿合买提·热西提,更应该去考察研究,在考古事业中为祖国作出贡献。阿合买提·热西提说,他们到达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沙漠时,红柳仍然显现着火红,而胡杨却是一片金黄,这是沙漠深秋季节的最后一息热色和暖意。此时沙漠的季风已经过去,沙暴也不会光临,气候早晚虽然透着寒意,每到中午阳光仍然是灼热的,是适宜于进行考古活动的季节。李遇春带着阿合买提·热西提和骆驼队从民丰县城出发,经过4天跋涉终于到达尼雅遗址。尼雅是丝路之路上的一座重要城郭。这座遗址曾被国外的探险家多次发掘,盗走了多种文字的木简木牍,后来我国学者采集到的一枚“司禾府印”证明早在公元前尼雅已有官府管辖。李遇春等人到这里时,看到的是露出沙面的土墙屋架、被挖掘过的土坑以及干枯的树木和有着果园痕迹的园林。李遇春决定把大本营设在尼雅遗址附近。经过查看之后,他决定大家分头到四

周的沙山之中寻找别的遗址。阿合买提·热西提与一名向导带着干粮和饮水向尼雅遗址西北方向走去，一路上除了流沙就是长着红柳的巨大沙包，走在里面好像进入迷魂阵，经过一天一夜的寻找，没有发现任何古代遗迹和遗物，第二天只好返回营地，但回程中迷失方向，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沙包中转悠。当阿合买提·热西提与向导走到一个巨大沙包时，疲累、焦急和干渴使他们不得不坐下休息。就在此时，阿合买提·热西提在沙包底部看到形似木棺的一角，用手扒开流沙，棺下有木腿支撑。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发现，可是怎么同营地取得联系呢？干脆守在原地，入夜之后在沙山顶端点起篝火，等待营地人员前来救援。天已尽黑，正当阿合买提·热西提与向导点燃篝火之时，却看到李遇春他们沙包顶端的篝火，心想这下有救了。阿合买提·热西提与向导用红柳枝干在木棺处作了标记，寻着火光走去，路上又不断地作标记直至营地。看到迷失一天一夜的阿合买提·热西提与向导回来了，李遇春那种兴奋无法形容。当得知他们在迷途中的考古发现时，李遇春更是激动万分，连声说："这次我们没有白来，没有白来！"当时大家都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次日天一亮，大家寻着标记赶到那里清除沙丘，揭开棺盖，看到的是身着汉锦的夫妻合葬棺，所有的人惊喜得几乎发狂。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的沙漠深处，这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如果说英国人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梵文、汉文、佉卢文的木简木牍、羊皮文书意义重大，那么发现有着古人形体又身着织锦的合葬棺，则是中国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经过仔细辨认，织锦上有着"延年益寿""宜子孙"等汉文字样，更加印证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此后，他们把营地移至棺木发现的地方，并考虑如何完好无损地把这千年遗物运出沙漠。如此厚重而古旧的棺木，不可能用骆驼运输，那样定会在沙山起伏、高低不平的乡间小道上被颠散，而且历经千年的棺木也无法捆绑。后来还是李遇春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他派人到几十公里外绿洲边缘的牧人那里借来4头耕牛，用带来的树干做成一个框状的



沙漠遗址中在戈壁滩头所呈现的古钱币和纺轮陶残片。



古罗马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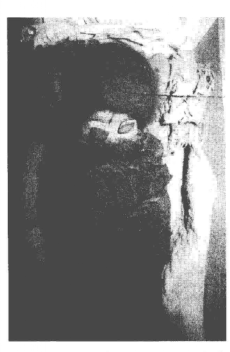
新疆古代遗址中出土的波斯银币。

支架，把棺木稳稳地固定在框架之中，用两头牛轮换扛着，经过两天两夜才走出沙漠。

在圆形城堡的月光下、篝火旁听完李遇春和阿合买提·热西提的讲述，我想，新疆的考古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李遇春和阿合买提·热西提等专家学者功不可没。特别是李遇春，他不仅连年深入环境险恶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瑰宝，而且多次登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曾在乌恰县克孜勒韦一条古道旁的岩缝中发现多枚古罗马金币，这些都被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而载入史册。

且末绿洲的千年干尸

在环绕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南道的采访中，我们结束了安迪尔沙漠遗址阿克斯皮尔的探访。古城边、篝火旁的中秋月夜，李遇春和阿合买提·热西提的故事以及他们考古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此后我跟随李遇春一行从安迪尔牧场到且末县，一路上沙海茫茫，干枯倒地的胡杨树旁长满沙生植物，由此联想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描绘的景象，真是感慨万千。在这漫漫古道上，还有几处古城遗址需要探访，而第一站便是且末。这是一处被沙漠包围的古老绿洲，历史上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和记述。据李遇春讲，除了丝绸之路的遗迹，这里还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遗存。到达且末的第二天，他带着我们到县城西南戈壁台地察看一处古墓群，几处墓穴已被盗掘，一些早期的粗砂陶片、毛毡和皮革碎片散布于墓穴周围，但是仅凭这些无法判断它们的年代，更无从知晓古墓主人的人种和历史。我带着种种悬念离开且末。两年之后，我听到几位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发现并出土有着特殊葬俗古墓的消息，便到新疆博物馆去看了三具出土的干尸，采访了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据他们介绍，经碳十四测定，这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古尸，墓葬属竖穴丛葬形制，所埋尸体有男有女，脸部都用颜料化妆，其中婴儿尸体全身用较细的毛毡裹着，头戴蓝色绒帽，尤其特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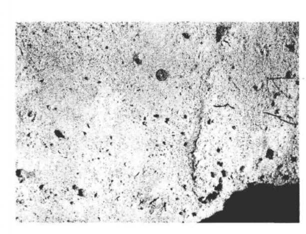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且末沙漠绿洲 3000 多年古墓葬中出土的孩童干尸。

是，眼眶分别盖着两块小石片。所有死者没有棺椁，墓室底部为树枝编的篱笆，顶部为苇草、马皮和黄土封盖。出土的还有多种花纹的毛织品、陶罐、骨器等。在且末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古墓葬的发掘，通过博物馆了解和目睹那里出土的干尸，心中的悬念才得以释然。

消失在红柳沙包中的古城

若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一个小绿洲，由于历史的沿革，其名称有楼兰、伊循、鄯善等。若羌有着奇特而著名的古代遗址，在丝绸之路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我们需要探访的重点地区。由且末县城出发，在昆仑山前起伏不尽的沙海中东行约100公里，就到一片名叫“瓦石峡”的小绿洲。瓦石峡附近有一片顶部长着红柳的巨大沙包群，众多的沙包之中隐藏着一座古城，已被流沙湮没。据初步考证，公元6世纪这座古城就已存在。从地表上看，除了巨大沙包上的丛丛红柳，被洪水冲刷的漫滩沟坎，几乎看不到城郭和房屋的遗迹，完全是沙漠边缘的一种典型的荒漠景观。如果没有考古部门竖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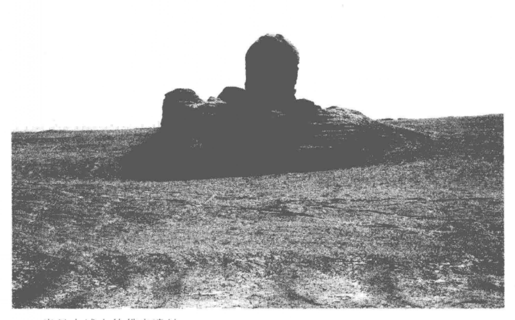


珠宝金饰件之一。1979年10月在若羌瓦什峡古城遗址古墓葬中冲刷出散布于地表的唐开元通宝及黄金珠宝饰件现场。



珠宝金饰件之二。1979年10月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若羌县瓦什峡沙漠古城中发现并被集拢的包括有孔雀石、玛瑙石、小珍珠及黄金饰件。

标志，你根本看不出它是一座古城，即便是在沙丘底部漫滩边缘看到细碎的陶片和犹如磨砂的玻璃碎片，还一下子难以琢磨它们的出处和来历。对于我们刚刚踏入的人们来讲，内心则画着大大的问号，只有李遇春明白此处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古城。我们正带着疑惑察看之际，新疆博物馆阿合买提·热西提“这是什么？”的一声惊呼，马上印证了李遇春的看法。随着呼叫声我立即凑到近前，看到阿合买提·热西提脚下有一滩色点，旁边还有一枚古钱，我不敢扰乱现场，立即把它拍摄下来，之后在仔细的辨认中才发现它是散乱在沙滩上的饰件。当阿合买提·热西提小心把它捡拾起来的时候，我才看清那枚古钱为“开元通宝”，将色点收拢之后，里面有大小不一的玛瑙，有蓝色的孔雀石，还有一枚黄金花饰，后来经过拼接，恰恰是一串完整的项链。据李遇春讲，它因为出自城区的边缘，可能是从墓葬中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大家在进一步的察看中，果然就在附近发现几具骸骨。为了看个究竟，我们在古城中走了多半天，看到一处房屋和果园的遗



米兰古城中的佛寺遗址。

址，也发现一处窑址和糊满绿渣的窑坑。除此之外，不是流沙就是沙丘，从表面上很难看出它是历经千余年的一座古城，殊不知就在流沙和红柳沙丘的下面，隐藏着更多的遗址和古人遗物。我们即将离开古城遗址时，流沙中一个绿色的色点引起我的注意，捡起来吹去浮沙竟是一枚“乾元重宝”，而在近旁义务看守古城的维吾尔族农民，则捡拾到一颗血红透亮的饰珠。在瓦石峡古城，我们只是看到它的表层，通过采集到的陶片、玻璃器皿残段、珠宝饰件、唐代钱币窥见它历史跨度之一斑。这座古城更深的内涵还有待考古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进一步去发掘揭示。

在瓦石峡古城考察之后，我们到达若羌县城，准备从那里去丝绸之路继续探访。发源于阿尔金山的若羌河、瓦石峡河、米兰河三条沙漠河流，浇灌出三片绿洲。若羌县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5000多户居民从事农牧业生产的荒漠绿洲，县城以北约50公里的罗布庄附近，就是塔里木河最后流注的台特马湖。若羌绿洲虽小，但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段，米兰就有一处最能说明其历史地位的古城遗址。

米兰古城位于若羌县城东北70公里的戈壁流沙地带，其西面约5公里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六团场，东南靠近阿尔金山，是从敦煌进入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由此向南，便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丝绸之路南道经且末、民丰、于田、策勒、和田、莎车，沿叶尔羌河登上帕米尔高原，过葱岭，去南亚，到西亚；而由其西北沿塔里木河、孔雀河的绿色走廊到达丝绸之路老北道，经焉耆、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登上帕米尔高原，南出印度，西去波斯、罗马。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新疆通向敦煌、青海的重要通道。经过历史考证，米兰古城也是离其不远的楼兰古城在公元3世纪左右由于自然环境的日渐恶化和频频战火的洗劫引发当地居民迁移的一个重要地区，那里留有公元八九世纪吐蕃人所建的城堡遗址，在其周边分布有更早期的多座残存寺庙。1906年底1907年初，英国人斯坦因在其中的佛寺剥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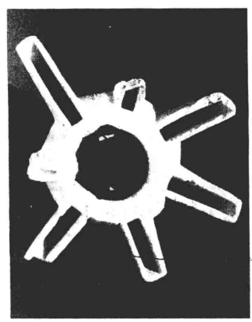
过犍陀罗风格的有翼天使、持有宝瓶花环的女郎以及王子施舍白象等许多精美、奇巧的壁画、木雕等文物。近年来有消息说，经过新疆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那里又有新的考古发现，在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寺庙佛塔中再次发现有翼天使壁画。1979年10月我们到达米兰古城时，吐蕃城堡的台基、墙垣、营盘房屋虽然历经战火风沙的破坏，古城堡的格局依然能看出个大概。据考古工作者的记述，城堡中出土过大量汉文、藏文木简，还出土过一个名叫坎曼尔的人的手抄诗稿。我们在废墟上也搜寻过，但已一无所获，唯一采集到是在别人发掘的土堆中拾的到一枚贝币，足以说明米兰古城年代之久远。我们还察看了一座佛塔，塔基宽阔，塔身呈椭圆形，立柱像是佛寺的中心柱，可能是英国人斯坦因剥离壁画的所在。我也曾仔细察看佛塔立柱周边，但已无壁画可寻。距土塔周边约百余米的地方，也有几座佛寺遗址，而其以北约5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遗址，虽已遭到破坏，但从残存的廊柱上看，似乎有着古希腊建筑的遗痕。纵观全景并查阅有关考古文献，米兰古城出土壁画的人物图像和画风，证明它是塔里木盆地一处突显着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遗址。如此众多的遗址，如此广大的范围，表明它在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许多探险者来到米兰古城，从而造成许多历史文物流失国外。我国的专家学者在米兰古城也有重大发现，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教授在对楼兰考察的著述中，也有对米兰古城的考证。伫立于阿尔金山下茫茫戈壁瀚海中的米兰遗址，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经历战火的洗礼和风沙的剥蚀，随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古老居民都已迁徙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其他绿洲，折射出千余年来塔里木盆地东部人类存在、发展、迁徙的一段历史。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曾拜访了且末县一位祖辈曾在楼兰生活的老人，也在若羌、铁干里克、尉犁荒漠牧场中访问过从罗布泊、米兰迁徙到这些地区的罗布人后裔，从其依然善于渔猎、畜牧的生产活动中看到他们祖先的遗痕，从聆听古老

歌谣中感受到他们祖先勤劳质朴和历尽艰难流徙于荒漠绿洲的陈述，从其舞蹈中那粗犷的舞姿、围拢篝火高唱的旋律，看到罗布人狩猎、欢聚的生活图景。

探访米兰古城之后，李遇春有事返回乌鲁木齐，便同我们分手了。接下来的行程中，我们将去库车、拜城采访那里的石窟壁画和苏巴什的寺庙遗址，以及西域三十六国之中的龟兹古城和出土过大量犍陀罗艺术造像的焉耆明屋寺庙遗址、壁画遗存，而后便可结束环绕塔里木盆地登高原、过绿洲、进沙漠的丝绸之路采访。我们在这一环形路线上，实地探访的古代遗址有20余处，据考古工作者发现和史书记载的遗迹数量相差尚远，而实际上因战火、流沙和人为破坏而消失的古代遗址还有许多。我们是在或明或暗的探索和追寻中经历着奇遇般的发现，听到过似有似无的传说，也领略过当今人们的破坏。

丝绸之路探访引发的忧虑

记得1983年我随新疆博物馆文物普查队在巴楚县考察时，看到的一组烽燧墩台雄伟和悠远、沙海中一座座高耸的土塔，在丝绸之路沿线犹如路标引领着人们走向塔里木绿洲城镇，在它们的周围我也看到过散布的各色陶片及烧陶窑址，也在茫茫沙海几乎看不出其他遗迹的地方发现过被焚烧之后又被流沙湮没的佛寺。那是在巴楚县沙漠深处考察一组名叫“琼梯木”的汉代烽火台和唐代驿站时，已经接近测量、试掘文物采集的尾声，我同新疆博物馆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在其周边进行最后的查看，沙山之间地面上一片殷红的焦土引起大家的注意，稍作挖掘竟是一处被焚烧的佛寺遗址。这处被忽略的地下遗址，出土了烧焦的木雕廊柱、被打碎的泥塑佛身的缨络雕饰等。在整个烽燧驿站的考察中，有许多看去不起眼的陶片，会翻弄出不同的花纹、人物造像和兽形雕饰精美的陶器残段。而更令人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策勒县达麻沟沙漠遗址中出土的石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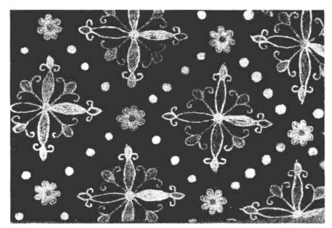


巴楚图木舒克（据吏德古城）出土的佛范。

惊奇的是在图木舒克古城中看到的景象。我们是从“琼梯木”烽燧驿站向西南沿着一条被沙漠掩埋的古道，经过几座烽火台到达图木舒克古城遗址的。“图木舒克”历史上又称“据斯德”，属古龟兹境（库车、阿克苏一带），今人也称为“唐王城”。它位于众多断层的孤山之中，唐书曾称这一带为“孤石山”。古城就在一座高大的断层山崖之下，而在其两山对峙的山口，分布着多座佛寺遗址，连同古城遗址构成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存。这次同新疆博物馆塔里



祆教膜拜之神物。



和田出土的缉绣丝绸织品。



焉耆明屋佛寺遗址出土的佛身、佛头。

木文物普查队来到图木舒克，我们登上古城附近的山顶，俯瞰图木舒克宏大的古城遗址和附近虽已焚毁但建筑轮廓比较清晰的佛寺，也到对面山口察看了另外两处佛寺遗址。看到这些，我想到千年以前丝路之道上的这座城池的繁荣和佛事的兴盛，遥遥相望的佛寺暮鼓晨钟、香烟缭绕、颂经拜佛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自公元九至十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历史上图木舒克也曾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徒共同生活、后来发生宗教信仰对抗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察看了有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古城遗址，听到关于伊斯兰传教士的一些传说。据说图木舒克也是祆教最先传入的地方，古城以北近年新修的公路旁边就有祆教寺庙遗址，后来我们在巴楚县文化馆曾经看到祆教信奉者膜拜的神灵文物。那是我们不同寻常的一天，既有实地探访的奇遇，也听到外国探险者在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图木舒克探奇寻宝的经历。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图木舒克古城山下的佛寺遗址休息之时，考古队员给我讲述了一段颇有趣味的真实故事。那是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到图木舒克，他所看到的是一处被破坏的古城遗址，除了废墟和古代垃圾的文化堆积

中有许多织物、陶器残片和木简，已别无他物可寻。当伯希和准备离开图木舒克的时候，他在寺庙废墟上无意识地用鞭杆拨弄着土堆，突然一颗泥塑的彩色佛头显露出来，这一惊喜立即打消他离开的念头，从此开始大规模发掘，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他在此留住近3个月，翻遍图木舒克一带的几座佛寺遗址，发现了造型精美的大小佛像，还有书写着汉文、梵文、吐火罗、佉卢文、龟兹文的木简经书，其中最大的一尊佛像，眉宇之间镶有红宝石。除了佛教遗物，他还采集到流散于附近的伊斯兰文书，发现了景教、摩尼教的遗迹，发掘了祆教的一处寺庙，取走了不同于佛教的造像。这就是一些外国探险家在沙海深处、戈壁滩头、绿洲之中经历过的奇遇。也就在被伯希和发掘过的最大寺庙的土堆上听完那位考古队员的讲述之后，一位考古队员同样在他的脚下发现一片佛身残段。大家正在翻看这一发现的时候，有人惊呼采集到佛像彩塑的花饰，而更加令人惊叹的是新疆博物馆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采集到一个小小的佛头，眉眼清晰，色彩艳丽，只是一侧的耳部有些残损，可见当时出土之多，许多文物在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图木舒克的古城寺庙虽然历经劫难，尚有许多秘密等待考古界、史学界的人士去考察去揭示，更需要人们的保护。当我面对被伯希和以及其他探险家、盗宝人、破坏者洗劫过的古代遗址而叹息时，又在佛寺东侧的山崖上看到雕刻于石壁的几尊佛像残痕累累，面目全非。它虽然没有巴米扬大佛的雄伟壮观，但在佛教遗存中也是一处非同小可的历史遗迹和艺术珍品，是朝拜者仰望的神圣。这是我在1979年探访中未曾看到的。不仅这些，图木舒克还有其他不解之谜。看过遭到破坏的石崖雕像之后，我们继续察看山下的佛寺遗址，看到佛殿残墙中的一颗头骨，但无法弄清它的秘密。

丝路之道古代遗址历遭劫难，许多文化遗存消失，呈现似有似无之状，大体应归咎于生态变迁中河水的断流、土地的沙化、流沙的湮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探险者和一些找宝人对古城、古墓、

寺庙的盗掘，对佛寺壁画的剥离。即使在近代，除了生态变化带来的危害之外，它们依然遭受着人为的破坏，这使我们这些探寻丝绸之路古代遗址的人们生发出许多悲哀和惋惜。1979年我们探访焉耆明屋遗址时，这个出土过大量犍陀罗艺术风格造像，后来又经过我国学者黄文弼先生考察的重要遗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砖窑取土的地方。据说在砖窑取土过程中发现的佛像散失了许多，有的甚至被大人拿去给孩子玩耍。我们到这里时，寺庙已被挖掘，遗址附近石窟中残留的壁画，也因管理不善有的被划损，有的色彩消失模糊不清。1983年，我随文物普查队在柯坪县以北一处名为苏巴什的山口考察时，位于山坡两侧对峙着的寺庙规模宏大遗址尚存，而山下佛寺中绘有壁画的墙垣，已被一座小水泥厂推掉变成料场，墙上的壁画也被乱刻乱涂弄得无法辨认。就已出土的文物而言，由于缺乏保管常识和欠缺运输保存的条件而被风化残损的依然存在。80年代和田发现一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棺椁棺盖有象征星宿的木钉，并绘有青龙、白虎和朱雀的图样，棺木中的老者和孩童遗体，出土时衣物完好，手脸的皮肤并未干裂，但因年代久远从墓穴中提取棺椁时，没有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出土时也未轻取慢放，棺木取出时已有裂痕，加之用拖拉机运输，经过几十公里的颠簸到达目的地，文管所的几位管理人员只好用铁钉钉住开裂的部位。更为严重的是，古尸出土之后未经化学处理和采取其他严格保护措施，不久干尸皮肤龟裂破损，这一重大发现落得如此下场，怎不让人痛心。以上仅仅是我所接触和亲身经历的几次考古过程中的感受，如何增强人们对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意识，应该是加强文化遗址文物管理的一个严肃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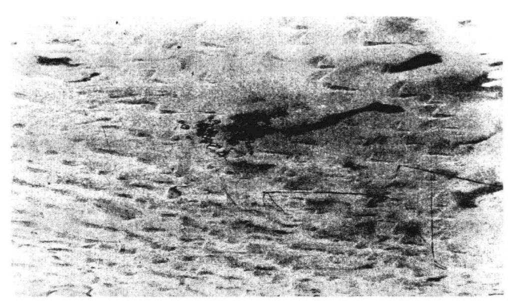
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多次采访，我深深感受到自从丝绸之路开通时起，中国新疆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相辉映的区域，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遗址便是这种交汇的见证。这条商道在进行商品交换和宗教传输中，自然而然出现许多中转站，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点，这种

融合出来的灿烂绚丽的西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放光彩的奇葩。然而，若要进一步发掘其文化底蕴尚需进行更加艰苦的努力，我从身临其境的采访中看到，许多遗址都蕴藏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色，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些已被毁坏，而且正在继续残损破败之中，还有更多的遗址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而深深湮没。因此我们的探访也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遇，更听到过虚幻的传说。埋在沙海中的古城、村落、文化遗址，可能会在经历一场沙漠风暴之后显现出来，也会随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探险发掘而有新的发现，而一些传说可能既有虚幻的臆想，也可能隐含着真实的存在。

在和田河故道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要到沙漠中探奇寻宝的痴人。那是在荒漠牧场一位维吾尔族牧人的家中，我们采访石油物探队时遇到的不速之客。他说要到古城寻宝，引起我们的兴趣。我问他要去哪座古城、所去方位。他则神秘地说："这不能讲，如果你们知道了，哪会有我的份！"我接着问他："你去的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城？"他说是沙漠中刚刚被风暴吹出来的。我问那里都有些什么？他说："城中有庙宇，有佛塔，庙中的菩萨完整无损，佛龛中除了泥塑的佛身，还有金佛铜佛，甚至连供奉神灵的香炉的摆放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除了寺庙官府衙门，居民住房都是好好的，里面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我说那你怎么不去？他说："现在不行，我要准备干粮带足水，等个吉利日子就动身，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免得有人跟踪。"我又说："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座古城？"他说："好多人都这么说。"这位痴人为了到沙漠古城中寻宝发财，已经到了癫狂的程度。我们告诉他孤身一人到沙漠中很危险，而且也没有你所说的有许多财宝的古城，即使是有，那你这样去也是违法的。他依然坚持："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心里有数。"类似这种说法，我在外国探险家的著述中看过，在采访中也听到过，它虽然不无踪影，但也绝不像这个痴人所说的那样玄乎。

我的丝绸之路采访已经过去多年，那漫漫途程中的所见所闻和考古生活的切身经历，不断加深我对丝绸之路的认识。1983年当我乘坐直升飞机到喀什、和田采访报道那里防风治沙、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时，俯瞰绿洲村落、城镇、烽火墩台，似乎千年古道上"烽燧远如点，驿骑互相望"，商贾、使者、传教士往来不绝的景象又呈现在眼前。我也在喀什飞往莎车的沙漠途中，俯瞰一座被沙海包围的古老村落，棋格似的房舍荒无人烟，通往外界的道路早被流沙湮没，我拍摄这一景象连同沙漠考察的其他图片，刊印在我编辑出版的《神秘塔里木》的画册之中，至今我还常常拿起这些照片审视，想象着它的往昔，这也成为我记者生涯的一个悬念而留驻心头。

（写于2002年11月9日）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被流沙湮埋的古代村落。

采访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一位名叫李吟屏的青年到县城以南约5公里的山普拉乡工作时，无意间在靠近村落的一条山洪冲刷的沟壑两侧发现多处墓葬。从残留的骨骸、织物等随葬品及覆盖苇席、皮革的槽形棺椁看，这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墓葬群。他从最初的判断比较中，认定其葬俗不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以往发掘的古墓。由于他热衷于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同新疆博物馆一些专家关系密切，他所通报的情况立即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成的沿塔里木盆地喀什、和田文物考古综合调查队，便把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定为那次调查的重要项目之一。

1983年12月28日，我们在山普拉乡政府大院里安顿好住处，第二天便随考古人员到了发掘现场。古墓群位于绿洲村落南端的一处台地上，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断层分布着多处墓葬，冲沟之上的地表全为砾石覆盖，看不到明显的墓葬痕迹。起初发掘工作不知从何下手，后来经过仔细的察看，发现地表有的地方有石块堆积，还有两处曾被挖掘过但又被流沙填充的土坑。负责现场发掘工作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阿合买提·热西提决定由他带领几名队员先清理这两处

土坑。经过一番发掘，先期划定的探沟未能发现墓葬，接着又在东西向探沟中部的交叉点上，画出另一条南北走向的探沟进行挖掘。与此同时，通过对后来被编为M2号的土坑的挖掘，清理出许多杂乱的骨骸。在不断深挖的过程中，尸骨残段越来越多，而且有毡片、芦苇、绳头、丝绸残片及黄红色发辫。开始大家以为它是因战乱或者瘟疫而被乱葬的墓坑，直到发现一只红色陶罐，接着又清理出四壁有阻止流沙用树条编排的护壁，特别是墓坑中部还有一个被砍断的立柱之后，才看出是一座顶盖被揭开而扰乱了的墓室，这是山普拉古墓群引起大家兴奋的最初的发现。至此，新的发现接踵而来，出土了令人惊奇、疑惑的多形制墓葬及许多文物。

第二天，就在最先开挖土坑近旁靠近冲沟的地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扣着的木盆，清除周边的沙土后，一双干枯的足踝出露于木盆外边，掀开木盆，一具头部裹着丝棉、身着绢绸的孩童尸骨呈现在眼前。这具小小的古尸穿着白色细管布裤，素白的连衣绢裙因年代久远已经出现许多虫蛀的小孔，但裙摆边沿及上衣袖口红色或蓝色丝绸的饰边仍然完好。死者为俯卧状，右侧肩膀放有一只旋制的木碗，身下垫有苇草、毛毡。在清理孩童墓穴的过程中，又发现一条用树条和芦苇做成护壁的通道，顺势清理，它直通前一天挖掘的M2号土坑。至此，大家认定它并不是一处乱葬的墓坑，而是一座隐含着某种葬俗的古墓。这种认识在进一步清理挖掘中得到证实。这是发掘山普拉墓葬群收获颇丰的一天，就在清理出孩童单人墓并发现有墓道的丛葬墓室的同时，另外几位考古队员开挖的探沟旁还发现一座用芦苇和树枝覆盖的古墓，它的一端放置的羊头角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好奇，似乎隐含着一个令人不解的秘密。

我希望尽早知道那座令人迷惑的古墓秘密，因此第三天多次到发掘现场了解进度。那天的发现接连不断，起先在M2号墓坑中发现大量头骨，同时出土的还有许多丝织残片，编织着不同色彩图案的条带、锁绣等织物，尤其是一块织着汉文字样、凤尾图形的绢绸，显

示出中原文化的色彩。这些发现都是令人兴奋的，而兴奋的高潮还是那座放置羊头角的古墓。中午时分我又到现场，看到沙土已被清除，放置羊角的下面用树枝、苇席作为棺椁的墓主人即将被揭示。下午，当揭去覆盖的枝条和芦苇时，令人意想不到的竟是一匹侧卧的白马出现在墓底，躯体干瘪但体形完好，头部还插有羽翎。在场的考古队员认为这可能是一具殉葬的马匹或是祭物，墓主人也许就在近旁，于是扩大挖掘范围。果不其然，考古队员在其附近相继发现多处单人墓葬，其中大部分是用胡杨树干掏空和掏挖成槽形及柜式棺椁的墓葬，墓主人有男有女，大部分为直肢裹有棉毛织物，并有随葬的黑灰陶罐、木盆，男性有弓箭，女性有纺杆、纺锤及铜镜。对其中出土的两个大型单人墓葬，我在1984年1月7日到9日的日记中有过记述——

今天(1984年1月7日)揭开靠近马匹附近的墓群。在这片100多平方米的试掘区，几天来已经挖掘清理出十几座大小不同形制各异的墓棺，其中大部分为孩童的墓葬，大人的细数起来只有四五座。而最大的棺椁是用原木掏挖的槽形棺，个别也呈筒形属屈身葬。墓主大多为头南脚北，考察发掘中考古队员一般都是绘过棺木图形之后，经过对周边砂土的细心清理便开始揭开棺椁。揭棺之时，我们在场的人既紧张又兴奋，因为墓主是男是女，身穿何服，有何随葬，就要在这一举之中了然。对于较大的棺椁，起初我们还以为是筒状，经过对封土进一步清除，底部则透出一条缝隙，结果是一个扣着的槽形棺，揭开之后，墓主长长的肢体完全被裹在一层毛织物中，织物纹理细密，历经1000多年虽已微黄，也能使人想到它当初的细白。古尸头南脚北，脚下的红陶罐装满干粮。由于年代久远，不易揭开裹着的织物，因此死者的面貌、殓衣等都无法知晓，只好等到运至乌鲁木齐进行特殊处理之后才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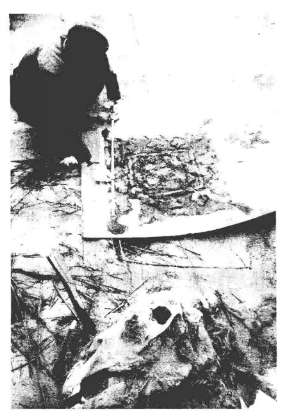
9日，时隔一天之后，试掘的墓棺已经清理完毕，在边绘图、边启棺的过程中，许多墓中的秘密已被我们了解了不少。由于墓葬形制

的多样，墓群延续年代的久远，我们仍然带着兴奋和好奇等待着又一个棺木的揭开。特别是看过前两天的那个大型棺木之后，我们对其近旁的另一个同样用原木开凿的槽形棺（编号M6）有着更大的兴趣。考古队员将沙土清理完毕，在众目之下揭开棺椁。墓主身着毛织长衫，头南脚北，足蹬漆皮长统靴，头顶部位有陶罐、木碗、粮袋，脚下有个较大的木盘盛着全羊祭品。经过细心的清理检视，死者头下枕着两块点心，右侧腰际放有带纺锤的纺杆；尤为特别的是，死者胸前隆起的包裹中竟是一具婴儿尸体，其左肩下还有绸袋装着的铜镜和木梳，铜镜已锈在袋内，绸袋做工细巧，花饰色彩鲜丽，丝绸质地图案很像1959年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古尸穿着之织锦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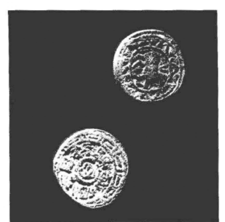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在山普拉古墓群最初发掘期间所写的两则日记，此后几天又有新的发现。就在两座大型古墓发掘不久，其近旁又出土一匹殉葬或祭祀的白马，发掘现场再度兴奋起来。经过清理，这匹殉马不仅头部插有羽翎，而且鞍鞯俱全，马颈下的套具中有几枚桃形饰件，特别是用作鞍垫的毛织彩毯，以红色、黄色和蓝色为主色调，依然鲜艳。这件长72厘米、宽72厘米的正方形鞍垫，四角带有15厘米长的毛穗，织有方格形花饰图案。这一发现，立即成为当地维吾尔族人传扬的新闻。后经碳十四测定，这是2200年前的文物。两具殉马出土不久，又在M1号墓坑中出土一只残破黑色陶罐印有马形标记的把手。相关的出土文物引起考古队员的思考，联想到过去在和田沙漠遗址出土的古于阗国印有马形标记的"马钱"，加之史书中有班超出使西域到达于阗国、当地人想用班超所乘马匹做祭祀的记述，说明当时于阗人有用马匹殉葬的习俗。

山普拉古墓群的发掘历时20多天，其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在后来的进一步发掘中，这种认识越来越清晰，促使我拍摄了不少照片。

在清理的两个大墓坑中，随着挖掘的进行，出土文物也在不断增多。它们恰似埋藏着许多古老物件的墓穴，开头几天，仅在被扰乱



山普拉古墓葬中殉葬的白马及出土的彩色毛织鞍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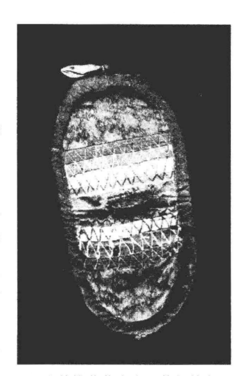
和田出土的古于田马钱。



山普拉墓葬出土的陶罐把手上的马形印记。

了的土层中就发现漆器残片、木梳、铜镜、珠贝件、木盘、箭镞、陶器以及大量骨骸,尤其是毛、棉、丝绸织物的出土异常丰富。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其中一天的情景:两座巨大的墓坑虽然过去已被扰乱,但在清理过程中却连续出土大量的毛、棉、丝绸织物。它们就像埋藏着古人丰富遗物的宝库,每天都给考古发掘的人们呈现出色彩斑斓、花饰新奇、图案结构非常好看的织物。特别是前一天发现金黄色质地并有蓝色凤尾纹饰的织锦和一个虽已残破但仍有“孙”字明显字迹的铜镜套之后,作为这次考古发掘的参与者,我也同其他人一样,

今天十分关注大墓坑中的每一锹土，以便把惊人的发现抢拍下来，因此不时俯身在土里寻找着，我想昨天出土的很有价值的织锦，它不会只有一片，果不其然在M1号墓坑清理出的土中，透过小小的一点金黄色丝绦发现了同前天一样的一片织锦。令人意外的是在M2号发现的又一枚铜镜，丝绸套却是一件非常完好而又做工精细的工艺品。菱形的花饰细针密缝，套面用红绸围边，边底还绣着一圈色彩不同的菱形花朵。据现场考古人员讲，30多年来发现缝制如此精巧、装有铜镜和木梳的古代妇女用品还是第一次。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交往中，中原文化不仅在著名的尼雅遗址和其他沙漠遗址存在过，就是在山普拉这片公元1世纪前后至公元3世纪这一跨越年代久远的多种形制的墓葬中，仍然闪烁着光华。



山普拉墓葬中出土的织锦和丝绸做的铜镜套。

就其织物而言，后来的出土文物不仅显现中原文化的存在，许多花饰图案的毛织物也展示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出土的各种织物中，仅二方连续图案的毛织彩带不下几十条，尤其是一块有镂空花饰的挑花素白毛织物和多种锁绣的香包、彩裙的织法、花饰及配色，都反映出生活在山普拉一带古代妇女曾经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袋状对象猴纹锦，对象之中还织有舒臂展肢、屈身攀援、造型生动的猴像，很像一幅佛教壁画。而出土文物中的彩色毛毯四方连续图案由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组成，特别是四边的对羊图形，长而弯曲的犄角构成了奇巧的边饰图案，同现今著名的和田地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与过去

人们所说的和田地毯始于公元前后相吻合，而且还有可能向前推移若干年。在众多的考古发现中，最令人惊叹的是M1号、M2号墓坑中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是在M1号墓坑被扰乱了的土层中发现一支有刺青纹饰的手背，紧接着又在M2号墓坑发现两件别致的华丽毛织物。人类刺青历史不知起于何时，而山普拉这只有着男性图像刺青的手背，据说还是新疆考古界的第一次发现，它也许是一位女性心目中的偶像而被铭刻于随时可以目睹并勾起情思的手背之上，也许还有着另外一种含义。而两件毛织物又似乎印证和田地区（古于阗国）人种融合、文化交往的某一段历史。因此这几件文物的出土引起考古队的一阵轰动。最先出土的是毛织裙摆红绿黄色相交的花饰图案，是从未见过的一种织物。而毛织裤管更是别具特色，它是一条完整的男裤，出土时一只裤管粘成一团，当时未敢展开，另一只裤管图形清晰，色彩如新，令人叫绝，只见舒展的裤管上织有一匹凌空飞跃的骏马，初看织底上有蓝色的天幕，四周织有八瓣和四瓣红黄梅花，飞马上方还织有云纹，更加强了腾飞的气势。我原以为这种织于衣着上的图饰，是出自古于阗人爱马的习性，没想到后来经考古队员解读，它竟是古希腊乐神的造像。我对图像仔细审视，才发现马首部分是人马合一的造型，马首和骑士浑然一体，恰似一边飞翔，一边吹奏号角。另一只裤管后来经过专家整修复原，显现出来的则是一个雄壮男性的图像。一条裤子织有两幅造型各异，而且有着明显外来文化的图像，这在塔里木盆地众多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不同形制、不同时代、不同葬俗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明晰起来。当M1号、M2号两个大墓坑发掘清理到3米多的深度时，四周用树枝编排的护壁显露，两座丛葬的墓室越发清楚。墓室中间作为支撑顶棚的一个木桩虽被截去一半，另一半却留存下来，直通底部的墓道亦未完全毁坏。种种迹象都已说明，它们之所以未被完全扰乱，是因为当地居民很早以前只是取走其上半

部的木料柴草，还未完全触及墓室底部，这增强了考古队员挖掘到底的信心。当挖掘到五六米的深度时，先被彻底清理出的是M1号墓室，内有木架支撑的尸床，分为三层，每层置放一架尸骨；也有尸骨散放于墓室的周边，其中墓道旁边的一具骨骸头北脚南，衣着朽烂，形体尚好。墓室尸骨有的在床上，有的在床下，是族系尊卑还是葬时先后所致，大家当时弄不明白，只有请考古专家去断定了。墓室床头一侧的地上有一只大耳红陶罐，旁边有一弓一箭，箭为木杆，箭头亦为木制，还有船形木盆及木盘和一红陶罐。紧接其后清理出的M2号墓室，尸骨比较紊乱，但遗物较多，而且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当时的葬俗。其中大量的叉形木桩似为停放多具墓主的尸床，但都已解体，其近旁被扰动的骨骸也比较多；墓室中间摆放着似乎是作为供奉用的制造精细的木墩和小桌，在其右侧清理出大量的黑陶罐、灰陶罐、木盆、木盘、木碗等40余件，在其墓道口的东侧有一较为完整的头北脚南的尸骨，死者身着肥大裙摆的衣衫，显然是位女性，衣着已朽烂，但能看出整个形体、着装和部分花饰。在M1号、M2号墓室的清理中，



洛浦县山普拉墓葬群丛葬墓室的底部。



山普拉丛葬墓室中身着彩色毛织裙装的女尸。



洛浦县山普拉公元1世纪古墓葬中出土的织有汉文的丝绸铜镜梳妆套。



山普拉古墓群中出土有刺青纹饰的干尸。

初步出土了近百具头骨和骨骸，从其被扰乱了的许多残损的出土文物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处埋藏着丰富古代遗物的古墓群，那次试掘的只是一部分而已，整个墓葬区的范围究竟多大，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古于阗国即现今的和田地区，自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1世纪初，曾是丝绸之路南端的重要通道，千余年来，在不同人种的迁徙中，在烽火不断的战乱中，在佛教由西向东的传输中，在丝路之路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既有不同人种的交融，又包容着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过程。山普拉墓葬群中不同的形制、不同的葬俗、众多的出土文物印证了古于阗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后来我从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读到有关中国西域人种和族属，尤其是这部著作对山普拉的评述，似乎和我在山普拉感受到的以及参与发掘的古人类学专家王博的看法颇为相似。余太山引述1987年第5期《考古与文物》文章中有关山普拉墓葬属早期铁器时代，出土采集的众多头骨标本均属欧洲人种，其中大部分为印度—阿富汗类型，个别为安德罗诺沃类型之后，他综述我国西域史前时期人类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欧洲人种、土著人种，也有蒙古人种，还有欧洲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型。从总体情况来看，欧洲人种占主要优势，且类型较多，如阿凡纳羡沃类型、安德罗诺沃类型、前亚类型、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印度—阿富汗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相互之间的混合型等。就山普拉墓葬形制，二次性丛葬墓室较多，以及屈肢葬，以动物为殉葬祭物及多处儿童墓的分布，都符合上述欧洲人种的古代葬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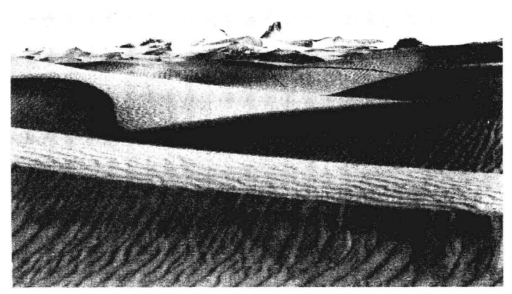
对于人种学，我是门外汉，但结合以上论述和考证，从和田地区有过众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来认识现在的遗传、返祖现象，依然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山普拉M2号墓坑中出土的黄红色发辫、文有头像的手背、织有古希腊乐神图像和别具一格的毛织衣裤，以及漆器木梳、汉文织锦、铜镜、丝绸镜套、精美的毡毯、多种图案的毛织彩

带及香包，甚至包括棉织物上的蜡染图形、珠贝饰件等等，都印证了中国西域文明的构成。墓葬群发掘之后，那些有别于穆斯林葬俗及其出土物件，也引起当地人的惊叹。在整个发掘期间，附近许多农民和孩子带着好奇心前来参观，人群中就有几个碧眼金发的孩童。我联想到后来在于田县见过的一些女性，特别是在民丰县水利建设工地见过的一位手持琴弦边弹边唱的维吾尔族妇女，她那美丽的脸庞闪动着一只湛蓝、一只褐色的眸子。我当时只是拍摄了她弹奏歌唱的身姿容貌，而没有拍摄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瞳孔。

山普拉是我考古报道中一次难得的奇遇。1979年我采访丝绸之路，通过对天山南北古遗址的探访，特别是环绕塔里木盆地之行，观佛洞看壁画，登高原走古道，进沙漠访古城，林林总总的历史遗迹使我看到两千多年来中国西域地理人文的变化，感受到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悠久历史，但对许多地方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而山普拉却是我对西域历史文化感受最为深刻的一次考古活动和采访体验。

新疆沙漠烽燧驿站的探查

1983年初冬，我跟随新疆博物馆叶尔羌河、和田河流域丝绸之路文化遗址的考察队进行了两个月的采访，其间仅在巴楚县境内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的烽燧遗址就待了10多天。在漫漫沙海的考察中，一些奇闻奇遇令我惊奇和兴奋。下面摘取几则日记，以表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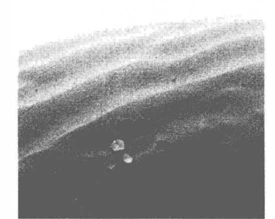
伫立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丝绸之路老北道的烽燧遗址。

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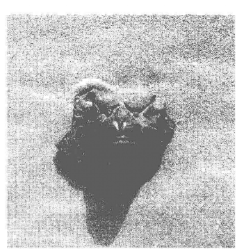
11月26日，晴。今天是对绵延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沙漠中烽燧遗址全面考察的第三天。北京时间清晨8点，按时差这里还是天光微明的拂晓。从冰冷的帐篷走出，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已经给大家点燃起一堆篝火，炊事员艾海提也正在热气腾腾的锅灶旁忙碌。此时天还没有大亮，只是那微弱的橙红色霞光，刚刚给东方大地抹上一道明亮而好看的边。这里虽然没有绿洲深处的晨雾，可是一层看不见的冷气却给人以凛冽枯寒的感觉。因为用水控制得很严，从进入沙漠的第一天起，就取消了刷牙，弄来一茶缸温水，同沙比提轮着浇洗，算是抹了几把脸。因为今天是在"琼梯木"烽火台附近的第一天露营，紧接着大家都起来了，围着篝火洗漱完毕，草草吃过早饭，便急切地踏上去"琼梯木"考察的第一天征途。

从"琼梯木"烽燧遗址的考察开始，大家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走路时总要望着脚下，这是为了不失时机地采集到文物。虽然遍地是陶器碎片，但是，要采集到真正有价值的文物也十分不易，要捡到好的就必须用心搜寻。在当地人称"阔西梯木"的一处好像古道关所遗址的一次发现，使我警觉起来。记得那一天的测量工作刚刚结束，忙了一天的考古队员张铁男等着大家集合，无意识地用脚翻弄着地面上的几块陶片，忽然看到被他翻起的一个红色陶片上，雕着非常精美的老人头像。它虽然残损了，但那丰盈的脸庞、突出的鼻翼、飘洒的胡须非常清晰。而就在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我们不知走了多少遍，所以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大家的兴奋和警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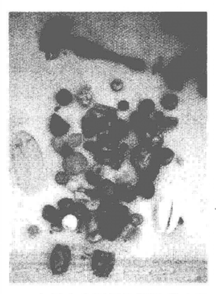
11月27日，晴。这次考察的"琼梯木"烽燧遗址，在我们营地的正北，约距3公里。从营地望去，沙梁一道高似一道，它就矗立在沙海的终端，显得高耸而醒目。说它像一个金黄色的浪尖，不如说它像一座瀚海中的灯塔。从营地到那里去，越过两三道沙梁，就已经见到散布在沙滩上的文物了。当然主要还是陶片，但是如果细心寻找起来，还会发现古钱币、饰珠、纺轮、箭头之类的物件。靠近烽燧遗址，就看到



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烽燧驿站出土的古钱币和彩色饰件。



琼梯木烽燧驿站附近深埋流沙之中陶罐雕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琼梯木汉唐烽燧驿站采集到的贝币和珠玉饰件。



烽燧遗址中许多储粮、存水的巨型陶缸深埋在沙漠之中。

深埋于地下的一排排大陶缸的圆形缸口。起先我边走边看着脚下，在一处比较大的滩地上发现一枚大孔的钱币，捡起一看，那有字迹的一面虽然糊着铜绿，仔细辨认就能看清左右两边有着“五铢”二字，起初我还认为是东汉五铢钱，但进而一看似乎又小了一点，它除了左右铸有汉字“五铢”，上下好像也有字迹，但不是汉文字。翻看之



在琼梯木烽燧遗址附近分布有多处烧陶址，在其周边散布着多种花饰图案的陶残片。

际，文物队王博来到我身边，我便拿给他看。当然，在行家眼里一下子便显出这枚铜钱的分量。他说，这是龟兹五铢，是汉唐时期龟兹国铸造的地方钱币，又叫“二体钱”，更早的不敢说，起码是汉末唐初的了。王博说，这几天在多处烽燧遗址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带字的龟兹五铢。我听了就更加感到它的珍贵。从“琼梯木”一出来就能给这次调查找到这样一件佐证，我便更加认真地寻找起来。当我翻过几道沙梁之后，文物袋里已经采集到铜饰件、唐开元通宝、小五铢、纺轮和各色各样的陶片。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站在高高的金字塔式的沙山之上，回望来路，那起伏的沙浪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一条巨大的飘动着的银灰色绸缎；再望那高耸的“琼梯木”遗址，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沙山举得更高了。我带着对古人的崇敬和怀念拍下了这一壮观景象。

11月28日，晴，有微风。到达“琼梯木”遗址，测绘组的黄小江、王素甫和北大历史系学生唐岐山已经开始忙着绘制图幅，文物队副队

长柳晋文和王博也已选好试掘探沟的两个点，并且已经开挖。“琼梯木”是一座500平方米的方形城堡，玉门关以西的汉长城，便以这种烽燧墩台的形制而呈现，直到帕米尔高原。在塔里木盆地北部丝绸之路老北道一线，每隔百里左右便会看到一处由烽燧、关所、驿站组合的建筑遗址。而“琼梯木”就是其中的一处。整个遗址南部耸立着瞭望塔，而城堡内部已被流沙掩埋了，只有靠南的墙垣附近有几处房屋残迹。这座城堡建在约高于地面10米的台地上，登临塔顶，四野沙海茫茫，因为离克孜尔河（汉语意为红河）古河床很近，整个沙面呈现一层淡淡的红色，看起来另有一番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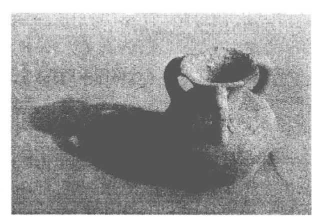
琼梯木烽燧遗址采集到的刻有老人头像的陶残片。



1983年11月考察巴楚沙漠燧道（汉唐）遗址时的维吾尔族向导吐尔洪老人在琼梯木墓葬中采集到一只莲花瓣纹三耳红陶罐返回途中摄者抓取的一个镜头。

看过城区，我正在那里休息，只见向导买买提明从城堡北面的沙丘上走来。他虽然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细高的身材依然十分健壮。今天他主动要求到城堡以北去察看附近还有什么遗址，在那疏松而且磁力很强的沙山上，别看他已经跑了半天，而走起路来还是那样的步履矫

健。他走到我的跟前，非常高兴而又带着诡秘的神态，从肥大的袷袢（大衣）衣襟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三耳红色陶罐让我看。这只陶罐细颈突肚，造型奇巧，罐口下部围着一圈莲花瓣纹，真是古代制陶业的一个精品。很显然，这是一个存放骨灰的礼器。几天以来，我们在一些遗址发现高约1米、腹部直径2.5米的大陶缸一排排埋在地下，而这么小巧又完整的陶罐还是第一次看到。不仅如此，买买提明老人还向我出示一件更为稀奇的东西——陶制男性生殖器。看到它我几乎瞠目结舌了，在这古老的区域，这件文物又说明了什么呢？我当时无法弄清，后来问过多人，才得知可能是古人由原始部落流传下来的生殖崇拜的器物吧。看来，这几天随着考察的步步深入，采集的文物也越来越多，这一带烽燧驿站和古城遗址的秘密就要揭开了。


琼梯木沙漠墓葬中出土的三耳莲花瓣纹小陶罐。

11月29日，晴。结束“琼梯木”的考察，获得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今天是快要结束“琼梯木”考察的一天，我随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在对城堡周围进行最后的检视中，竟有另一次奇巧的发现。我们走到离城堡西南约1公里的地方，在沙山之间的滩地上，发现一片由流沙覆盖的殷红的地面，恰似被燃烧过的痕迹。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蹲了下来，用手清理掉地面的浮沙，出现一片焦土，再向下挖，则有被烧焦的木雕梁柱的残段。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大家的兴趣。在不断的深挖中，一些彩色泥塑佛身残段和缨络相继出土，竟然是一座被焚烧了的佛寺遗址。随着出土物件的增多，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进一步发掘的劲头更大了，我也忙着把发掘现场和每个出土物件

抢拍下来。此情此景使我不难想象，在这茫茫沙海烽燧驿站的近旁确有寺庙存在，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当时过往客商、僧侣朝拜的所在。联想到距此不远的图木舒克(又称据史德古城)遗址中众多的佛寺遗址，而且其附近沙漠烽燧中竟然也有寺庙，足见当年这里佛事活动的兴盛。那么它是因何被焚毁的呢？图木舒克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最早属龟兹国(今库车)的尉头州，公元10世纪前后曾是原疏勒国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教同佛教对峙的一个区域，后来伊斯兰教势力强大，佛教便开始衰萎直到消亡。我们在"琼梯木"烽燧遗址发现的这座小小的佛寺残迹，很可能是在宗教对抗中被焚毁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偶发的灾难所致。无论怎样，它都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是值得研究的历史遗迹。我觉得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琼梯木"等烽燧驿站，它也就成了我在"琼梯木"沙漠遗址中度过10多天里的不同寻常的一天。

11月30日，晴。明天就要结束沙漠考察，离开"琼梯木"烽燧驿站的遗址了。

傍晚，夕阳映红了沙海，给"琼梯木"城堡镀上一层金辉，随着考古队员的归去，这里又进入一片死寂。在将要离开"琼梯木"的时刻，我要最后一睹这千年古迹所隐含的辉煌，在观览之中把自己的思绪引向更深的感念，亦为了拍摄一张傍晚古城堡景色的照片，便留在一座沙山上。寂静之中，我一边等待着更加殷红的霞光出现，一边把当天捡到的那几枚古钱摊放在沙地上，拉长了的投影，使一条条波状的沙纹更加清晰地展现一道道沙脊的坡面。它们像沙海中的波涛，又像一曲曲乐章，给这古老的有着丝绸之路辉煌的地域唱着无声的歌。这一天我将捡到的汉代五铢、开元通宝、龟兹五铢、龟兹小钱，由大到小排列在眼前的沙面上，铜绿和字迹反映出它们的历史年轮，夕阳的映照增加了古老的光辉，我看着它们，遥想这里往昔的繁华，又放进一颗粉红色的透明石料，使它们折射出更强的光影，我便透过它们拍下最后一张"琼梯木"沐浴着晚霞的照片。

从塔里木荒漠烽燧看长城的西延

初冬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显得更加枯寂，一道道新月形沙丘横亘在我们面前，就在这荒寒的沙海之中，1983年11月我随同新疆文物考古调查队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文化遗址考察。

这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组成的13人考古队，在新疆巴楚县的沙漠深处跋涉10多个日日夜夜，对点点烽燧和座座城堡进行探查，成为我新闻采访生涯中一次特殊的经历。

在那次考察之前，我通过一则新闻消息得知1981年新疆博物馆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与喀什地区文物管理所的研究人员李恺，在一个风沙弥漫的恶劣天气，发现并踏勘过当地人称“琼梯木”的古城堡遗址。他们进入沙漠不久，在沙梁之间的滩地上看到铺展着像海边贝壳般花饰繁多的陶片。当时因为准备不足，加之风暴的袭击，未能进行详细发掘。这是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的沙比提·阿合买提未曾见过的一个遗址。报道中说，沙比提·阿合买提和其他考古工作者虽然在塔里木盆地的许多沙漠遗址有过多次艰辛的跋涉和惊人的发现，例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尼雅遗址汉代（公元前1世纪）古尸及丝绸、毛织物的出土，安迪尔河下游圆形城堡的发现，米兰遗址大量木简的采集，图木舒克古城寺庙遗址佛像的发现等等，但是从



1983年随新疆博物馆文物普查队普查时所摄之烽燧驿站(汉唐时期)。

未遇到有着这样丰富陶片的沙漠遗址。

自那次报道之后，巴楚县沙漠遗址的秘密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通向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老北道上，这些烽燧遗址又记载了哪一段历史，有着什么样的地位，确实是一桩需要探索的秘密。1983年8月我所期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新疆博物馆在国家文物管理部门的支持下，组成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两河流域(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文物考古调查队，巴楚县“琼梯木”一带的烽燧遗址被列为这次考察的重点项目之一，而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又是这支考古队的队长。

考古队是在夏日酷暑已经过去、沙漠风暴还未来临的初冬季节，通过著名古城图木舒克（又称据史德古城）进入沙漠的。进入沙漠之前，考古队就在附近的兵团农场做了充分准备，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在链轨拖拉机的开导和牵引下，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向目标进发。先是沿着打柴的小路，继而在既无车辙又无人迹的流沙地带行进。那一天直到被巨大沙梁挡住去路才停下来。在四野茫茫之中，塔克拉玛干真是一处变幻莫测的沙海，一年以前的足迹早被流沙掩埋。从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认定的方向看去，只见沙丘像起伏的波涛无边无际，就连老向导也感到无所适从，大家只好四散开去，在沙梁之间辨别兀立的烽燧墩台，直到黄昏一切景物变得模糊起来，才在靠近沙山的一处滩头撑起帐篷，度过沙漠考察的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

第二天拂晓时分，大家都走出帐篷，为了驱赶沙漠初冬的寒气，有的队员燃起篝火，四周的景物逐渐清晰起来。当一轮红日刚刚照亮沙山的时候，我看到沙浪汹涌的西北天际有一座殷红的土塔，透过一道道金黄色的沙梁，它显得那么清晰，那么诱人。与此同时，几位青年也不约而同地发出“烽火台”“土塔”的喊声。然而沙比提·阿合买提说，从地理方位和这座烽火台的形状看，并不是他前次见到的那一座，这只能说是又一个新的发现。匆匆吃过早饭，他便把这支队伍分作两路，一路去寻找“琼梯木”，他带着另一路向“土塔”走去。我跟着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走向这座神秘的土塔。

我们离开住地翻过几道沙梁，在沙山之间的滩地上看到散布零落的陶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迹象！由此，大家互相提醒注意自己的脚下，就在这时，随同的摄影师已经惊喜地捡到一枚唐朝中期（公元8—9世纪）的“乾元重宝”，紧接着又有人捡到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的龟兹小钱，特别是一只带有兽头造型的陶器残段，黝黑的陶质，细巧的造型，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从这里开始直到土塔，大家又有不断的发现，言谈笑语，使我感到塔里木盆地这个埋藏着

许多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瑰宝的"博物馆",又给我们奉献出一个记录着人类活动的古代遗址。

土塔在我的眼前越发高大了,它那宽厚的塔基、高耸的塔身虽经一千多年的风沙剥蚀,仍然远远超过周围的沙山,像一座路标雄踞在瀚海之滨。它显然是一座远古的烽火台,当我们登临塔顶,极目四望,大海一样的沙浪向四周铺展开去,靠近土塔的东北侧,一些房屋只剩下被风沙剥蚀的残迹,有的则已被流沙掩埋,只有在它附近的几处平地上,还留着古代士卒盛粮储水的巨大陶缸的碎裂残片。向导告诉我们,这座土塔当地人称"泽梯木",它附近还有"阔西梯木""约木拉克梯木"和"琼梯木"。听着向导的陈述,大家似乎已经看到它们的存在和"琼梯木"等高大的城堡。经过测量,这座当地人称"泽梯木"的烽燧残高12.65米。在沙漠考古的第一天,沙比提在地图上标注了它的准确位置,我也拍下考察发现中的第一张照片。

午后,我们啃过几口干粮,便按向导指引的方向走去。一座座沙山疏松而又有磁力,我们的步履虽然沉重,但并不感到劳累,特别是前方隐含着的秘密,更加激励着每个探索者的豪情,我当然也不例外。翻过几座沙梁之后,一条古代的道路断断续续出现在我们眼前,宽阔的路面暴露在松软的盐碱地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清晰可辨。我们顺着这条古道行进,最后看到像孤岛一样漂浮在沙海中的"阔西梯木"城堡。

"阔西梯木"矗立在一片洪水冲积的滩地上,细细的流沙、板结的地面透着殷红,沙生植物呈现着细白而干枯的枝条。当我们疾步走到城堡附近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使大家惊呆了,黑色、灰色、红色、黄色的陶片遍布城堡的四周。这座城堡呈四方形,东西各有一个豁口,在经年累月的风蚀中,它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目,从残留的形体中可以看出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关所,遗址周围深埋着许多直径一到两米的陶缸,缸口一圈一圈排列着,较远之处分布着三处烧陶窑址。靠近窑址有打碎的磨盘,更多的是灰绿色的陶渣,并夹杂

着散乱的陶片。我们经过四五公里的沙漠跋涉，面对古代人们丰富的遗物，早已把疲劳忘到九霄云外，立即开始紧张的测量、拍照，直到日落黄昏才返回营地。当晚，寻找"琼梯木"的考古队员也带回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但找到"琼梯木"，而且还发现名叫"约木拉克梯木"的圆形烽燧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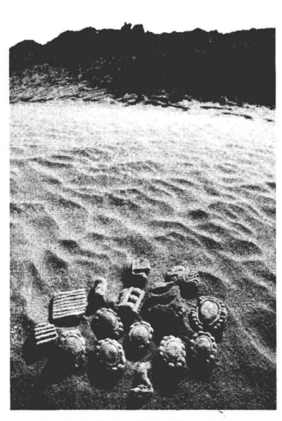
在寂静的沙漠之夜，我看到被篝火映红的考古队员们因获得成功而欣喜的笑容，作为一名随队记者，我的内心也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激动。谁会想到，进入沙漠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四个形制不同的古代遗址，特别是"阔西梯木"的丰富陶片，仅仅有兽头雕饰的陶器残片就不下十几种，更何况那些云纹、水纹、几何图形、联珠、卷草花纹的印纹陶片俯拾皆是。

第二天考古队全体成员对"阔西梯木"进行采集测量，还踏看了"约木拉克梯木"。它距"阔西梯木"东偏北约5公里，整个烽燧遗址被风沙剥蚀得只剩下残高5米多的塔基，但在偏北约500米的地方有房屋残迹和两处窑址，最可喜的是，在沙漠尽头大家看到"琼梯木"城堡的高高的瞭望台。从这一天开始，考古队便把营地搬到距"琼梯木"约3公里的一处滩地上，对它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

当地维吾尔族人所称的"琼梯木"，是一座矗立在沙海之中的方形城堡，城区的墙垣和房屋都已被流沙填埋，但设于城南的高7.8米的守望台仍然十分醒目。它周围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几乎每道沙山之间的滩地上都散布着文物和残留的住房、寺庙、烧陶窑址。

到达"琼梯木"的第二天，考古队成员便被分作试掘、测量、采集三个作业组进行考察。最初几天，我们从营地到城区往返6公里多的路程，边走路边寻找古人的遗物。陶片和深埋地下的巨型陶缸是容易被发现的，而那些铜钱、铜部件、纺轮、饰珠则需要认真寻找。在广泛的采集中，每天傍晚都忙坏了负责登记和保管文物的沙比提·艾合买提。在他周围，摆着一堆堆各类花纹的陶片、人形或兽形的陶器残段，有汉代（公元1至2世纪）的五珠钱，唐代（公元6至7世纪）开元

通宝、乾元重宝，龟兹古国的龟兹二体钱（即铸有汉文字和龟兹文的钱币）和大小不一的龟兹小钱，而那些摊开的饰珠、铜饰件虽然没有多少光华，但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些文物中，你也会看到印有对称莲花瓣纹造型精巧的红色小陶罐、塑造生动的猴头陶件和形态别致的陶制力士残段，无疑它们都反映着这座古城堡的历史年轮。



从被流沙埋没的焚烧的佛寺遗址中出土的佛身残段。

在试掘中，大家还采集到白玉雕琢的菩萨和有龟兹文题记的红陶片，发现很多鹿角、鹿头骨和牛、马、羊、骆驼骨骼，还有葡萄、桃子、杏子、籽、粟、棉籽等。文化堆积情况证实，这处遗址延续朝代较长。此外，还清理了城南一处寺庙遗址，出土了大量佛身残段、璎珞、饰件等。伴随佛址出土的还有已被烧焦的雕饰精美的梁柱和寺庙装饰花纹，说明当时过往客商朝拜香火之兴旺。那几天，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常常沉浸在考古发现的兴奋之中。

当快要结束对“琼梯木”遗址考察的时候，我曾和副队长柳晋文站在“琼梯木”的守望台上，遥望隐没着据史德古城（又称图木舒克）的西南方向，思考着这些烽燧遗址的历史价值。从采集的文物和烽燧驿站的组合来看，可以肯定它们是西汉以后继长城的西延所建。那么“琼梯木”是关所还是驿站？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通四夷道》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自拨焕（今阿克苏——编者注）西南渡浑河（今

阿克苏河）百八十里有济濁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地，一曰尉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这次考察测定的"琼梯木"的方位，沿古道西南行至据史德正好约合唐制六十里，"琼梯木"很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谒者馆"。"馆"在唐朝一般指著名的驿站，为了保护丝绸之路过往客商、使者、僧侣的安全大都设在烽燧关所的附近，而"琼梯木"也正好在"阔西梯木"和"约木拉克梯木"附近的偏北方向。再从里程上看，主要驿站一般也都设在马行一日的驿道上。

为了得到更加确凿的考证，我随考古队从"琼梯木"向东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到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境内的阿恰附近进行考察，同样发现一组烽燧和驿站的遗址，并且采集到龟兹小钱，唐"开元通宝"。阿恰古代素有"和平铺"之称，按贾耽所记"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濁馆，故和平铺也"。今天仍然有人称这里为和平乡，比照之下里程吻合，似为"济濁馆"的所在，从而进一步印证"琼梯木"就是"谒者馆"的方位和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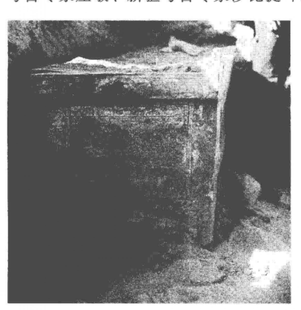
"谒者馆"（即琼梯木），地处喀什噶尔河下游，汉代属尉头国（今乌什县一带），唐代（公元6世纪）归尉头州（今巴楚县图木舒克古城）管辖，从采集到的大量龟兹钱币来看，图木舒克（即据史德古城）均属龟兹国（今库车）属地。考古队也注意到历史地理的考证，发现克孜尔河（喀什噶尔河）即文献中之赤河，流经图木舒克以北便是漫流潜伏的状况说明，这座遗址是唐朝后期随着克孜尔河流量的减少、古道的变易而废弃的。但从烧毁的寺庙遗址和打碎的佛身来看，也有毁于战火的可能。"谒者馆"在干旱流沙的侵蚀中早已没有人迹，而其遗址与文献记载此处"树木丛茂"比照说明，它的繁盛时期曾是一个林木苍郁、水草丰美的文明区。正因为这样，它所留下的经济、文化遗物是十分丰富的，加之沙漠的封闭和阻隔，使这座城堡和附近的烽燧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经过初步考证，沙比提·阿合买提馆长说这里是由汉（公元前）延至唐朝的一组烽燧驿站。它的发现对

于研究丝绸之路、汉唐长城以烽燧亭障形制的西延和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写过这样的诗句："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开拓于纪元前，热闹繁忙了一千多年的这条古代交通要道，今天虽然没有一队队行旅扬起的烟尘，但一座座烽燧、残留的城堡、丰富的文物，仍然向人们展示一幅古代历史的画卷，令人暇想和深思。

佛门在叶尔羌的历史见证

1983年10月，我结束新疆和田地区沙漠绿洲的采访报道，按照事先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遗址调查队约定的时间，赶到叶尔羌河畔的莎车县，第二天即跟随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庄敏、新疆考古专家沙比提·阿合买提前往叶尔羌河上游卡群乡发现彩棺的古代遗址进行踏看。据从遗址现场返回莎车县城的考古队员讲，在初步发掘的古墓中已能看到棺椁的彩绘。这样，我就怀着急切的心情同考古专家一起上路。



莎车县叶尔羌河上游1983年10月在通向帕米尔高原古道上出土的唐代(公元6世纪)彩棺。棺首绘有和尚及龙首的图像。

乘汽车出莎车县城，往西南方向沿叶尔羌河北岸的土路行驶，这是一条通向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的古道。1979年9月我采访丝绸之路时，曾经探访过

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古城堡”,沿途考察过几处古代驿站的遗址,登上冰雪达坂明铁盖通向瓦罕走廊的隘口。那时我就听说丝路之路有两条通道经过帕米尔高原西去印度、波斯和罗马,因而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回来后,我盼望着能够再走一趟由叶尔羌河登上帕米尔高原的丝绸之路。时隔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而且将亲身经历一次丝绸之路遗址的考古发掘,不能不令我感到兴奋。

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行约50公里,就进入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丘陵地带。道路逐渐向上攀登,农家的房舍或隐或现地藏在山冈后面。我们要去的古墓发掘现场,就在道路右侧的一处土崖中。我们到时,挖掘取土工作已基本完毕,考古队员们等候着专家到来,然后进行最后清理和开启棺椁。发掘现场聚集着许多维吾尔族农民,普遍显出好奇的神色,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他们想不到在自己祖辈的墓地附近竟然发掘出异样的棺木。

我们最初看到的棺椁铺着一层浮土,考古队员清除浮土之后,棺板上的彩绘便显露出来,先是棺椁两侧的云纹和卷草花纹,接着是棺首的龙头和棺尾的比丘像。随着这些花纹和图像的出现,我同大家的心情一样激动,而且对墓主充满神秘感,急于看到棺内的状况。但在开棺之前,考古队员必须对棺椁上的花饰图像抓紧临摹,以防变色和彩绘脱落。因此,在考古队员们进行保护性处理的同时,发掘现场的莎车县文化馆美术工作者主麻·玉素甫就抓紧时间开始临摹,我也抓紧拍摄棺椁上的讲经说法图和比丘画像等等,并从这些色彩鲜艳、画功娴熟的彩绘中,揣测墓主可能是一位有着华丽服饰和众多陪葬品的贵人,暗自筹划要把古尸初现时激动人心的场景拍摄下来。

开启棺盖的时刻到了,我选择一处居高临下的角度,瞄准墓坑和开棺的人们。当棺盖开启之时,我虽然立即按下相机快门,但场景却令我失望。棺内只有一具腰系细绳的枯骨,此外别无他物。墓主身

份似与棺椁彩绘极不相称，令我疑窦丛生，是被盗掘过吧？但棺椁完好，棺盖封闭如初。我正在揣测之时，发掘现场的喀什地区文化处考古人员李凯似乎一语道破古墓的秘密。他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座和尚的墓葬，从棺木上的讲经说法图、比丘图、菩提树等花饰的彩绘就可以看出，只有寺庙和尚死后才会用这种形制的葬法，佛家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之说，这位死者身无牵挂，必定是出家的和尚或者想做和尚的人。"听了李凯这番解释，大家心中的疑云才得以消失。我联想到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玄奘取经归来就是走的这条道，而且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有着众多的寺庙遗址，这条古道上肯定也有供来往商贾、使者、官吏、僧人朝拜的佛寺，因而出现和尚的墓葬也就毫不奇怪了。经过考古专家初步分析，这处墓葬不晚于公元6世纪的唐代，那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往密切、佛教东传最兴盛的时期，因此才会出现有着浓厚佛教色彩的墓葬。



唐代彩棺揭开棺盖时腰系细绳一丝不挂的墓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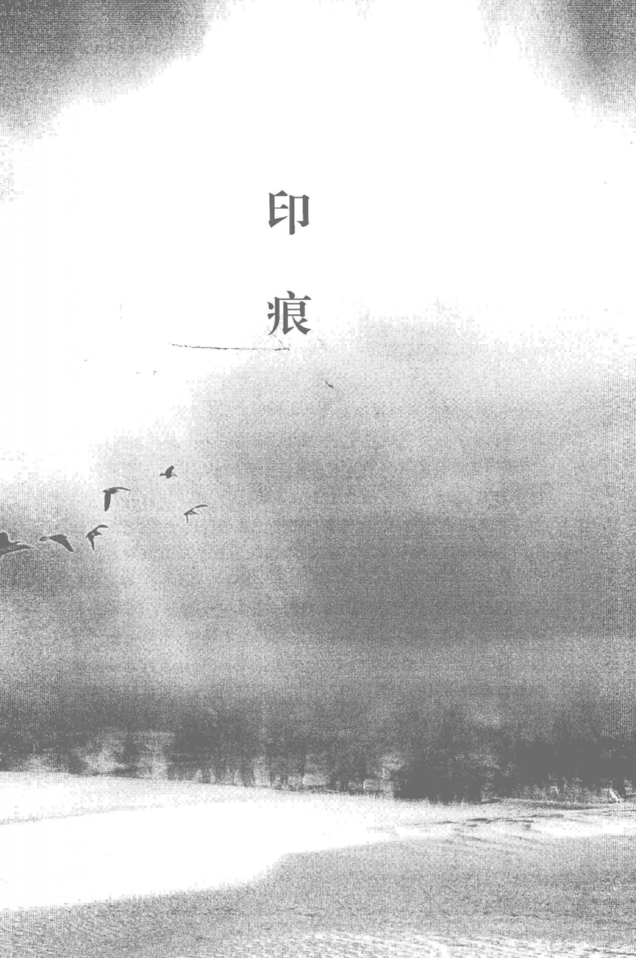
在塔里木盆地古代墓葬的发掘考察过程中，我所亲眼目睹的不同形制、不同年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墓葬棺椁为数不少。记得1959年在尼雅遗址发现出土的身着织锦的夫妻合葬墓曾经引起轰动，当它被运抵乌鲁木齐向人们展示时，我曾现场拍摄了那两具被测定为公元1世纪左右的汉代古尸，及其有着"万世如意"和"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汉文字样的织锦华服。后来我又在和田地区洛浦县

参与山普拉丛葬墓室和单人墓葬的发掘考察，还见过和田县出土的雕有星宿图形、绘有青龙白虎的棺椁。我还在莎车县探访过装潢华丽的穆斯林墓室和清代王爷的麻扎（陵墓），这都反映出塔里木盆地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习俗的多样和文化底蕴的深厚，值得人们细心琢磨、深入研究。



和田县1983年出土的彩棺干尸，系公元1世纪的棺椁，棺木绘有青龙白虎朱雀图，棺盖镶有象征星座的木钉。死者身着丝绸。

后来我看到叶尔羌唐代彩棺的考察报告，对其地理方位、墓葬形制及历史年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处墓地位于莎车县城西南58公里的卡群乡之卡木沙勒村，因为当地农民取土而暴露棺木一角。考古人员在清理暴露棺木的同时，还试掘与之相邻的墓葬两座，发现彩绘棺木一具，内殓男性一人，仰身直肢，腰部系着平纹白布带，没有随葬物品，唯其彩绘棺木色彩艳丽，画笔工整，显系唐代画风，棺首为讲经说法图，棺尾当为一比丘坐在张口龙首之左，神情自若，衬以蓝色湖水；棺盖与棺木两侧绘满花草图案，可识别为忍冬，卷草纹，黄底黑线，肃穆清丽，可断为死者系一僧侣。此项发现为研究唐代绘画、僧侣葬俗，特别是宗教派别的葬俗，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此外，棺木为揭盖带足长匣形制，棺盖中心部位的边框处，钻孔穿带捆束（不用钉子），是研究民俗和僧侣葬俗的不可多得之实物借鉴。墓葬所在的卡群地方，是古代由莎车越葱岭前往中亚、印度的必经之处，马行三日即可抵达帕米尔高原的布伦木沙镇，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丝绸之路进入葱岭之前的重要隘口和人们进行佛事活动的地方。



印
痕



丝绸之路随想

丝绸之路，这条从公元前138年由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真正开拓的“欧亚大道”，到现今已有2000多年了。在这一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虽然经历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兴衰过程，但是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许多历史学家还在缅怀着它，并且在对它的重新探索中，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篇章编入人类历史的文库。还有许多人想踏着这条漫长的道路，循着古人的足迹，去领略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的光辉业绩。

丝绸之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丝绸的贸易通道。然而，通过中华民族的这一创举，它带来的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之路。丝绸，只不过是它最突出最典型的象征而已，是对中国古代人民开拓这条道路的深情赞语，因为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有“丝国”之称。

有着这样漫长的历史，有着这样深刻的意义，在这条7000多公里的陆路交通线上，又留存着丰富的文化宝藏，它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探索愿望，不诱惑人们去向往它？况且它那神奇的风貌和传说，以及荒漠戈壁、茫茫沙海、酷热火洲、冰峰雪岭，更使人怀有神秘之感。

20世纪初期，有些仁人志士风尘仆仆地来探索过它，但也有一

些心怀鬼胎的人来盗窃过它。在迷离的沙海中，为了寻找一座古城，有的人竟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寻觅觅，也有人在荒漠古城遗址中剥下一块块闪耀着佛教艺术光辉的壁画。

今天，丝绸之路虽然已被风沙湮没，被战争毁坏，但它依然放射着光芒。高昌古城那巨大的长安式城郭、街道的残迹，仍然向人们展示着昔日的宏伟气派。阿斯塔那古墓群依然是一座未被人类全部认清的地下之谜。克孜尔千佛洞的菱形壁画艺术，仍然反映着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文化的光辉。于阗故国撒满陶片的古城，光怪陆离的佛寺遗址，陶窑遗痕贝壳般的遗物，在沙漠中忽隐忽现，随着移动的沙丘，不时抛露出自己的面貌。楼兰古城奇特的“雅丹”地形，帕米尔雪山古道，伊犁草原的石人墓葬，都展示着不同的风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信仰，都使我们似乎看到丝绸之路上驼铃震响，驿马奔驰，各国使者、商贾、旅行家、传教士往来不绝的历史踪迹。它像一个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又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百科全书，蕴涵着无穷的知识和情趣。它几乎包罗了中国汉唐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至19世纪整个西域的历史变迁。

丝绸之路上也有特殊的自然风貌。假如你西出阳关，去丝绸之路南道，沿楼兰经和田(古于阗)，过疏勒，翻帕米尔(古葱岭)，就会看到一处又一处沙漠奇观。假如你西出阳关去中路老北道，到吐鲁番(古高昌)，经焉耆、库车(古龟兹)、阿克苏(古姑墨)，过喀什(古疏勒)，翻帕米尔，古城或石窟就会展现在你的面前。假如你西出阳关，去丝绸之路新北道，到哈密(古伊吾)，翻天山经巴里坤(古蒲昌海)，再经吉木萨尔(北庭都护府)，沿天山北麓，过准噶尔盆地，出伊犁河谷，就会感受到活跃于广袤戈壁和天山草原的突厥与乌孙等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厚度。

不管丝绸之路的哪一条路，在帕米尔高原会合以前，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不同的历史痕迹。

随着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条新的通

途。总的说来，过去那种“烽燧狼烟冲云霄，长河落日驼影归”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比较发达的交通工具和沿途城镇的崛起。这些对于寻访丝绸之路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当然在航空、铁路、汽车这样现代化的交通条件下，也还有寻觅沙漠古城的艰辛、冰峰雪岭的高寒以及鞍马驰骋的劳顿，但这些只能是探访丝绸之路豪情中的另一番情趣，也是你劳累之中的诗一般的憧憬。

1980年刊登于香港《中国旅游》杂志

我的人生轨迹和童年的印痕

1954年春天，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三年，来到出生之地伊宁市。可巧的是，我所采访的第一个地方便是在三区革命最初的动乱中（1944年11月—1945年1月）随着继母躲避祸端的察布查尔。那时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即将成立，我们要对此进行采访报道。作为刚刚起步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察布查尔是继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乡成立之后，新疆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它拉开了新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序幕。锡伯族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东北故地西迁新疆伊犁的，他们到达后在伊犁河南岸建起八个牛录，从那时起就在伊犁地区屯垦戍边，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建立了丰功伟绩。三区革命初期，艾里汗吐列等人打着“反汉排汉”“建立东突厥斯坦”的旗号烧杀抢掠，当杀戮之风还没有波及到察布查尔之时，那里便是我和家人的避难之所，也是我生命旅程的转折之地。

4月，伊犁河的冰雪开始融化，我们乘着马车走向渡口。我面对漂浮着冰块缓缓西去的浩荡巨流，望着远处雪峰连绵、云雾缭绕的乌孙山浮想联翩。虽然伊犁河谷经历了战乱的创伤和自然的变迁，但它依然显得丰盈而美丽。伊宁市也在那白杨林立、河渠纵横的街区中展示着独特的俊秀和柔美。就我的记忆所及，和平年代我有过

美好的童年，小小学童毕竟挡不住大自然的诱惑，我在游玩当中享受过这片土地的恩泽，也有在动乱之中失去父母的悲哀和苦难生活的磨炼。这是我增强体魄、趋向成熟的地方，一幕幕旧时的情景从眼前闪过，一段段童年的往事涌上心头。因此，我把它作为值得追述的经历加以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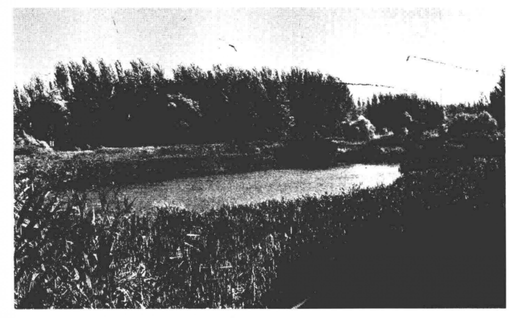
伊宁是我的故乡，1996年我将要退休之时，又一次来到伊宁，来到伊犁河畔。过去在社会动荡、家庭变故之中，多变的生命历程向我昭示为人处世的真谛，增强了我的体魄和胆识，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为我踏入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于1935年农历八月出生在伊犁河谷的伊宁市。母亲石瑞堂祖籍北京，她的先辈是清朝乾隆年间来到新疆伊犁的满族人。我的外公石晓岩是举人出身，晚清时期在伊犁惠远将军府当过官医，辛亥革命后从惠远城迁居伊宁市，在市区的汉人街开了一爿药铺。由于是有坐诊医生的药铺，加之我的外公是一位道学先生，因此他在伊宁市汉族、满族和锡伯族居民当中颇有名气。他家生有三男一女，长子石元珍最早在老霍城县东街邮政局当局长，后来调到伊宁市邮政局工作，是一位思想开明、思维活跃、爱好摄影的人，1945年迁往甘肃兰州，兰州解放



解放初期伊宁市街巷。

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疆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病故于乌鲁木齐。次子石元璞文化水平较高，一直外出闯荡，1946年住在三角地府后街的左公祠附近，后来迁居南门附近一所院内，因在盛世才统治下做过一些坏事，新疆和平解放后受到政府清算。三子石元禄是我母亲的弟弟，从小受到溺爱，好逸恶劳，吸食鸦片，新中国成立后才算戒掉烟瘾，有了正式职业。我的母亲石瑞堂幼承家教约束，很会操持家务，尤其善于女红，家中的绣花枕套、鞋面、窗帘、香包等等，都是她一手钩织，十分精巧，因此街坊邻居的女流常常聚到我家，与母亲切磋女红手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伊宁石家逐渐由富裕走向败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名门望族的共同命运。老举人在世时，靠着经营药铺，全家人还能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他一去世，家底很快就被素有恶习的老二和老三两个儿子掏空，也给我母亲带来多次改嫁的悲惨命运。这些祖辈的人生际遇，都是我在懂事之后才知晓的。今天回想起来，正是社会的动荡和家庭的变故，使我小小年纪就懂得许多人情世故，使我有着同龄孩子所不具备的体魄、胆量和生存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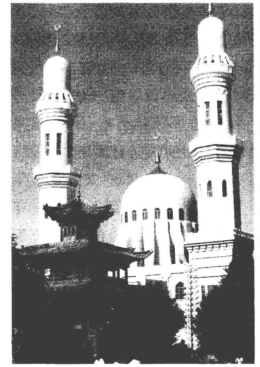
伊宁汉人街附近浅滩水源地的景色。

我最先的朦胧记忆是在老霍城，父亲武杰又名武建业（后来才知道是继父），1939年担任霍尔果斯边卡大队的大队长。他在老霍城西街有一座住宅，我和母亲就住在那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制服领章上有两杠两星，还有"保2"字样，据说是中校军衔，家里有勤务兵。此前他曾担任昭苏县松北边卡队长，在昭苏县圣祐庙给我请来护身符，放于我的襁褓之中，这是我长大之后听母亲讲的。母亲还告诉我，父亲是早年从黑龙江借道苏联西伯利亚来到新疆的，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军官。这支军队到达新疆之后，正值盛世才刚刚执政，他为了坐稳新疆督办之位，不得不倚重来自东北的军人。后来盛世才联俄联共，父亲便与新兵营的共产党人胡鉴一起调入新疆边务处，并分别被任命为边卡大队的大队长，父亲驻守伊犁，胡鉴驻守蒲犁（即塔什库尔干），没过多久胡鉴回到延安。1949年胡鉴作为解放军进疆部队战车团的团长，率部挺进乌鲁木齐，还特意到三角地看望我的父亲。那时父亲早已离开伊犁的边防哨卡，在乌鲁木齐三角地经营"一品香"饭馆。



1985年伊宁斯大林街一带的街头新建筑。

当时父亲所在的霍尔果斯边防站，距老霍城我家住宅不是很远，他经常骑马往返于边防站与县城之间，我曾随他骑马到过边防站多次。在我的印象中，霍尔果斯边防站是一座军营，青砖大门直对中苏两国交界处的大桥。当时新疆与苏联的经济交往比较频繁，石



2005 年修建完工的拜图拉清真寺(后)和清乾隆年间修筑的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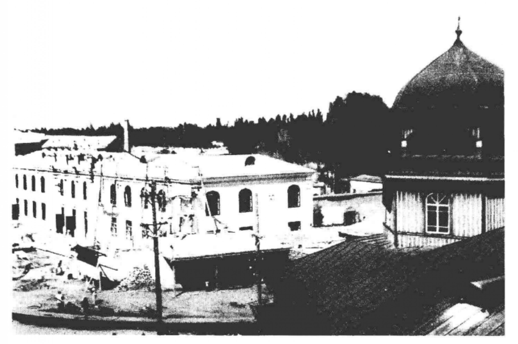
伊宁河湾乌孜别克族清真寺的塔楼。

油开采加工机械、有色金属采矿机械、布匹、食糖、皮革和搪瓷制品等大宗物资,都从霍尔果斯口岸运进运出。苏德战争爆发后,据说苏联把作战飞机的维修、保养、组装部分放在新疆,大量飞机部件也是从霍尔果斯口岸运到新疆境内的,因此口岸上的车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中苏边境会晤一般在老霍城西门附近的俄式房屋里举行。我随父亲参加过一次边防会晤后的宴请,宴会的餐桌上既有中餐也有西餐,还有鱼子酱之类的食品。

在老霍城住的时间不长,因父亲升迁,我们移居绥定县城。他所在的军营设在绥定县城东街,我家住在公安局附近的一座四合院中。绥定城内的汉族居民,大多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后裔,店铺大多是他们所开。天津杨柳青人是追随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新疆的,春秋迭代而乡音难改,因此天津口音特别明显。绥定城外的居民主要是维吾尔族和回族,我喜欢去的地方是南门外面的集贸市

场，那里比较繁华，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每逢重大节日，绥定县城就格外热闹。春节期间天津杨柳青人张灯结彩，扭秧歌，耍社火，凸显着汉族文化特色；而在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期间，木马旋转，羯鼓敲响，唢呐高奏，清真寺前的萨玛舞欢快而热烈，别有风情。

伊犁是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荟萃之地，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庙宇、道教寺观、基督教堂、东正教堂、夫子庙、娘娘庙、关帝庙等等，多有分布。其中昭苏县的圣祐庙、察布查尔县的靖远寺、伊宁市的东正教堂和南关两座清真寺更是规模宏大。清朝政府设置的伊犁九城，比如惠远城、宁远城、绥定城、瞻德城、广仁城、拱宸城、熙春城、惠宁城等等，几乎都有将军庙和城隍庙，即便是天山之中的三台、芦草沟、大西沟一带也都建有佛寺或道观。大西沟佛寺供奉着11位佛祖，有37座神龛，虽距伊宁近百公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善男信女每年都来参加庙会。我家迁居绥定县城之后，母亲带着我乘坐当时流行的六根棍马车行走一天到达大西沟，连夜登上半山腰的佛洞。我似乎记得母亲焚香跪拜之后，在佛龛下摸了一粒石子，祈求



解放初期伊宁市尚存街头的古旧建筑。

佛祖保佑她再生一个女儿。

那时由于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联俄联共，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虽然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烽火连天，但新疆社会却呈现着暂时的平静和繁荣。可惜好景不长。1941至1942年，盛世才公然背信弃义，开始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政权，把在新疆工作的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投入监狱。我的父亲因在伊犁边卡与苏联人士交往较多，也被调到乌鲁木齐，并以“参与暴动”的罪名关押起来。从这时开始，我们家庭的不幸遭遇也就接踵而至。

父亲入狱之后，母亲和我便从绥定县城迁居伊宁市。此时的伊宁，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我就读的伊宁三民小学（又称区二小学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慷慨激昂的旋律，整天回荡在校园上空。我虽然是最小班级的一名学生，也将稚嫩的歌声汇入支援抗战的时代洪流之中。当时，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反帝文化部、著名作家沈雁冰领导的新疆文化协会编辑出版的抗日书刊广泛传阅，著名演员赵丹领导的新疆实验剧团演出的抗日剧目观者如潮。看到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领土的一组漫画，我恨不得立即斩断那些形象丑陋的魔爪。有一次，母亲带我到伊宁市北大街文化俱乐部观看抗日剧目演出，当演唱《渔光曲》时，舞台上有一幅水边晾晒鱼网的布景，画面优美，令人难忘。这次演出是乌鲁木齐抗日青年们组织的，受到伊宁市各族居民的热烈欢迎，进一步激发出伊宁市民同仇敌忾、抗战必胜的决心。

边城伊宁民族众多，按照当时的排序，有汉、满、蒙古、回、维吾尔、锡伯、索伦（达斡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归化（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兰其（种田者）等13个民族。我正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中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各民族风俗习惯的熏染。汉族、满族、蒙古族的春节和其他节日就不用说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肉孜节与古尔邦节，乌孜别克族的诺

鲁孜节，塔塔尔族的撒班节，锡伯族的西迁节，俄罗斯族的复活节等等，一年四季，此起彼伏。每到节日期间，边城伊宁的地方民族特色就表现得尤其明显。古尔邦节早晨，清真寺召唤教民的羯鼓声和唢呐声，把节日的欢乐传递到城区每个角落和各族市民的心田。俄罗斯族的复活节里，青年男女怀抱手风琴，跳着踢踏舞，走向街头，尽情欢唱。值得指出的是，沙皇俄国占领伊犁长达十年之久，俄国十月革命后又有大量难民迁入此城，因此伊宁市的建筑风格和饮食文化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特征。

母亲和我从绥定县城来到伊宁后，在桃提库鲁克（四座桥）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聚居的深巷之中安家。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母亲到汉人街一家帽店打工，把我们兄弟二人完全托付于三民小学。我失去家庭的管束，常把书包藏在汉人街附近的回族清真寺内，到风景如画的后滩去玩耍。伊宁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成为我弃学游玩的天堂。我常去游玩的地方首先是汉人街，因为姥姥一家就住在汉人街桥头的石家阁楼。那里彰显着以天津杨柳青人为主的汉族文化，也彰显着以当地维吾尔人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伊宁市汉人街形成于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追随西征大军而一路经商的天津杨柳青人，有一部分定居伊宁继续经商，久而久之形成一个商业区，这就是汉人街的雏形。汉人街商业的日渐繁荣，吸纳着俄国华侨、山西晋商、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手艺人，以及清朝伊犁将军府的八旗后人。我的外公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从惠远城伊犁将军府迁入汉人街的。1944年前后主导伊宁市汉人街商业活动的依然是天津杨柳青人，街道两旁的会馆、客栈、酒楼、药铺、当铺、照相馆、醋酱坊、杂货店、食品店等等，大多都是天津杨柳青人开办的。我之所以爱去汉人街，是因为于家干果店和赵家杂货店的瓜子、花生、糖果、冰糖葫芦等等总是让我馋涎欲滴。我对汉人街的益泉涌油坊和崔家烧酒坊也有特殊的记忆。有一次我被开水烫伤，就是把崔家酿酒用的芦苇垫子烧成灰，再调以香油涂抹治好的。



1939 年之汉人街杨柳青人李老太过世在街头出殡的情景。



清代从天津杨柳青人到达伊宁的一个家族。

汉人街的大桥一带也是伊宁市文化活动的中心。大桥南侧的三民电影院、后滩的文化舞台是最热闹的两个去处，1940年前后建成的三民影剧院，以放映苏联电影为主，曾放映过《夏伯阳》《布加乔夫》《一双玻璃鞋》《小黑飞马》，也放映过国产影片《荒江女侠》《啼笑姻缘》《壮志凌云》《台儿庄》等。三民影剧院经常演出一些天津戏班的京戏，如《玉堂春》《樊梨花》《狸猫换太子》《大闹天宫》《金鞭记》等等。有一次演出《大上吊》，剧中受尽屈辱的女主角在无常鬼"死了好，死了好，阴间有吃有喝，还有大皮袄"的煽惑中表演上吊，戏班特意在舞台上杀了一只公鸡驱除邪气。后滩文化舞台也有华侨戏班陈宝庆、明月仙、白云甫等著名演员的京戏，我对剧情记得不甚清楚，但对扮演美猴王孙悟空的演员翻斤斗、攀绳索的悬空动作，以及鬼戏《乌盆记》和喜剧《花子拾金》《顶板凳》都还记忆犹新。天津戏班和华侨戏班周鸿印、戴玉堂、魏亚秋、王明山等培养的七岁红、六岁红、俄汉混血儿大玛拉、小玛拉等演员演出的戏目也颇有名气。当时伊宁市有天津会馆、陕西会馆、山东会馆、东北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这些会馆除了演出本省的地方戏，每逢重大节日还表演社火、踩高跷、走高台、跑旱船、扭秧歌、打花鼓。伊宁市工商业联合会有一次为了庆祝节日，曾搞过一场由13个民族反串演出的东北大秧歌，轰动全城。我对走高台十分着迷，看到那些扮演仙女和神童的孩子站在细枝末梢上，真为他们担心，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怎么站上去的，细细的枝条又是怎么支撑他们的。汉人街大桥河畔百家商号的喧闹景象，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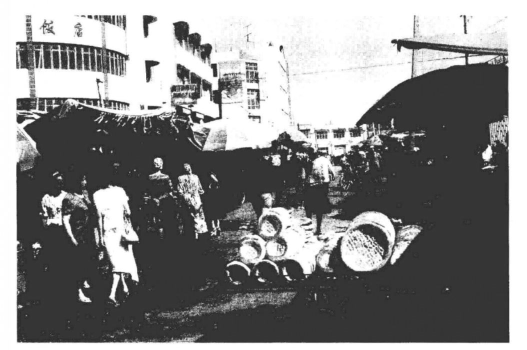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1942年前后我只有六七岁，除了知道父亲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我对社会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反正有母亲管吃管穿，也就无忧无虑，东游西荡，整天玩耍。何况伊宁市汉人街的繁华世界，后滩一带的河渠、湖塘、水磨、草地种种诱惑，哪能抵挡得住！我家小巷深处的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庭院，都种着很多花卉和果树，每当夏秋季节，果树枝头就会伸出院

墙，挂满嫣红的和金黄的果实。我进出小巷，必然要从这些庭院的门前走过，那诱人的黄杏、苹果、樱桃总是让我放慢脚步，寻找木杆或小石头打下果子，边吃边走，磨磨蹭蹭来到学校门口，这才发现又迟到了，老师手拿戒尺在等着呐！许多时候，我为了躲避戒尺的惩罚而不去学校，把书包藏在大桥附近一座清真寺的墙角旮旯，径直到风景秀丽的后滩去玩耍。后滩是伊宁市各族居民休闲娱乐的地方，绿树成荫，溪流潺潺，水清得诱人，草绿得诱人，一到那里便心旷神怡，因此傍晚纳凉的人很多。每到此时，说书的、耍把戏的、唱歌跳舞的、叫卖冰淇淋的、兜售皮囊马奶的不一而足，各种杂货小吃应有尽有。我不仅傍晚时分必到后滩东瞅西看，即使白天也要约上几个小朋友在后滩一带四处游荡，那清澈见底的河水、不急不慢的水磨、白绒绒的芦花和黑油油的蝌蚪，总是让我们这些顽童乐而忘归。

1942年夏末，随着又一次家庭变故的发生，我的欢乐时光结束了。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家里坐着一位陌生的男人，母亲好像对他诉说着什么。此后他经常到我家来，每次都给母亲带来新的不安。来的次数多了，我问母亲这人是谁，她这才告诉我，这位男人是我的生身之父，名叫高长泉，早年从甘肃武威来到新疆伊宁市，靠缝制皮裘和皮件谋生，有一次把富贵人家的狐皮大衣给做坏了，便弃家逃亡，一去就是6年。我的母亲生活没有着落，这才改嫁于武杰。此时我的生身之父来到家中，是想与我的母亲破镜重圆。作为一个破落的满族人家的孤女，我的母亲无依无靠，只能求助于在动乱年代同样被丈夫遗弃、带着孩子艰难度日的我表姐石玉姬。在盛世才联俄联共实行“六大政策”之前，新疆战乱频仍，从杨增新到金树人，从马仲英到盛世才，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妇女们囿于封建礼教，一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始终处于从属地位，遇到社会动荡，丈夫离家出走，她们便生计无着，不得不改嫁他人。母亲和我表姐，就是这样不幸的女人。我的母亲和表姐商量之后，认为复婚之事必须征得武杰同意，于是她就带着我与二哥武纯发，同

高姓父亲一道前往乌鲁木齐。

1942年六七月间的乌鲁木齐，表面上是平静的，实际上涌动着盛世才反苏反共的潜流。盛世才借口“阴谋暴动案”对进步人士包括我的继父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制造了许多冤狱，但他反苏反共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只是暗中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人。我们正是在这种罪恶潜流还没有完全表面化的时候来到乌鲁木齐的。在我这个7岁孩子的眼中，乌鲁木齐远远不如伊宁繁华，城内以汉族居民为主，南关以外的山西巷和二道桥商业区比较热闹，从北门外山梁上“一炮成功”的炮楼到小东门、小南门、小西门外的城郊，大部分是菜园和坟冈，红山脚下虽有庙宇但香火不旺，西公园的鉴湖和朝阳阁游人稀少。市区建筑除了比较壮观的城门楼和大十字天津杨柳青人开办的商号，再就是新疆督办公署的大楼。因为父亲高长泉是甘肃人，我们便住在乌鲁木齐市山西巷一家甘肃人开办的车马店中，左邻右舍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和回族居民，街区的商人也大多来自山西、甘肃和青海等地。不远处的龙泉街，有一眼清泉，车马店较



今日的汉人街（2007年7月）。

多，所以每天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从我们居住的山西巷到南关大寺、马市、二道桥、南梁洋行街一带，也是比较热闹的街区。

在乌鲁木齐暂住期间，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一是当时南关大寺至马市一带的街道正在整修，临街店铺的房顶都加盖了只有墙面没有屋子的假层楼面，后来听说是宋美龄、朱绍良等人要来乌鲁木齐视察，盛世才便弄虚作假，装潢门面，下令各家商铺搞起这面假墙，营造虚假的繁荣。二是乌鲁木齐河洪水泛滥，冲毁大桥，想去对岸的人，只好坐着大轮马车涉水而过，或者趁早晨水势稍弱时雇请脚夫背着过河，我同二哥看过这些惊险场面。再就是我们居住的山西巷离南门不远，城门东南一带大多是菜园，盛夏时节百合花开放，市区一些居民每到傍晚便来菜园观赏游玩。在只有一座西公园的乌鲁木齐，城郊的菜园成为市民买菜或消夏的好去处。

继父仍被盛世才关押着，我的母亲常常到法院去，与高姓父亲打官司。不知怎么回事，母亲被判入狱，关押在当时小东门法院对面的监狱之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乌鲁木齐。临行之前，我和二哥特意到监狱里探视母亲，看到母亲凄惨的神情，我们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自从父亲入狱以后，母亲无法养活我们，不得不去帽店打工，苦苦支撑，度日如年。母亲来到乌鲁木齐，原想寻求新的生计，不料却身陷牢狱。想到我们将与母亲长久离别，想到今后将要度过没有母亲的时光，一种悲哀和恐惧之感便笼罩我的心头。

高姓父亲带着我和二哥，从乌鲁木齐返回伊宁。我们坐着被称为“洋毛车”的苏联进口载重汽车，70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整整7天。尽管如此，这同过去乘马车、骑马、骑骆驼，甚至同挑着货担跟随清军赶大营的前辈相比，已是好多了。回到伊宁后，父亲受雇于西沙河子的一家皮革厂，宽阔的厂区内有几幢大型工房，西边有水塘和果园，春天里池塘的浅水处有泥鳅和白条鱼，盛开的桃花杏花倒映水中，别有一番景色，因此成为我们经常游玩的地方。

西沙河子没有商业区的喧闹，比我们曾经住过的汉人街及河湾

一带显得整洁而清静，白杨深处的街巷之中，除了维吾尔和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的传统住宅庭院，许多建筑都展现着俄罗斯风格。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移民留存下来的墙体厚实的建筑群落，每座庭院都是“人”字形铁皮屋顶，屋檐都有雕花围边，门庭窗棂也有雕饰，院内都有篱笆花园，附近还有东正教堂，以及中苏合资兴办的火电厂、面粉厂、皮革厂、乳胶厂等等，成为伊宁市独具风情的一隅。

当时父亲没有再娶，大哥武纯新也被带回伊宁，我们父子四人便住在皮革厂内东北角的一座房子里，中间是庭堂，对面是存放各种制革材料的库房。看来父亲既是厂里的生产技术员，又是材料保管员。皮革厂的工人大都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很少。大部分车间阴暗而潮湿，弥漫着皮革臭味和刺鼻的酸碱异味，只有制作马鞍和皮件的车间和成品车间比较明亮，虽然散发着已经熟制的皮革气味，但与那些刮油、清洗、发酵和烘制的车间相比，气味要好得多。当时的伊宁市制革工业比较发达，著名民族企业家玉山巴依的制革靴鞋厂，引进德国设备和技术生产的“禾热木”牌皮靴皮鞋颇有名气，尤其是一种底子垫着桦树皮并用油浸过的皮靴，据说人穿上站在泥水中一天一夜都不会透水。父亲所在皮革厂的王老板也很会经营，在我父亲技术指导下生产的苏式鞍具和皮件质量不错，特别是旱獭皮染成的水獭皮制成品，黑中透紫，油光锃亮。父亲在车间走来走去，进行技术指点，照顾不上我们兄弟。我放学之后便在车间转悠，并和工人一起在大食堂就餐。逢年过节，我们就到现今斯大林街汉族、维吾尔族和俄罗斯族杂居的商业区购买食物。如果说伊宁市汉人街集中体现着汉族文化，南门一带拜图拉清真寺和卡赞奇一带集中体现着少数民族文化，那么斯大林街就是各族文化集中展示的商业区。在一座汉族鼓楼的两侧，有墙体厚实的俄罗斯风格的文化设施和洋行货栈，而在两者之间，却分布着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店铺和餐馆。在伊宁市斯大林街，俄罗斯人开办的冷饮店、蛋糕店和门前挂着面包圈，放置着咸鱼、熏肉、火腿、香肠、列巴的店铺，特别

诱人。记得1943年春节，我们全家就是乘着雪橇在俄罗斯人开办的店铺买的蛋糕、糟鱼、火腿、香肠和面包。除夕傍晚，我们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乘着雪橇飞驰，听着辕马脖颈串铃的响声，看着身旁往来飞驰的雪橇，心情无比快乐。在1943年到1944年间父亲再娶之前，我们兄弟的饭食大都是同工人们一起吃烤馕喝奶茶，也常常从打馕师傅那里要一两个馕作午餐。由于没有母亲的照料，我同两位哥哥几乎过着流浪儿的生活。大哥武纯新最早跟随父亲外出流浪，跟着父亲学了一点儿谋生手艺。过去我们没在一起生活，因此我对大哥没有多少印象。自从1942年母亲入狱，父亲便把大哥、二哥和我从乌鲁木齐带回伊宁，此后只要父亲不在家中，大哥就给我们讲述一些他过去浪迹天涯的故事。不久听说我母亲已经出狱，父亲考虑到我母亲身边没有子女，便托人把大哥武纯新带到乌鲁木齐陪伴母亲。

经常给我说南道北的大哥离家走了，我便感到有些孤寂，皮革厂车间也就成为我和二哥武纯发的玩耍之处，工人们也给予我们许多照顾，其中对我帮助最多的是维吾尔族青年达吾提，他五官端正，面带笑容，心地善良，络腮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我每次到他的车间去玩儿，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有时还叫一声“巴郎”，给我一只苹果。达吾提所在的车间虽然弥漫着生皮革的腐臭，但他裹着围裙刮取皮张油脂的熟练动作以及闲暇时的言谈笑语，常常使我愿意到他身旁去凑热闹。而令我对达吾提心存感激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平日我们的洗漱都是自己去做，早晨起来到厂区门口的小河边洗把脸便草草了事，夏天还可以，冬天就不行了，河水冰凉，带着冰碴，洗不干净，时间一长我那两只黑黑的小手就结起厚茧，而且裂开许多血口。一天被达吾提看到，他托起我的双手说：“可怜的小弟，我给你想个法子吧！”当天晚上他就把我领到厂区门口工人们取暖的煤火堆前，把从羊皮上刮下的油脂涂在我的手背，让我抬起两手走近火堆烘烤，每次烘烤之后，再把我拉车间用热水烫洗双手，如此反复多日，我的小手血口愈合，黑茧也渐渐消失。厂区门口的煤火堆，是各车间

工人们的聚会场所，每到傍晚下班时分，大家为了驱寒取暖，便聚拢在煤火堆前逗趣说笑，我的参与也给他们增添了一些相互逗趣的笑料。在涂油烘烤手背的日子里，有的人看着我裂口的双手和黑黑的脖颈，开玩笑说："可怜的孩子，你有个妈妈才行呀。你如果愿意，就到我家去吧，干脆认个维吾尔族干妈，保准让你这双小手变得又白又胖。"旁边的人说："别去！他家不行，天天喝的是乌麻什（面糊）吃的是扎格日（玉米饼）。还是到我们家去吧，我的女人会给你煮糖浆，给你做雪白雪白的蛋清花，既好吃又好看，还有俄罗斯的马洛日纳（果酱）。"听到这些，达吾提说："小弟，今天咱们算是掉进大话窝里啦！他们说的这些东西，连自己都很少吃过，是拿吃不着的肉馕在诳你呢！"说得大家一阵哄笑。达吾提那时还没娶妻，是个乐天派，而且能歌善舞，闲暇之时常与同伴聚在一起，弹着"都塔尔"和"热瓦甫"，敲着手鼓，打着"沙巴依"欢歌起舞。他们大都来自遥远的南疆，而流浪者的歌声最能勾起人们对故乡、对情人的思念。在一次即兴演唱中，达吾提的歌声既表达出四处流浪的惆怅，也表达出打情骂俏、幽默滑稽的乐观。他喜欢唱歌，平日里走路时也唱，工作时也唱。他最爱唱的一支歌是"布谷鸟儿飞来了，美哉！象征着春天来到了，想起我的爱人来，我的心儿燃烧了。布谷鸟儿飞来了，美哉！落在我家树上了，我的心儿突突跳，情人呀，象征着爱人来到了。布谷鸟儿飞来了，美哉！花园的花儿开放了，天真画眉在叫时，情人呀，我和爱人在园里。"我问达吾提为什么总爱唱这支歌，他说那是唱给心上人听的。我问："我能不能见到她？"他说："会的，你一定会见到。"时隔不久，他向工人兄弟们宣布将要举行婚礼，当然我也是被邀请的客人之一。

达吾提结婚那天，我们迎亲的六根棍轻便马车队围着新郎奔驰在伊宁街头，一路上打着手鼓，吹着唢呐，唱着情歌，辕马脖颈的串铃也叮当作响，喜气洋洋。达吾提头戴礼帽，身着制服，衬衣领口绣有花边，显得格外精神。他的笑容透露出内心的喜悦，路上不断地与

青年朋友们逗趣，高高兴兴来到新娘子的门前。新娘子家的院落中，挂满了贺喜的绸幛，摆放着装满衣物的箱柜，到处是裙衫艳丽的妇女和欢呼雀跃的孩子。当迎亲车队到来之时，老年妇女把糖果撒给孩子们，随着嫁妆和贺礼被送上马车，新娘子被几位亲戚用花毯兜着送上最头前的一辆马车。到达新郎家里后，新娘便被隔离在洞房之中，我和一群孩子透过玻璃窗争看新娘的秀容。那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性，面带羞涩而甜美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对嫁给达吾提这样的丈夫感到多么地称心。那天的婚宴热闹而丰盛，达吾提可能是倾其所有办此婚宴的。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在铺着洁白的达斯迪汉（饭单）的条桌上，摆着糖果、糕点、馓子、烤馕和琥珀色糖浆，用白糖和鸡蛋打出的雪白而起着泡沫的蛋清花，配以樱桃和黄杏果酱，真是令人馋涎欲滴。吃过甜点，便是大盘的羊肉抓饭，油中透亮的大米，金黄色的胡萝卜，尤其是放在顶端的焦黄的肉块，散发出浓郁的饭香肉香。参加婚礼的男宾和女宾，都被分隔在不同的房中予以招待，饭后妇女们围着新娘唱歌，不时夹杂着银铃般的笑声，而院里的男宾歌声厚重，舞姿粗犷，呈现着另一种狂欢气氛。

达吾提结婚后仍在皮革厂劳作。自他有了家室之后，每天都从家中带来饭食，若带来好吃的，总要把我叫到一起享用。这种人间的友情，在我心底埋下了为人处世崇高品质的种子，他的勤劳和乐观也给我后来的人生注入一种消磨不去的活力。我和达吾提的深厚友谊，直到父亲娶了继母我家搬到西沙河子三巷之后还在延续，甚至在后来三区革命爆发时也未曾中断。

1944年11月，伊宁已进入初冬季节，清晨的寒气笼罩着城区。作为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像往常一样走出萧条的街巷，由西沙河子前往南关第一小学。我走到电灯公司和面粉厂附近，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炸声。起初我只是感到惊奇，不一会儿就看到街上行人慌乱地奔跑起来，我随着他们跑回家中。父亲在极度忙乱之中把我们安顿在对门的公安局院内，说要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再来接我

们。没有料到，这就是我同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危难之时的诀别。

当时的伊宁市公安局坐落在西沙河子公园附近，院墙高大而厚实，像是一座坚固的城堡。正因为如此，三区革命的枪声一响，许多汉族居民便跑到公安局寻求庇护。我们进入公安局大院之后，被安顿到后院作为牢房的几间空着的囚室，等待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得到平息。从上午到晚上，街头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公安局这一避难之所，正是三区革命军最先攻击和夺取的要地。当时除了北大营和王老板皮革厂闲置工房中驻有一营国民党守军之外，伊宁市区的设防实际上是很薄弱的，腐败的国民党军官及其兵痞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很快就被三区革命军消灭，只有驻守北大营、二林巴克到飞机场一带的原东北军部分官兵还在抵抗，其他的武装已被解除和消灭。因此公安局在经过一天一夜的强攻之后，到第二天凌晨便岌岌可危。这一危机波及到寻求庇护的人们中间，起初是惊慌骚动，继而是择路奔逃。我和二哥及继母，随着大批难民仓皇登上高高的墙垛。墙头上的守卫士卒已不知去向，枪支弹药散落一地，狼藉不堪。大家也顾不上墙有多高，纷纷纵身跳了下去，有些摔断了腿的老人大声呻吟。我们从被人踢开的窗户里钻出去，一口气奔逃到伊犁河边，直到渡河之后来到察布查尔地界才心神稍定，心想总算逃出来了。在一些成年人的引导中，我们来到第一处避难之地——锡伯族聚居的第八牛录。早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3275人，从辽宁沈阳太平寺出发，离开东北故乡远赴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他们把这一天定为西迁节。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渡过辽河，翻越大兴安岭，北渡克鲁仑河，西渡乌里雅苏台的扎布汗河，再渡额尔齐斯河，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伊犁河封冻之际，渡河来到目的地察布查尔，路上走了一年零六个月。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按照行旅建制设置8个牛录，从东到西分布于伊犁河南岸。第八牛录位于东头，同别的牛录一样建有城墙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绝大部分族人都居住城内。从进入第八

牛录城内开始，我们这些难民就在锡伯族人的接济下，度过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

伊犁三区革命的初期，军政大权一度操纵在破坏祖国统一反汉排汉的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手中，他们在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同时，也杀害无辜平民，因而在汉族群众中造成极大恐慌，加之谣言的蛊惑，一些汉族平民便逃到察布查尔，寄居在各个牛录。那年我只有9岁，尚不懂事，不知道寄居期间发生了什么，致使我们从第八牛录移居到第六牛录（现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首府所在地）一户俄罗斯人家中。在三区革命最初的无政府状态中，一部分人受到民族分裂分子的挑唆，常常三五成群，持枪携棒，到察布查尔城乡搜寻汉族人。每当这种消息传来，我们这些汉族难民就很恐慌。俄罗斯主妇害怕受到牵连，便把我们母子三人藏匿到另一院落的空房里。曾有两个背着长枪的哈萨克人来到我们居住的房中，看到我们孤儿寡母十分悲惨，也可能是出于怜悯之心才平和地离去。还有一次来人较多，吓得我们只好跑到城墙底下一个洞中去躲藏。旷野之中积雪茫茫，我因为寒冷难耐，就独自一人向村子走去，快到村里时，一伙拿着棍棒、背着枪械的人，从另一条田埂上迎面走来，看着我这个边走边哭的孩子，没有理会。后来我们母子虽然又聚到一起，但继母藏在灶坑中的金银首饰却不翼而飞。

我们寄居察布查尔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令我终生难忘。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既有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也有对救命之恩的感念。救助我们的俄罗斯主妇娜达莎，虽然长期处在锡伯族聚居区，但仍保留着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给我们端来的主食是面包和苏波汤，有时也用土豆泥做成油炸或烤制的面饺，别有风味。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受到雪地躲藏而被搜寻的惊吓之后，右腿根部出现疖肿，在没有任何药物救治的村子里，只好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后来形成大大的脓疮，直到无法走路时才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先是二哥背着我到村里寻找懂得医术的人，用发面酵母敷在疮面上亦然拔不出脓血，最

后还是俄罗斯主妇娜达莎从邻村请来一位哈萨克族牧羊人进行治疗。这是一位慈眉善目、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他看过肿胀的脓疮后对娜达莎说："孩子年纪小，脓包长得地方不好，不治很危险，只好给他开一刀，愿胡达保佑他吧！"他用清水洗过疮面，从所穿皮靴的靴腰中拿出一把剃刀，在皮裤子上蹭了几下，然后在炉火中烤过算是消毒，很熟练地切开脓包，脓血立即流了半盆，接着他用水清理一番，让娜塔莎继续用发面酵母敷上，经过极度的疼痛之后，五六天时间竟然愈合了。此后数十年中，每当我看到腿部的疤痕时，便会想起俄罗斯主妇娜达莎和她找来为我治病的哈萨克牧人。

1944年12月底，伊宁市趋于平静，我们涉过封冻的伊犁河，由察布查尔回到伊宁。家里已被洗劫一空，父亲也没有音讯，我们只好住在继母的娘家，从此便与继母的娘家人相依为命。

回到伊宁的最初一段时间，战乱虽然基本平息，但据守在二林巴克、北大营和飞机场一带的国民党守军依然进行着顽强抵抗，来自城区北部的枪声，每天都让伊宁居民惊恐不安。当国民党守军即将弹尽粮绝时，从乌鲁木齐飞来的运输机每隔几天都会在北大营的上空投放物资，每到此时，双方争夺物资的战斗就十分激烈，给人们造成一次次新的紧张。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45年1月，因为天空连降大雪，飞机空投被迫中断，当时北大营一带的国民党守军虽然突出重围抢回一些粮食，最终还是支持不住，北大营不久便被攻克。

战乱彻底平息之后，继母打听到皮革厂王老板已在动乱初期死亡，他的妻子与苏联顾问生活在一起。动乱之前我们住同院，找到王老板的夫人，就有可能知道我家丢失财物的下落。我们经过多方打问，才在一所学校附近找到王老板夫人。她是出生在伊宁的汉族与俄罗斯族混血儿，动乱之前我就见过，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十分漂亮。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已是傍晚，她没让我们进屋，继母和她站在昏暗的廊檐下交谈，得知我家丢失的财物无法寻找，只好回到家中。后来继母再次见到王老板夫人时，她在斯大林街商业区的一家俄式服

装店里当裁缝。

没有男人的家庭，犹如没有风帆的船。我们和继母娘家共有八口人，生活没有着落。二哥被送到汉人街南叉子拐角处的棺材铺当学徒，我和继母娘家的两个男孩到街头去捡菜叶和煤核。有一次继母还领着我到父亲先前工作的皮革厂寻找活计，可皮革厂已经变成关押汉族青壮年的地方，每个车间都关着几十个汉族男子。可巧的是，我们在皮革厂遇到达吾提，真是喜出望外。达吾提说，他从战乱开始时就寻找我们，到我家后不见一人，屋里已被抢劫一空，后来还一直打听我们的下落。我便把躲到察布查尔的前因后果对他讲了，达吾提高兴地说："还好。胡达总算保佑了你们。"得知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很悲痛，叹口气说："可怜的孩子呀！我这里没有别的，就把刚刚烤好的馕拿一些吧。"说着就给装了一面袋馕让我背回来。看情形他的生活也不甚宽余，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去打扰。

我们的生活难以维持，继母只好求助于她的大姐家，这样我们就从继母娘家搬到四座桥的深巷之中，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伊宁战乱结束以后，一场伤寒病接着暴发，我的继母也受到感染，连续多天高烧不退，每到傍晚更是严重，神志不清，呓语不断，令人害怕。因为无钱看病，我们只好给她用毛巾冷敷，挺过一段时间便痊愈了。继母的病情刚刚好转，她娘家的嫂嫂那里便来告急，说是也得伤寒病了。继母的嫂嫂生有两子一女，一个男孩羊角风，一个男孩年纪小，女儿因兵荒马乱不敢出门，让我到汉人街他们家中去护理。继母的嫂嫂当时只有30多岁，原本精明干练，自从得了伤寒病，委靡不振，气色很差，整天卧病在床，全靠我熬粥煮饭，端屎端尿。这些苦和累都不算什么。可怕的是，她每天傍晚高烧之时说的胡话，特别是用她已故妹妹的语调说出的一番话语，真是令我魂飞魄散。她的妹妹在三区革命初期就死于绥定县城。一天傍晚，太阳刚刚落山，继母的嫂嫂便因高烧疯魔起来。先是几次呼叫妹妹的名字，接着改变声调，以她妹妹的口气说："我现在的日子好苦啊！腿也瘸了，无食无衣，快给我送

点衣服和钱吧!”这种悲伤的哭诉,令我毛骨悚然。伤寒病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傍晚时分要发高烧,随之出现神志昏迷,产生错觉,将从前的一些经历胡乱道出,虽然荒唐,却也可怕。正是伤寒病人的这一症状,才使“一贯道”驱魔逐鬼的把戏有机可乘。继母的嫂嫂比较相信这种歪门邪道,发病之时便让我把“一贯道”的法师请来。法师先在一碗清水中竖起几根筷子,稍后点燃黄表纸钱,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在筷子头上旋转黄纸,待到黄纸快要燃尽时,砍倒筷子,手持菜刀,在案板上边拍边吼,说:“纸钱也给你烧了,你赶快走吧!”这样就算赶走了缠在病人身上的冤魂,法师临走时还在门框贴上一张谁也无法辨认的所谓“符咒”。后来还是我用侍奉继母的办法,将冷毛巾敷在病人脑门上,才使她安静下来。这段经历,咋看起来似乎有着令人费解的迷信色彩,实际上是病人平时思念妹妹而留存于大脑中的记忆,头脑发烧时信号紊乱,把亲人的音容笑貌再现出来。这就是“一贯道”法师利用病人出现错觉而取得信赖的把戏。我也看到过“一贯道”“点传师”做法事的情景,他们坐在张天师的神龛前,双目紧闭,假装神灵附体,手持木圈上绑着的竹签,在沙盘上写画出令人难辨的文字符号,从而欺骗信徒和求助者。

在那段日子里,穷困和病痛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亲友。虽然三区政府调整策略,在阿巴索夫主持下成立了汉族协会,我们也得到一些救助,但日子过得依然艰难,我不得不继续捡菜叶、拾煤核。1945年夏天,我们从汉人街北叉子大杂院迁入铁匠街巴扎,这里虽然地处偏僻,但靠近夏力洋行所在的商业区及河湾一带的马市和煤场,希望能够好过一些。铁匠街巴扎是各种手艺人的荟萃之地,容纳着伊宁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当,因而社会经济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顾名思义,铁匠街巴扎有打制各种铁器、马蹄铁的炉火熊熊的铁匠铺,有敲击洋铁皮制作煤炉、铁盆、铁壶之类的洋铁铺,有加工金银珠宝饰件的铺面,有制作鞍鞯靴鞋的铺面,还有榨油作坊和石灰专卖场,可以说居民所需的生活品和手工艺品应有尽有。进入街区,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吱吱呀呀的榨油声，忽高忽低的叫卖声，虽然显得杂乱无章，但却有着一种古朴的气氛。

我们的住房在街区末端，是一座房租低廉的两间居室的土屋，近旁有一间卖石灰的小店和两家油坊。卖石灰的店主大叔体格健壮，诙谐健谈。伊宁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居民，喜欢把自家的院墙粉刷成白色和蓝色，所以石灰店的生意也很不错。看到我这个因捡煤核弄得黑糊糊的孩子，店主大叔出于怜悯之心，经常给我几个小钱。油坊的老板我不太熟悉，但我和他的雇工却成为朋友，其中一位名叫塔西阿訇的榨油工，个头矮小，诚实憨厚，一天到晚套着拉磨的毛驴，绕着榨油木臼不停地转着圈子，菜籽和胡麻在大木碓里经过槽臼碾压，伴着吱吱呀呀的声响，清油从木槽出口涓涓流出。我常常专注于他的这种神奇的劳动，还帮他赶着蒙住眼睛的毛驴围着榨油槽臼转个不停，有时帮他往木槽中装填菜籽。有好几次他趁老板不在，让我回家拿碗来接点清油。在铁匠街巴扎居住的日子里，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同情和帮助，有时在家中受了委屈，心情不好，离家出走，不是在街头停放的马车上过夜，就是到维吾尔族的馕房去取暖，干点小活，混个馕吃。

在铁匠街巴扎的日子里，继母的兄长，也就是我称作舅舅的男子，被关押在西沙河子公安局的牢房里。他是在三区革命初期绥定县城失陷之后逃至惠远而被押送到伊宁的，虽然躲过不死之难，却也难免牢狱之灾。从1944年11月下旬到1946年我离开伊宁，从来没有见到过他。那段时间，姥姥和舅母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已是捉襟见肘，还要想方设法弄点好吃的东西送给狱中亲人。他们家的大孩子患有羊角风，常常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二姑娘和我的小姨虽然懂事，但却害怕散兵游勇不便出门，许多事情只有靠我这个不满9岁的孩子去做，给狱中送饭的事也必然由我承担，拾煤核、捡菜叶也是我和他家小儿子每天必须完成的活计。生活之困顿，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也曾希望找到一条新的生活出路，但因年纪幼小，不

知如何是好。一位赶着马车出售煤炭的维吾尔族大叔，看着我这个又黑又瘦又矮小的孩子跟在车后，捡拾从马车上颠簸下来的煤核，便停下车来，说："巴郎，跟我到辟力青去吧！去那里挖煤，或者不论干点什么，都比你现在强。你要愿意去，我先给煤窑的老板说说，行与不行，下个礼拜的主麻日（星期五）你在这里等我。"当时我答应了，后来左思又想，还是不去为好。星期五见面时，我告诉这位维吾尔族大叔："我现在还小，再大一点儿就跟您去挖煤。"

在铁匠街巴扎居住期间的生活虽然极端困难，但也有着短暂的快乐和趣事。铁匠街巴扎没有附近分布着洋行和商号的北大街那么宽阔和深长，但也算是一个热闹的去处。因为这里的手工制品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招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所以有着别处街头看不到的乐事。比如古尔邦节期间在大街上看不到的"斗羊"游戏、往屋顶掷西瓜的比赛、掷羊骨碰彩蛋的赌博、饭馆茶馆弹着"热瓦甫""都塔尔"的聚会弹唱等等，都洋溢着古老的情调和浓郁的风情。尤其是"抵羊"，比赛者各牵一只盘着粗大犄角、体格雄壮的公羊，等待围观的人们押上赌注之后，便为各在一头相距约5米的羊只做好准备，裁判发出指令，参赛的羊只立即冲上前去，竖起身体，用自己的头部顶撞对方的头部。在粗重而有力的撞击之下，怯阵躲避或者卧倒在地的羊只便是输家。这种活动有时就在我家门前举行，每到此时出售石灰的大叔都会热心参与。他也喜爱向屋顶投掷西瓜的比赛，凭借他健壮的体格，诙谐的心态，每次赛事都能把掷不到屋顶的大瓜投掷上去，从而获得冠军。瓜果成熟的季节，在铁匠街巴扎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游戏。我也常在观战的人群中，为卖石灰的大叔呐喊助威。

童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对我后来的成长也有好处。失去父母后的孤独无依，战乱爆发时的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委屈无奈，幼小心灵的迷乱彷徨，犹如一堂堂生动的课程，从体魄、性格、生存意志到价值取向，给我以连续性、全方位的锤炼，使一个边城孩子逐渐走

向成熟。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要算是在糖坊度过的那些时光了。

1945年底，我们寄居的继母娘家，生活实在是难以维持了，我便被送到继母的大姐家中。她的丈夫是个生意人，家有三个女儿，最大的十四五岁，一家五口住在伊宁河湾附近维吾尔族聚居区四座桥的一条深巷之中，院落很大，没有院门，墙已残破，院墙入口的左侧住着一位维吾尔族孤身哑女，院落北侧住着一家汉族人，再往里便是我家主人的三间居室，对面是厨房和柴房，靠近院墙豁口拴着一条大花狗，便是全院住户的守护神。我刚去时，先是给主人看守摆放在露天集市上的瓷器摊，货品中有少许产自苏联的大花瓷碗瓷壶，大部分则是过去山西、天津客商用骆驼队运来的瓷器，有花瓶、帽筒、茶壶、茶杯、碗盘、餐碟之类的用具，全部摆放在木柜之上，早晨拿出，晚上入柜。除了我看守的瓷器摊位，旁边也有天津商人的店铺和货摊。因为是集市贸易，小商小贩、饮食餐点也混杂其中，显得比较杂乱。这个地段与另一条有俄罗斯塔式尖顶、厚重深沉的商号相比，略显卑微却也繁荣。整个夏末初秋，我一直坚守瓷器摊位，按照主人的嘱咐，热情招呼各族顾客。有的时候，主人也来查看和询问销售情况，待不多时便去进行其他的营生。他是一个30多岁的精明男人，个头不高，眼光敏锐，颇有城府。三区革命爆发时，因他住在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聚居区，为了使自己融合于邻里之中而出行方便，他便蓄起胡须，夏天头戴维吾尔族礼帽，身着廉价的西服式便装，冬天则头戴绒毛围边的黑色棉帽，出门时身着维吾尔人称作“袷袢”的无领对襟长袍，俨然一副当地少数民族的装扮。每逢主麻日（星期五），他也同有些汉族人一样，混进少数民族人群中，到清真寺做礼拜。

随着伊宁社会生活的安定，主人经营活动的空间也不断扩大，在迎合市场需求方面，他也是多变之人，许多时候都表现出精明的算计。他虽然态度谦和，待人热情，但在家里却是说一不二的，非常威严。因为他家都是女孩，除了看守瓷器摊位，我还承担着挑水、背

炭之类的家务重活。他家的二姑娘身体健壮，有一股男孩子的劲头，有时她也帮我干点类似的活儿。女主人即我的大姨，老实厚道，心地善良，平日里给予我许多关照。

看守瓷器摊位时，我除了早晨能吃点稀饭和干粮，中午一般没有饭吃，战乱之时缺医少药，有什么病也只有忍着。一次我发高烧，病得不轻，主人给了几毛钱，让我到近旁喝碗用冰碴稀释的酸牛奶退烧。说也真灵，我喝过那碗冰水，病情还真的减轻了。

经营瓷器的过程中，主人因买了一个汉族女人的旧瓷器，便惹来纠缠不休的麻烦。那个汉族女人总说还有瓷器要卖，但要预支点钱，不然她就不走。这是一个瘦高的女人，面容又黑又瘦，一脸无赖之相，像是吸毒者。有一次她故技重演，说家里还有一件好瓷瓶，要求主人预付定金，主人不相信她的话，她就同主人一道回家拿来这件瓷器，从此更加没完没了，每次来后都要预支些钱。主人如果不给，她反而拿走摊位上的几件瓷器，弄得主人叫苦不迭。因为近旁还有天津人的瓷器铺面，主人怕丢失面子，也不便声张。事后我听近旁店铺的人们议论，那个汉族女人打吗啡已到无处下针的程度。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此人。

入冬以后，瓷器摊位无法露天摆放，主人便在乌孜别克俱乐部对面租赁一间土屋，临街开着一个大窗户，算是店铺的门面，靠窗有一小门通向店铺和后室。店铺门前便是发源于后滩泉水汇集处的一道清流，当地人称为河湾。那里虽然离热闹的汉人街不远，但却是一处僻静的街区，也是乌孜别克族文化宗教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店铺对面分布着乌孜别克俱乐部、学校和礼拜寺，建筑风格独特，绿色的铁皮屋顶，配以雕花的屋檐和窗棂，是一组既有俄罗斯风格又有当地维吾尔人墙面粉白和天蓝色调的建筑群，尤其是清真寺全为一砖到顶的砖木结构，宽阔的屋檐和大庭中礼拜者所朝向的壁龛，古兰经的纹饰和几何形图案雕饰分布于大庭的四壁，而门楼顶端呼唤教民礼拜的高高耸立的塔楼，同远处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飞檐瓦顶

的另一座回民清真寺遥相呼应，构成边城伊宁多民族聚居的显著特色。

伊宁市汉人街的大桥一带，每到冬季制作麦芽糖的作坊有好几家。主人租赁的铺面和土屋，就是为了开办制糖作坊。这样，我将在这座阴冷黑暗的土屋里，度过一段孤独、疲累、也有短暂快乐的时光。最先入住土屋的只有我一人。时值11月，伊宁已经下过第一场雪，幽暗而透风的土屋几乎一无所有。入夜以后，我只好在屋角避风处垫着一块毡片，盖着破被，度过没有炉火、没有灯光、令人胆寒的夜晚。制作麦芽糖，需要熬糖的大锅和发酵池。不久主人便雇来一位修补房屋和开挖灶坑的维吾尔族中年劳工。他个头高大，面容黑瘦，留着络腮胡须，双手积满厚茧，一看便知是四处打工的流浪汉。他的到来使我不再害怕黑夜的孤寂。看着空空如也、四处透风的土屋，他摇头叹息，问我："小兄弟，你来几天了？"我说已经4天了。他说："这么冷的房子，你穿得又是这么单薄，这怎么行？来，咱们想点办法让房子热起来，起码不能让自己受冻。"说着就用镐头在墙角掏出一个排烟洞口，捡来一些煤块，燃起一堆炭火。此后，我们两人晚上便在炭火堆旁取暖睡觉，有时睡不着，他就给我讲述一些自己的经历。他的老家在南疆喀什一个偏远的村庄，苛捐杂税和各种盘剥弄得他无法养家糊口，妻子也跟别人跑了，他只身一人从阿克苏的温宿县翻过天山木扎特冰川达坂，经过昭苏县和特克斯县来到伊宁，无依无靠，四处打工，虽然居无定所，却也自由自在。他问过我的身世，我回答从小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战乱开始时父亲就走失了，我和继母躲进公安局院子，后来听说父亲到二林巴克飞机场和北大营一带寻找安全的地方，没想到在机场被攻陷之后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我在继母的亲戚家。听完我的诉说，他很是感慨："穷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管什么朝代也改变不了。我们穆斯林，心中只有胡达，每天做礼拜也能得到一些安慰。我是个遇事不愁的人，只要胡达保佑，我们总能找到快乐。"在深夜的炭火旁，微弱的亮光和温暖，加之倾

心的交流，给我增添了生活的勇气。我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常常在这种氛围和心灵感应中进入梦乡。

深深的灶坑挖好了，巨大的铁锅镶嵌在灶坑上，再给大锅周边垒起约一米高的围沿，并用土坯围拢起发酵的陶缸，这便是制作麦芽糖的主要设施。两个装置完成之后，不久便来了一位回族师傅，他个头不高，面容白净，又是一张娃娃脸，显得格外年轻。他30岁出头，在伊宁城区的糖坊中已经干了好几年，算是一个制糖工匠了。熬糖和出糖的日子，整个糖坊热气蒸腾，弥漫着既酸又甜的气味。那是最紧张最劳累，对我来说也是最甜蜜的日子。回族师傅小马比较乐观，他来之后，我同维吾尔族赛依提的生活也变了样，墙下冒烟的洞口被堵死了，炉火的光焰照亮了糖坊，做糖的时候有说有笑，黑暗无光的土屋变得很有人气。小马师傅做糖的技术十分熟练。糖稀的制法很简单，只要把发酵后的麦芽汁熬稠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而要做出芝麻棍棍糖、元宝糖、蛋蛋糖等，就比较麻烦，必须把熬得更加浓稠的糖浆一块一块捞到案板上，稍许冷却，再用手滚出粗大的长条，两人手中各执一个木棒，不断地拉动，如果没有副手，制糖师傅就得像拉把子面一样，把棕色的糖团拉白。拉白之后的糖条，还必须使其成槽，经过几次扣合拉长，直到成为比大拇指还粗的条状，再用烧热的刀片切割成约10厘米的条段，然后用箩筐装起，在大锅蒸腾的热气中稍稍熏蒸，再倒入撒满芝麻的案头搅拌，便是梅花般有五个孔隙的成品。这就是小马师傅的高超手艺。

制作麦芽糖的季节性很强，整个冬季都得忙个不停。那个年代伊宁汉族人较多，他们分布于市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当地人称为“汉人巴扎”的大桥一带，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据说他们的先辈大都是追随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大军进疆的，一边行路一边给士卒销售日用杂货，他们携家带口，有的挑着货担，有的乘着骆驼，为了路上安全，紧紧跟着军队。他们进疆之后，对于繁荣商业经济、开展内外贸易起到很大作用。人们对这些赶大营的

天津杨柳青人和山西骆驼客赞语有加，说他们对边疆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因此，当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和他们有着亲密的交往，在三区革命最初的动乱中，许多人的生命财产得到少数民族兄弟的保护。由于汉族居民较多，伊宁市汉人街上的汉族居民又比较集中，按照传统习俗和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信仰，春节之前这里制作的麦芽糖特别受人欢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是众多汉人家中送别灶王爷升天述职的日子，为了让他们升天之后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言好事，少说所居人家的过错，就得用糖粘住他们的嘴巴。因此，除在灶王爷神龛旁贴有“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对联之外，人们供奉麦芽糖便是一项重要的事情。当然，迎春之际许多人家用这种糖做的“元宝”等，也有以麦芽糖祝愿来年吉祥、财源广进的意思。麦芽糖也是人们冬季普遍喜欢食用的，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更喜欢吃的糖类。因此，这一节令是糖坊最繁忙最快活的日子。

在制作麦芽糖的繁忙日子里，作为一个年仅10岁的孩童，我由常常饿着肚子的生产淡季到可以吃到一些制糖的下脚料，也就很知足了，虽然累点苦点，但心里还算快活，特别是两位师傅在繁忙之中的说笑，更是给我的精神增添了快慰。他们常常说：“趁现在做糖，多吃点吧！不然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制糖的时候，他们像抻面那样拉动着糖块，有时还叫我试试，回族师傅说：“小弟，来！也来练习练习你的臂力，将来干活不但会有力气，会有巧劲，就是打起架来，你的臂膀和拳头也比别人的有力量。”有时我们切割完做芝麻棍子糖的糖条，余下的要做一种乒乓球大小的糖蛋，这是用一根固定在糖案上的麻绳一颗颗摞出来的，摞得多了麻绳就要发涩，平常都是把绳头用水蘸一下，有时嫌麻烦就用唾液过一下，每每要做这种蛋状的糖块时，小马师傅就说：“来，咱们该做唾液糖蛋了。”这种带有几分幽默的动作，也隐含着些许粗俗和玩耍的劣迹。那些日子主人也常常来到糖坊，有时还睡在为他准备的案头看我们做糖。

初春到来，天气转暖，糖蛋容易发黏溶化，我们麦芽糖的生产便

同左邻右舍的糖坊一样都停业了，主人开始打起别的主意。不久，他就买来一个用手摇动的石磨，让我一边守护糖坊，一边摇动那个脸盆大小的磨盘，给他研磨孜然、辣椒面、五香粉之类的调料，由他推销给烤肉摊和餐馆。我不停地摇动石磨，一天下来手臂就有些酸痛，多亏以前小马师傅要我同他一起把黏稠的糖稀拉来拉去，像拉面似的把棕色糖坨拉成雪白，我在这种劳作中锻炼出一点臂力，才能一天到晚转动石磨，但日复一日，手腕的肿胀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渐渐习惯，更使自己的臂力得到增强。

经营五香调料时间不长，主人又打起新的算盘，开始筹划新的营生。1945年初伊宁二林巴克飞机场被三区革命军攻占之后，国民党当局曾在那里留下几架残破的飞机，一些商人勾结机场人员倒卖飞机铝材，有的飞机就被肢解了，三区政府虽然对偷盗者进行惩治，但依然未能彻底杜绝，余下的飞机铝材还是悄悄流向市场。主人看到这一商机，就开始筹划翻砂做模具的生意，想用暗地里买来的飞机铝材熔化之后制成汤匙和糖块模具。一天深夜，他冒着被缉拿的风险，领着我到河湾附近一处偏僻的地方背回一个麻袋，回到糖坊我才看到麻袋里装的是一些银白色金属。此后，除了继续研磨五香调料，我又当起翻砂工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带着箩筐和口袋，到我住过的铁匠巴扎的金银首饰作坊捡木炭、筛炭灰，背回之后加上细砂和黏合剂制作模具，每天都是满身满脸木炭黑灰，除了充满稚气的双眼，全身再无清洁之处，几乎变成一个小黑人。街上的孩子们看到我这副模样，总是大喊一声："黑乌鸦来了！"大人们则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瞅着我这个黑孩子，有时还给我一点糖果以示关怀。

我在糖坊度过一年多的时光，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朝夕相处，从而感悟到人生的一些真谛。现在回想起来，苦难的生活虽然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它能使人变得坚韧、顽强、富有同情之心和感恩之心。在我幼小躯体所难承受的生活重压之下，长辈们送给的几粒糖果、几分钱币、一只烤馕、一只苹果或者一把爱抚，都会让我刻骨铭

心。也许那些对我施以爱心的人们早就忘了，但我对这点点滴滴的恩情始终没忘，而且懂得长大之后要尽可能地关照弱者。记得有一年的古尔邦节早晨，我同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并排站在清真寺前，当礼拜结束走出寺门的穆斯林把钱物送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我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齐声高喊："啊咪！"穆斯林也说："让胡达保佑你们！让我们共同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古尔邦节期间我最快活，可以在穆斯林人家吃到和到街上买到瓜果、羊羔肉、烤羊肉串、抓饭和包子，这也使我从中感悟到人间的爱心是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底层人们在交往中体现的固有的真善美，使一切民族的宗教的界限都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正是这样，我这个寄居在糖坊中的孩子，也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增强着生存的技能，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人生的旅途上，固然要寻找机会，把握机遇，把自己放在理想的位置，也要在苦难生活的磨炼中，把自己锻造成一个百折不挠、坚忍不拔、永不停歇、努力追求的人，这就是机遇和意志的统一，就是走向成功的信条。1944至1946年那段社会动荡、家庭不幸、自身困顿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是我后来作为普通劳动者能够成就自己事业的一种因子。

1946年，国民政府与三区领导人进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张治中率领国民政府代表团到达伊宁视察。这样，从1944年开始关闭的伊宁至乌鲁木齐公路得以开通，大量的伊宁市居民开始移居乌鲁木齐。运输公司汽车司机开着美国进口的"大道奇""雪佛兰""捷米西"等等，在伊宁至乌鲁木齐700多公里的公路往来穿梭。我的母亲出狱之后，便同我的继父及大哥武纯新一起住在乌鲁木齐。这年秋天，母亲知道伊宁的三区政府和乌鲁木齐的新疆国民政府不再打仗了，便请人将我和二哥带到乌鲁木齐与他们团圆。

我到乌鲁木齐后，被安顿在东风路口的乌鲁木齐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就读，一年后转入明德路小学，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46至1949年，乌鲁木齐一直动荡不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新疆省政府

被围攻，大十字商号被抢劫，第一中学学生示威游行，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经济崩溃……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中，我们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走上充满希望的人生旅程。随后，我就读于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学校，1952年调入新华社新疆分社，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

后　记

我退休之后，整理思绪，撰写这本新闻采访生活实录，但因身体不适，断断续续写了较长一段时间。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书，实得益于亲人与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大家为我付出了许多辛劳。给我提供老照片和资料的有杨楷第、张志文、杨俊甲、单兴德诸君，帮我进行文字校阅的有胡大军、王伯瑜、李梅诸君。我把他们列于书后，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